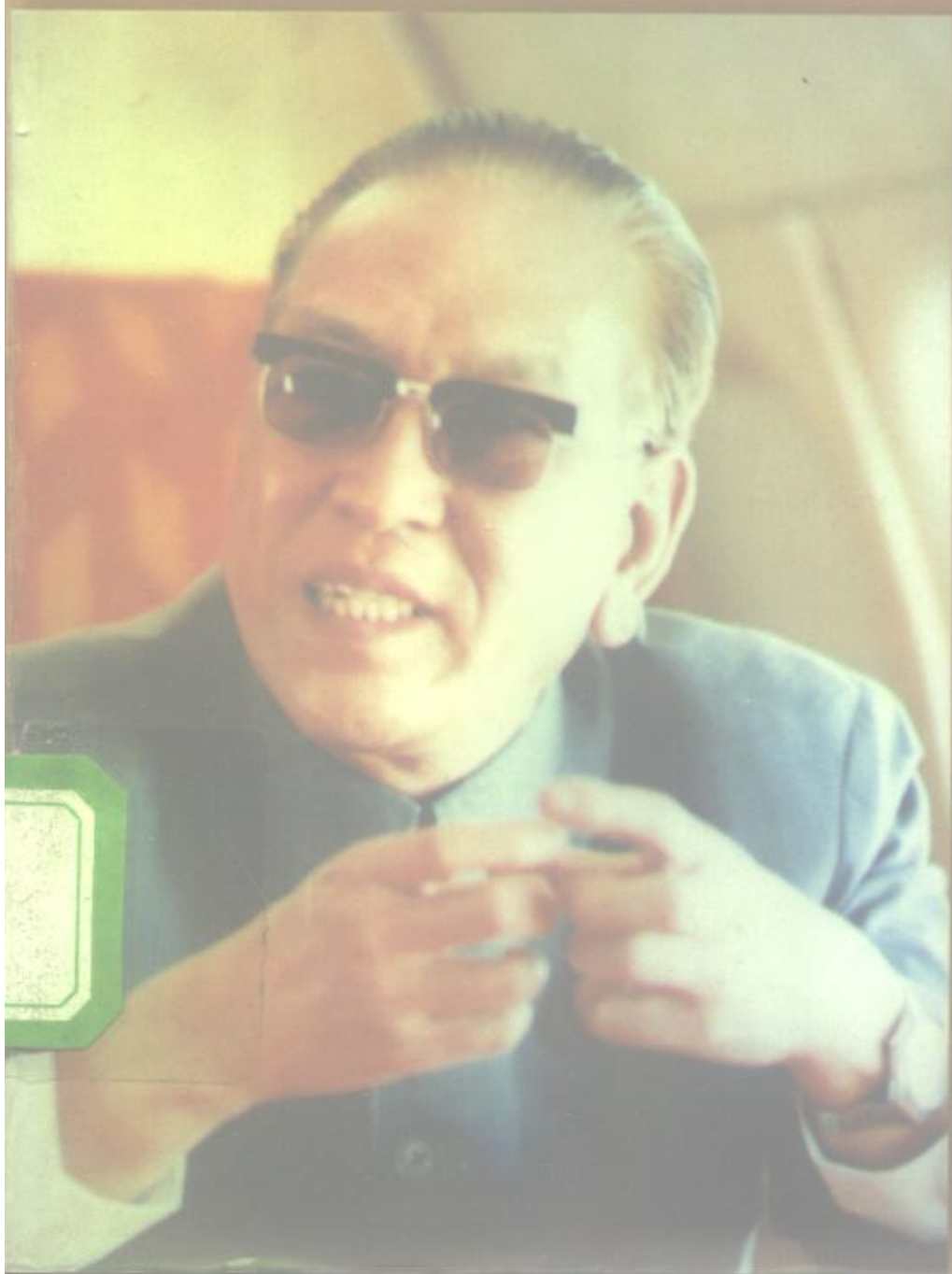


耿飏回忆录

(1949~1992)



目 录

第一章	脱下军装干外交	1
	将军荟萃外交部.....	1
	怀仁堂内学礼仪	13
	毛主席接见十大使	21
第二章	从北京到北欧	28
	奔赴斯德哥尔摩	28
	一人任三使	34
	第一次招待会	41
	与联合国秘书长的秘密会谈	47
	添砖加瓦砌“炉灶”	54
	无形的桥梁	62
第三章	南亚热浪	70
	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70
	“打开西面的大门”	79
	周总理访巴	88
	“援助是相互的”	98

DP99/3328

	“我们什么也不要”.....	105
	异国故人来.....	111
第四章	外交部内外	121
	副部长们.....	121
	签订边界条约.....	130
	陪同陈毅出访.....	137
	签订中国印尼友好条约.....	146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53
	种豆捕鱼打黄羊.....	162
第五章	再度出使邻国	168
	“又要你去当大使了!”.....	168
	“我们都是将军出身”.....	174
	海滩上的宏论.....	179
第六章	新中国外交正确辉煌	187
	挺直脊梁办外交.....	187
	坚持和平外交.....	195

	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203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211
第七章	风雨十年忆“文革”.....	220
	挨批斗琐记.....	220
	“策划人就是我!”.....	232
	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	241
	调任中联部长.....	247
	得罪“四人帮”.....	263
	心碑永存.....	271
第八章	春风又绿中华.....	284
	接过华国锋手令之后.....	284
	政务军务忙.....	296
	出访传友谊.....	302
后 记		312
附 录	耿飚的戎马生涯	蔡华同 313

第一章

脱下军装干外交

将军荟萃外交部

1950年年初，刚过阳历年，我们十九兵团司令部就忙开了。参谋们有的在起草文件，有的在核对资料，有的在打电话，我则在批阅一份报告。忽然，通讯员进来叫我：“副司令员！李政委和杨司令员请您过去一下。”

“老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李志民同志一见到我，就笑眯眯地对我说。

“什么？调我去干外交？”我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自参加红军之日起，我早已把自己和人民军队联结在一起；虽然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经过20多年战斗，现在已经打下革命江山，但我决心还要为保卫人民胜利果

实,为保卫祖国建设而继续紧握枪杆子;而且,从个人感情上说,我也舍不得离开长期在一起工作的战友,离开一道浴血战斗、生死与共的广大指战员。

杨得志同志和李志民同志从我的表情上看出了我的心事,就一唱一和地劝我:

“老耿,你以后还可以来兵团走娘家嘛!”

“枪杆子当然重要,但是搞外交也同样重要啊!”

“挑你,算是挑对了!扳着指头数,我们这里也只有你最适合搞外交!”

其实,他们不劝说,我也决不会不同意调动工作,因为:首先,对于中央的命令,我当然无条件服从;其次,我也明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我只是对部队、对战友以及对驻地人民群众,有一种浓郁的依恋之情,因而舍不得离开他们。

春节刚过,我便奉调携眷来到北京,临时住在华北军区招待所。招待所所在的隆福寺一带,是有名的繁华地区,孩子们一到,就嚷着要去逛街看热闹。但是,我却迫切地想去看看天安门。我把这个想法一说,孩子们鼓掌欢呼,连赵兰香手里抱着的仅两岁的小女儿,也在不停地拍着她那双小手,而且他们吵嚷着要求马上就去。于是,冒着摄氏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我们来到天安门前。

一阵寒风吹来,使我不由自主地赶紧翻起了军大衣的领子。当时,长安街南面棋盘街一带的房子尚未拆迁,天安门广场要比现在小得多;也许由于京郊的防风防沙林带尚未种植的缘故,那时广场上的西北风比现在要强

劲寒冷得多，吹在脸上和颈间，好像刀刮般地疼痛。所以，我急忙把孩子们的棉衣领子也翻起来。

虽然天气是这样寒冷，可是此刻我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

巍峨的天安门，在初春的阳光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仰望天安门城楼，我仿佛听见：毛主席在开国典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响彻云霄的声音，依然回响在广场上空。

记得数月前举行开国典礼时，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正在西北前线。当我们在司令部里，通过电波听到毛主席那庄严而洪亮的声音时，大家都激动地跳了起来。但是，我在欣喜中又觉得有些遗憾：未能处在天安门前群众的洪流中，直接聆听那开天辟地的一声春雷，亲身经历那伟大时刻的伟大场面！当时我就暗中告诉自己：下次去北京时，一定要到天安门前补上一课，补充体会一下当时激动人心的情景，以弥补未能亲身参加开国盛典的损失。

现在，我站在人民领袖宣布新中国诞生的地方，站在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下，不禁胸中热血沸腾，脑中思潮起伏……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北京。

回忆四年前，即1946年初，我奉中央的命令和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嘱托，第一次来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那时，我作为军调部我方代表团的副参谋长兼交通处长，在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的领导下，

4 耿飏回忆录

参加了和美蒋代表在谈判桌上的激烈斗争，还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监视。由于北平恶劣的政治环境，尤其是目睹北平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使我对这个古都产生了并不良好的印象，觉得这是个灰暗、阴沉、令人窒息的破旧大城市。

第二次来这里是在1949年初。那时我们第十九兵团参加了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迈着雄健的步伐，精神抖擞地举行了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面对着回到人民手里的新生的古都，我们的脸上都荡漾着胜利的微笑；军营里和城内城外，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到处飘扬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动人的歌声。

一年以后的今天，我第三次来到这里，感觉又是不同。因为，现在的北京，已经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这里，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朱总司令，一面指挥着向东南、中南沿海岛屿和西南地区继续进军，以便解放全中国，一面正在筹划绘制着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因此，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我此刻仰望着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国徽，在保持着革命胜利的喜悦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建设新中国”这副担子的重量。因为我知道，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胜利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标志着更艰巨的新的征程的开始。

长安街上有轨电车的“当当”声和孩子们的欢笑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这是什么？”

“那是哪里?”

孩子们用戴着棉手套的小手指指点点地发问,又一次打断了我的思路。

“这是华表。那是天安门。”我答道。

“华表是升旗的吗?”

“不,那边的旗杆才是升旗的;这华表是古代的东西。”

“古代用它来干什么?”孩子好奇心强,总爱打碎乌盆问(纹)到底。

我还来不及回答,另一个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叫天安门?”

“这个么,有个很长的故事,在路上说不完,等回去再给你们讲吧!”

清早,我开车来到外交部。这是一辆军用吉普车,我在十九兵团时经常开着它到各军的军部和部队基层去办事。这次来京前,李志民政委和杨得志司令员要后勤部把这辆车交给我带走。我考虑到外交部刚建立不久,车辆和司机一定缺乏,到京后自己带车可以减轻机关的负担,所以接受了他们的盛情。现在,我每天开着这辆吉普车到外交部上班。

今天,我心中异常高兴,因为昨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同志告诉我:周总理今天要我谈话。

我和周恩来同志已有许多年未见面了。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北平军调部的时候,那时他为揭露和挫败

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为争取国内和平而日夜操劳,面容显得消瘦。所以,当我走进总理办公室之前,头脑中自然而然地闪现出他当年的形象。可是,我一进门便惊愕地发现:周总理神采奕奕,显得比前几年还要年轻得多。虽然听说他刚出访苏联回来,在莫斯科时他协助毛主席和苏方经过 20 多天会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此刻在他脸上却丝毫看不见由于日夜辛劳和长途旅行所产生的疲劳迹象,反而满面红光,精神焕发,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中蕴含着充沛的精力。

“总理,您好!”我轻轻叫了一声。

“哦!耿飏同志,你来了!”总理那略带苏北口音的清晰、好听的声调,使我倍感亲切。

等我在他对面坐定后,周总理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把你从部队调来,是由于外交工作需要。”

周恩来同志的工作作风,素来以严谨、认真、踏实、细致而闻名。他在向部属交代任务时,必定要详细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背景材料、注意事项和有关情况。记得 1944 年 9 月,他要我把一个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带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行前,他向我详细交代了有关情况,连如何行军都作了周到的安排和布置。他的谆谆嘱咐,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又按照这一贯作风,向我详细讲述起建国以来数个月内外交战线的形势和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就得到苏联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承认,接着,

越南、缅甸、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后来改国名为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荷兰等国也相继发来贺电承认我国。

按照外交惯例,国与国之间一经互相承认,便算开始建交。但是,鉴于有些国家仍和逃到台湾的国民党集团保持着“外交关系”,所以我国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规定,坚持只有当这些国家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宣布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并同意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才能与之正式建交。因此,到现在为止,我国已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一些国家则在进行谈判之中。

随着外交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外交干部。这些干部从哪里来呢?主要的来源是:一,原来在解放区做外事工作的同志,曾在八路军驻重庆、西安等办事处和驻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还有在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二,从部队调集一批适宜做外交工作的同志;三,从文化界和其他部门调集一些熟悉外事和国际问题的同志;四,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大学生。

“现在,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同志早已赴任,但是驻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大使尚未派出。这次中央从各个野战军

调来一批领导干部,就是作为驻外大使的人选。”说到这里,周总理转过头去向坐在旁边的章汉夫副部长问道:“有几位已经来外交部报到?”

章汉夫同志扳着指头答道:“有袁仲贤、姬鹏飞、黄镇、王幼平、谭希林、曹祥仁、倪志亮、彭明治……”

“好!”周总理点点头,然后又对我说:“他们都将是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但是,把你调来,是准备任命你为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

“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面对这个意外的任命,我的声调中带着几分惊讶。

“怎么?有点出乎意料?”总理听出了我的惊讶之意,便问我:“你知道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吗?”

“不太了解。”我答道,“但我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还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听说,董必武同志曾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字。”

“是啊,”周总理似乎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露出了赞许的目光,“董老是当时三名中国代表之一。”

现在,那个已经不代表中国人民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还窃据着联合国内的中国席位。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就通过决议,不承认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出席第四届联合国大会的资格。建国后,周总理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严正指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立刻取消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大和联合国各

机构一切活动的权利。他还致电第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坚决否认蒋帮代表团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任命张闻天同志为出席联大首席代表，着手组建我国参加联大的代表团。1950年1月中旬，我国外交部发出照会通知联合国：中国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首席代表，要求将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立即从联合国及其所属各个机构中驱逐出去。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要作好出席联大的准备。”周总理说。接着，他看着我问道：“你对于这次工作调动，有什么意见？”

我连忙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一窍不通。”

“可以边干边学嘛！”总理笑着说，“再说，抗战时你不是曾经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吗？在北平军调部不是还和美蒋代表在会议桌上打过交道吗？实际上你已经接触过外事工作了。这次决定派你到联合国去，也是考虑到了你的这些经历。”

我十分佩服周总理的记忆力，在他日理万机的情况下，竟对许多年以前的这些细节，仍然记得这么清楚！

“可是，”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我对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开会程序等都不了解，尤其是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还不清楚，那怎么行！”

“这些，可以慢慢学嘛！”周总理翻开一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说，“至于我国的外交政策，这里

规定了它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为了独立，为了和平，为了友谊；反对侵略，反对战争。当然，目前我国的外交政策还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一边倒。你读过毛主席关于‘一边倒’的论述吗？”

“记得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谈过这个问题。”我回答。

“对！”周总理用他睿智的目光注视着我，“毛主席指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对没有第三条道路。现在帝国主义正在反对我们，正在处心积虑地企图颠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正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因此，我们当然不能倒向帝国主义，只有向社会主义一边倒！”

他喝了口水继续说：“所以，我国现在的外交任务，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其他友好国家建立友谊，加强团结，为争取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由此决定了我们的外交工作也有两个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这在联合国的工作中更要多加注意。”

周总理的这番教诲，使我顿开茅塞。特别是他概括的“为了独立，为了和平，为了友谊……”这几句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数十年中，一直是我国开展外交所遵循的原则，并从而形成了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参加了出席联大代表团的筹备工作。

张闻天同志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从遵义会议起,到延安时期的前几年,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革命经验丰富,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很高。他也是一位杰出的笔杆子,曾亲自起草富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并写有许多有份量的具有指导性的政策文件和文章。去年中央调张闻天同志到外交战线协助周恩来同志工作,后又命他到莫斯科去筹建驻苏使馆。建国前夕,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他为出席联合国大会首席代表(也是常驻联大代表团团长),就把他从苏联调回,改派王稼祥同志为我国驻苏大使。

当我向张闻天同志报到时,他异常高兴地对我说:“啊!老战友来了,欢迎,欢迎!”

我赶紧说道:“老战友这个称呼不敢当,您是老领导,又是我的老师。”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张闻天同志是在1934年中央苏区举行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那时他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会上作过一个生动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在红军大学第一期(从第二期起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洛甫同志(即张闻天)经常来校讲课,我曾多次向他请教理论问题,渐渐就熟悉起来。

“但是现在我不是老师了,我们共同配合工作。”他谦

虚地说。

“现在您还是我的老师，”我认真地答道，“我对外交一窍不通，全仗您把着手教呐！”

于是，我在张闻天同志领导下，投入了代表团的准备工作。当时，代表团还调集了一批熟悉外事和懂外文的干部，记得有柯伯年、黄华等同志。

正当我们紧张地准备时，忽然传来消息：由于美国的无理阻挠，新中国竟被继续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得到美国扶持的蒋介石集团，继续窃据着本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席位。……

不久，周总理再次召见我。他直截了当地说：“经过谈判，我国和瑞典已建立外交关系。中央决定任命你为驻瑞典王国大使。”总理接着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啊！”

我说，请总理对怎样开展使馆工作的问题作指示。

周总理思索片刻后说道，具体怎样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在这里只能谈些原则性意见。首先，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和别人打交道，所以凡事要慎重，遇事要多想，多分析研究，尤其是要多请示，不要自作主张。其次，要重视调研，重视总结，要在工作中学习、锻炼和提高。在观察国际形势和各国的情况时，要善于从一般情况中发现重要的问题，要学会“小中见大”。还要注意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使馆内部要加强团结，强调组织性、纪律性。要努力使瑞典成为我国和西方联系的纽带。同时，要支持瑞典等西北欧国家坚持中立的政策，和中立国家交

朋友,争取团结国际上的中间力量,越多越好……

向总理告辞后走在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直浮现着他的这句话:“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

怀仁堂内学礼仪

离开了驻联合国代表团筹建处后,我便到外交部参加首批驻外大使的学习。

在首批驻外大使中,有好几位是我的老战友。任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的姬鹏飞同志和我在延安时就相识;任驻匈牙利大使的黄镇同志在红五军团时我们见过面,长征中他编的一些短剧,使我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同志、驻波兰大使彭明治同志早在红军时期就和我一起战斗过;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同志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把我调到红四军去任参谋长,我们便经常见面;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同志则是我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友,北平和平解放后,我所在的十九兵团奉命向山西和大西北进军,为了加强军事通讯联络,上级把懂得无线电通讯技术的曹祥仁(时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调到十九兵团协助工作,于是我们并辔驰骋在华北和大西北的广漠原野上;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同志和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同志也是从部队调来的,我和他们虽未在一起工作过,却早已久闻他们的大名;还有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同志,是一位长期在内蒙古参加革命斗争和地下工作的蒙古族老同志,初次相识,竟一见如故。

外交,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个陌生的课题,全新的领域。因此,我们的学习,便要从外交的 ABC 学起。不但要学习国际形势、世界知识、我国的外交政策和未来驻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情况,还要学习外交礼仪,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

为了便于我们适应和熟悉外国的生活习惯,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办公厅找一个合适的饭店,让我们这批驻外大使连同家眷都搬进去住。

办公厅经过调查比较,最后确定把我们集中到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

大栅栏虽然地方不大,却和王府井、隆福寺一样,都是北京有名的热闹去处。这一带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旅馆,新华饭店就是其中较大的一家。

有几位大使和家眷本来都住在附近的解放饭店,所以搬过来很容易。而我家住的华北军区招待所离这里较远,好在那时行李比较简单,加上我自己有辆吉普车,连大人带孩子塞满一车,也就搬过来了。

要拿现在的眼光来衡量,这家新华饭店,按其规模和设备来看,别说“星”级,可能连中等旅馆都够不上。但在当时的北京城里,除了六国饭店和北京饭店外,挨下来大概就得数上它了。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甚至不自在。特别是睡在弹簧床上,整个身体好像陷在“坑”里,翻个身要花很大力气,还上下颤动,害得人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稳。但是,我们知道,对这些自己必须习惯起来,自在起

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习惯。

周总理对任何事情都想得十分周到。他要外交部办公厅给未来的大使夫人们请了一位老师，教她们学习外交礼仪。

这位老师名叫胡济邦，是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毕季龙同志(后来7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夫人。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当过驻苏联记者，又在原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担任过三秘，解放后回国参加外交部的筹建工作。

由于她外事经验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这些男同志也向她请教。她是来者不拒，有问必答，但是她的重点还是放在夫人们身上。

也真难为她了，要教会这些从山沟里、农村里和军营里出来的女干部和女军人学会穿旗袍或者“布拉吉”(连衣裙)，还要脚登高跟鞋，走路不摔跤，的确不是件容易事！可喜可敬的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她居然把她们调教得不仅在衣着打扮上能够适应外交场合的需要，而且在酬酢应对方面也都颇能符合外交礼节。

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些大使和夫人们，在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和胡济邦的率领下，全体人马开到北京饭店举行彩排。彩排的主要内容是吃西餐，包括怎样安排主人和客人的座位，怎样执刀弄叉，怎样切肉喝汤，怎样铺餐巾，怎样抹黄油等等，每个人都全过程地演练一遍，直到阎宝航和胡济邦点头满意为止。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对我们这些大使来说，更重要

的学习还是在于领会和掌握我国的外交政策、了解国际形势和驻在国情况,以及熟悉正式外交场合的礼仪。为此,外交部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为我们办了个学习班。除大使外,还有准备任命为参赞、秘书等具有外交官身份的同志,都参加了学习。

外交部特地邀请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驻华大使来学习班讲课,介绍国际和有关国家的情况以及他们自己的外交工作经验。此外,我们还参加了一些活动,如参观苏联驻华大使馆等。

有一次,我和黄镇、曹祥仁等同志就外交礼仪问题交谈,大家都希望外交部派人来向我们讲解一下有关呈递国书的仪式。因为,大使出国上任后的第一个重要外交活动,就是向驻在国国家元首呈递国书。但是,呈递国书有些什么程序和礼节,要说些什么话,我们一无所知。

正当我们谈得热烈的时候,阎宝航同志推门进来。

“老阎,来得正好!就请您给我们讲一讲怎么呈递国书吧!”阎宝航早年曾在英国留学,抗战前曾担任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主席,对外交礼仪很熟悉,所以就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

“啊,不行,不行!”他忙不迭地摇手,“我又没有当过大使,能讲出什么名堂!不过,我可以把你们的这个要求反映上去。”

不久,他兴冲冲地来告诉我们:周总理指示,过几天有位东欧国家驻华大使向毛主席呈递国书,到时安排十位驻外大使去现场观摩学习。

“那太好了！”

“这是个好机会！”

有的同志进一步提出要求：“呈递国书仪式完成后，能不能请毛主席对我们作指示？”

阎宝航说：“这个我再给你们反映一下。”

呈递国书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内举行。当我们走进怀仁堂时，只见接见大厅已经布置妥当，但是并没有我们的位置。我们在哪里观摩呢？是站着看，还是坐着看？——我正在猜想时，工作人员却过来把我们分别引进大厅旁边的几间小屋里。

小屋和大厅只隔着一排窗户。那时的窗户并不是玻璃窗，而是在窗格上糊着洁白的窗纸。屋内有桌子、椅子。

“喔，这是休息室。”我说，“是不是等会儿举行仪式时要站着观看，所以先让我们在休息室里坐一会儿？”

“不，”工作人员笑着回答，“你们几位就在这里观看。”

“怎么？在这里观看！”大家都感到意外，纷纷议论起来：

“隔着一道墙，怎能听得清楚？”

“窗户纸不透明，也看不清呀！”

这时，周总理来了。他在察看了大厅的布置和各项准备工作后，走进我们所在的小屋，用欢快、爽朗的声调向我们打招呼：

“同志们好！你们看，在这里观摩，条件还不错吧？”

“总理您好!”我们纷纷站起来,和周总理握手。

“这里有桌有椅,条件倒是不错,只是……”有位同志说了半句,迟疑地停住了。

“只是什么?”周总理问道。

“只是隔了一道墙壁,变成‘壁后观’了!”

周总理笑着说:“只是隔着一排窗户嘛!这不叫‘壁后观’,这叫‘窗下学礼’。”

我们听后,脸上都呈现出会意的微笑。

忽然,周总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窗户纸上一个约有桂圆那么大的窟窿,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有位同志答道:“我想看得清楚些,所以……”

周总理点点头:“这倒也有道理。不过,这个窟窿太大了!要是你们每人捅这么大的窟窿,十个大窟窿排成一排,容易被人发现,就会失礼!可是,隔着窗户纸,确实看不见。要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他考虑了一会,忽然从桌上拿起一支削好的铅笔:“有了!我看不如用铅笔尖戳个小洞,这样既可以看到,又无伤大雅。”

“洞太小了,恐怕看不仔细。”有人说。

“小中见大嘛,”周总理一面用铅笔尖在窗户纸上戳孔示范,一面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

我听得这句话,不禁想起了不久前周总理对我的指示:在观察国际形势和各国的情况时,要善于从一般情况中发现重要的问题,要学会“小中见大”。把这两句话一对

照，我体会到周总理现在所说的这句话，不仅指的是从窗纸小孔中观看大厅里的仪式，而且有着更深刻的涵义，即教育和勉励我们要善于从“小事”中观察和了解国际上的大事；而这一点，正是每个驻外大使所必须学会的本领。

这时，毛主席和外宾都已抵达，呈递国书仪式即将开始，所以周总理立刻离开小屋，向大厅走去。

我们分别从铅笔尖戳出的小孔中向大厅观看。

开始时，由于孔太小，看不清。后来，通过调整距离、变换视角……逐渐适应，终于看清了接见大厅里的活动。

近来看到有的书籍和报刊文章中说，当时我们这些驻外大使们躲在屏风后面观礼。其实，我们是在窗户后面观看。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有的同志嫌窗户后看不清楚，所以悄悄走出小屋，到大厅里的屏风后看个痛快。如果确有这种情况，那么我并不知晓，因为当时我的全部注意力，正透过窗纸上的小孔，集中在接见大厅里的那位东欧国家驻华大使身上：

他此刻已站在毛主席面前，双手捧着国书准备呈递。毛主席面露笑容，神色显得庄严而亲切。那位大使一面呈递国书，一面口中致辞。看来他的口才很好，讲了有好几分钟。

我一边听着，一边暗想：以后我在呈递国书时，也应当像他那样流利地致辞；但是，要是致辞中突然“卡壳”了，那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在我脑中不断盘旋。等毛主席致了答辞、整个仪式结束后,我便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和大家研究。恰好别的同志也有类似的问题,于是就讨论起来。最后,得出两点共识:一是致辞应有所准备,预先有个腹稿;二是在举行呈递国书仪式前,应该先行预习多次,务必使走路的步伐、站立的位置、呈递国书的姿势都符合要求。

“那何不趁热打铁,现在就来演习演习呢!”有的同志提出建议。

大家赞成这个建议。于是,说干就干,我们就在小屋内演习起来。

正在这时,周总理又走了进来。他看见我们正在演习,一面点头表示赞许,一面笑着说:

“你们演习是必要的,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刚才仪式中的程序和动作,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各个国家对呈递国书仪式中的礼仪规定各不相同。所以,你们上任后,要向驻在国的礼宾部门虚心请教,取得他们的帮助和配合。”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满面笑容地说道:

“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接见你们。”

我们听得毛主席要接见,都喜出望外,便兴高采烈地随着周总理向大厅走去。

毛主席接见十大使

我和毛主席已有五六年未见面了。此刻，我看着面前这位伟大领袖的魁梧身躯和他那透着红光的笑颜，心中不禁涌起一种交织着崇敬和喜悦的感觉。

毛主席一面和我握手，一面风趣地说：“喔，老乡来了！”

我的老家和毛主席的家乡都在湖南东部，相隔不远。1939年，我的父亲到延安，我陪着他去拜访毛主席。毛主席拉着我父亲的手亲切地说：“我们都是湖南老乡，欢迎你到延安来。”接着，他向我父亲询问了许多关于家乡的情况。所以，后来毛主席也称我为“老乡”。

“主席，您好！”我紧握着毛主席的手说。

毛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长征时我在你那儿吃过西瓜，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还有那顿饭吃得很好；在延安还吃过你送来的老虎肉……”

毛主席所说在我那儿“吃过西瓜，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指的是1935年秋冬之交，红军长征到达甘肃东部时候的事情。10月初的一天下午，毛主席和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博古、王若飞等同志，一齐骑马来到驻在通渭县城的红军第一大队队部。我当时任大队参谋长，大队长是杨得志同志。我们一商量，决定由杨得志向他们汇报工作，由我负责招待。我见大队部的伙房里穷得一点油水也没有，便拿出几个银元，到城内一家饭馆里订了两桌酒席招待他们。酒席摆好后，刚要分别入座，毛泽东同志忽然

挥了挥手，连连说：“合兵！合兵！”当时把会师叫做合兵。于是，我们将两桌合在一起。大家频频碰酒碗，为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而干杯。饭后，我命人撤去残席，搬上几个西北大西瓜来。毛主席见到西瓜，很高兴，就叫把一盘辣子留下。他把辣子、米醋、酱油一齐抹在切开的西瓜上，边抹边说：“这叫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吃起来香得很哩！”周恩来副主席也笑着说：“这是‘五味西瓜’！”张闻天同志开始时不敢吃这“五味西瓜”，因为他怕辣，后来见毛主席吃得津津有味，又禁不住毛主席一再劝说，便也尝了一口。可是，这一尝不要紧，只见他愁眉苦脸模样，连连摇头叫道：“太辣！太辣！”毛主席哈哈大笑说：“吃辣子的人最革命嘛！”这句幽默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至于“吃老虎肉”，那是抗战初期的事。当时，我任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和王维舟旅长兼政委一起，率部驻守甘肃庆阳一带，保卫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我们率领部队到庆阳东北的大山里开荒屯田。那一带野兽很多，不但糟蹋庄稼，而且虎豹等猛兽还经常咬伤人畜，妨碍我们开荒种地。因此，王维舟同志要我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不像现在要保护珍稀野生动物，我就组织了数十名战士，开展打猎活动。一个月下来，我们打到了包括老虎、豹子和狼在内的许多野兽。我派人把一只老虎送到延安，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滋补身体，还送了些虎骨给他们泡酒防治风湿。送去的同志回来告诉我：毛主席看见送来了老虎很高兴，对朱总司令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它举起来？朱德同志试了试

说，不行，得吃掉“九牛二虎”才有那么大力气呢！

现在，听毛主席这么说，周总理也想起了当年在通渭吃“五味西瓜”之事，所以接着毛主席的话茬说：

“可是，今天这里没有‘五味西瓜’和酒席招待你们，只有白水一杯！”

毛主席在和姬鹏飞、黄镇等同志握手时，也说了些很风趣的话。有几位大使，毛主席不熟识，周总理就在旁边介绍。

等大家都坐下后，毛主席先环视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说：

“听说你们不久就要出国赴任了，总理要我和你们谈一谈。……”

我在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时，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所以，现在看见毛主席讲话，就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记录起来。记得那天连同毛主席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插话，约摸记了半个本子。可是，这个记录本后来被康矛召同志借去了，“文革”后他万分抱歉地告诉我：记录本没有了，十之八九是被造反派抄走了。我感到遗憾，但也无可奈何。因此，如今只能根据回忆来记述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的谈话内容。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当然这首批中应当包括已去苏联的王稼祥同志），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需要干部。我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干

部。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历来是我们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

这时，有的同志提出，我们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

毛主席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么，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

周总理点点头，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说，当大使的能懂外语当然更好，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条件。你们在使馆，可以学习驻在国的语言，边干边学嘛。

我们都表示赞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见。

毛主席幽默地说，我刚才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

周总理笑着插话：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喔，想起一件事。”毛主席露出认真的表情，“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恩来，你看怎么样？”

周总理点头：“同意。”

毛主席继续说，第二，你们中间有好几位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当然，政治部主任也善于调研。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

周总理说，主席说得对，打仗前参谋长要对敌情、民情和战场的地形、环境等进行周密的调研，做外交工作也同打仗一样，要了解驻在国的风土人情和各种情况，才能做好工作。

接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又谈了怎样通过公开的途径，如阅读报纸、参观访问、和别人交谈等，来进行调研，以便增进对驻在国的了解，学习别人的长处，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毛主席说，刚才谈到，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但是，话又得说回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你们还是要像总理刚才所说的，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研。而且，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凡事都不会孤立地存在，要看到事物间的联系。比如，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冷却塔，再观察一下周围，看到配套的建筑设施，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电厂。再如一个国家要出兵，事先总有很多迹象，如动员、军事运输增加以及舆论变化等等，通过对这些迹象的研究，就可以得出是否要打仗的结论。从报刊和书本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东西。有时，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经过研究，也许能从中发现一个大问题。

周总理说，我们要学会“见微知著”。

毛主席说，谈到调研，我们不妨学学宋代的沈括，他

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把那里的城镇关隘、山脉河流,详细记载下来,并绘成地图,还把当地的土地物产、风俗人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当朝廷派他和辽国进行划分边界的谈判时,他对有关数据、资料十分熟悉,脱口而出,对答如流,使辽国占不了便宜。

毛主席抽了一口香烟,继续说道:总之,要重视调研,重视学习。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资本主义的政治不能学,但是他们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中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学是为了用,要把学到的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

说到这里,毛主席看着我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毛主席特别指出: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

接见快结束时,周总理补充说,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使馆内要有严格的纪律,要加强组织性。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这些指示,对我以后在使馆的工作,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学习班结束后,外交部又正式公布了去各国的大使、参赞和秘书的名单。

由于当时我国与丹麦的建交谈判也已取得成功,两国决定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所以,在宣布我为驻瑞典王

国大使后,还加了一个兼职,即兼驻丹麦王国公使。第二年初,我在瑞典又接到国内任命,命我再兼任驻芬兰共和国公使。

于是,我们全体驻外使馆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便精神抖擞地抓紧各项准备工作,准备踏上新的征程。

第二章

从北京到北欧

奔赴斯德哥尔摩

1950年7月初，外交部催促我即刻赴任，因为瑞典驻华大使已经来到北京上任。

当时到欧洲去，不像现在有民航班机，一般是乘火车经莫斯科转赴各国。

我偕同使馆的外交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连同家属共二三十人，乘坐国际列车，离开北京向莫斯科进发。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国际列车，也是第一次出国。

1950年，在我的生涯中是充满了许多“第一次”的转折之年：第一次从部队转入外交战线，第一次当驻外大使，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吃西餐，第一次越过国界，第一次途经列宁的故乡……后面还有许多“第一次”在等着

我：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第一次乘坐国际海轮，第一次来到北欧国家的首都，第一次呈递国书，第一次进行外交拜会，第一次举行招待会，第一次举行外交会谈……

出了国门后，列车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向西行驶。

这列火车是苏联的列车，虽然是国际列车，却比我们国内的火车还要陈旧。每节车厢之间不是用挂钩，而是用铁链拉住，车子一开，就咣当一声；一停，又是咣当一声，震得人头脑发胀。有一次铁链没有挂好，两节车厢脱开，前面半列车已经到站，我们后面的半列车还在铁路上慢慢地蹒跚着。

看着这种情景，我心中不禁暗想：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给苏联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损害。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五年，但是苏联的经济还没有从战争的严重创伤中恢复过来。

这样的火车，车速当然很慢。幸好当时是夏天，可以沿途看看西伯利亚的风光，才帮助我们度过了这漫长的旅程。

经过贝加尔湖时，我透过车窗凝神注视着这个浩瀚的湖泊。这不仅是因为美丽的湖光水色吸引着我，更主要的是，那青青湖畔草使我想起了苏武牧羊的故事。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位满目悲愤、满怀忠贞的汉朝使节，在遍地绿草中或漫天飞雪中，手执牧羊鞭，高举汉朝的符节，踽踽在当时属于匈奴境内的北海（即今贝加尔湖）边。苏武，这位千古留芳的铮铮铁汉，留居匈奴 19 年，终于等来了汉匈和亲，为民族和解与民族团结立了大功，而他那威武不

屈、忠贞不渝的崇高情操，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以后，我又有几次经过贝加尔湖，但都没有机会再看到它那壮美的身姿。因为，那几次都在冬天，车外是摄氏零下 50 多度的严寒，车上虽然有暖气，但车厢内的温度仍为摄氏零下 20 度左右。车窗的玻璃上结满了冰，所以根本看不到车外的景色。

经过伊尔库茨克后，前面展开了更为漫长的旅程。屈指算起来，一共行驶七天八夜，列车才喘着粗气驶进了莫斯科车站。

一到莫斯科，我们立即通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同瑞典外交部联系。但是，得到的回答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原来，每年的 7 月和 8 月，是瑞典法定休假期。现在，瑞典国王和王室成员已离开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王宫，到一个岛上休假去了，外交部的官员们大也都去休假了，只有少数工作人员留守值班。所以，这位值班人员希望我们到 9 月份再去瑞典。

根据这个情况，我召集同志们商量。大家认为，既然瑞典国王不在首都，我们去了也无法呈递国书，而且和瑞典外交部及其他政府部门也无法联系工作，那就只好在苏联逗留一段时间。

我基本上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大队人马可暂留莫斯科，但是要派两三个先遣人员，先赴斯德哥尔摩做建立使馆的准备工作。最后，决定派郝汀参赞、英语翻译顾亟等三位同志先去瑞典。

这件事给了我们一次深刻的教训,也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要加强外交调研的指示十分正确,十分重要。其实,当时瑞典驻华大使已经到任,外交部有关部门与瑞典驻华使馆常有接触,我们只要向他们了解一下瑞典国内的有关情况,就不至于在莫斯科滞留了将近两个月之久。

在莫斯科滞留期间,我们去参观了著名的红场,并瞻仰了列宁陵墓。

到红场拜谒列宁墓,是我和许多战友长期凝聚在心头的共同愿望。记得1935年初红军长征到达松坎时,我和杨成武同志在行军战斗的间隙,一面靠着土坎晒太阳,一面交谈。当谈到革命胜利后的愿望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到莫斯科去瞻仰红场和列宁陵墓。

如今,我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自然异常高兴。尤其是在瞻仰列宁遗容时,我的心中无比激动。从他那坚毅的脸容中,我似乎看到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俄国十月革命时振臂高呼、指挥工人赤卫队向冬宫冲击的壮烈场面;与此同时,我还想起了毛主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言。是啊,列宁不仅是俄国革命的领袖,他的伟大思想也指导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因此,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今天,我来拜谒列宁陵墓,见到这位革命伟人的遗容,心情之激动自不待言。

但是,对于红场的观感,却和我原来的想像有些差距。本来,在我的想像中,红场一定十分宽广,十分壮丽。

可是,一见之后,才知道并非如此。它不仅比不上现在的天安门广场那么宽广、壮丽,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它也不如我们建国初期的天安门广场那么雄伟。尽管如此,由于红场是列宁陵寝所在之地,又是苏联首都的中心,因此,我依然对它保持着敬仰之情。

然而,使我们感到迷惑甚至失望的,是当时在莫斯科观察到的一些社会和经济情况。

商店里的货物并不丰富,而且价格昂贵。服务行业的价格也很高。我们下榻的苏联大饭店,论设施是中等水平,但房费很贵,平均每个房间要 200 多卢布,合人民币 100 多元。和当时我国的旅馆价格相比,实在贵得令人咋舌。一张公园门票要合人民币 10 多元,而当时北京的公园门票才 5 分钱。尽管按照苏联政府规定,服务行业不得收取小费,但事实上到处要小费。从火车上下来,即使自己提行李,也要付小费,而且要付三四次小费,才能进入旅馆的房间。旅馆的服务员每天要收小费,平均每个房间为 5 至 10 个卢布。到饭馆吃饭,必须先给小费,饭菜才能较快端来。

付小费,在西方国家是很平常的事;当时在我国的许多城镇,由于刚解放,饭馆和旅馆中收小费的现象也存在,但没有这样严重;可是,在苏联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明令禁止的情况下,这种陋习仍如此普遍,这不免使我们感到纳闷。更有甚者,在旅馆附近和马路边,发现有些浓妆艳抹的女子在游荡,她们的目的不言自明。这种现象更使我们感到困惑。

我们当时在议论这些情况时,都把它归因于二次大战结束不久,遭受严重战争创伤的苏联百废待兴,还来不及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大家心中总还有些疑虑。后来,当我国采取有力措施消除了社会上类似的落后和丑恶现象后,经过对比,我才明白这是个政策正确与否的问题,以及是否抓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

在莫斯科时,我还去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因为我在部队时,就很想了解苏联军队的作战方法有些什么特点,和我军在战法上有什么不同,现在参观学习的机会就在眼前,怎能放过?在参观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展览厅里的几个大沙盘,有库尔斯克战役的,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参观者站在楼上往下看,沙盘中红军、蓝军的攻防进退标志十分鲜明。这些战役的规模都很大,都是大兵团正面作战,往往由几个集团军乃至方面军协同进行阵地战。作战双方都是机械化部队,拥有许多飞机、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特别是在介绍库尔斯克战役和乌克兰战役的沙盘中,遍地都是苏军坦克。

在莫斯科停留了将近两个月,到8月底,派去斯德哥尔摩的先遣人员来电,说瑞典外交部通知:现在可以赴瑞。

于是,我们一行便在9月初离开莫斯科,取道列宁格勒,搭乘一艘客轮,犁开波罗的海的碧浪,向瑞典进发。

这艘吃水约3000吨的轮船,不是直线开向目的地,而是先沿着芬兰湾北面的海岸线绕行,中间还在芬兰的港口停泊,然后再穿越波罗的海。所以,航行了整整七天,

才于10日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在这并不太长的海运线上所花的时间,竟和从北京到莫斯科的铁路线上所花的时间差不多,这表明当时北欧的交通也不方便。

一人任三使

俗话说:“凡事开头难。”古语云:“创业维艰。”这两句话语,确是我们在北欧建立第一个使馆的真实写照。

我们刚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时,全班人马都住在旅馆里,办公和会客也在旅馆。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在旅馆里办公呢?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凡事开头难”。我们这些赤手空拳的远方来客,要在异国他乡建立起一个大使馆,真是谈何容易。首先遇到的就是房子问题。而在当时的斯市,要找到合适的房子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即使目前暂住的旅馆,也全靠三位先遣人员的艰辛努力,才得以找到。

据郝汀和顾亟两位同志后来告诉我,他们三人(还有一位机要员)先行抵达斯市后,便去瑞典外交部礼宾司联系。礼宾司的一位值班人员把他们安排在靠近郊区的一个私人公寓内租了几间房子居住。住了几天后,他们觉得住在私人出租房内不太妥当,到市区去办事也不方便,就自己遍访市内找寻住处。几经奔波,好不容易在市中心找到了一家广场旅馆,包了几个房间,兼做住房和办公室,包括一间机要员的保密室。

有了落脚点后,就加紧和瑞方有关部门进行联系。在

邮电局登记了电报挂号,以便和国内及莫斯科我的住处联系。在银行建立了汇款账号,以便国内将建馆经费汇来。同时,他们继续四处奔波,为大队人马的到来准备住处。

当时斯德哥尔摩旅馆常常客满,在市内很难找到供我们二三十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所以,他们便把目光转向郊区,终于在一个旅游区找到一个较大的休假旅馆,订了一套房间作为大使住房兼会客室,又在旁边一个较小的休假旅馆订了若干个房间,供使馆其他人员居住和办公。我们大队人马刚到瑞京时,住的正是这两个旅馆。

住了几天,我觉得在休假旅馆办公和会客,总是有些别扭,就叫顾亟同志再去寻找合适的住处。小顾走遍斯市,终于在斯德哥尔摩大旅馆为我订到了一套房间,使馆其他人员则住在附近另一个旅馆。斯德哥尔摩大旅馆规模较大,有大型的宴会厅和其他公用设施,半个多月后我们就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国庆招待会。

举行国庆招待会后不久,我们又从旅馆迁出,迁到斯市边缘的一个岛上。从市区出来,过一座桥,就是我们的使馆和大使官邸。由于这是购买的空房,屋内没有家具,也没有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具。所以,一切器具用品,都要从头置办。有些物品,还要大家动手加工。例如,所有窗户上的窗帘,都是由使馆的女同志缝制的。

后来,在这个岛上住了两三年后,我们才在斯德哥尔摩市内买到房子,于是使馆便迁入新址。至此,建馆工作中的房子问题,才算得到解决。

建馆伊始,工作千头万绪。在找寻房子的同时,我抓紧时间拜会瑞典外交大臣——安顿,向他递交我国外交部的信函。这是一次礼仪性拜会,同时也是为了商议呈递国书事宜。后来,我们又同瑞方礼宾部门官员就呈递国书的日期和仪式等问题多次磋商。

瑞典虽然地处欧洲北部,和中国距离遥远,但它对我国友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几个西方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和我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同时它一直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国际关系中,瑞典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不参加军事条约和军事集团,因此它能比较客观地对待和处理当时的东西方关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瑞典王室和政府十分重视新中国首任驻瑞特命全权大使的到来,并对我此次呈递国书的仪式显示了特别的关注。

1950年9月19日,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因为在这个日子我第一次向一位外国元首呈递国书。那天,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派了一辆六乘王辇(这种由六匹马拉的高贵华丽的轿车,是王室专用车辆)来接我去王宫。瑞典外交部的陪同官员告诉我:“这次王储特派六乘王辇来接,表明对贵国和大使阁下本人的重视和尊敬。”

我带着翻译顾亟乘坐王辇来到王宫。只见宫门两侧肃立着两排警卫,他们身穿古代武士的服装,头戴绒毛蓬松的高帽,腰佩短剑,给人以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进了王宫大门,有一个院子,甬道两边也排列着卫队。院子后

的门厅里、楼梯上以及楼上的过厅内,都有卫队排列成行。这么多的警卫,为这次呈递国书仪式增添了隆重的气氛。

我刚走完楼梯的最上一级,便听见在过厅中迎候的礼宾官用英语高喊了一句。机敏的顾亟赶快告诉我,他喊的是“中国大使耿飚将军到!”哦,我明白了,礼宾官的高喊,一方面是迎宾礼仪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向过厅后面房间内的国王通报我已来到。

当我跨进房门时,看见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陛下正坐在房间中央,王储站在他的侧后。面对这位须眉皆白的老国王,我的脑海中瞬间掠过了从阅读资料中了解到的关于他的经历和政绩。他生于1858年,现已93岁高龄。作为前国王奥斯卡二世的长子,他从1872年“瑞(典)挪(威)联盟”时起,已是瑞典和挪威的王储,并于1884年任挪威副国王,直到1905年挪威脱离联盟而独立为止。在此期间,他先在大学中学习经济学和历史,后在军队服役,并曾获得中将军衔。他于1907年就任瑞典国王后,致力于各项政治改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严守中立。1939年苏(联)芬(兰)战争期间,他主张援助芬兰,但反对瑞典直接干预。这些似乎为以后瑞典在国际关系中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开了先河。

我怀着尊敬的心情,趋前几步,双手恭敬地将国书递上。

王储代国王接过国书。没等我致辞,国王便客气地请我坐下交谈。

在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国王的问候、中国人民对瑞典人民的友谊后,我接着说:“今天能够晋见古斯塔夫五世陛下,感到非常荣幸。我将为增进中瑞两国间和两国人民间友好合作关系而作出不懈的努力。”

国王点点头说:“谢谢!”接着,他询问了新中国的有关情况。我一一作答。

忽然,国王举手指了指房间内陈设的瓷器说:“这些都是中国瓷器。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我喜爱中国瓷器,也十分仰慕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我表示:瑞典的历史文化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希望中瑞两国的文化交流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

交谈了几分钟,我见国王年事已高,不宜过于劳累,就告辞退出。

这次呈递国书,用坐下交谈来代替宾主双方相互站着致辞,不仅别开生面,而且也在庄严、隆重中增添了一种亲切的气氛,从而体现了中瑞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这是我首次见到、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老国王。不久,老国王逝世。王储阿道尔夫继位,即古斯塔夫六世国王。

在这次呈递国书仪式中,我有幸结识了王储。他是古斯塔夫五世国王之子,生于1882年。20岁时参加瑞典陆军,50岁时晋升为上将。1950年10月继任王位时已经68岁。年轻时在大学学习历史和考古学,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很感兴趣;尤其令人欣喜的是,他和老国王一样,特别喜爱中国的陶瓷,乃是瑞典研究中国陶器的权威。他任国王后,我曾多次晋见他。他让我参观王宫中陈

设的中国陶瓷,果然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有一次交谈中,他盛赞中国的京剧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并兴致勃勃地告诉我,20多年前曾到过中国,欣赏过梅兰芳演唱的京剧。那次梅先生演一个皇后(当时我想可能是《贵妃醉酒》中的杨贵妃,后来才知道是《霸王别姬》中的虞姬),通过舞蹈和眼神,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她的心态。他说:“我虽然听不懂唱词,却通过梅先生的表演,不仅领会了剧情,而且领略了京剧的艺术魅力。梅先生真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

他还拿出一个装在锦盒内的印章说:“那次我和梅先生交了朋友,梅先生特地把他的图章送给我留念。”我接过印章仔细观看,发现这是一枚精致的名章,其石料为黄色的寿山石,这是一种很珍贵的治印石料,上面的篆刻笔力遒劲,刀法精湛,堪称印章中的上乘之作。这些都说明瑞典王室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较深的渊源。

呈递国书后,我就忙于拜会瑞典王国政府的塔格·埃兰德首相、各部的大臣、官员以及议会负责人,还拜访了一些国家的驻瑞典使节。

埃兰德首相对我国也很友好。他于1928年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曾先后担任隆德市议会议员、瑞典下院议员、国家人口调查委员会和建筑委员会主席、政府不管部大臣、教会和教育大臣及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1946年任政府首相,并当选为社会民主党主席。他在执政期间,推行了多项政制和社会改革。在我和他结识后的第二年,即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后他被推举为名誉主席。正

是在他的领导下,瑞典政府及其各个部门,和我们使馆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和有效的协作,从而为中瑞两国间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驻瑞典使馆的工作初步开展后,我先后赴丹麦(1950年11月)和芬兰(1951年3月),去筹建驻丹、驻芬使馆,并分别向丹麦国王斐德烈九世和芬兰共和国巴锡基维总统呈递了国书。

丹麦国王斐德烈九世是前国王克里斯蒂安的长子,1912年立为王储。二次大战期间,他支持反对德国占领的丹麦抵抗运动。1943—1945年间,他与其父王一起被德国监禁,1947年继承王位。王后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尔夫的女儿英格丽德公主。他们的长女玛格丽特·英格丽德后来任丹麦女王,即玛格丽特二世。

芬兰总统巴锡基维早在本世纪初就是芬兰内阁成员,后来因为不满沙皇俄国在芬兰推行俄国化政策而退出内阁。1917年芬兰独立后任内阁总理。在苏芬战争期间,他努力促成与苏联媾和并认真执行媾和条件。二次大战后再次出任总理,并于1946年当选为总统。

斐德烈九世国王和巴锡基维总统均对我国友好,这十分有利于我们驻丹、驻芬使馆顺利开展工作。

由于我身兼驻瑞典、丹麦、芬兰三国的首任使节,而且三个使馆均处于草创之际,所以工作的纷繁可想而知。加以我初次出使外国,外交经验缺乏,更增加了工作难度。但我遵循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诲,凡事均认真进行调研,一切工作都从头学起,边学边干,在学和干中逐渐克

服困难,积累经验。

我特别注意经常向国内请示报告,处理外交事务时始终以我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为准绳;同时,在使馆内部,多和同志们商量,依靠使馆党委的领导,发挥集体的智慧和群众的积极性。正是这样,才使我们的建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较好地完成各项任务。

第一次招待会

在向瑞典国王呈递国书后,使馆全体人员便忙于准备国庆招待会。

这是我们使馆举行的第一次招待会,也是我们驻外大使在西方国家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所以,不仅我和使馆全体人员对此十分重视,国内也很关心此事。

为了使国内了解这次国庆招待会的情况,我布置有关人员把招待会拍成影片,以便送呈外交部审阅。

国庆招待会在我所居住的斯德哥尔摩大旅馆举行。约有 500 位贵宾参加了这次盛会,其中包括瑞典的内阁大臣、政党领袖、议会议员、军方人士、外交部官员、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官员和市议员、社会名流、华人华侨代表以及各国驻瑞使节。这么多人把偌大的宴会厅挤得满满的,热闹非凡。

招待会的气氛热烈而友好。宾主一面交谈,一面频频举杯,为中瑞友谊、为新中国和瑞典各项建设的发展、为两国领导人的健康而干杯。

这次招待会在瑞典政界、外交界和新闻界产生了较

大的反响。瑞典报纸和电台在报道时称：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斯德哥尔摩可以称得上是盛况空前，得到了瑞典各界人士的赞誉，中国外交官首次向公众展示了他们的外交才能，有利于瑞典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等等。

通过这次国庆招待会，我和使馆的外交官们扩大了接触面，结交了不少朋友。

平时，我们与驻在国的军方人士接触不多。可是，在这次招待会上，我也结识了几位瑞典军官。有一位瑞典高级军官和我交谈时问道：“听说大使阁下是位将军，不知您曾带过多少兵？”

我以前从未确切地计算过曾指挥过多少战士，经他这么一问，便屈指计算起来：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辖三个军，每个军约四五万人……于是答道：“大概十几万人吧。”

这位军官一听，马上“啪”的一声立正，对我行了个军礼，并用尊敬的目光看着我说：“您统率的军队人数比我国全部军队还要多！”

这时，正在旁边的几位瑞典议员和政府官员也过来参加交谈。他们对我说：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

“您是从伟大国家来的伟大的大使。”

我连忙答道：“我本人谈不上伟大。比起国家和人民来，我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很想成为一座联结和沟通中瑞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桥梁。”

在国庆招待会之前,我已经去拜访过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驻瑞使节。招待会之后,我和其他国家的驻瑞使节也有了交往。

在和各国驻瑞使节交往中,有一些很有趣的插曲。

我在第一次拜会捷克斯洛伐克驻瑞典大使时,他对我曾经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示钦佩,并再三要我讲述长征中的故事。我就给他讲了一个强渡乌江时用三发炮弹击溃隔江敌军的故事。

1934年底,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境内,只见一道急流汹涌的乌江天险挡住了去路。中央军委命令第一军团的第一师和第二师分别在龙溪和江界两个地方强渡乌江,为大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以杨得志同志为团长的红一团奉命从龙溪强渡,我任团长的红四团则在江界强渡。

我在派一支尖兵队泅渡过江失败后,改用竹筏渡江。等尖兵队筏渡成功后,将全团兵力分成三拨:一营为先锋部队,率先乘竹筏强渡;二营为后续部队,等竹筏返回后迅速渡江接应;三营在南岸向对岸守敌猛烈射击,掩护一营过江。

一营强渡成功后,迅速扩大战果,控制制高点,反击敌人的反扑。我在南岸立即组织二营续渡。突然,听得对岸杀声大作,枪炮声骤然增大。仔细观察,发现敌人的预备队上来了,把一营又压回江边。我立刻命令三营加强火力,但是三营只有步枪、机枪,没有炮,而单靠枪无法隔着宽阔的江面射击一营当面的敌人。看见情况危急,我急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在电话里向陈光师长大喊:“炮!我要

炮!”

很快,军委直属炮兵营的赵章成连长和王东保指导员赶到了江边。形势紧迫,容不得我们寒暄,我立即对赵连长说:“快,快打对岸崖上那一坨‘人蛋’!”赵连长一看,对岸山崖上的敌军正挤成一个大团,向已退到江边的一营压下来;一营处于仰攻地位,处境异常危险。他二话没说,抱起一颗82迫击炮弹装入炮膛,一面单眼吊线,判断距离,一面口中念着“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我们”,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嘭”的一声脆响,炮弹像只黑乌鸦似的飞向敌阵,“轰”地在“人蛋”中爆炸。接着,他又连发两弹,把敌人炸得人仰马翻,喊爹叫娘,撂下一大片尸首向后溃退。一营乘势反击,又占领了崖上阵地。……

我在讲这个故事时,临时来了些“机动”。因为,赵章成连长原是白军军官,炮打得很准,但他信佛,所以在打炮时他口中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佛祖保佑”、“死鬼别怨”之类。可是我想,捷克大使一定不懂什么叫“南无阿弥陀佛”,再说赵连长作为红军指挥员,不应再有迷信思想;因此,我灵机一动,就改成他念“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当时,捷克大使听得十分高兴,连连鼓掌称赞:“打得好!打得好!”

有一次,以色列驻瑞典大使主动来到我们使馆拜访。他一见面就问我和林彪是否兄弟?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原来,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跨过鸭绿江,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而西方人开始时以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由林彪指挥的,因此这位以色列大使企图到我这里来打

听有关林彪的情况。

那么,他怎么把我当作林彪的兄弟呢?这个原因出在我的名字“飏”上。由于“飏”和“彪”同音,这位以色列大使便误以为这两字是同一个字。他按照西方人名在前、姓在后的习俗,又误以为“飏”是我的姓、“彪”是林彪的姓。于是,两误合成一误,便认为我和林彪是兄弟。

我告诉他:“飏”和“彪”这两个字同音不同义,是名不是姓,我和林彪既不是兄弟,也不是同族。

他听后有点不好意思,脸上现出尴尬的神情。为了掩饰窘态,就提出了新问题:这两个字是什么含义?

我便给他当了一次学汉字的启蒙老师,告诉他:“飏”字的含义是大风,“彪”字的含义是小老虎。他似懂非懂地连连点头,然后道谢告别。

我在丹麦和芬兰时,也常常和其他国家的使节交往,还虚心地向他们请教。

记得有一次在驻丹麦使馆,遇到了一件事。这件事看起来并不大,用现在的眼光看也很容易处理;但对当时缺乏外交经验的我来说,却颇感棘手。当时丹麦内阁改组,外交部长易人。新任外长和前任外长分别给我来信致意。对这两封信如何处理?要否一一答复?如何答复?我就此事召开会议商量,大家都感到对此没有把握。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要进行外事调研、要虚心向别人学习的指示,便考虑和东欧国家驻丹使馆联系,请他们谈谈对类似问题的处理办法。

首先,我到波兰驻丹麦使馆,向波兰公使请教。因为

他在丹麦已有五年，外交经验很丰富。他听了我的来意后，直截了当地说：这种信函只是按惯例行事，两封信都不必答复。

我回到使馆后，考虑来考虑去，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于是，便到罗马尼亚驻丹麦使馆去请教。罗马尼亚代办认为：两封信都应答复。他说：对前任外长只要表示谢意即可；对新任外长除致谢外，还要按其来信的内容回答。

鉴于波兰公使和罗马尼亚代办的意见大相径庭，我想：俗话说买东西要“货比三家”，向人请教也应如此。于是，再次驱车前往苏联驻丹麦使馆。

苏联驻丹麦公使是位老资格的外交官。他的意见和罗马尼亚代办相同，即对前任和新任外长的来信都要答复。不过，他补充了一点：在给新外长的复信中，还应提出加强关系的愿望。

把三位国家公使、代办的意见一比较：二比一，认为应该复信的占多数。加之考虑到“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中国古训以及应该和驻在国有关部门加强联系的原则，我最后决定：给前任和新任外长分别复函。

以后，我在对外交往中，经常注意向各国驻瑞典、丹麦、芬兰三国的使节请教。毋庸讳言，由于当时国际关系的状况，我们同苏联东欧国家驻三国使馆的联系要多些。不过，我始终掌握一个尺度：加强联系，但不能依赖他们。凡事还是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依照我国的外交政策和我们使馆的具体情况，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

当然，在和各国使节的交往中，有时也难免会出现一

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例如，有一次我应邀参加苏联驻芬兰使馆举行的招待会。苏联驻芬大使也是一个将军，此人头脑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比较浓重，惯于对人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不仅驻在国的官员对他不敢怠慢，连东欧国家驻芬使节见了他也都毕恭毕敬。在招待会上，他对我竟然也盛气凌人，傲慢无礼。当时我想：新中国可不是任何国家的附庸，可不吃你这一套！你是将军，我也是将军，我哪能受你这种闲气！于是，我提前退出。后来，苏联国内可能知道了此事，就换了一个大使。新的苏联大使态度比较和气，我们和苏联驻芬使馆的交往又密切起来。

与联合国秘书长的秘密会谈

我到任后不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50年9月15日，美国以7万余人的庞大兵力在朝鲜仁川登陆，并向北进犯。对此，中国政府作出了严正反应。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美国对此警告置若罔闻。美军于10月1日越过三八线后继续北犯，其先锋部队竟进逼中朝边境鸭绿江和图们江，同时，美国空军还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地区，使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面对我国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的严峻局势，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组成以彭德怀为

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接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与朝鲜军民共同抗敌。我原来所在的十九兵团,在杨得志同志率领下,也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

我虽然身在北欧,但十分关心抗美援朝的情况。除了从国内发来的通报中了解志愿军作战情况外,还组织使馆人员从各方面收集有关朝鲜的消息。我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对朝鲜战局的关切和对战友们的关心,同时也是为了外交工作的需要。因为,当时美国是通过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打着联合国的旗帜派兵侵朝的,所以在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中,人们不了解朝鲜战争的真相,舆论也大都被美国虚假宣传的迷雾所笼罩。因此,我们作为在西方国家中最早建立的使馆,应该充分利用瑞典等中立国家的有利环境,通过外交工作来把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真实情况告诉世界各国人士。当然,这种做法是报请国内批准的。

一天,瑞典外交大臣安顿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会晤。

我带着翻译小顾,驾车来到瑞典外交部。安顿郑重地向我表示,他是以一个中立国家外交部长的身份,试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但是,我从他的谈话中发现:他囿于美国的宣传,因而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基本上和美国一致。他还劝我国同美国妥协,停止抗美援朝。

针对他的这种观点,我就向他说明了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的真相,以及中国人民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被迫入朝作战的原因。我严肃指出:在1950年

6月朝鲜战争开始后不久,美国的军用飞机就不断侵入我国领空。仅自8月27日到10月23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美机就已侵入我国东北地区上空达12次之多。美国在出兵朝鲜的同时,还派遣其隶属于太平洋舰队的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巡弋,并对台湾实行了军事控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这样做,显然是对中国的蓄意侵略;而且,它还以此和侵朝战争相配合,企图对新中国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由此看来,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其矛头不仅针对朝鲜,也是对着中国的。所以,我们认为,美国侵略朝鲜,是和它威胁与侵略中国有联系的。

安顿听着我的叙述,不再坚持他原来的观点,有时还似有所悟地连连点头。

过了几天,他再次邀我交谈。我就向他进一步介绍情况,着重指出,针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我国政府请印度政府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向美国政府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决不会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可是,美国不听这个警告,不仅美国军队越过了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鸭绿江,而且其指挥者气焰嚣张,公然扬言要越江进攻我国东北地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忍无可忍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才进行抗美援朝,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

在我介绍的时候,安顿很认真地倾听,还不时插话提出些问题。

我接着对安顿说,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援助被侵略的友好国家朝

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抵御和消除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为了保卫我国的安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如果我们不去援助朝鲜抗击美国的侵略，听任美军为所欲为，那么，不仅我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而且也将破坏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因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是为了遏制侵略，保卫和平。

我还强调指出：我们要通过抗击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来争取和平。如果美军停止进攻，知难而退，当然就可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其侵略行动，而要我们向他妥协，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听了我的介绍后，安顿神情凝重地说，从耿大使的介绍中，我了解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情况。看来，我将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一方面向驻在国的外交部和各国使节通报朝鲜战争情况，一方面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还举行新闻发布会来介绍此事，这样多管齐下地开展工作，果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我们把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和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争取世界和平的崇高目标联系起来，更赢得了爱好和平的北欧人民的赞赏。同时，我们提供的事实和提出的观点，又通过新闻界传播到西欧和南欧国家，从而使更多的人了解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的真相。

为了挽救其在战场上的失败，美国不顾国际公法，从1952年1月开始，在朝鲜进行了持续一年之久的细菌战。美军用飞机投撒和大炮射布的办法，将携带各种病菌的生物（包括苍蝇等昆虫以及老鼠、兔子等小动物）和杂

物布撒到朝鲜北半部以及我国东北一些地区,妄图在我前线和后方造成疫区,以削弱我军的战斗力。

我从国内发来的通报中知道上述情况后,立即组织使馆人员同各界人士广泛交谈,揭露美国这一严重罪行。但是,有些善良的人士开始时不相信,他们认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不会干出这种违反国际公法的事。经过我们用许多图片和文字资料反复说明,有的人渐渐半信半疑起来。

有一位斯德哥尔摩市的医学博士安德烈女士,是个具有科学头脑,工作态度严肃认真,主张一切结论都要有真凭实据的人。她听了我们关于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介绍后,认真地表示:一定要亲自到朝鲜进行实地考察,亲手收集第一手资料和实物证据。

不久,她怀着疑信参半的心理,踏上了远赴朝鲜的旅途。她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在朝鲜北方地区访问了许多居民和医务人员,收集到许多实物。她将这些实物带回瑞典亲自化验,结果证明的确带有大量致病细菌。于是,她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在瑞典报纸上公布。接着,其他西方国家的报纸转载了这个调查报告,从而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了美国违反国际公法、进行细菌战的严重罪行,剥开了它掩盖其罪责的“民主”和“人道”的外衣。

美国在发动侵朝战争以及对我国台湾实行军事控制的同时,还操纵联合国的表决机器,拒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于这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无理行径,我们也通过各种外交活动予以揭露和抨击。

1953年,瑞典副外长哈马舍尔德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我一知道此事,立即将这个信息报告国内。周总理迅速回电,指示我去找哈马舍尔德面谈,争取他就任后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努力。

我和哈马舍尔德有过多次接触,所以并不陌生。但是,大概由于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是个受制于人的职务,因此他对我的约见比较敏感。当我们和他电话联系时,他的反应很是谨慎,虽然同意和我会见,却提出了一个建议:会见的地点不在瑞典外交部,也不在中国使馆,更不在咖啡馆、酒楼等公开热闹场所,而是由他指定时间和地点,进行秘密会晤。

他显然是为了避开新闻记者和其他人的注意,以免有人将我们会面之事张扬出去,引起美国人的不满。为免于使他为难,我同意了他的意见。

哈马舍尔德指定的时间是次日清晨,地点是在斯德哥尔摩市偏僻地区的一个幽静的小图书馆。

第二天早晨,我和翻译驱车到达约定地点,与哈马舍尔德晤谈。由于时间尚早,图书馆阅览室内没有读者,只有我和哈氏交谈。这种冷清的情况,正是哈马舍尔德选择这里为会晤地点的原因。

在约一个半小时的晤谈中,哈马舍尔德谈得不多,他主要是边听边记,但也不时插话,并提一些问题。

我向哈马舍尔德讲述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并指出,现在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所以这个集团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当然也无权坐在联

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中国席位上。因此,现在国民党的所谓代表窃据联合国席位是非法的,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我还批评了美国阻挠新中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错误行径,揭露了它在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侵占我国台湾的罪行。

我严正表示:为了坚持国际正义,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提高联合国的威信并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必须驱逐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中的国民党代表,让新中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恢复我国在该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同时,美国必须停止侵略我国的台湾。

我还向哈马舍尔德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改革和建设成就。

哈马舍尔德对新中国的各项成就表示赞赏。关于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他表示:瑞典很早就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断绝了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因此,他作为瑞典的副外长,完全同意我阐述的观点。他说,到联合国上任后,从个人的心情来说,愿意支持新中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他又担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起不了多大作用。显然,他已料到当时操纵联合国的美国,必然会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施展阴谋诡计,以支持国民党代表赖在联合国,从而达到其阻挠新中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目的。看来,那受制于人的阴影,已深深地笼罩在这位即将上任的联合国新秘书长的身上。

后来,果然由于美国的操纵和阻挠,我国继续被摒于

联合国之外；但通过这次交谈，使哈马舍尔德加深了对新中国和有关问题的认识，从而有助于他处理联合国的有关事务。

添砖加瓦砌“炉灶”

毛主席和周总理把建立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巧妙地比喻为“另起炉灶”。借用这个妙喻，我们在瑞典等北欧国家建立使馆，也是新建“炉灶”。建炉灶要砖瓦，如果把新中国的整个外交事业叫作大“炉灶”的话，那么，我们驻瑞典、丹麦、芬兰三个使馆，就是这个大“炉灶”中的三块砖瓦；而建立使馆这个小“炉灶”所需的砖瓦，便是我们这些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从这个意义上说，建馆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应该是建设一支过得硬的外交队伍。

在建设外交队伍中，最迫切的当然是外交人才的配置和培养，同时也要兼顾使馆所需的各种技术人才。

说到对外交人员的培养，首先当然要提高其政治和理论水平，加强其对我国外交路线、外交政策的理解和实践能力；同时也要提高其外交知识水平和礼仪修养，加强其对工作的责任心；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要提高外交官和其他涉外同志的外语水平。

在北欧国家，日常交往中除使用其本国语言外，还通用英语；但是按照当时习惯，在正式外交公文及信函中，却往往使用法文。当时我们驻瑞典使馆没有法文翻译，就请了一位懂法文的瑞典人当法律顾问，兼做外交公函的法文翻译工作。

有一次,瑞典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逝世后,瑞典外交部送来一份法文的讣告,内有“悲哀地通知你……”等词句。我们赶紧写了表示哀悼的吊唁信函,其中也有“悲哀地……”等词句,请这位法律顾问译成法文,然后由使馆的打字员打印好,经有关同志校对后,派一位秘书送到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礼宾司长接过吊唁信,一面道谢,一面展开信纸观看。看着看着,他的双眉渐渐皱紧起来。接着,他指了指信中的一个字,严肃地说:“这个字不应该这样写!”我们的秘书不懂法文,当场不便表示意见,只好说:“等我回使馆查询一下。”

我听了秘书的汇报后,立即把法律顾问请到使馆来研究。他仔细阅读了打印的信函留底,神情紧张地喊道:“糟了!这个词少打了一个字母,把‘悲哀地’变成‘荣幸地’了!”

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召集会议研究补救的办法。会上决定采取两个措施:第一,重新打印吊唁信,把那一份有错字的换回来;第二,由我亲自去向瑞典外长道歉,并说明造成错误的具体情况。

吊唁信重新打印后,我们不仅自己反复校对,还请法律顾问也核对一遍。然后,我驾车到瑞典外交部,一面把信函交给安顿外长,一面就我们的错误诚恳地向他道歉,向瑞典王国表示深刻的负疚之情,同时实事求是地说明:所以产生这个错误,除了我们的疏忽所致外,也由于工作人员不懂法文的缘故。

安顿外长十分通情达理。他坦诚地对我说:“听了大

使阁下的说明,知道你们的这个错误只是技术上的失误,这不会妨碍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况且大使阁下知道此事后,及时采取措施改正了错误,还亲自前来登门道歉,这充分说明了你们的诚意。因此,我不仅不会为了此事而指责你们,相反,我被你们知错即改的行动和阁下真挚诚恳的精神所感动,从而更加深了对中国的尊敬之情。”接着,他对我们哀悼国王逝世的深情表示谢意,并指出这体现了瑞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这次由于打错字而产生的外交事件虽然得到了圆满的结局,但是给我们的教训却很深刻。因此,使馆党委决定:一、要加强外文学习;二、要增强全体人员的工作责任心。

我们号召使馆的外交官都要学习外文,已经掌握英文的,也要学点瑞典语或法文。我自己也带头学习英语。

以前我曾经学过一些英文单词,那还是在湖南水口山铅锌矿时毛泽覃同志教的。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和毛委员先后派了蒋先云、谢怀德、毛泽覃等同志到水口山来组织工人俱乐部和工人纠察队。我参加了他们领导的罢工斗争。我的舅舅宋乔生是工人俱乐部的负责人,我家和舅舅住在一起。毛泽覃同志和我舅舅是好朋友,所以常到我家作客。有一次,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是小学者,将来等革命胜利了,还要留洋、当工程师哩!你愿不愿意学点外文?”我高兴地答道:“当然愿意!您教我好吗?”他点点头:“好啊!我就教你英文吧。”于是,我在毛泽覃同志的教授下,先学26个字母,接着又学了200来个单词。

后来,毛泽覃离开了水口山,我也因工作忙碌而无暇继续学习英文。但是,就凭这点英文知识,我却制止了一次红军战士企图焚烧美钞的事。那是1932年4月中央红军东路军东征闽南、攻占漳州之后,我正在红九师驻地的街上巡视,忽然看到有几名战士在焚烧东西。上前去仔细一看,发现烧的是美钞。我立即制止焚烧,命令将全部美钞上交东路军总部。之后,将近20年的戎马倥偬,将我脑海里储存着的英文单词夺走了大半。现在,仅凭这些残存的、零星的英文知识,当然应付不了外交场合的需要,更谈不上阅读英文报刊和资料。所以,我下决心不仅要把丢掉的捡回来,还要学得更多更好。于是,我便自费聘请了一位瑞典人做我的英语教师,同时也经常向使馆内的英语翻译和其他懂英文的同志请教。

这样,使馆内便掀起了一个学习外文的热潮。赵兰香作为大使夫人,为了便于在外交活动中和夫人、女士们交谈,也在女翻译束世敏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积极学习英文。

关于增强工作责任心的问题,我们使馆可以称得上是常抓不懈。有一次,使馆写了一份给国内的工作报告,经过打印和校对后,送我过目。我发现尚有几处错误没有校对出来,其中最为触目的是把“大使”打印成了“大便”。在其他工作中,也常常有由于工作马虎而发生的错误。我们就通过这些事,号召大家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减少失误,做好工作。我还向同志们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外交工作代表国家”等指

示,用以和大家共勉,从而增强了使馆全体人员的工作责任心。

就像军队打仗离不开后勤一样,搞外交也需要后勤工作的支持。所以,我们始终把后勤作为使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们确立了几条原则:

一是后勤服从于外交,后勤工作为外交工作服务;

二是坚持节约,在有利于开展外交工作,并照顾到安全、保密、通讯畅通和人员健康的前提下,为祖国节省每一分钱用于恢复和发展国内的经济建设;

三是大家动手,勤俭建馆。

当时,使馆的工作人员很少,而工作异常繁忙,往往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甚至几个人的工作。所以,我们号召大家在工作中要互相帮助,外交官也要协助做行政、后勤工作。例如,在使馆内宴请外宾时,外交官和夫人们都要到厨房帮厨,或参加布置宴会厅、设置宴席等工作。

当时,驻瑞使馆只有一名司机,又要接送人员,又要运输物资,实在忙不过来。我们就号召大家学习开车,争取做到自己开车出去办事,以减轻司机同志的负担。

有一次,我要去参加外交活动,恰巧司机开车出去办别的事了,我就准备自己驾车前往。有的同志劝阻说:“大使自己开车,有失身份,可能会招致别人讥笑。”显然,他所说的“别人”,是指当地的新闻界和外交界人士。

这位同志这样说,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同。现在,别说大使,就是各国领导人中,自己驾驶汽车的也不乏其人。但是,当时在斯德哥尔摩,各国驻

瑞典大使中,的确没有自己开车的。

不过,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就答道:“这个不必担心。从使馆内部来说,大使和司机只是分工不同,分工是为了搞好工作,互相帮助也是为了搞好工作,这里没有什么‘有失身份’的问题。至于‘别人’,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看法,但我相信对多数人来说,勤劳、平等和合作,始终是一种美德。”

“但是,您自己开车,我们不放心……”另一位同志的眼中流露出疑惑的神情。

“哦,”我笑着说,“看来你是对我的驾驶技术有怀疑,对交通安全不放心。是不是?”

他点了点头。

“可是,我已经有着将近 20 年的开车历史呢!”看着他依旧半信半疑的眼神,我认真地说:“看来得利用几分钟时间向你们汇报一下我的开车经历……”

早在红军时期,我任参谋长的红九师在一次战役中缴获了一辆小汽车。我凭着在水口山铅锌矿当钳工时的那点点机械知识,将这辆车的全部机械装置摸索、摆弄了几遍,并学会了驾驶。接着,就开车在驻地的街道上转了几圈。抗战时期,我到晋察冀军区后,驾驶汽车的机会多了起来。尤其是在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和十九兵团参谋长时,我几乎成了司令部中一名出色的驾驶员,经常自己驾车到下属各纵队(军)和各旅部去了解军情。

平津战役后,我们十九兵团奉命离北平向石家庄集结,以便进军山西参加太原战役。兵团几位领导决定,组

织一个临时指挥部,由政治部主任潘自立同志带领部队出发。杨得志司令员、罗瑞卿政委和我,则分乘三辆吉普车,绕道天津去学习兄弟部队的攻城经验。我们从天津启程南行后,我坐的那辆车,忽然后轮不能驱动了。查看后发现是变速箱出了毛病,路上没法修,司机不敢开。我就自己开,用加力档驱动前轮,居然开到了石家庄。路上罗、杨两位还特地来坐坐我开的这辆蹩脚车,以表示对我的鼓励。

讲完这段历史后,我看看他们,心里想,这下该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可是,”他们又提出了新问题,“大城市里开车不比在郊外,马路上人多车多,还有红绿灯……”

“那不成问题!”我反驳道,“出国前,我每天驾车从北京最热闹的地区之一隆福寺,开到外交部上班,经过的不都是人多车多有红绿灯的闹市吗?”

他们被我说服了,只好同意我自己开车。从此,我便经常自己驾车外出办事。

过不多久,瑞典的外交界和新闻界果然纷纷议论起这件事。不过,他们并没有讥笑我,相反,却把此事传为佳话。瑞典外交部的官员们和一些国家的驻瑞使节,都用赞赏的口吻对我说:“大使阁下自己开车,了不起!”“耿大使亲自掌握方向盘,佩服!”有位东欧国家大使还说:“可惜我的开车技术不佳,不然我也自己驾驶。”瑞典的报纸上,也在我的名字前冠以“自己开车的大使”、“兼任司机的大使”和“掌握方向盘的大使”等称号。这样一来,不但毫无

坏处,相反却产生了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处:增加了中国大使馆和我本人的知名度,从而有利于我们同瑞典各界人士接触,有利于同他们交朋友。

我还经过考试,得到了瑞典的汽车驾驶证。在当时,北欧各国的驾驶证可以通用,因此,我到驻丹麦和芬兰使馆去时,也经常自己开车。有一次,我自己开车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发,沿着海岸线转了一圈,参观了不少地方,方便了对丹麦风俗民情的调研。在芬兰,我也曾驾车从南端的首都赫尔辛基开往北部地区,一个来回少说也得上千公里。

在我的带动下,我们三个使馆中有许多同志都学会了驾驶汽车。

保密观念,对于我们驻外使馆的人员来说,更加需要加强。使馆党委经常把加强保密观念,作为对使馆人员的培养内容之一。

我们不仅在外交工作中注意保密,而且在后勤工作中也注意这个问题。例如,在使馆房屋的购置和修建中,都考虑到保密问题。

有一次顾亟同志因事到大使官邸找我。他见我不在屋内,便到屋外找寻,发现我正钻在汽车底下捣鼓着什么。

“耿大使,您在修汽车吗?”顾亟问我。

我站起来答道:“我正在查看汽车底下有没有被人安装窃听器。”

他听了后,原本微笑着的脸,变得凝重严肃起来,显

然他从我的回答中体味到了保密的重要性和严肃性。

若干年后,顾亟在任我国驻芬兰使馆参赞和驻西萨摩亚大使时,都很重视保密工作。据他后来回忆,他的这种良好的习惯,就是在驻瑞典使馆时开始养成的。

无形的桥梁

毛主席在怀仁堂对十大使的讲话中,曾指示要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和长处。遵照这个指示,我在出使北欧三国期间,特别注意他们在工业、农业和林业等方面的生产经验。

瑞典东濒波罗的海和波的尼亚湾,西南面隔着海峡和丹麦相对。不仅海岸线绵长,而且境内湖泊众多,运河密布,呈现一派北欧风光。特别是由于靠近北极,每年6月24日的极昼现象(夜晚如同白昼一样),更是别有情趣。加之它重视环境保护,风景优美,所以吸引着众多的外国旅游者。但是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的是遍布瑞典的工业企业。我每次驾车到各地旅行,首先的目标总是工厂。

通过对工厂企业的参观和调研,我了解到瑞典的钢铁工业比较发达。这并不表现在钢铁产量方面,而是体现在质量方面。要论钢铁产量,瑞典在欧洲国家中还排不到前列。但是,瑞典的钢铁工业有其突出的特点:由于瑞典的铁矿砂品位比较高,其冶炼钢铁的生产技术也比较高,所以,两高合成一高,便冶炼出了高质量的特种钢。

瑞典生产的特种钢,多用于出口。因为,它是瑞士手

表、德国照相机及精密仪器的必备原材料,其他国家也往往用它来制造机械设备的某些精密部件。所以,瑞典钢铁工业的发达,推动了其国际贸易的发展。

同时,它也推动了瑞典国内各项工业(如造船业、机械制造业等)的发展。瑞典的汽车工业嗣后也有了长足发展。如今,瑞典制造的 VOIVO(沃尔沃)汽车,已和德国的奔驰、法国的雷诺、意大利的菲亚特等一起,成为欧洲名车。

瑞典的钢铁工业,给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仅在当时就为此写了调研材料报回国内,供有关部门参考,而且在 20 多年后,我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重访瑞典时,还特地请了我国的冶金专家、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徐驰同志参加代表团,去学习瑞典的冶炼经验,并和瑞典的冶金工业部门商订有关的合作项目和技术交流协定。

有一次,丹麦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陪同我到日德兰半岛的西海岸去参观。

丹麦号称“千岛之国”(实际上全国共有 400 多个岛屿),其海岸线全长达 7400 多公里,和瑞典海岸线的长度 7600 多公里差不多,但是其领土面积(不包括位于北美洲的格陵兰岛)仅为瑞典领土面积的十一分之一。这样的海岸线密度(海岸线长度和国土总面积之比),不仅为北欧诸国之冠,而且也超过了世界上岛屿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

日德兰半岛的面积,占丹麦本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其西部的海岸线濒临北海。

当我们的汽车沿着海岸线行驶时,我不禁被这安徒生故乡的美丽风光所陶醉。看到那湛蓝的海水拍打着曲折的海岸,围绕着一个个珍珠似的岛屿,我竟然生发出一种心与海水共悠悠的感觉。但是,当我发现海岸线上另一种奇异的景色时,我的感觉立即从陶醉变成了惊讶和赞叹。

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壮美景观:无数高大的风车,矗立在沿海土地上,绵延数百公里,就像一片广袤无际的森林,覆盖着日德兰半岛的西海岸。

陪同的丹麦官员告诉我,建造这些风车,是为了利用从大西洋吹来的海风运转发电。目前,风力发电已成为丹麦重要的动力资源。不仅当地的农业用电依靠风车,而且它还可以给工业和城市供电。

我听着他的介绍,看着这巨大的人造“森林”,心中不禁盘算起来:风力发电,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主意啊!在我的家乡湖南一带的农村,也有风车,但那只是农民用来戽水的。而丹麦由政府投资建设风车群,这就把风力变成了动力资源,把风车变成了动力工业,从而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生产建设。

风力发电的优点很多。比起火力和水力发电来,成本要低得多,不仅不会污染环境,反而会给美丽的海岸增添几分雄伟壮丽的景象。而且,建造风车也很方便,只要有风的地方就可修建使用。

在我国沿海地区、高原、大草原甚至戈壁滩上,也富有风力资源,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像丹麦一样,由国家投

资建设一批风力发电站呢？

回到使馆后，我立即把丹麦利用风力发电的经验和我的建议报回国内。后来几次回国述职，我又向有关部门介绍了上述情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风力发电事业发展较慢。粉碎“四人帮”后，我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又多次提出这个问题。目前，我国有些地方已有一些小型的风车用于发电。特别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原上，小型风车发电比较普遍。许多农牧民的帐篷旁边，都建有一个风车，连着一个小发电机，解决了家庭的照明、煮饭、取暖、冰箱、电视等用电。但是，这种还是分散的、小型的家庭发电。最近得知，新疆的达坂城地区，在丹麦的帮助下建立了两个风力发电站，东南沿海有些地方也开始建立风力发电站。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我国有更多地方建立风力发电站，将取之不尽的风力资源变成电流，汇入国家或地区的电网，那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该起多大的促进作用啊！

芬兰是个世界驰名的千湖之国，其实称它为万湖之国似乎更为确切，因为它所拥有的大小湖泊竟有 6 万多个。因此，它的湖光水色着实让外国旅游者赞赏不已。但是，对我来说，当驾车奔驰在芬兰西南部沿海平原和北部、中部的丘陵地带时，印象最为深刻的却并非这些美丽的湖泊，而是沿途到处可见的翠绿的树林。

据了解，在这个北欧国家，森林覆盖面积达到全国总面积的 70% 以上。这样高比例的森林面积，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而且，芬兰的森林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人

工栽种的次生林多于天然林。我发现,沿公路两边的土坡上,绿荫密布,根本看不见空地。陪同的芬兰朋友告诉我,这些都是人造林。由此可见,芬兰的造林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芬兰的造林,由专门机构负责规划、组织和管理,有专门的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从事栽种。值得指出的是,他们有整套科学的栽种和管理方法。后来我参观了一个林场,看见工人们正在种树。他们将土地略加平整,拣去较大的石块后,每个工人拿着一台单人操作的植树机械,只要往下一按,便一次完成了挖树坑、植树苗和培土三道工序。因此,他们的植树进度很快。当然,他们在植树后的浇灌和管理方面,也有一套完整、合理的办法。此外,芬兰还有一整套保护森林资源的完善的法律法令。显然,这些都是芬兰人工造林事业取得巨大成绩的有力保证。

对于这样好的造林经验,我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回到使馆后,我们便将这些见闻写成材料,报回国内。

除了上述情况外,我还先后参观了瑞典、丹麦、芬兰三国的农场、造船厂、木材加工厂、造纸厂、乳制品厂和鱼类加工厂等企业,将其先进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介绍给国内有关部门,从而使我们三个使馆成为沟通国内外经济部门的一道无形的桥梁。

由于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尚未和新中国建交,不少国家中还有国民党的机构,故而侨居这些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人士,想要回到新中国去参加建设,往往受到阻挠和迫害。我们驻瑞典使馆便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协

助他们顺利回国的任务。

1951年冬,信使送来一封外交部公函,内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给我的信。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在公函中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我协助李四光的女儿从英国回国。李四光在信中详细写明了他女儿现在的情况和通讯地址。

原来,李四光和夫人于1949年秋冬之交离开英国,取道瑞士、意大利和香港回国,当时,他们的女儿李林正在剑桥大学攻读金属物理学博士学位,因而不能同行。李林只是把她母亲送到瑞士,和先期到达的父亲会合,然后满怀离情与父母告别,回到剑桥继续攻读。如今,李林已经学成,急于回国,将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祖国的科研和建设事业。

我很重视此事。一来,这是周总理的指示和李四光先生的委托;二来,新中国正需要像李林这样学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来从事建设工作。但是,怎么和李林联系呢?当时的国际电话,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方便,如到电报局发电报,则容易被人知晓,再说电报也说不详细。考虑再三,我决定给她写信。

在信中,我要李林不要声张,装作到北欧旅行,悄悄来到瑞典。

寄信的方法,也经过一番筹划。为了不露蛛丝马迹,以免引起别人注意,我没有叫人到邮局投寄此信,而是亲自驱车到离斯德哥尔摩市100多公里的乡村,停在路边一个邮筒旁,观察一下四周,正好寂无一人,便将信件投

入邮筒。

李林接信后,按照信中约定,离开剑桥,从英国东海岸的一个港口城市,乘船抵达瑞典西南部的港口,然后乘火车来到斯德哥尔摩。

她受到了我们使馆人员的热烈欢迎。我们安排她住在使馆宿舍。我和赵兰香一起接待她,和她交谈,还陪同她观看了歌剧《茶花女》。我对她说:“你和令尊都是科学家,新中国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相信你回国后,一定会像令尊一样,在生产和科研领域中施展才能,为祖国建设事业作出贡献。”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果然不负所望,回国后数十年来在物理学研究领域作出了出色的成绩。1980年,李林和她的丈夫邹承鲁教授一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加上李四光先生也是学部委员,一门三院士,在科技界传为佳话。

过了几天,我们送她乘船途经芬兰转道莫斯科回国。我还专门致电我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同志,请他关照李林。

由于美国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当时我国在国际市场买不到一些必要的先进设备。我们使馆得知后就设法购买,运回国内,帮助有关部门克服困难。

过去,我们的军事通讯设备比较简陋,尤其是营以下部队间的通讯手段更为缺乏,在战场上除了依靠通讯员的双脚外,往往依靠军号声进行联络。而敌军听到我军的军号声,便发炮循声打来。因此,军委决定给部队基层单位配备小型的先进的通讯器材。军委领导请外交部常务

副部长李克农同志转告我,要我设法购买几个外军使用的步话机(对讲机)作为样品。可是,这些东西正属于对我国禁运的物品之列。

我想,无论如何要想方设法打破封锁,买到这些器材。于是,我便四出奔走,经过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了一位颇有门路的某国商人。这位商人表示,可以代为购买,但是必须给他赚三倍的钱,而且要先交钱。我同意他的条件,他一拿到钱,当天就发电订货,几天后货物就空运过来。我们便妥为包装,将这些器材送回国内。

有一次,罗瑞卿同志要我代某部购买一些器材。我没有通过使馆财务处付款,而是用自己的生活津贴费托某国商人买了几件,运回国内交给老罗。

除此之外,我们三个使馆在促进中瑞(典)、中丹、中芬的文化和民间团体交往等方面,以及在促进中国和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方面,也起到了搭桥作用。

有意思的是,在当时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政治关系中,我们驻北欧的三个使馆也起了一定程度的桥梁作用。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前及50年代中期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之前,我曾奉周总理之命分别拜访丹麦、瑞典、芬兰三国的领导人,请他们向美国转达中国政府的意见:愿意举行国际会议、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愿意通过中美谈判来讨论台湾问题及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三国领导人及时向美国转达了上述意见,引起了美方的关注。

第三章

南亚热浪

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1956年初,即我任驻瑞典大使的第六年,接到外交部通知,得知国内已对我作出新的任命,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这次任命很有意思:我和韩念龙同志对调,他是我国首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现调任驻瑞典大使,接替我的职务,而我则接替他的职务。更为有趣的是:瑞典地处寒带,而巴基斯坦十分炎热,从气候方面来说,我和他是“冷”“热”互换。所以,后来我们相见时互相打趣说:我们两人,一个是从冰窟跳进了火炉,一个是从火炉掉入了冰窟。

在向瑞典外交部和有关部门作了告别拜会后,我便束装离任回国。

回到北京,周总理接见了。他一方面听我汇报驻瑞典使馆的工作情况,一方面就我调任驻巴大使一事作了指示。

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巴基斯坦,本是英国的殖民地,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一些殖民地陆续摆脱其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而宣告独立。1947年8月中旬,实行分治的巴基斯坦和印度,相继挣脱殖民锁链,成为独立国家。但是,刚独立的巴基斯坦,尚是英联邦的自治领,其国家元首为总督,由英国国王任命。

1951年,我国和巴基斯坦建立外交关系,韩念龙同志出任我国首任驻巴大使。

1956年初,巴基斯坦决定废除自治领制,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总统为国家元首。这是巴基斯坦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该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巴基斯坦的东北部和我国毗邻,是我国西陲的近邻之一。所以,周总理在对我的指示中特别强调:“安定四邻”是我们建国后的一个紧要任务,睦邻政策是我国的重要国策。只有和周围的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致力于国内建设。虽然有些邻国和我国有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这并不妨碍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巴基斯坦是我国的近邻,历史上也有着友好关系。这次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正是增进中巴交往、加强两国友谊的大好时机。他要我到任后

抓住时机,努力为进一步建立中巴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新的成绩。

周总理进一步指出,虽然巴基斯坦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但它并不敌视我国,而且有着和我国增进交往的良好愿望,这就为我们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提供了基础。只要我们按照去年万隆会议的精神以及会上通过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中巴友谊一定能够得到发展。至于认识上的分歧,可以求同存异;如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通过和平协商,互谅互让地妥善解决。

总理还告诉我,应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我国政府将派遣一位特使前去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和该国第一任总统就职的庆典。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便在外交部阅读有关材料,加紧做赴任前的准备工作。

过了几天,贺龙副总理打电话到外交部找我。原来,中央和国务院已决定派他前往巴基斯坦参加庆典。

我和贺龙同志很熟。记得抗战期间在延安时,贺龙同志曾考虑把我调到抗大五分校当教育长,但是我希望到抗日前线去。有一次,我对毛主席谈及此事,毛主席说:“你直接去找贺胡子谈一下。”我说:“我怕谈崩了。”毛主席笑着说:“胡子是个随和人呀,莫怕嘛!这样吧,我先打个电话给他。”第二天我和曹里怀同志一起去见贺龙同志。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哎呀!我贺龙的同志关系糟糕呀,害得老乡来找我,还得由毛主席保驾啦!”他一面招

呼我们坐下，一面递给我们香烟，而他自己却抽烟斗。经过交谈，贺龙同志同意了我的要求。他说：“说实话，我是真想把您挖过来。您想上前线，我何尝不想哪！但是，我尊重您的意愿。”

谈完公事后，他留我们吃饭，一面吃一面说：“抱歉得很，没得什么好吃的，只好多放点辣子来招待老乡！”还对我说：“听说您炖狗肉很有板眼，什么时候让我见识见识？”我就把“坛子焖狗肉”的做法、火候以及加什么佐料等说了一遍。他连连点头：“对头，这和打仗一样的嘛，火候到了，没有不打胜仗的。您上了前线，就这样干！”很自然地把话题从“狗肉”又转回到抗日。

对他风趣的语言、待人的热情和乐观的精神，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在电话里的声音依然那么洪亮、爽朗：

“耿飚呀，听总理说您正在抓紧时间做赴任前的准备工作。能不能缩短准备时间提前上任，和我一道前往巴基斯坦？”

我答道：“我正想提前赴任呢！”

“那好！咱们一同去，这就说定了。”

“不过，贺老总，”我习惯于用当年的称谓来称呼他，“我可不能同您一道去。”

他着急地问：“您刚说要提前赴任，怎么又不行了？”

“我还是要提前赴任。”我赶快解释，“我的意思是，要比您先去。”

“为什么？”他问。

我进一步解释：“一来，我先去赴任，递交国书后，就

可以大使的身份陪同您参加巴方庆典和各项外交活动；再则，现在韩念龙同志已经离任，所以我到任后要立即和巴方联系，商定您在巴的活动日程，做好接待的准备工作。”

“哦，有道理。”他赞同我的意见。

接着，我到贺龙同志家中拜访他，请他就访巴期间的活动提出具体要求，以便和巴方商量。

我在3月中旬抵达巴基斯坦后，便忙于呈递国书的准备工作。但是在和巴基斯坦外交部联系时，对方提出：鉴于伊斯坎德尔·米尔扎总督现正致力于筹备国庆和就任新总统事宜，建议将呈递国书仪式推迟到国庆大典以后。我表示同意，但请巴外交部把中国政府将派特使参加巴国庆和第一任总统就职仪式之事转禀米尔扎总督。

过了几天，巴外交部通知我，米尔扎总督将接见我。外交部官员郑重地对我说：“这是总督第一次接见尚未呈递国书的外国大使，是破例接待，说明总督对中国政府和贵大使的重视。”

在拜访米尔扎总督时，我除了对他祝贺并表示要努力增进中巴两国的友谊和合作外，特别告诉他：“贺龙副总理将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贵国国庆和阁下就任首任总统的典礼。”

他听后高兴地说：“贺龙副总理是著名的元帅，中国政府派遣这样高级的领导人来参加庆典，是对巴基斯坦的尊重和友好，对此深表谢意。”

他还表示，在举行庆典后，他将亲自陪同贺龙元帅参

加一个有趣的活动——打猎。

在交谈中，米尔扎总督还对我以往的军事生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原来，我们使馆在向巴基斯坦外交部提供的新大使简历中，给我加上了将军的头衔；米尔扎总督以前曾任地区司令和国防部长，也是一位著名的将军，所以他兴致勃勃地询问我在军队中的经历。

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特别感兴趣，要我讲讲长征中的事。我讲了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摆脱敌人以及过雪山草地的情况。

他问：“长征时你担任什么职务？”

“开始是团长，后来任师参谋长。”

“团长是什么军衔？”他问得很细。

“那时候，中国红军没有军衔。要是按照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团长相当于上校。”我答道。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当将军的？”也许是我的简历中的将军头衔引起了他的注意，所以他这样询问。

我告诉他：“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我担任军参谋长，这个职务相当于将军；不过，我正式得到将军的军衔是在1946年初。”

“哦，那时贵军已经实行军衔制了？”

“不，我军是在去年（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1946年我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由于工作需要，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特别任命了一批将校，我的军衔是少将。”

接着，米尔扎总督又询问我曾经指挥过多少士兵、参

加过多少战役等。在听完我的回答后,他用满意的口吻说:“好,你是长征中的英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将军。等贺龙元帅来后,我们三个军人一起去打猎,打猎是军人最好的体育活动。”他又一次提到打猎。我猜想他一定十分喜爱这项活动。

3月22日,贺龙副总理一行抵达巴基斯坦。接着,我陪同他参加了米尔扎总统就职典礼、卡拉奇10万群众庆祝大会和其他外交活动。

在拜会米尔扎总统时,贺龙副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周总理向总统祝贺。

米尔扎总统表达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国领导人的尊敬和仰慕之情。他赞扬周恩来总理是十分正直、极有天才、极有能力的政治家,希望周总理能尽早来巴基斯坦访问。

米尔扎总统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对贺龙副总理说:“我为中国派出贺龙元帅这样重要的人物来参加我们共和国成立典礼而感到莫大的光荣。”

贺龙副总理在向米尔扎总统介绍我的情况时,特别强调耿大使也是一名军人,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虽然米尔扎总统已经知道了我在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中的经历,但他还是高兴地对我说:“欢迎耿将军出使我国,以后大使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无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我,我都愿意接见,帮你解决。”

贺龙同志阐述了我国政府寻求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外交方针和睦邻政策,表达了增进中巴两国友谊的愿

望。

米尔扎总统希望密切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他说，乔杜里·穆罕默德·阿里总理不久将访问中国，期望周恩来总理能在今年冬天回访巴基斯坦。他邀请贺副总理届时陪同周总理再次来巴基斯坦作客，并一再询问贺副总理：“能不能同周总理一起来？我们两个都是军人，军人说话肯定确切。请你告诉我，你究竟什么时候再来？”

贺龙同志说：“贵国总理访问中国后，周恩来总理可能要来贵国回访，届时本人希望能和周总理一起来。”

米尔扎听了十分高兴，含笑说道：“这应该是一项军人之间的诺言。”

他还请贺龙副总理给周恩来总理捎个口信：如果周总理对巴基斯坦，特别是对它和别国的关系能够给予指导，只要这种指导符合公正的原则，他将乐意采纳。

会见在友好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次日上午9时，米尔扎总统亲自陪同贺龙副总理乘飞机到卡拉奇西北基达地区的猎场打猎。我也应邀同往。

基达地区靠近阿富汗，长有大片灌木林。那里的灌木丛很大，每丛平均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的面积。许多野鸡、野兔和其他小动物，都喜爱钻在灌木丛里休息、安家或躲避鹰隼和豺狼等天敌。米尔扎总统告诉我们：他经常到这里来打野鸡，今天我们的猎取对象也是野鸡。

我举目观看，只见在灌木林前的一块空地上，一字儿排开三把椅子。椅子间的距离约30米。每把椅子旁，放着两支猎枪。负责装填弹药的工作人员，肃立在椅子后

面。

米尔扎总统坐在中间,招呼贺副总理和我分别坐在两边的椅子上。然后,他拿起一支猎枪作出对空射击的姿势,并向我们示意。我这才知道,原来是坐着打猎。

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有趣的打猎场面。百十来人使劲击鼓,鼓声震天动地,吓得灌木丛中的飞禽走兽惊慌出逃,有的乱飞,有的狂奔,从一个灌木丛窜到另一个灌木丛。我们是只打野鸡,不及其余。所以,猎枪只对着空中,不打地上。

打野鸡说容易也容易。因为,野鸡体形大,飞得不高,飞行速度也不快,当然比高空的飞鸟好打;加上猎枪打的是散砂弹,所以容易打中。但是,对我来说,这次打野鸡也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是因为坐着打猎,使不上劲;其次,我在部队中习惯于打驳壳枪、手枪,不善于使用猎枪;第三,野鸡从一个灌木丛中飞出后,没飞多远就又一头扎进另一个灌木丛,飞行距离短,因此必须抓住短暂的时机及时射击,否则便会错过良机。

这次打猎总共打了一个多小时。数了数我的战利品:二十来只野鸡。米尔扎总统枪法熟练,打猎经验丰富,共猎获三四十只。贺副总理脚边有二十多只。贺龙同志的枪法很好,也富有打猎经验,为什么打得较少呢?很可能是他出于宾不压主的外交礼貌,因而故意少打。

的确,像这样的打猎,其实也是一种外交活动。通过打猎,不仅密切了领导人之间的交往,而且也体现了相互尊重、关心以及彼此间真诚、融洽的关系,有利于沟通双

方感情,增进两国友谊。

米尔扎总统看了看我和贺副总理的猎获物,点点头说:“成绩不小!”他吩咐左右,将这些野鸡就地煮熟,于是我们在猎场共进了一顿别有风味的野味午餐。

午餐时,米尔扎总统对贺副总理和我说:“希望以后还能和你们一起打猎。”果然,后来他又单独邀请我陪他到卡拉奇东北面的海得拉巴地区打了一次猎。同年12月,当贺龙副总理陪同周总理出访亚洲五国而再次来到巴基斯坦时,又应邀和米尔扎总统一同到海得拉巴打猎。可以这样说,和米尔扎总统一道打猎,是我任驻巴大使期间和他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增进中巴友谊的纽带之一。

贺龙副总理离开巴基斯坦回国后,我又开始做呈递国书的准备工作。4月10日,在巴方外交部官员陪同下,向米尔扎总统呈递国书。

接着,我拜会了乔杜里·阿里总理和其他巴基斯坦领导人。

乔杜里·阿里总理本来预定于秋天访华,但是9月份他忽然宣布辞去总理职务。

米尔扎总统任命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底为新总理。我便去拜会苏拉瓦底总理,以后又多次拜访他,并就他于10月份访华之事进行商谈。

“打开西面的大门”

我就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后不到半年,便因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而回国。还有几位被选为八大代

表的驻外大使，也同时回国。

一天早晨，毛主席叫人给我打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去。根据我的印象，毛主席的作息时间表与众不同，经常是深夜批阅文件，凌晨睡觉直至中午，故而要到下午才能接待来访者。现在，莫非是因为要与八大的开会时间相一致，所以他改变了作息规律？我心中想着，脚下却不敢怠慢，立即驱车赶到中南海内游泳池旁。

这时，毛主席正从游泳池上来，原来他已在池内游了好几圈。他披上一件泳袍，亲切地招呼我和他共进早餐。

他的早饭很简单，就是一碗面条，两碟小菜，其中一碟是他最爱吃的青辣椒，在火上烤一下，蘸着盐吃。

毛主席一面给我夹菜，一面询问我关于北欧和巴基斯坦的情况。当我汇报到与韩念龙同志对调职务、互换“冷”“热”之地时，他风趣地说：“这好嘛！你们一个是热处理，一个是冷处理。”

他又问：“你在国外，知道不知道国内的情况？”

我答道：“知道一些。外交部每月给使馆发来通报，但内容可能不全面。”

“噢，”他点点头，“知道就好！那你说说看，近来国内经济建设方面有些什么重要事情。”

我讲了关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有了较大发展等我所了解的情况。

他说：“不仅要看到顺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困难的一面。”

我又讲了美国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给我们制造

困难……

“对了！”毛主席放下筷子，神情庄重地说，“今天我找你来，就是要谈这个问题。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主要靠自力更生，但是也要争取外援，也要和别国有经济贸易往来。因此，我们要想办法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在这方面，你这个驻巴基斯坦大使要起作用啊！”

我能起什么作用呢？

他大概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心中的疑问，便解释说：“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联结西亚和东南亚，因此，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而中巴友好则有助于打破这个反华军事包围圈……”

我明白毛主席所说的这个问题。由于巴基斯坦的西部地区与西亚相连，而其东部地区（当时称东巴，即现在的孟加拉国）靠近东南亚，所以，50年代中期美国在拼凑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时，便选中了巴基斯坦这个联结中东和东南亚的南亚国家，作为构成其军事锁链的重要一环。

1954年9月8日，在美国的策动和组织下，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八国的代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会，讨论订立军事同盟条约的问题。经过一番谋划，在会上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即人们常说的《马尼拉条约》。按照美国的解释，订立该条约的目的之一，是“抵抗共产党的侵略”，这就暴露了其反对新中国的实质。该条约于1955年2月

19日生效,与此同时,各缔约国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

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两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了《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即《巴格达条约》。接着,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相继参加该条约,并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虽然只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该条约组织,却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给这个西亚地区性的军事联盟组织印上了反共反华的烙印。

这样,美国就把“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两条锁链,通过巴基斯坦联结起来,在我国的西面和南面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军事包围圈,人们形象化地把它称为新月形反华军事包围圈。

在1955年4月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微笑、坦诚、和解,以及寻求和平、友谊、团结、合作的真挚愿望,赢得了绝大多数与会国家的赞扬和尊敬,并消除了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疑虑和误解。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也由此得到了发展。而中巴友谊的建立和发展,沉重地打击了上述两个条约集团的联结点,在联结两根锁链的重要环节上重重地砍了一刀,因而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有助于打破这个美国操纵的反华军事包围圈。

“另一方面,”毛主席继续说,“巴基斯坦处在我国和西亚、欧洲、非洲之间,因此,它是我国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这扇西门,无疑有助于挫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现在,我们对外单靠南门还不行,应该打开西面的大门。”

我知道毛主席所说的南门是指香港。现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我们只有香港这个南门还不够,的确应该打开巴基斯坦这个西门,建立一条通向世界的国际通道。

“你看能不能把这扇西门推开?”毛主席问我。

我说:“主席的指示是重要的战略决策,我们一定努力贯彻,相信能够推开这扇西门。”

“那好!”毛主席补充说,“不过,我刚才所说的只是原则,或者像你所说的是战略,至于具体怎么做法,那就要你们去研究。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必须不断加强中巴两国人民之间和两国政府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我说:“我领会主席的意思,要使中巴两国长期友好下去。”

“对!”毛主席满意地点点头,“中巴长期友好,对大家都有好处。”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为我以后在巴基斯坦的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过了几天,毛主席又召见了我们回国开会的十来个驻外大使,记得其中有黄镇、王幼平等。这次是周总理带领我们一起去见毛主席。时间还是早晨,地点也是游泳池旁。毛主席游了几圈后,从游泳池中上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并要大家和他共进早餐,边吃边谈。吃的还是面条,但是比上次多了一盘腊肉片。还有一盘辣子,和上次的青辣椒不同,这是将辣椒烤焦后捣烂,放上精盐和酱油等佐料做成的,吃起来很香,拌着面条吃,别有风味。

交谈中,毛主席向我们一一询问了各个驻在国的情

况，我们分别作了扼要的汇报。谈着，谈着，他忽然问道：“你们看过戴高乐的回忆录没有？”

我们都摇摇头。

毛主席见我们都没有看过，就接着说：“这也难怪，你们都很忙，但我还是要劝你们抽空看看这本书。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其中有许多提法很有意思。例如，戴高乐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大鱼吃小鱼’。这个话很有辩证法，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实质。我们看看当前的国际现状，美国和英、法等国的关系不就是这样吗？但是，戴高乐有独立性，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他不同意美国的观点和做法，不愿意让美国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也不愿意让法国听从美国的控制和摆布。所以，美国可以指挥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指挥不动法国。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正确地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

在谈到驻外使馆向国内汇报的问题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你们当大使的，应该自己动手写汇报材料。”然后他又问道：“你们写文章时，是怎么写的？有些什么心得体会？”

我们纷纷表示，因为很少写文章，所以谈不上有什么心得体会。大家异口同声地要求毛主席向我们传授写文章的经验。

毛主席说：“要写好文章，必须做到六个字：思，谈，听，看，放，改。在动手写作以前，先要做到前三字。”接

着,他对每个字作了解释:

所谓“思”,就是要思考。要想一想应该写些什么,有什么观点,用什么材料,怎样结构,怎样分段,总之要对文章的框架和主要内容有个腹稿。

所谓“谈”,就是要找人谈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征求意见。谈话对象的面要广一些,可以根据文章内容,找不同专业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广泛交谈。

所谓“听”,就是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看看别人支持不支持自己的想法,同意不同意自己的观点,从而改进自己原来的写作方案。

他说:“上述三个字做到后,就可以动手写作。在写出初稿后,还要做到后三字。”

所谓“看”,就是要对初稿多看几遍,反复斟酌,看看有什么错误的、遗漏的、说得不清楚的、表达得不准确或不充分的地方。

所谓“放”,就是文章写好了不要急于发出去,而要放一放,在书桌上放它几天。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跳出原有想法的框框,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文章的内容和写法,然后和写好的文章作比较,找出应该改进的地方,以便加以修改。在“放”的同时,还可以请人看看文章,给人讲讲内容,继续征求意见。

最后一个字“改”,就是要在“看”和“放”的基础上,参考别人的意见进行修改,改一遍不行,就多改几遍,直到改得满意为止。

“至于写汇报材料,”毛主席补充说,“除了这六个字

外,还应该注意几点:要一事一报,不要把几件事写在一起,东拉西扯,纠缠不清。要开门见山,先写明事由,再加以叙述、分析。好比看人,先要看清他的五官面貌,再看他的手足服饰……”

我一面记一面想:毛主席的这番经验之谈,不仅适用于写文章,而且对我们为人做事,都有指导作用。

除了这两次接见外,我们驻外大使每次回国述职,毛主席总是要找我们谈话。有一次,他同我们谈到学习外国经验和研究国际情况等问题。他说:

“我们观察任何事物、研究任何问题,都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对资本主义也要一分为二。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糟粕,也有不少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你们把他们的好经验报告回来,我们可以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使用,或者参考,使其能对我们的建设起到有益的作用。学习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把学到的东西应用于工作和生产,取得成绩。对于我们自己的发明,也要这样看。发明也是手段,目的是把发明用于生产建设,使其对国家、社会产生利益。

“中医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华佗、扁鹊的医术很高明,在当时的医药界首屈一指。可惜古代的这些医学,有好多内容失传了。幸亏有《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一批医药典籍留传下来,还有许多民间秘方,不少秘方很有效。问题是要将它们和现代医药科学结合起来。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医学、药物学,并发扬中国传统的医药学,通过中西医结合这个手段,来达到提高我国人民健康

水平的目的。

“研究问题要看背景。马克思对建立巴黎公社,开始并不赞成,但是巴黎公社失败后,他马上表示支持和赞扬。他从巴黎公社烈士们的鲜血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争取人类解放的决心。”

听到这里,我联想起毛主席对南昌起义的评价。尽管在当时情况下,他并不赞成在大城市搞武装起义,而主张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进行武装斗争;但是南昌起义爆发并失败后,他还是高度赞扬这次起义打响了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后来还建议把8月1日定为建军节。这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是多么相似!

毛主席继续说:“要研究别国的情况,必须先搞调查。进行调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中之一是注意蛛丝马迹。”说到这里,他看着我问道:“听说你小时候念过私塾,有没有读过《幼学琼林》?”

我点点头:“读倒是读过,只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不求甚解。”

“你能背几句吗?”他问。

我背诵了一段。

“好!”毛主席说,“你刚才背的‘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两句,就是蛛丝马迹,是自然界的蛛丝马迹。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也有很多蛛丝马迹,要敏于发现,善于捕捉。你们要多看驻在国的报刊,因为一个国家如要采取重大措施,必先制造舆论,所以从报刊中就可以发现蛛丝马迹。”

说到这里，毛主席忽然问我们：“你们会游泳吗？”

我们有的点头，有的摇头。

他继续说：“游泳也要调查研究，掌握规律。水太脏了不能游，太凉了不能游——水温低于摄氏十六七度容易抽筋，有漩涡不能游，水草太多也不能游。所以，要调查清楚环境和条件，才能下水。俗话说：‘逆流百步，顺流九里。’顺着潮流，可以事半功倍，否则就劳而无功，吃力不讨好。……”

毛主席的这些教诲，令我得益匪浅，不仅对当时的工作和学习有指导作用，而且至今我对这些精辟见解记忆犹新，经常反复咀嚼，越发觉得其中蕴涵着深奥的哲理，使我终身受用无穷。

后来，周总理也就“打开西门”的问题和我谈话。他说：“毛主席就这个问题对你所作的指示，具有伟大的政治战略意义，你务必要深入领会，在工作中努力贯彻。同时，从经贸方面来说，我们也可考虑经过巴基斯坦建立一条通向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从外交方面来说，中巴友好也有助于我国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总理的这些指示，使我加深了对毛主席关于“打开西门”这一战略决策的认识，并进一步加强了我对这个工作的使命感。

周总理访巴

1956年底，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五个

邻国。接着,在1957年初,又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等欧亚六国。

周总理和贺副总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从12月20日起,到12月30日止,历时10天。这次访问,不仅是对巴基斯坦苏拉瓦底总理10月份访华的回访,而且也是一次贯彻我国和平外交路线及睦邻政策,与这个西陲近邻增进交往,加强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外交活动。

为了迎接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我于19日专程飞抵缅甸首都仰光。一到仰光,我立即分别向周总理和贺副总理报告了巴基斯坦情况和代表团访巴日程。当晚我参加了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为周总理访巴举行的答谢宴会。第二天便陪同周总理、贺副总理一行离开仰光,飞抵巴基斯坦。

访巴期间,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及代表团全体人员,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不论是在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第二大城市拉合尔以及拉瓦尔品第、白沙瓦、海德拉巴等历史名城,还是在东巴基斯坦(即现在的孟加拉国)的首府达卡和纳拉扬甘吉工业区,代表团所到之处,热情好客的当地人民都笑容满面地夹道欢迎。有的地方还举行群众大会欢迎中国贵宾。

米尔扎总统和苏拉瓦底总理分别同周总理、贺副总理进行会见、会谈。在会谈及交谈中,周总理向巴基斯坦领导人介绍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并再次表达了进一步发展中南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

周总理说:“我们是抱着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和寻求

知识的目的到巴基斯坦和其他邻国来访问的。和平、友谊和合作,这就是中国睦邻外交的宗旨。巴基斯坦是中国的近邻,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要继承这种良好传统,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睦邻关系。”

周总理表示,尽管我们两国对于某些国际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尽管巴基斯坦参加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国际条约,而中国是反对这些条约的,但这些并不能妨碍我们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共同愿望下,加强双方的联系和合作。

周总理还回忆了万隆会议期间和巴基斯坦前任总理友好交谈、达成谅解的情景。当时,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总理在听了周总理所作“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的大会发言后,十分激动地说:“我是带着(对中国的)成见来的,但想不到周恩来总理这样尊重别人的意见。现在成见消除了。周总理真正能代表伟大的中国,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派出这样伟大的代表团。”他还对周总理说,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并不是为了反对中国,巴基斯坦也不相信有人提出的所谓“中国有侵略意图”的说法。阿里总理还向周总理保证:如果美国在马尼拉条约下采取侵略行动,或者发动世界大战,巴基斯坦将不会参加,正如巴基斯坦并未参加朝鲜战争一样。

这次访问期间,周总理再次对巴领导人表示,我完全

相信,这些条约并不能妨碍我们为争取和平而进行合作。

周总理在与巴领导人会见时,高度评价两个月前苏拉瓦底总理访华时双方进行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在那次会谈中,两位总理就万隆会议精神与和平共处问题进行了很有意义的对话。周总理问道:“万隆会议以后,世界局势变化很大,中巴两国关系也有了很大进步。你对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看法如何?”

苏拉瓦底总理答道:“你出席万隆会议,毫无疑义对会议的成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阁下参加万隆会议以前,许多人不清楚中国的立场和目的,不知道中国是要并吞世界其他国家,还是要同别的国家友好合作。……你出席万隆会议受到很大的欢迎。你的合作态度改变了会议的整个气氛。你使我们感觉到,中国真诚地和迫切地要同别的国家友好相处,并且共同求得发展。”

周恩来对来访的苏拉瓦底总理表示,万隆会议取得成就,是所有与会各国努力的结果,这个成就不是一个国家的成就。在那次会议上,大家表现了团结和谅解,并且表示要为共同目标奋斗。中国人民的愿望是这样,政府的政策是这样,我作为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代表和发言人,表达了这一愿望。我们认为,只有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才能得到发展;只有站在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不容许自己重蹈殖民主义的覆辙,才不致失败。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规定在宪法里的基本政策。

访巴期间,周总理对米尔扎总统和苏拉瓦底总理说,社会制度不同不要紧,意见有分歧也不要紧,只要我们按

照万隆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用求同存异的方法来对待分歧,那么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友好关系就会得到加强。

周总理强调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挣脱殖民主义锁链的斗争而获得独立的国家。在亚洲和非洲,还有许多这样的新独立国家。但是,也有不少国家的人民,仍处于殖民主义的阴影之中。因此,我们希望不仅中巴两国、而且亚非各国都要加强团结,更好地为巩固各国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更好地为促进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在谈到克什米尔问题时,周总理建议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通过和平谈判和友好协商来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米尔扎总统和苏拉瓦底总理均对周总理的意见表示赞赏。同时,他们也分别表示了加强巴中两国友谊合作的愿望。

12月24日,周总理和苏拉瓦底总理代表中巴两国政府,在巴基斯坦总统府签署联合声明,米尔扎总统参加了签字仪式。这标志着双方的会见和政治会谈取得圆满成功。

同时,双方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还就两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和交流进行商谈,并取得了协议。

米尔扎总统和苏拉瓦底总理亲自陪同周总理、贺副总理参加一些活动。

在一次活动中,周总理与米尔扎总统、苏拉瓦底总理互赠礼物。米尔扎总统和夫人向周总理赠送的礼物中,有一幅镶在大镜框内的周总理像。这幅半身像的质地,现在记不真切了,回忆起来似乎是一种很精致的棉麻织物。从这幅英姿勃勃、面露微笑的周总理像中,我看到了巴基斯坦人民及其领导人对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周总理本人的友好和尊敬。当时,我被这充满友谊和欢愉的情景所感染,就想请摄影记者赶快拍下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这位记者的新闻敏感性很强,也正在找寻合适的角度以便捕捉这个动人的镜头。我们的意见不谋而合,于是,一帧象征着中巴友好的生动感人的历史照片便诞生了。

抵巴后的第二天,周总理、贺副总理和代表团全体人员便去拜谒了巴基斯坦国父真纳的墓地,并拜会了受人尊敬的真纳小姐。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是巴基斯坦立国运动领导人。1940年3月他在拉合尔主持召开穆斯林联盟大会,会上通过了建立巴基斯坦的纲领,要求在印度西北部和东部的穆斯林聚居区组成伊斯兰国家。1947年8月印巴分治后,真纳出任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督、制宪议会主席。1948年9月11日,他因病逝世。巴基斯坦人民把这位伊斯兰国家的创立者尊称为国父。他的妹妹法蒂玛·真纳,是他在领导立国运动中的得力助手,人们称她为真纳小姐,在巴基斯坦享有很高的威望,受到历届政府的尊重。

当天,代表团还观看了巴基斯坦空军表演,并参加了首都市民的欢迎集会。

在参观吴拉姆·穆罕默德水坝时，周总理详细了解了这个水坝的工程建设情况以及它在蓄水、防洪和发电等方面的资料和数据。后来，在和苏拉瓦底总理交谈中，周总理多次提到这个水坝。他说：“中国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也要修建一些水坝，吴拉姆·穆罕默德水坝的建设经验，对于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将起很好的借鉴作用。”

在卡拉奇，代表团参观了许多工厂企业。周总理对这些工厂的生产管理经验了解得很仔细。他对我说：“很多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他对一家纺织厂制造的一种人造皮革很感兴趣，在参观过程中向该厂负责人和工程师详细询问这种人造皮革的生产、销售和用途等情况，并表示回国后要派人来学习。

由于贺龙副总理是元帅的缘故，巴方特地安排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海军的活动。当周总理、贺副总理在巴基斯坦海军领导人的陪同下，乘船前往卡拉奇附近的马诺拉岛海军基地时，受到了海军官兵的热情欢迎。他们一面为中国贵宾进行表演性的演习，一面高呼向中国总理和中国元帅致敬的口号。那飘扬在阿拉伯海上空的热烈而嘹亮的呼号声，伴着轰鸣的轮机马达声，至今仍在我的耳畔回荡。

历史悠久的白沙瓦大学，是巴基斯坦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南亚地区最负盛名的伊斯兰教育中心之一。周总理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这里受到了该校师生的热烈欢迎。挂在那宏伟建筑物上的一串串彩旗，在微风中

飘然起舞,仿佛也在向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表达欢迎之情。

在座谈中,周总理向白沙瓦大学的师生们谈到了中巴两国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他说,早在1000多年前,名闻世界的丝绸之路就把我们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这条满载丝绸和其他财富的辉煌之路,不仅加强了中巴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也沟通和增进了我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希望今后在中巴两国间能够建造一条新的丝绸之路,使我们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白沙瓦大学的师生们,用热烈的掌声和伊斯兰的礼节来表示他们对周总理讲话的赞同和支持。

在马尔丹,周总理、贺副总理与霍堤土邦的酋长共进午餐。酋长向每位客人赠送一双鞋,还亲手给周总理戴上一顶该土邦特有的帽子。按照土邦风俗,向客人赠送鞋帽,是最尊贵的礼节。据陪同的巴方官员介绍,这是该土邦300年来第一次向外国客人赠送鞋帽。对中国贵宾的这种特殊礼遇,表明了土邦酋长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在历史名城拉合尔,周总理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拉希德市长在夏丽玛尔公园为欢迎中国代表团而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会上,周总理发表了洋溢着中巴友谊的演说。演说结束时,他用乌尔都语高呼:“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参加欢迎集会的巴方领导人和拉合尔市民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代表团从拉合尔飞往达卡时,原定在午后2时许到

达,但是由于飞机推迟起飞时间,所以到下午6时半才飞抵达卡机场。

当飞机即将抵达机场时,看着机舱外的苍茫暮色,我心想,时间这么晚了,机场上欢迎的人们可能已经散去。但是,当飞机降落后,我出乎意料地发现机场上黑压压一片,全是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人群。不仅如此,从机场通向达卡市区的公路两旁,欢迎的群众也排成两条长龙,他们有的挥舞彩旗,有的振臂高呼,有的鼓掌,有的扬手,用微笑和鲜花迎接中国客人的到来。“中国!”“周恩来!”及“巴中友好!”的欢呼声响彻从机场到市区的上空。

达卡的官员告诉我,欢迎群众约有10多万,都是自发前来迎接中国贵宾的。他们从各个地方汇集而来,大都从上午就来到这里,等待了七八个小时。干渴、疲劳、焦急和黄昏的来临,都没有驱散他们欢迎的热情。我一面听着他的介绍,一面看着车窗外欢迎群众那一张张充满热情、真挚和友好的笑脸,不禁为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所深深感动。这种动人的情景,正如周总理后来在总结这次访问时所说的:“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在参观了纳拉扬甘吉工业区的麻纺厂和棉纺厂后,周总理又到达卡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接着又和代表团全体人员一起出席了达卡市数万市民的欢迎大会。晚上周总理一行观看了巴中友协举办的精彩的戏剧晚会。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得这次访问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30日上午9时,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在圆满完成了

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后，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机离开达卡回国。

这次周总理访巴，不仅加强了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体现了我国的和平外交路线和睦邻政策，而且还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当时我国正处在国际反华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如何打破这种包围与封锁，乃是我国外交战线面临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这样，毛主席才指示我要努力打开巴基斯坦这扇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而这次周总理访巴，就是亲自来实践毛主席的这个战略意图。同时，他在这次访问中所取得的外交成果，又为我们驻巴使馆今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送别周总理和代表团后，我和使馆的同志准备离开达卡回到卡拉奇。我想，应该在达卡买点有意义的东西，以纪念周总理此次访巴。买什么呢？我发现达卡生长一种楠竹，坚挺向上，耿介拔俗，很有象征性和纪念意义。据说这种竹子只产在东巴，西巴地区没有见过，那么，把它带回去种在使馆内，岂不是好！主意已定，我便买了一根粗壮的楠竹，截成四段。按照卖竹者的指点，每段上要有三道竹节，插种时将下面两道按45度角斜插入土中，留出上面一道以备抽芽。将这四段楠竹乘飞机带到卡拉奇后，立即插种在大使馆的院子里。等它们长成后，我在其中一棵长得最粗的上面刻了字，写明这是对周总理访巴的纪念。后来，这里变成了一片茂密的竹林。在我任期届满离巴后，由于巴基斯坦迁都，我国驻巴大使馆也随之迁至新都，原来的馆址改为我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1978

年我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时，在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内重睹了这片竹林，抚竹追思，不禁又想起了20多年前周总理访巴的盛况，回忆起他在发展中巴友谊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友谊方面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援助是相互的”

前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同志和大使馆全体人员的出色工作，为中巴两国间的友谊奠定了基础。我到任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和大家一道努力，使中巴的良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回忆起来，有几件事对加强两国友好关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件事是我国对巴基斯坦灾区的援助。

有一次，当我去拜访苏拉瓦底总理时，他向我提出了一个紧急援助要求。他说，现在东巴地区遭受严重水灾，缺乏粮食，希望中国朋友帮助我们解决困难。

我问，需要多少粮食？

苏拉瓦底总理表示，关于粮食数量和如何援助等具体问题，将由有关部门研究后再向中国大使馆通报。

不久，巴基斯坦外交部向我提出了急需6万吨大米的具体要求，希望给以优惠价格，并要求尽快运送到东巴灾区。

我考虑到巴基斯坦既面临国内经济困难和自然灾害，又承受着来自国外的巨大压力，如果给巴一定的援助，可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因此，便向国内报告此事，建议以优惠价格卖给巴基斯坦6万吨大米，或者赠送一

部分粮食。

国内迅速回电,传达了周总理的批示:同意卖给巴方6万吨大米,按正常贸易价格计算,另外赠送大米4000吨。这些大米将尽快调集运送到东巴,以帮助灾区人民克服困难。

第二天,我将国内决定答复巴方,他们表示满意和感谢。接着,双方订立协议。在协议签字仪式上,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主动向我提出,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面粉,口袋上都印上了“美国援助”的字样,中国援助的大米,也可以在米袋上印上“中国援助”的字样。

我想,美国这样标榜对别人的“援助”,未必能收到它所希冀的效果;而我们援助巴基斯坦,是基于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以及对东巴灾区人民的同情,是出于帮助东巴人民克服困难的真诚愿望,别无其他目的,因此,我们不能仿效美国的做法。于是,我答道,我们只在米袋上印上“中国”,说明这些大米产自中国就可以了,不必再标明“援助”字样。

若干天后,当大米运抵东巴时,巴方官员看见米袋上果然只印“中国”而未印“援助”,十分满意,再三对我使馆人员表示,中国不利用援助来抓宣传资本,是对巴基斯坦的真诚支持。

协议签字仪式后,巴基斯坦粮食部的新闻官员专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公布了中国援巴粮食的情况,并赞扬说这是慷慨的援助。当他发现我国新华社驻巴记者所写的英文电讯稿上没有“慷慨的”字样时,便提笔

在稿件上加上了这个充满感情的形容词。

巴基斯坦新闻舆论界对中国援助的反应异常热烈。许多报刊在报道此事时，异口同声地称赞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不抱政治目的”、“真诚”，并说这种援助体现了巴中两国间的亲密友谊和团结合作。有些报道还把我和我们使馆的外交人员誉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巴基斯坦政府领导人也常在各种场合表达对中国的信任和感激之情。他们说，患难见知交，在巴基斯坦遇到困难时，雪中送炭的中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1957年春，苏拉瓦底总理在巴基斯坦国会答辩时也表示：“当危机的日子到来时，中国一定会帮助巴基斯坦的。我们去年粮荒严重时，中国已经帮助过我们。”

后来，我回国述职时见到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他告诉我，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曾就我国援巴大米之事专门向他致谢。巴大使说，中国在自己粮食并不很富裕的情况下，调集数万吨大米卖给巴基斯坦，还慷慨赠送数千吨大米，这不单纯是一种贸易关系，而且表明中国人民对于困难中的巴基斯坦人民的关怀和同情，巴基斯坦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件事。

当巴基斯坦领导人对我就此事道谢时，我总是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对他们说明两点：第一，由于我国的经济还不发达，所以对外援助是有限的，只能尽力而为。第二，援助是相互的，我们此次援助了你们，但你们也在其他方面援助我们；正是通过相互援助，我们才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关于“援助是相互的”，不仅理论上是如此，而且在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相互关系中，也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拿经贸方面的事例来说吧。巴基斯坦盛产优质棉花，当时，我国由于棉花产量较少，满足不了国内棉纺业和其他用棉行业的需要，所以每年要从巴基斯坦进口棉花。有一次，巴基斯坦出口的棉花涨价。据国内有关方面反映，巴棉涨价，势必会增加我国纺织品的生产成本，水涨船高，我国纺织品的销售价格必然要随之增加，这样不仅影响到我国人民的生活，也降低了我国棉纺织品出口的竞争能力。因此，国内希望驻巴使馆协助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使馆商务处的同志，便去同巴方外贸部门商议。我也向巴基斯坦外交部反映此事。巴外交部官员表示，愿意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们主动向巴外贸部门做工作，终于使得巴基斯坦出口商同意对我国出口的棉花保持原有价格。这实际上就是巴方对我国的援助。

外交方面，巴基斯坦经常和我国合作，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联合国，巴基斯坦的代表和其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一起，一直投票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实际上就是在国际政治中对我国的支援。

在科技交流方面，我国和巴基斯坦相互支援的例子也不少。例如，我国援助巴基斯坦建立造船厂，教给他们船舶制造方面的经验和技能。巴基斯坦则向我国传授麻棉纺织方面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巴方有关部门还把他们掌握的有些国际先进科技介绍给我们，或把有些先进的

机械设备转让给我们,这无疑有助于打破美国对我国实行的科技封锁。

除此之外,巴基斯坦各部门对我们使馆的工作,也经常给予支持和帮助。以前,国内的领导机关给我们驻外使领馆的外交人员和工作人员制订了一些守则和规定,如出外必须两人以上同行、不能到电影院看电影、不许逛街、不许到外面去游泳等。其中有些规定在当时对有些驻在国是必要的,但有些规定则限制过严,往往会影响对外交往,也使我们使馆人员缺乏必要的文体活动。我到驻巴使馆后,按照当地环境和具体情况,取消了一些过严的限制,不但允许大家上电影院、逛街、逛商店,还鼓励外交人员到巴方人员家中去串门,和当地居民交朋友。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巴基斯坦外交部和有关部门的帮助。

我还鼓励大家在星期日到海滩去游泳。我们把国内寄物品来的木箱集中起来,准备在海滩上修几间淡水淋浴的房子。巴方知道后,不仅拨给我们一块地皮,还请巴海军司令部运来水泥,并派人帮助我们修建了浴室。

中巴两国间的互相帮助和合作,还体现在发展两国间的陆路交通和开辟国际航空线方面。

为了实现毛主席关于“打开西门”的指示,我们考虑应该推动两国的民航和交通部门建立中巴航线,开通两国间的公路交通。而要达成这个目标,首先必须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同意和支持。为此,我多次拜访了巴基斯坦领导人。

米尔扎总统十分赞赏我提出的意见。他说,建立航

线、开通公路,有利于两国人员的交往和货物的运输,从而必将促使巴中两国之间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得到进一步发展。他积极支持这一设想,并希望早日实现。

继米尔扎总统之后任职的阿尤布·汗总统也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开辟陆上和空中的中巴交通线以及中国经由巴基斯坦通向中东、欧洲和非洲的国际航线。

苏拉瓦底总理以及在他之后任职的几位巴基斯坦总理,都把开辟中巴航线和建立中巴间的公路交通线看作加强两国友谊和合作的重要措施,并对有关的谈判和建设工作给予大力协助。

后来当我奉调离开巴基斯坦回国后,继任的几任驻巴大使都继续为开辟中巴交通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巴方领导人的支持和协助下,在使馆同志们的积极联系下,中巴两国的交通和航空部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促成了中巴通航,并为中巴国际公路的建设着手做准备工作。

在此以前,我国对外交通,除到东欧和北欧可以取道苏联外,要到东南亚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要取道香港。到西欧或非洲去,也要绕道香港。这样,对旅客来说不仅很不方便,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万隆会议前“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被炸,就说明了这点。当然,建国初期我国领导人和代表团出访,也可以从昆明起飞,经过缅甸的仰光,转飞欧洲和其他地区;但是,这样绕道而行,同样很不方便。因此,中国和巴基斯坦通航以及将中巴航线向西延伸,成为通向中东、欧洲和

非洲的国际航线,就为我国打开西门、走向世界开辟了便捷的道路。

在陆路交通方面,我国和巴基斯坦的交通部门经过数年准备,各自在中巴边境地区修建了公路。

在我国新疆和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之间的边境线上,海拔数千米的喀喇昆仑山脉自西北向东南,绵延数百公里,成为中巴两国间一道天然屏障。在喀喇昆仑山脉的北段,有几个山口可以通行,红其拉甫山口就是其中之一。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这样的山口,把中国和西亚及欧洲联结起来。

但是,在现代的国际交往中,仅靠马队或骆驼队显然不行;因此,建设中巴之间的国际公路便成为当务之急。

经过协商,中巴双方都决定修建一条通过红其拉甫山口的国际公路。可是,由于这个地方是雪山高原区域,而且气候恶劣,风沙甚大,所以要在该地区修建公路,工程异常艰巨,必须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同时,两国交通部门必须各自先修通从内地到边境地区的公路,然后才能修建国际公路加以衔接。所以,这条国际公路巴方路段的实际施工,是在我离任以后的第八年才开始的。两国的交通部门、筑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经过12年艰苦劳动,终于在世界屋脊上架起了这座联结中巴两国的友谊之桥。

当这条象征着中巴友谊进一步发展的喀喇昆仑国际公路建成通车之际,我正好在巴基斯坦访问。当时任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兼政府首脑的哈克将军对我

说：“这条公路的建成，和你这位前任大使当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表彰我对增进中巴友谊所作的贡献，也为了感谢我在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主持签订了中巴边界条约，巴基斯坦政府给我颁发勋章，还邀请我出席在红其拉甫山口举行的通车仪式，并参加剪彩。

在阵阵掌声和欢呼声中，中巴两国的汽车互相通过红其拉甫山口，这标志着高入云霄的喀喇昆仑山已被中巴人民的团结合作所征服。而随着这道横隔在中巴两国间的天然屏障被超越、被克服，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谊，便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什么也不要”

中巴友谊的发展，有许多动力和原因。除了上述各点外，下列几件事在促进和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件事是我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坚持了公正的立场，使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都十分满意。

由于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之间长期没有解决的历史悬案，一直影响着印巴关系和南亚次大陆的局势；同时，也由于克什米尔紧邻我国西部地区，而印巴两国都是我国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它们之间能够友好、妥善地解决这个历史悬案；因此，我很关心这个问题。我到巴基斯坦上任后，就开始了解克什米尔问题的由来和现状。

位于巴基斯坦东面和印度北面的克什米尔，原为一

个土邦,面积 21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 500 万,其中穆斯林占 77%,印度教徒占 20%。1947 年关于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规定,克什米尔可以自由决定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也可以保持独立。由于宗教信仰和民族不同等原因,占克什米尔邦居民中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倾向于巴基斯坦;而当时克什米尔邦的印度教徒,倾向于印度。所以,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于 1947 年实行分治并相继独立时,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后来,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不断发生争端,导致爆发了三次印巴战争。1947 年第一次印巴战争时,联合国专门成立了印巴委员会进行调解,并作出了关于克什米尔停火和举行公民投票的决议。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均表示接受该决议。1949 年 7 月双方正式停火后,印度控制克什米尔南部,占有该邦约五分之三的土地和约四分之三的人口;克什米尔北部地区则由巴基斯坦控制。1953 年,印巴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均认为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最实际方法是举行公正无私的公民投票。但后来印度反对举行公民投票,双方为此举行过多次会谈,也毫无结果。至今,克什米尔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有关的纠纷不断,成为南亚次大陆局势紧张的重要因素。

我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十分明确,总的来说是持调解而不介入的立场,主张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其归属问题,希望印巴两国之间通过和平协商来克服分歧,解决这个历史悬案,而不应引入外来干涉。在这方面,我曾几次向周总理介绍有关情况并提出建议,得到了周

总理的肯定。

1956年秋,我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说:“克什米尔问题非常敏感,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在争取我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支持。我接触过很多巴基斯坦的政府官员和各阶层人士,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和我讲到克什米尔问题。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体会到,从巴基斯坦方面看来,中巴两国能否长期友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所以,我们对克什米尔问题,一是坚持不介入,二是讲公道、讲正义。我们同印度友好,同巴基斯坦也友好。这样,就可以全面地贯彻我国的睦邻政策。”周总理肯定了我的意见。

1956年底,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五国。在此之前,我曾向周总理建议:“您访问印度时,如果印方安排您到尼赫鲁总理的家乡访问,最好别去。”

“为什么?”周总理问我。

我答道:“因为,据我所知,尼赫鲁的家乡在克什米尔南部印度实际控制区。您访印时如果在尼赫鲁陪同下到他故乡去访问,就会造成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反对巴基斯坦的误解……”

“哦,我明白了!”周总理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说,“你这个意见提醒了我,提得好!”

后来,周总理访印时果然婉拒了印方的邀请,未去克什米尔访问。巴基斯坦方面对此十分满意,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很大支持。

另一件事是飞地坎居提问题的妥善解决。

为了贯彻周总理关于要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指示，我对中巴两国间的有关历史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经过调研，发现有一个飞地坎居提问题，可算是中巴关系史上尚未解决的悬案。

坎居提位于巴基斯坦东部，与我国新疆的南部接壤。它面积不大，本是喀喇昆仑山区的一个小土邦。中国元朝时，曾派兵占领该地，并把它作为中国的属地。后来，这个土邦的首长宣布脱离中国，接受巴方的管辖。这样，坎居提实际上早已成为巴基斯坦的地方。但是，在我国解放以前印制的一些地图中，仍把坎居提作为中国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块飞地。

根据有关资料，我和使馆的同志们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按照实际情况，不应再把坎居提作为中国的飞地，而应该明确放弃这块名义上的属地，把它正式地完全地归还给巴基斯坦。

我在回国述职时，向周总理提出了放弃坎居提这块名不副实的属地的建议。我说，我们这样做，一方面符合实事求是和公正处理国际间历史悬案的原则，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中巴友谊。

周总理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外交部研究此事。过了几天，外交部通知我：国务院和外交部已同意我的建议，并授权我照会巴方。

我回到巴基斯坦后，立即晋见米尔扎总统，向他通报我国政府的这一决定。

米尔扎总统问我：“贵国政府同意坎居提属于巴基斯坦，那么，要我们为你们做什么？”

我理解他问话中的含意，即中国有什么交换条件，便答道：“我们什么也不要。”

他听了很高兴，于是和我就坎居提的历史以及中巴两国边境往来等问题进行交谈，并约我过几天再来总统府会晤。

几天后，我如约到达总统府。当我走进接见厅，看见除了米尔扎总统和巴方礼宾官外，还有一位官员在座。米尔扎把他介绍给我说，这是坎居提的现任酋长，特来和我见面，并通过我向中国政府致谢。

酋长紧紧握住我的手，连声道谢。

我说：“不必感谢。我们是按照和平友好、公正合理的原则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也是我国政府一贯奉行的外交原则。”

米尔扎总统设宴款待我们。在宴席上，我们频频举杯，为中巴两国的友谊和合作而干杯。

为了促进中巴两国之间的经贸交往和合作，我国对外贸易部在卡拉奇举办了一个贸易展览会。当我得知展览会上要运用毛主席的语录时，就向负责筹办的同志建议，要多用有关团结、合作等内容的语录。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在展览会场正面入口处的大厅正中，竖立了一块引人注目的大标语牌，上面摘录了毛主席关于“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的词句。

展览会的观众十分踊跃，卡拉奇的新闻界对此也有

良好反应。后来,有许多巴基斯坦官员和各界人士向我谈及参观展览会的观感。他们除了称赞展出的商品丰富、质优外,不少人特别提到了毛主席的这段语录。他们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这个说法太好了!只有团结大多数人,国家才能安定、富强。”

有人问我:“在你们中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是否包括各个民族之间的团结?”

“对!”我说,“中国有 50 多个民族,都紧密地团结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内。不仅如此,而且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们,都紧紧团结在五星红旗下。”

他说:“你所说的对我启发很大,在我们国家里,也应团结大多数人。”

还有人对我说:“我们巴中两国之间,也要加强团结……”

我对他的意见表示赞赏,并强调,我们两国加强团结和合作,就能进一步增进友谊,共同发展,并为促进和巩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毋庸讳言,当时在中巴友好的主基调中,也曾出现过少数不调和的声音,但是,这种微弱的声音很快便被淹没在中巴“友谊、团结、合作”的巨大声浪中。例如,1957年冬,巴基斯坦外交部有两名官员,发表了一个反对我国的声明,竟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加入”联合国。我们使馆知晓后,立即起草了一封抗议信,准备递交巴基斯坦外交部。但是,抗议尚未发出,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已发表声明,指出这两名官员是私自行动,他们的意见并不代表

巴外交部,并表明巴基斯坦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许多巴方人士也来找我交谈,指责这两名外交部官员的错误意见和擅自行动。由此可见,中巴友好在巴基斯坦已深入人心。

异国故人来

1958年春夏之交,当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同志和夫人刘英同志一道来到巴基斯坦,视察和指导我们驻巴使馆的工作。

他乡遇故知,这本是人生一大快事,何况在异国和故人重逢,自然倍感高兴和亲切。

由于闻天同志并非应巴基斯坦方面的邀请来巴访问,而是代表我国外交部到我们使馆来巡视,是一次内部活动,因此,他在巴期间没有外交上的交往和应酬,也不需要住宾馆,就住在使馆内。当时我们使馆的房子并不宽裕,更没有像样的客房,所以我就把大使官邸内我自己的住房腾出来,供他们夫妇居住。

我考虑到闻天同志是部领导,而且年高(当时已将近60岁)体弱,所以吩咐厨房按部级干部的标准给他准备伙食。但是,他坚决不同意专门为他做高标准的饭菜,我只好照他的意见办,只是每餐给他两个芒果,以补充营养。开始时,他不肯要,说每顿吃这么高级的水果,太特殊了。我告诉他,巴基斯坦盛产芒果,并不贵,我们使馆人员也经常吃。这样,他才同意。他很喜爱芒果,一面吃,一面开玩笑说:“我到过不少国家,都没有吃到芒果,以后我要

多到巴基斯坦来。”

他经常同大家在一起聊天：他说，这样既可加深感情，还可了解使馆的工作情况。他这种朴实随和、不摆领导架子、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可与周总理媲美，因而得到了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交口赞誉。大家都感到，和闻天同志相处，十分亲切，所以和他交谈时都能说心里话，毫不拘束，也无顾虑。

我从闻天同志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觉得只有像他这样平易近人，深入群众，才能使大家畅所欲言，也才能了解到更多、更深、更加全面细致的情况。

闻天同志的生活十分朴素。按照常情推想，像他这样高级的领导干部，曾任驻苏联大使，参加过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又到过许多国家巡视我国驻外使馆，其生活用品总是高级的、现代化的；但事实却不然，他的衣着朴素，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生活用品。一天早晨，我去找他，发现他正拿着一把老掉了牙的旧剃刀在刮胡子。我想：这怎么行，一不小心岂不要刮破下巴！于是，便将我刚买的一把飞利浦牌电动安全刮胡刀送给他。他试了试说：

“好！好用！既方便，又安全，比我的剃刀好多了。我先借着用几天，等走时再物归原主。”

我说：“这是我送给你的，您走时就带着。”

他连连摇手：“不行，不行！怎么能接受你的礼品。”

我笑着说：“这不是礼品。我作为您的学生和战友，送您一个小小的日用品，以尽师生之谊，这合乎常情，有什么不可以！”

“怎么？”他诧异地问，“我什么时候当过你的老师？”

“您忘了，在北京筹建出席联大代表团时，我曾提及此事：在江西中央苏区，我听过您的报告；在延安时，我听过您讲课。所以，您作为我的老师，确实当之无愧。”

他听后感在“哈哈”的笑声中，只好同意收下这小小的馈赠。

通过和使馆人员的广泛交谈和阅读有关资料，闻天同志全面、详细地了解了我们使馆的外交工作，并对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强调：巴基斯坦是我国的近邻，我们要贯彻睦邻政策，和它加强友好合作。为此，使馆工作中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与巴方上层和各界人士加强联系；二是要加强调研。他还就使馆内部的组织工作、政治思想工作、行政后勤工作以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学习、保健等问题，对我们作了详细的指示。

在和我交谈中，他还着重谈了使馆的调研问题。他说：“大使作为国家的代表到国外工作，工作对象首先是驻在国，不了解驻在国的情况就无法工作。如果在国内工作中犯了错误，尚可纠正；但在外交上犯了错误，其影响和损失就很难消除和弥补。所以，大使和参赞都要带头走出使馆，到外面去活动，去作调查研究。只有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才能对情况作出客观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

他明确指出，使馆要重视调研，大使的工作重点就是调研，不要陷于事务性工作，不要受礼宾工作的干扰。要把研究驻在国情况和国际关系，作为使馆的一项根本任

务而常抓不懈。只有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才能做好其他工作。

我向他请教,怎样深入研究国际问题。

他说:国际问题的确很复杂,但并非高不可攀,深不可测。只要有决心,肯学习,抓住不放,一定能够钻进去。研究要注重实际,联系实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特别要联系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来进行研究。同时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研究。他还举了一些事例加以说明。

记得我在1950年出国赴任前夕,在怀仁堂聆听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搞外交要做好调研工作的指示,现在听了闻天同志这番话,更加深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真是获益匪浅。

闻天同志这次来我们使馆视察,时间不长,却对我们的工作起着很大的指导作用,使我们能更好地领会和掌握我国的外交政策;同时,也使我从他的言行中进一步认识到他的可贵品质。

早在红军时期,我就认识闻天同志。30年代初,他作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从上海来到江西中央苏区。不久,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接着,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那时,我在红三军中先后任九师参谋长和四团团。在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聆听了闻天同志的报告。他知识渊博、论点清晰,加以态度和藹、温文尔雅,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红军长征时，闻天同志在中央纵队，我们红四团是前卫部队的先头团，所以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在红军进入贵州境内、我受命率领红四团抢渡乌江时，随军指挥的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总参谋长刘伯承相继告诉我关于闻天同志的一件事，使我对他产生了更加深刻的良好印象。

这件事发生在1934年冬，当时中央纵队已渡过清水江，抵达黄平一带。闻天同志身体不太好，所以行军时坐着担架；王稼祥同志（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这时，正是南方桔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桔子长得又大又好。他们叫担架停在一个桔园内，两人头靠头地躺在一棵硕果累累的桔子树下，然后交谈起来。王稼祥问道：“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唉，也没有个明确的目标。看起来这个仗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王稼祥同意张闻天的意见，当天晚上首先打电话把它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别的将领。几个人一传，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高级将领都知道了张闻天的意见。由于张闻天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既然他有此意见，那么毛泽东重新领导红军这件事就有了希望，所以大家都很高兴，都赞成在渡过乌江后中央举行会议，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很受鼓舞。回想起在中央苏区时,红军进行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都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打赢了。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同志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离开了红军指挥岗位;但是,朱德和周恩来同志仍然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战斗,故而仍旧取得了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来了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把他奉为太上皇,把红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他。他彻底抛弃了行之有效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改而贯彻他的那一套“短促突击”战术。在一次李德讲课的课堂上,我提出过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拍桌子骂我,还罚我的站。他就是那样蛮横。结果,就是李德那套完全错误的打法,害得我们打输了第五次反“围剿”,红军遭到了严重损失,连中央苏区那样好的一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才不得不离开江西中央根据地,仓促进行战略大转移。记得毛主席后来在陕北给我们讲课时就说过,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开始并不是要进行什么长征,我们是逃跑,是逃跑主义,是没有办法了,打不赢了。毛主席的这个看法,符合长征开始的情形,也使人明白了张闻天同志所说这次红军大转移“没有个明确的目标”的原因。因此,广大红军指战员都十分怀念毛泽东同志,都希望他重新出来指挥我们战斗,挽救革命危局。现在我从左权、刘伯承同志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受鼓舞,就率领部队拼命地打,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打过了乌江。

过了乌江攻占遵义之后，中央就布置在遵义开会。我虽然知道前面提到的消息，但不知中央在何时何地开会，所以正准备让全团干部战士在遵义城里好好过个年，休整休整。忽然，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红一军团政委）直接命令我们红四团迅速向北突进，攻占娄山关。占领娄山关和桐梓城后，红二师的陈光师长和刘亚楼政委又命令我团占领牛栏关和松坎，并前出至凉峰崖下的渡口附近，以警戒可能从重庆那边过来的敌人。直到后来遵义会议胜利结束后，消息传来，我才明白上级这番布置的用意，是要我们去抵挡北面的敌军，以保证在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全进行并圆满成功。

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我党我军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摆脱了“左”倾路线的束缚，挽救了处在危境中的中国革命，从而成为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对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之顺利召开并取得成功，闻天同志功不可没。正如后来毛主席在七大上所说，遵义会议的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其他同志的。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就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

遵义会议后，闻天同志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使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以在中央和全党顺利推行。在延安时，闻天同志还长期主管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36年底，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闻天同志

竭力主张通过此事将局部统一战线发展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促使蒋介石同意抗日。他的这个意见对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起了很大作用。

抗战爆发前,我曾在红军大学学习,在此期间,多次聆听闻天同志讲课。每有问题,我往往向他请教。他总是耐心讲解,使我得益匪浅。

抗战胜利后,闻天同志调到东北工作,我在华北,因此没有见面机会。直到建国初期,我奉命调到外交部参加筹建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工作,才和这位老首长兼良师益友久别重逢。当时,他拟任我国出席联大代表团团长,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再次受到很多教益。

在闻天同志任我国驻苏联大使期间,我每次从瑞典回国,经过莫斯科时,都受到他亲切的接待。有一次他亲自驱车到火车站接我,回到使馆后又和我促膝交谈。

他在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期间,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并协助周总理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在外交业务上,而且对部内的组织建设、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培养以及建立工作制度等方面,他都投入全副精力,认真负责地抓,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他主持召开了一次使节会议,就当时的国际形势作了一次重要发言。发言记录送呈中央,毛主席在上面作了“很可以一看”的批示,还印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们阅读。

但是,他在庐山会议上所作关于国内经济工作存在问题的发言,却使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加上“右

倾”、“反党”的罪名而受到批判,并被免去了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在“文革”中,他更遭到林彪、陈伯达、康生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除了“右倾、反党”外,他们还给他加上了“二十八个半”的罪名。康生别有用心地胡说什么“从苏联回来的二十八个半中,没有一个人好人。”企图在已被打倒在地的张闻天身上再踏上一只脚。

我曾为此问了周总理:“难道二十八个半中真的没有好人吗?”周总理反问我:“你的看法呢?”我说:“不可能没有好人。张闻天反对托派,在遵义会议上带头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决裂,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怎么能说他不是好人呢!”周总理说:“你的看法很对。你记住:无论在什么地方,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

“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还通过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事件来迫害闻天同志。他们硬逼着他“证明”六十一人出狱时没有经过中央批准,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但是,闻天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和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态度,毫不含糊地指出,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是得到他批准的,党中央对此事也是知道的,因此,六十一人不是叛徒,刘少奇也没有违反组织原则。这样,就使林彪、“四人帮”诬陷刘少奇的阴谋遇到了障碍。康生两次派人威胁张闻天,恫吓他说,“应替子孙后代留条后路”,示意他推翻原来的说法,出具“中央不知六十一人出狱”的假证明材料。面对沉重的压力,闻天同志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他气愤地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别人!”不久,他就被监禁起来,遭到更重的迫害。

他在身体遭到摧残、精神备受折磨的处境下，始终坚持原则，毫不动摇地维护历史的真实，竭力保护那些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据刘英同志说，后来那些同志纷纷对她表示，是洛甫救了他们。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平反昭雪，并于1979年8月25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悼念于1976年7月1日含冤逝世的闻天同志。因病不能参加追悼会的安子文同志，特地派儿子慰问刘英同志，并说：“我们一家子不会忘记张伯伯！”

是啊，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历史都不会忘记他——一位坚持真理、忠于革命、严于律己、能上能下、刚正不阿、不畏强权，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对同志满腔热忱，善于团结干部、爱护下属，办事坚持原则，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清明廉正，勤俭朴素的杰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领导人。

第四章

外交部内外

副部长们

我担任了两年多驻巴基斯坦大使后,看到中巴关系在友好合作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心中异常欣慰,同时,也产生了换换环境的想法。我主要是想在国内干点别的工作,如能回到部队则更好。

1958年10月间,我给陈毅外长发了一份电报说:1950年初奉命搞外交,先到北欧三国,后到巴基斯坦。过去抗战八年,现在搞外交也将近九年了,希望调动一下工作。不料,陈老总看了电报大发脾气,回电说:耿飚你辞职的作法不对,我刚上任你就不干了!我不同意你的要求。周总理得悉此事后,给我发来电报指出:九年来你在外交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对外交事

务已比较熟悉,看来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是合适的;我国的外交今后要有更大的开展,现在正需要密切注意世界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你留下来,安心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于是,我遵照周总理和陈毅外长的指示,服从组织安排,继续在驻巴大使任上工作,直到次年10月才奉调回国,算起来在巴基斯坦呆了整整三年半。

1960年1月初,我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当时,外交部已有好几位副部长,如章汉夫、姬鹏飞、曾涌泉、罗贵波等同志,三个月后,黄镇同志也被任命为副部长。此外,还有乔冠华、韩念龙等几位部长助理。我们这一班人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领导下,团结合作,和全部工作人员一道,为外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工作。

当时外交部的办公地点在北京站北面的外交部街,地方不大,一个办公室里往往要挤好几个人,即使副部长也是两个人合用一个办公室。我和姬鹏飞同志桌靠桌、面对面办公。

鹏飞同志和我在延安时就认识。他在参加宁都暴动前,原是军医。1931年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曾先后在红五军团和红一军团任卫生部部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他的生活津贴费比我们军事干部高,所以当节假日我和其他同志到他住的窑洞去玩时,他总是大方地掏钱请客。我还常常和他讨论一些学习中的问题,因此我们的交往更加密切。延安分手后,我到华北,他到华东,解放战争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建国后,我们同时调到外交部,老战友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当得知他将派到东德任我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团团长(大使衔)时,我对他说:“你这是学以致用啊!”因为我知道他懂德文,所以这样说。

他在民主德国呆了五年,于1955年奉调回外交部任副部长,比我回部早了五年。由于他在部内任职时间长,熟悉业务,工作经验丰富,因此我在和他面对面办公时,经常向他请教。工作中有了问题,我们也互相切磋、研讨。

有一次,我对他开玩笑说:“我们两人在各方面都相处得很和谐,但在办公桌的高度上却‘和谐’不起来。”原来,鹏飞同志有个习惯——将办公桌放得低,座位垫得高,办公时喜欢俯身桌上,伏案工作。而我的习惯正相反——爱用砖将办公桌垫高,这样就可挺直上身阅读写字。因此,我们两人的办公桌一高一低,形成了一个台阶。当时,我们还为此进行了一番辩论。他认为,伏案工作比较舒服,不觉得累,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于工作;我说,挺直身子,习惯了也不累,从长期来看,可以使腰不弯、背不驼,有利健康。至今我年逾八十,依旧保持这个习惯。

黄镇同志待人热情,讲话很风趣。有一次,我去找他说:“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他答道:“你回部比我早,经验比我丰富,应该我向你请教才对。”我认真地说:“这个问题,你是专家,只有你才能给我满意的解答。”接着我提出了关于印尼情况的问题。黄镇自50年代中期起担任驻印尼大使达七年之久,对该国情况十分熟悉,所以他就欣然解答了我的问题。后来,在处理我国与一些邻国的有关事

务时,我和他也经常互相探讨。

除了鹏飞和黄镇外,我也常向其他几位副部长请教。尤其是章汉夫同志,给我的帮助甚多。由于我刚刚到部任职,情况不熟,对于没有把握的事,往往请教汉夫同志,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和指点。不仅如此,他那“立场坚定,执行政策,熟悉业务,遵守纪律”(这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周总理对每个外交战士提出的四项要求)以及对工作勤恳负责、一丝不苟,对同志满腔热情、关心爱护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也常常使我敬佩不已,决心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

章汉夫同志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留学美国和苏联,攻读国际政治和经济学。在苏联时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工作。30年代回国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以及文化宣传、统战、国际联络等方面的工作,还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及港澳特区工委书记等党的领导职务。在被敌人逮捕后,虽遭严刑拷打,但始终不屈服于敌人的淫威,拒不透露党的机密,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以及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这种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一直贯穿于他的工作之中。抗日战争期间,他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努力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介绍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他还撰写过大量时事政论文章,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影响。抗战胜利后,他曾随同董必武出席联合国旧金山

会议,经历了联合国创建的盛举,取得了参加大型国际会议的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派他率领一个小组在天津调研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的问题。他主持撰写的调查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准确的情况和有益的建议。上海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外事处长,在此期间的辛勤工作,为他以后到外交部任职积累了经验。

外交部建部初期,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章汉夫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以后,陈毅副总理兼任外长,他又成为陈老总的得力助手。他作为副外长、后来又作为常务副外长,参与了新中国外交方面的许多大事,例如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与各国谈判建交、与周边国家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参加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等,他都亲身参与其事,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的建立,开创了独立自主、扬眉吐气的崭新外交。因此,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人员,立场坚定和执行政策应该是首要条件。在这方面,汉夫同志身体力行,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他忠实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确定的“另起炉灶”(就是同 100 多年来的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彻底割断联系,不自动继承旧中国的一切外交关系,不承认国民党统治时期外国驻中国的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中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就是在清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以后再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等外交方针。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而

且教育全部各级干部在对外接触和处理涉外事件时不要气馁,要挺起腰来,理直气壮地进行谈判和交涉;对于对方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要当场拒绝;对于针对我国的污蔑和攻击,必须严正驳斥。

在边界谈判中,汉夫同志根据中央确定的互谅互让的原则,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解决了我国同一些国家的边界问题。我到外交部后,也参加了同一些邻国的边界谈判,遇到问题,便向汉夫同志请教,他的回答和指点,对我解决问题有着很大的启发、帮助和指导作用。

汉夫同志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政策建议,被中央所采纳。例如,现在为世界许多国家承认和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家都知道是由中印(度)、中缅(甸)总理共同倡导创立的。但是,在这个创立过程中,章汉夫功不可没。1953年12月,周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了关于和平共处的基本内容。1954年4月29日,章汉夫代表我国政府和印度政府代表、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经过将近五个月的谈判,最后达成并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这个《协定》的序言中,根据周总理所提的基本内容,写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在国际条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此,章汉夫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一个多月后,即1954年6月,在中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了中印两国达成了关于五项原则的协议(即上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正式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接着,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重申了这个倡议。以后,许多国际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

对于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的问题,章汉夫在他审改上送的文件中提出了稳步前进、区别对待的方针,得到中央批准,从而顺利地解决了这个复杂问题。他具体领导这项工作时,十分谨慎,考虑深远,注意后果。他不让各地随便动用前外国驻华使领馆的档案文件,主张封存;建议保存某些愿意遵守新中国法令的外资企业,不主张一刀切。这些做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61年5月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我国参加的第二个这样性质和规模的国际会议。这个会议是外长级的,我国代表团团长是陈毅外长,章汉夫是副团长。陈毅外长于7月初回国后,章汉夫担任我国代表,直到第二年年年初。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无论是作为陈毅的助手,还是主持代表团工作,他始终忠实、准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具体指示,并根据会议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长达七个月的会议,历尽种种曲折艰难;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激烈尖锐的斗争,中国代表团周旋于美、英、法、苏、加拿大、波兰、印度、泰、越、老、柬等代表团之间,根据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将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障碍,推动会议前进。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使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圆满结束。这是我国外交的胜利,它表明我国对外方针的正确和斗争策略的巧妙;而

章汉夫作为代表团的主要领导,也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重视调查研究,是汉夫同志能够提出中肯的政策建议的重要原因。例如,关于确定我国领海宽度问题,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肆虐,根本没有领海主权可言;现在,领海问题已经成为新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和开展独立自主外交中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夫同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他熟悉国际法,亲自研读了有关领海问题的大量英文、俄文资料,经过仔细研究比较后,向中央提出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规定领海为3海里是有利于其炮舰政策,丹麦、瑞典等国规定为4海里的宽度对中国来说尚为不足,萨尔瓦多规定为200海里则太宽而难于划线,而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委内瑞拉、印尼等大多数国家所定领海宽度为12海里比较适合我国的情况和利益。他的这个建议被中央采纳。1958年9月4日,我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当时,美国第七舰队尚未撤出我国台湾和澎湖地区,但美国舰只始终游弋在我沿海七省12海里以外。这说明领海宽度确定得适当所产生的法律效力,确实有利于保卫我国的领海主权。

汉夫同志不仅自己带头调研,而且教育下属各级干部也要进行调查研究。在50年代,他就要求分管亚非国家的业务干部编写《非洲概况》和亚非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等调研材料,供部领导参考。在林彪一伙无理否定思想政

治工作应落实到业务上时,汉夫同志当时就理直气壮地说,外交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落实到正确执行外交政策上,而要正确执行政策,就必须亲自看第一手材料,了解形势动向,这就是外交业务。他还说,外交部的司级干部每天至少要看两本《参考资料》(当时有上、下午版两本),及时掌握国际动向,这是做外交工作最起码的基本功。

汉夫同志是外交部严守外事纪律的模范。他严格执行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规定,从不自作主张,在处理有关政策性的问题时,都和其他副部长商量,重大问题一律请示周总理。在1961年举行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陈毅外长要求代表团贯彻中央精简节约的精神;汉夫同志以身作则地模范执行陈毅外长的指示,并以此作为外事纪律在代表团中加以贯彻。

汉夫同志不仅自己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且要求各级干部也这样做。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格,绝不容忍办事马虎、随便、拖拉和互相推诿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是,他对同志又十分热忱、爱护,注意培养干部的工作能力,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水平。他对待干部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对于犯错误的人,不是无情打击,而是耐心说服和帮助;对于已经改正错误的干部,不存偏见,照常信任使用。他还勇于自我批评,工作中有了错误缺点,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并坚决改正。

可是,这样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杰出的外交家,在“文革”中竟遭受严重迫害,被关押五年之久,后来屈死狱

中。现在我乘撰写回忆录之机,在这里追忆他的事迹,对于我们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工作作风,提高外交战线广大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签订边界条约

在外交部几位副部长的分工中,我负责主管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业务。在这个地区,有许多国家是我国的近邻,和我国有着共同边界。旧中国时期,和邻国的边界往往缺乏精确的划定,许多地方存在着未定界,有些地方还有着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为了与邻国维护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我们决定通过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也就是说,同这些邻国订立边界条约,已成为我国睦邻外交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措施之一。

当时,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领导下,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方针和睦邻政策,副外长们按照业务分工,分别主持了与一些周边国家的边界谈判。我主要抓了与缅甸(后期)、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四国签订边界条约或边界协定的工作。

订立边界条约是个很繁重、很复杂的工作,其中包括对边界进行勘察,调研历史资料和国际法,通过协商、谈判和公文往来确定边界线、拟订协定、签订条约等许多环

节。为了准确地确定边界,外交部组织了几个边界考察团(组),赴中缅、中尼、中巴、中阿边境进行实地勘察。然后在掌握详细的实地资料和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边界联合委员会分别与这些国家的代表举行会谈。本着以诚相见、互谅互让的精神和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则,经过反复商谈和艰苦工作,终于达成协议。

在和上述四国的边界谈判中,相对而言,与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三国的谈判进展要快些,而与缅甸的谈判则时间较长。(实际上,中缅边界谈判从5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这不仅是由于中阿、中尼、中巴边界线比中缅边界线要短,更重要的是因为中缅边界问题中,包含着较为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是由缅甸独立前统治缅甸的英国殖民主义所造成的。

早在1894年中国清朝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以前,英方就以修建从八莫到南坎的公路为借口,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强行在中国云南省西部的南畹三角地区修路。南畹三角地区又名勐卯三角地区,位于畹町和瑞丽西南,在南畹河和龙川江汇合处,面积约250平方公里;到1897年中英两国签订第二个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时,英国又进一步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这块中国领土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承继了这个“永租”关系和管辖权,从而形成了位于中缅边界中段的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1911年初,驻缅甸的英军对中国云南省的片马地区(位于怒江以西,尖高山以北)发动武装进攻,并侵占了片

马、岗房、古浪三地的各个村寨,历史上称为“片马事件”。当时,中国人民被英国的这种侵略行为所激怒,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英国迫于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蓬勃开展,不得不于同年4月10日给当时的中国政府发来照会,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地属于中国;但在实际上英军却继续无理侵占这个地区。这样,就在中缅边界的北段形成了第二个历史遗留问题。

1934年初,英国派遣其驻缅军队进攻中国云南省阿佺山一带的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所管辖的地区,当地佻族人民奋起抵抗,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通过滇缅公路,将国际援华的作战物资运输到大西南抗日后方基地。1941年6月18日,英国以封闭滇缅公路、切断国际援华物资供应线相威胁,迫使国民党政府用换文的方式在阿佺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即“1941年线”。这样,就在中缅边界的南段形成了第三个历史遗留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考虑到上述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都是殖民主义造成的,在缅甸独立和新中国诞生后,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两国之间,已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这就是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关系;因此,在解决边界问题时,我们决不能像殖民主义那样以兵戎相见,而应该采取友好协商、平心静气地进行外交谈判的方法,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和平共处的原则,兼顾现实的和历史的因素,公平合理地加以解决。

195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和缅甸总理吴努在会谈

公报中提出,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中缅边界问题。这就为中缅两国间的边界谈判确定了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并将此事提到两国外交关系的日程表上。此后,外交部就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云南省有关方面,对涉及中缅边界的历史文献和资料以及边界实际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1955年11月,中缅边境上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双方的前哨部队在执勤时产生误会而引起一次武装冲突。双方领导部门得知后,迅速采取措施平息冲突,妥善地解决了这次突发事件。这次事件,促使中缅两国政府加快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步伐。

从1956年年初起,我国政府同缅甸政府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商讨。同年11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会议同意了外交部提出的关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接着,我国政府通过来华访问的吴努主席(吴努于1956年6月辞去缅甸总理职务,改任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向缅甸政府提出了这个原则性建议。

在上述原则性建议中,对中缅边界的三个历史遗留问题提出了如下解决办法:

关于边界中段的南畹三角地区,建议缅甸方面放弃对这块中国领土的“永租”权及由此产生的管辖权。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和缅甸政府磋商如何废除这种“永租”关系的具体步骤。

关于边界北段的片马地区,建议从伊索拉希山口以

北到底富山口的一段,可以按照习惯的边界线来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南到尖高山的一段,其中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地应该归还中国,其余地方原则上可以按两方(中国境内的怒江、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缅甸境内的恩梅开江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水岭来划定边界。

关于边界南段的阿佤山区,鉴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已与英国政府以换文方式划定了“1941年线”,同时为了在中缅边界谈判中创造良好气氛,以促进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我国政府表示承认“1941年线”,并准备把1952年因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1941年线”以西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撤回到该线以东。

对于我国政府提出的这个原则性建议,吴努主席表示赞赏,认为这是照顾到中缅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在他和我国政府领导人会谈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宣布:中缅两国政府决定,自1956年11月底至12月底的一个月内,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

根据这个决定,中缅两国政府都于1956年底以前如期完成了在上述地区的撤军工作,从而为中缅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建立了良好的开端。

在中缅两国领导人亲自商谈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外交部继续与缅方就边界问题交换意见,并着手进行划界的具体工作。我在作为主管副部长负责此事后,主要通过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来进行各项工作。当时担任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的是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

长姚仲明同志,他曾是我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在其余的中方代表中,还有时任驻缅大使李一氓等几位熟悉中缅边界问题的同志。

在讨论边界问题时,我们十分注意聚居在中缅边境地区的各民族的利益,并就与此有关的问题同缅方协商。因为,边界划定时,很难避免把同一个民族分在边界两边,从而使原来的亲戚朋友变成分居两国的边民。所以,我们特别需要考虑到和照顾到这些民族的利益,就更加需要同缅方协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在划界后有利于两国边民能够进行探亲访友、开展边境贸易等友好往来。

1960年1月中下旬,我将经过双方代表辛勤工作达成的协定文本,呈交陈毅外长审核,并上报国务院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久,缅甸奈温总理访问我国,中缅双方于1月28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协定”签订后,我们一方面根据协议规定的边界线进行实地定线,竖立界碑、界桩等工作,另一方面按照实际工作中发现的新问题,与缅方进一步协商后补充和完善“协定”的内容。经过数月紧张工作,最后拟定了正式的边界条约文本,报请国务院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1960年9月,缅甸联邦的吴努总理和奈温总参谋长联袂访华。10月1日,中缅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于是,一条洋溢着中缅人民胞波情谊的和平友好的边界便在怒江、龙川江和澜沧江之滨以及高黎贡山、尖高山和老别山之麓诞生了。

早在1957年12月,陈毅同志就曾在—首五言诗《赠缅甸友人》中,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江水。我吸川上流,君喝川下水,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彼此为近邻,友谊长积累,不老如青山,不断似流水。……彼此是胞波,语言多同汇,团结而互助,和平力量伟。……”的美好诗句,热情地歌颂了中缅人民的胞波情谊,如今在这条和平边界两边,更是“中缅友谊似江水,万里长川紧相连”了。

继中缅边界条约签订之后,我们又先后与尼泊尔(1961年)、阿富汗(1963年)和巴基斯坦(1963年)签订了边界条约或边界协定。

《中尼边界条约》规定:以传统习惯边界线为基础,参照实地勘察、调查的结果进行若干调整,从而确定自西向东的全部边界线走向,边界线之北为中国领土,之南为尼泊尔领土。在以河流为界的地方,以河道的中心线为边界线。

《中阿边界条约》规定:两国的边界,南自5630(米)高峰起,北至5698(米)高峰(即克克拉去考勒峰)止;其间的山脊以分水岭为边界线,山口以分水线为边界线。

《中巴边界协定》规定:以传统习惯边界线为基础,参照自然地形,划定中国新疆地区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之间的全部边界线。以河流为界的地段,以河床的中心线为边界线;以山口为界的地点,以分水线为边界线。这个“协定”中还写明:双方同意,以后当巴基斯坦和印度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议得到解决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就本协

定所涉及的边界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新举行谈判,并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本协定;如果这个“有关的主权当局”是巴基斯坦,则在新的中巴边界条约中,应当保持本协定及所附《议定书》中的各项规定。

这些边界条约和边界协定的签订,不仅使我国与这些邻国之间有了一条和平、和睦的边界,从而加强、发展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也为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在不同制度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良好的范例,从而有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事业。

陪同陈毅出访

除了订立边界条约外,我国还同一些邻国订立了友好条约。其中,中阿友好条约是在陈毅副总理访问阿富汗时签订的。

1960年8月,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我们的邻国阿富汗。当时,阿富汗是一个王国,国家元首为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中阿两国是近邻,历史上一向友好,此次我们是应阿富汗政府的邀请,前去参加该国独立42周年庆典,同时也是为了加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而去访问的。

在前往阿富汗的飞机上,陈毅同志和我聊天。他说:“1956年我参加接待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从此我就和这位亲王交上了朋友。这次我们去阿富汗,又要和一位国王交朋友了。”

“还有一位亲王呐!”我补充说,“阿富汗的达乌德首相是查希尔·沙阿国王的堂兄,也是亲王。”

陈毅同志点了点头,忽然问道:“耿飏,你有没有和国王交过朋友?”

我答道:“有啊,……”

“嗨,看我这个记性!”他没等我说完,忽然拍拍自己的脑门:“你那年到南京和我谈及驻瑞典大使馆的工作时,不是说过同瑞典国王交上了朋友吗?”

“是的。您的记性真好,还记得几年前我向您汇报的内容。”我说,“我在北欧时,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尔夫和丹麦国王斐德烈九世都有很好的交情,瑞典国王爱好中国历史,尤其对中国古代的陶瓷有深刻的研究,所以他经常和我谈论中国文化。”

陈毅同志又问:“那么,你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可不可以和国王、亲王等交朋友呢?”

我想了想说:“我认为可以。而且对我们这些从事外交的人来说,必须和他们交朋友。”

“为什么?”他进一步问。

“因为我们要和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当然也要和它们的领导人友好,这是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回答。

“对头!”他点了点头,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你这个看法是对的。以前,我曾和一些同志讨论过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认为,搞外交嘛,就要和外国领导人交朋友;有的则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外国的国王、亲王、首相、总统等交朋友,会有模糊阶级观点、丧失革命立

场的危险。我不同意后一种意见。我认为,别国的人民对其领导人如何看法,那是人家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但是,只要这些国家对我们友好,我们就应该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及其领导人都真诚地交朋友。以诚换诚,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友谊。至于阶级观点和立场的问题,那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当前我们在外交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国际反帝反殖统一战线,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这就是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革命立场。所以,我们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交朋友,正是体现了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马列主义的革命观点。”

陈毅同志的这番话,使我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从而对我国的和平外交路线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同时也加强了我对这位元帅外交家的敬佩之情。

我和陈老总在建国前接触不多,十位元帅中,他是唯一一位在战争时期没有直接领导过我的老总。但是,在外交领域里,除周总理外,他是给我以指导和教诲最多的国家领导人。

早在50年代中期(大概是1954年),有一次我回国述职,周总理要我和另外几位驻外大使到南京去向陈毅同志汇报工作。当时,他是上海市市长,兼华东军区司令员,军区司令部就在南京。开始时,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向陈老总汇报国外情况呢?到了南京见到陈毅同志时,他第一句话就是:“是周总理叫你们来的吧,看来我是免不了要同外交打交道了!”原来,中央这时已在考虑调陈

毅同志到北京搞外交,因此让他先熟悉一下有关情况。

当我向他汇报北欧三国情况和使馆工作时,他听得很仔细,还不时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这使我对他那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敏锐的观察力有了深刻的印象。汇报结束后,我们准备束装返京,陈毅同志说:“忙什么!好不容易来一趟南京,就多住几天。我安排你们去参观一些企业,你们常驻国外,也要了解国内的生产情况呀!我还打算陪你们游览长江呐!”

在游览长江时,游船刚刚离开码头,陈毅同志就问道:“你们谁会下围棋?来和我杀一盘!”几位大使都摇头表示不会。有人推荐说:“耿飏同志会下……”我连忙摆手:“不行不行!我这点水平,怎能跟陈老总下!”陈毅同志不容分说,吩咐随行的参谋摆上棋盘,拉我坐下对弈起来。他的棋艺比我高出一筹,因此我不敢懈怠,全神贯注地投入这黑白“战场”之中。当游船在长江中绕行一大圈回到码头时,我的注意力还沉浸在一块“打劫”棋中。游江结束,别的大使都在兴致勃勃地夸赞长江之壮丽,或在谈论李白诗句“二水中分白鹭洲”深得金陵大江的神韵,而我却遗憾地说:“我只顾下棋了,什么景色也没有观赏!”陈毅同志听后,爽朗地笑了起来。他一面笑,一面风趣地对我说:“今天我们在长江上摆开战场所,杀得痛快,岂不是比欣赏白鹭洲的景色更有意思!”我被他那豪爽的性格所感染,禁不住也笑了起来。

过了不久,陈老总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处理外交事务,参加接待重要外宾,并多次陪同周总理

出访或参加国际会议。1958年2月,他正式兼任外交部长。从此,我回国述职时,便直接向他汇报,并聆听指示。我任副外长后,在工作中面聆他的教诲更多。而这次陪同他出访,更是向他请教学习的好机会。

陈毅同志学识广博,通晓古今中外的掌故。他告诉我: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曾派副使到大夏和高附。大夏位于现在阿富汗的北部,高附即今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一带。

我说:“唐代的丝绸之路,也是从西安向西,经由新疆,越过喀喇昆仑山口,经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而到达波斯(即今伊朗)、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南欧诸国的。”

“噢,你当过驻巴基斯坦大使,这方面比我熟悉。”他笑着说。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说道:“所以,中阿友谊和中巴友谊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当然,现在我国睦邻政策的深远意义,远远超过古代的友好往来。”

我们抵达喀布尔后,受到了主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查希尔·沙阿国王和达乌德首相于当晚接见中国代表团并设宴欢迎我们。陈毅副总理同他们进行了友好交谈。后来,包括副首相和外交大臣在内的阿方领导人又同我们进行了会谈。

在交谈中,陈毅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热烈祝贺阿富汗国庆,并分别转达了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对查希尔国王和达乌德首相的亲切问候。主客双方的交谈很活跃,谈话内容很丰富,比较集中的话题有二:

第一是中阿友谊。从主人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阿富

汗政府只邀请了中国派代表团来参加其国庆典礼,其他国家、包括阿富汗的邻国都没有受到邀请。这表明阿富汗国王和政府十分重视和中国的友好关系。陈毅副总理追溯了中阿两国间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特别阐述了我国政府的和平外交和睦邻政策,真诚地表示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阿富汗及其他邻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他还邀请查希尔国王在方便时访华,国王愉快地答允。四年后,查希尔国王如约到我国访问。

第二是中国的建设经验。阿方领导人表示钦佩新中国十年来的建设成就,希望了解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陈毅同志一方面扼要地介绍了我国解放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成绩和经验,另一方面也坦率地指出我国在经济建设中还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他说:“我们的建设并非百分之百的顺利。建设速度是很快,但是经验不足,缺点很多。世界上没有不学而知的聪明人,不经过挫折就不能取得经验。比方说,我们工作不是8小时,常是10小时,很多人没有星期天,过得很紧张。还有天灾,粮食缺乏,副食品供应缺乏,有伤亡事故,也有反对我们而制造暴乱的。”

在晚宴中,阿方有位大臣向陈毅副总理询问关于中国实行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问题。陈毅同志答道:“根据我们的经验,还是大中小型都要搞,三者结合比较好。大型企业花钱多,搞一个要花几千万、上亿元,要三年、五年甚至更多年才能搞成,如果光搞大型企业,搞到头发白了,工业化还完不成。……所以搞中小型企业,就地取材,

很快就可以搞起来,很快就有效益。”

阿方领导人在听了陈毅同志的谈话后,十分高兴,他们表示:“我们愿意同中国朋友谈话。我们到巴黎、纽约去谈,谈的是老一套,都是教科书上的东西。跟中国朋友一谈,就学到了新鲜的思想、新鲜的经验。”

陈毅同志诚恳地对他们说:“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贵国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建设方法。”

在交谈和会谈中,当谈到国际问题时,阿方提出:在当前东西方对立的情况下,阿富汗只能站在中间立场。陈毅同志对此表示理解。他指出:我们支持阿富汗和其他国家采取和平中立政策,坚持国际和平和民族独立,不参加敌对性的军事集团,反对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主张国际经济合作以及各国平等友好地相处。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致的。

在双方的联合公报中也体现了这个精神。为了尊重阿富汗的中立立场,联合公报里没有写进反美的词句。但是,双方一致表示要支持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国家。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这次访问阿富汗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是签订了《中国和阿富汗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规定:中阿双方相互尊重对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当两国间出现争端时,应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决不诉诸武力;彼此保证互不侵犯;双方均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军事

同盟；根据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联系。这是1960年初以来，继《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尼和平友好条约》之后，我国和亚洲国家签订的第三个友好条约。这些友好条约的签订，使我国和各国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陈毅同志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还参加了阿富汗独立庆典的各项活动。在一次晚会上，中国艺术团表演了京剧、中国民族音乐和新疆地区的民族歌舞等精彩节目，博得了阿富汗朋友的热烈掌声。

这个艺术团来到这里，一来是应邀为阿富汗独立庆典助兴；二来是作为中阿之间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以促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并为两国文化领域的合作开个好头。

艺术团除了演出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向阿富汗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民族文艺。有的团员在经过几天辛勤学习后，能用当地语言演唱阿富汗民歌，得到主人的称赞。一位阿富汗官员指着唱阿富汗民歌的团员对陈毅副总理说：“她才学了两天，就唱得这么好，中国人真有天才！”

顺便说一句，周总理很重视我国的艺术家学习别国、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艺术。每逢有艺术团出国访问演出时，他总是嘱咐他们要利用出访的机会学会几个当地的歌舞。后来，以擅长演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民族歌舞而驰名国内外的东方歌舞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组建成立的。

陈毅副总理这次访阿，取得了圆满成功。除了发布《联合公报》、签订《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外，还有一个重要成果，那就是建立了中阿两国领导人之间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桥梁，开拓了两国团结合作的领域。

当我们满载着阿富汗人民的友谊回国时，在新疆停留了几天。自治区的领导同志很关心中阿友谊的发展，要求陈毅同志就这次访问作报告。自治区下属的一些地区也来人来电，热情邀请代表团去作报告。

由于陈毅同志在访阿后期身体不适，现在尚未痊愈，因此他决定，在乌鲁木齐的报告由他来作，去外地作报告则由我承担。

遵照他的意见，我立即飞赴喀什市。喀什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靠近中阿边境。因此，这个地区的干部和人民，对中阿两国的友好交往十分关心和支持。

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约有 1000 公里的路程，我乘坐的伊尔 14 飞机，速度不快，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面的上空飞行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才抵达这座南疆名城。

在同机的旅客中，有一位喀什地区负责同志的夫人，坐在我的旁边。我发现她一上飞机，就找了一个呕吐袋，拿在手里。问她为何如此紧张，她说她有晕机症，飞机一起飞就要呕吐不止。根据我的经验，晕机并非真正的病症，大半是由于心理作用之故。所以，等飞机起飞后，我便给她讲长征中的战斗故事。她听得入神，完全忘了晕机这回事，结果，直到飞机落地也没有呕吐。

在喀什,我向当地的干部和各族各界的代表介绍了访阿之行,着重讲述了和邻国友好合作的意义。从热烈的掌声中,我体会到了他们对我国和平睦邻政策的衷心拥护。

签订中国印尼友好条约

1961年3月底至4月初,我又陪同陈毅副总理访问了印度尼西亚。

位于东南亚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是亚洲的一个大国。作为1955年万隆会议(即第一次亚非会议)的东道国,印尼在亚非国家团结合作、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作出了贡献。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多次访问我国。1956年苏加诺总统第一次访华抵达北京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往机场迎接。当时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同志全程陪同苏加诺在北京并到外地参观访问。中国、印尼两国领导人之间和两国人民之间迅速建立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令人遗憾的是,1959年印尼少数右翼势力制造了排挤、打击和驱赶华侨的事件,致使这一友谊之桥受到损害。这次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印尼,就是为了修复并进一步发展中印友谊。

作为分管东南亚地区业务的副外长,我也参加了这个访问印尼的代表团,并负责出访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我们准备了一个会谈提纲,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问题,如就维护民族独立、亚非

国家团结合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等问题进行讨论,交换意见;一是中印双边关系问题,包括加强两国友好关系、增加两国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等问题。有的同志提出,要不要谈旅居印尼的华侨问题。陈毅同志指出:如果主人不提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提。因为印尼国内已经停止驱赶华侨,该事件已经平息,我们不必再去揭疮疤、算旧账,在两国关系上,要向前看。

我们还和对外文委的同志一起准备了一个中印文化交流协定的草案,以便在和印尼方面商谈确定后签订。

在代表团出发前两三天,我在向陈毅同志汇报准备工作进展情况时提出了一个建议:“鉴于我国和缅甸、尼泊尔、阿富汗、柬埔寨等国都已订立了友好条约,是否在这次访问中同印尼也签订一个类似的条约?”

陈毅同志点点头:“你这个意见要得,我赞成。”

我说:“不过,在上报中央的访问计划中,没有提到这一条。”

“那不要紧,”他答道,“我正要就出访中的几个问题向周总理请示,你和我一道去,当面向他提出这个建议。”

于是,他便同我一道去见周总理。总理听了我们的建议后,思考了一会说:“如果印尼方面也有这个愿望,可以就此进行商谈。至于在这次访问中能否签订,可视具体情况而定,能签就签。”

在前往雅加达途中的飞机上,我请陈毅同志讲讲当年参加万隆会议的情况。他欣然应允。于是,就在万里长空的蓝天白云中,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万隆会议的

来龙去脉,尤其是周总理以微笑、和解精神以及寻求团结友谊的真诚态度,不仅赢得了各国朋友的掌声,也赢得了亚非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赞扬,并为新中国赢得了理解和友谊。同时,以求同存异这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高明办法,促使万隆会议取得成功,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为亚非国家维护独立、团结合作以及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毅同志的介绍,使我对周总理光辉的外交业绩和杰出的外交才能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但是,我还想了解陈毅同志自己参加国际会议的经验,所以我对他说:“能否请您谈谈自己……”

他连连摇头:“我只是一个学生,是跟着周总理去见见世面,磨练磨练,主要是借此机会向总理学习的。我没做多少工作,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

其实,我以前听别的同志介绍,陈毅同志在万隆会议中协助周总理工作,出了不少好点子,还在会外和一些国家的代表频繁接触、交谈,交了许多朋友,使这些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对新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现在他对自己的这些成绩避而不谈;他的谦虚,使我对他更加钦佩。

当我还要请他谈时,我们的座机已经飞临雅加达上空,交谈只好告一段落。

中国代表团在雅加达机场受到印尼领导人的热情欢迎;接着,苏加诺总统在总统府以热烈的拥抱和亲切的问候来迎接陈毅副总理。他们彼此以“陈毅兄”和“朋加诺”

(印尼语中的“朋”也是“兄”的意思)相称,体现了两位老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主人把陈毅团长的住处安排在总统府内的国家宫。这里通常是来访的外国元首下榻之处,现在被用来破格接待陈毅副总理,这种特殊待遇,一方面体现了印尼对中国的友好,另一方面也表明苏加诺本人对老朋友陈毅的亲密和尊敬。

当晚,苏加诺设宴款待陈毅,并和他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交谈。第二天上午,陈毅副总理及代表团主要成员到独立宫正式拜会苏加诺总统,双方就两国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交谈中,主客双方都盛赞了中国和印尼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苏加诺总统提及1956年访华时受到中国政府亲切接待和各地人民隆重欢迎的情景。陈毅副总理也回忆了1955年陪同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时,受到印尼领导人盛情接待和万隆人民热烈欢迎的场面。谈论间,苏加诺提出要签订一个印中友好条约,而且希望明天就进行谈判。

陈毅副总理答道:“好,明天谈判,后天就签字。”他指着我对苏加诺说:“我们代表团由耿飚副外长负责此事。”

次日,当陈毅团长去参加其他活动时,我和印尼副外长便举行会谈,就中印友好条约的内容进行讨论。幸亏在得到周总理“能签就签”的指示后,我们于离京前夕连夜准备了一个友好条约的草案,这次才没有抓瞎。印尼方面也有一个草案。讨论时,就以这两个草案为基础,加以取

舍,互相补充,最后确定了一个共同文本,其中包含下列要点:缔约双方均尊重对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持并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发展并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在双方均认为必要时,可以进行友好讨论,就互利合作问题及与彼此利益有关的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具体办法。

我将这个文本请陈毅同志审阅后,立即通过我国驻印尼大使馆报回国内,并说明请外交部火速报请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审批,以便及时在访问期间举行签字仪式。

电报发出后,我心中直犯嘀咕,主要是怕国内来不及审查批准,以致耽误了签字。不料次日下午就收到国内通知:该友好条约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是,陈毅和苏班德里约两位外长立刻在一式两份的中国和印尼友好条约正式文本上签了字。

这次陈毅副总理访问印尼,主客双方共签署了三项文件,即会谈联合公报、中印文化交流协定和中印友好条约。其中,前两项是在原定访问计划之内的,后一项是临时提出的,因此,陈毅同志高兴地说,这次我们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当然,这“超额完成”不仅是代表团的业绩,其中也包含着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国内各部门许多同志的辛劳。

代表团回国后,我从常务副外长章汉夫同志那里得知:那天外交部收到驻印尼大使馆发来的电报后,迅即送呈周总理审阅。总理指示国务院办公厅报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当时已是深夜,但是朱德委员长对此事十分重视和支持,他立即指示全国人大办公厅连夜通知各位在京的人大常委(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大多数),于次日上午举行紧急会议进行审议,并要外交部派员列席会议以备常委询问。……

“耿飏同志,”章汉夫同志对我说,“这个友好条约,是代表团访问印尼的重要成果之一,对中国同印尼友谊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对你本人,我却要进行批评。这次你陪同陈毅同志出访,是前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工作很辛苦、紧张,成绩很大,但在签订友好条约这件事上做得太急促了,给国内的后方工作造成了被动,特别是限时限刻要求人大常委会审议,似乎太仓促了!”

虽然汉夫同志的用词很委婉,但我懂得这个批评的份量。我就根据实际情况答道:“在原来的出访计划中,没有考虑到签订友好条约这件事,这是我们的疏忽。至于要求国内及时审查批准,这可是不得不如此啊!”接着,我就把周总理所作“能签就签”的指示、苏加诺“希望明天就进行谈判”的建议以及陈毅同志所作“明天谈判,后天就签字”的承诺,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

“喔,这样说来,我是错怪你了!”汉夫同志性格很直爽,他在发现同志的缺点错误后就当面提出批评,但当发觉批评错了后,他又赶快承认,“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你抓紧时间报回国内,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条约的及时签订,既执行了总理的指示、实现了陈毅同志的承诺,也使

这次访问取得了更多更大的收获……”

是啊,陈毅同志这次对印尼的访问活动以及所签署的三个文件,不仅修复了中国、印尼友谊之桥,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虽然其后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两国关系又出现过波折,但是挫折是暂时的,友谊是长久的,团结友好毕竟是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中的主流。如今,友谊之花又盛开在两国的广阔土地上和两国人民心灵的土壤中。

还有一件事,值得在这里提一下。我们代表团离开印尼归国途中,经过缅甸,承缅甸政府盛情挽留小住数日,陈毅同志并与缅甸领导人进行了友好交谈。他喜欢写诗,便在住处写下了歌颂中缅友谊的诗章:

燕子湖边几度停,主人好客客来频。不言十日平原饮,瑞苗胞波总关情。朝出暮归走不停,风光入眼总宜人。披襟午夜凭栏坐,树影森森似横云。百战将军壮岁华,湖边小筑未卸甲。树树樱花如集锦,幽居面对大金塔。小窗闲谈拂暑多,时见片帆湖上过。入夜清凉新世界,畅谈刚果与老挝。匆匆聚会又归程,接送殷殷感盛情。中缅友好多珍重,彼此亲仁又善邻。

诗中首句“燕子湖边几度停”,指的是代表团的住处在燕子湖畔,我们在往返途中经过缅甸时都住在这里。以前陈毅同志陪同周总理访缅或路经仰光,也曾住此处,故

称“几度停”。“畅谈刚果与老挝”，则与访问印尼的活动有关。因为当时刚果和老挝的人民，正在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而进行斗争。陈毅同志在同印尼领导人会谈时，讨论了关于如何声援刚果和老挝人民斗争的问题。在缅甸，他还念念不忘此事，与缅甸领导人和我们代表团成员谈话时，曾多次谈及刚果人民和老挝人民的英勇斗争。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俗话说：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虽然我国对所有邻国一视同仁地实行睦邻政策，都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它们通过谈判协商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但是与邻国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却并未像中缅、中尼、中阿（富汗）、中巴（基斯坦）边界问题那样得到圆满解决。不仅如此，而且在1962年冬，由于并非中方的原因，在中印边境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一场历时一个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由英国殖民主义造成的。1914年春，在印度北部西姆拉举行的所谓“中英藏会议”（即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亨利·麦克马洪一方面在会上提出妄图否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种种无理要求，另一方面背着中国政府的代表在会外阴谋设计了一条西起中不（丹）边境、向东延伸的非法边界线，企图把中印边境东段地区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

土划归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接着,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离开西姆拉,来到德里,于3月24日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私自制造了这条非法边界线,即所谓“麦克马洪线”。中国的历届中央政府均从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即使英国自己也长期不敢公布有关这条非法边界线的文件,也不敢改变地图上关于这段边界的历来画法;直到20多年后的1936年,这条“麦克马洪线”才开始出现在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地图上,但在1954年以前,仍被注明是“未定界”。

印度独立后,不仅接管了英国侵占中国西藏的一些边境地区,而且进一步扩大其占领范围。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印度军队即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逐步推进,到1953年基本上侵占了该线以南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中印边境中段,印度军队从1952年起也侵占了将近2000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在中印边境西段,中国地图标明的边界线与中国历史上行政管辖区的界线是一致的,即从喀喇昆仑山口,向东南大体上沿着喀喇昆仑山脉的分水岭到空喀山口,再从空喀山口向南直到帕里河附近处,这条线以东和以北的边界地区,历史上从来就属于中国管辖。其中大部分地方,包括阿克赛钦地区,是新疆管辖的,小部分地方由西藏管辖。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管辖这个地区,并把它作为连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和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主要交通要道。

印度地图上对西段边界的画法,在19世纪中叶以前,同中国地图的画法很接近。也就是说,当时印度方面对这段边界的划法和中国没有多大差异。1865年以后,印度主要的地图对这段边界的画法模模糊糊,这显示英国殖民当局正酝酿改变边界的划法。1950年印度官方地图用颜色涂出这段边界时,开始扩张到中国管辖地区,但仍然标明这个地方是“未定界”。直到1954年印度地图才把这条扩张了的“未定界”画成正式“边界”。接着,印度军队于1955年公然越过中国的行政管辖线,侵占了中国的巴里加斯地区。

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直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友好协商来解决,就像我们和其他邻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签订边界条约一样。为了给中印谈判协商创造良好气氛,我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在中印边境东段,印军从所占领的地方退回去,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中国军队也不越过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印军不越过中国行政管辖线,从其侵占的巴里加斯地区退出去。

但是,印度方面不理睬中国的合理建议。1959年3月,印度政府正式向中国提出全面的领土要求,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军对上述中国领土的侵占是“合法”的,而且进一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新疆的阿克赛钦等地区约3.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属于印度。同时,印军不断地侵入中国领土,仅从1959年6月至9月的三个月内,就侵占了我国的朗久、兼则马尼、塔马顿、马及墩(以上在东段),

班公湖地区(在西段)和乌热(在中段)等地。

我国政府为维护中印友谊,争取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因此命令我国边防部队对入侵印军不得开枪,以避免发生武装冲突。但是印方得寸进尺,不仅继续入侵,而且袭击中国哨卡,挑起流血事件。10月22日,印军蓄意进攻我空喀山口,打死打伤我国边防人员,从而导致边界冲突。

尽管如此,我国政府还是做到仁至义尽,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怀着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在印度国内的一片反华喧嚣声中飞抵新德里,与印度政府进行谈判。其后,根据两国总理的协议,中印官员又分别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了两次晤谈。但是,由于印方不顾事实,肆意歪曲边界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并为印军的侵略行径无理辩护,所以几次会晤谈判均未取得一致意见。

自1962年4月起,印军变本加厉地采取侵占行动,从西段到东段连续侵入和占领中国领土。9月,印军第九旅竟然进一步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占了该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并进攻驻守择挠桥的中国边防部队,打死打伤中国官兵47人。同时,印军在中印边境地区集结了22000余人的兵力,准备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驻守中印边境地区的我国边防部队,遵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对印军的挑衅一直采取忍让的态度。但是,印方把我们的忍让视为软弱可欺,步步进逼。我们边防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忍无可忍,纷纷要求中央准予还击

印军的进攻,以保卫我国的神圣领土。全国人民也义愤填膺,希望边防部队把侵入我国领土的印军赶出去。

10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境全线发起进攻。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由驻守新疆和西藏的边防部队对印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

中印边境之战,我国政府一直坚持两个原则:一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打第一枪,后发制人,也就是说,我国边防部队是在印军不断向我进攻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二是并非要借助军事手段来解决边界争端,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反击促使对方停止军事侵略,回到谈判桌上来,继续通过外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因此,这次自卫反击战并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和外交有着密切关系。

为了从外交和军事相联系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周总理亲自指导处理这个事件。当时罗瑞卿同志任总参谋长,周总理经常把他找去了解情况,研究工作。罗总长向周总理建议,要我也参加研究,因为我既是副外长,又熟悉军事。周总理同意。于是,每天晚上,我和罗瑞卿、童小鹏(总理办公室主任)等同志,都到周总理那里,一起商量、研究。有时情况紧急,白天也去研究。每次作出决定后,有关军事方面的,由罗总长回总参去贯彻、实施;关于外交方面的,由我回外交部去布置、执行。凡有重要情况和重大决定,周总理都亲自去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因此,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也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在第一次研究时,周总理指出:印方不顾国际惯例,对我不宣而战,我们可不能像它那样,而是应该光明磊

落,在自卫反击战开始之前,要向印方递交照会,通知它我边防部队即将发起反击,并说明我军被迫自卫反击的缘由和目的。他命我立即起草照会,必须当晚递交给印度驻华大使馆。

周总理不仅具有高度的理论、政策水平和领导、组织能力,他那严肃认真、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也给我们参加研究的每个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那善于把外交折冲和军事指挥巧妙结合的斗争艺术,更使我们钦佩不已。就拿这次递交照会来说吧,周总理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考虑:从外交方面来看,必须使印度外交部在我军开始反击前得到这份照会;从军事方面来看,却不能让印军过早地知道我军的意图。为此,他详细、精确地计算了从印度驻华大使馆向印度外交部、印度外交部向其最高当局和印军领导机关、印军领导机关向边境地区印军分别报告、通报和传达命令所需要的时间,然后确定了向印度驻华使馆递交照会的具体时刻。这样,使外交上先宣后战的国际惯例和军事上的保密得以兼顾,从而为这场正义之战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当我将紧急起草的照会内容报请毛主席、周总理审核批准后回到外交部时,已是深夜。由于当时印度驻华大使不在北京,我命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去把印度代办叫来。可是,这位代办已经回宿舍睡觉去了。他睡得很熟,任凭人们在宿舍门外大声喊叫、按门铃、敲门、往屋里打电话,总是唤不醒他。没有办法,礼宾司的同志只得叫人翻过围墙,到屋内把这位代办从床上叫起来。就这样,我

们及时把照会递交给了印方。

1962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和新疆的边防部队,在印军发动进攻的态势下,被迫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同时进行自卫反击。

当时,东段的态势异常严峻,印军第七旅自从侵占了克节朗地区后,在克节朗河一线展开,向我军发起全面进攻。我西藏边防部队针对该旅的进攻部署,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该敌。反击一开始,我军就采取两翼攻击、迂回侧后、穿插切入、分割包围等战术,将敌军各个击破,全歼印军第七旅,俘获其旅长季·普·达维尔准将。接着,我军乘胜分五路继续进击,收复了达旺地区。在东段的其他地区,西藏边防部队也向占领我国领土的入侵印军实施反击,拔除其侵略据点。

在西段,我新疆边防部队在反击中全歼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的印军,拔除多处侵略据点。

我边防部队士气高涨,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自卫反击进展颇为顺利,但在有些地方也遇到了障碍。这是由于印军侵占我国领土后,在一些地方构筑了地堡等工事,这些工事成了我军前进的拦路虎。周总理从前方部队的报告中得知这个情况后,就与我们商议对策。罗总长和我根据以前在十九兵团拔除敌军地堡、暗堡的经验,提出了几条办法供前方部队参考采用,取得了较好的作战效果。

10月24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向印度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但是,这个诚恳、合理的建议竟遭印度政府断然拒绝。

印军继续向边境地区增兵,到11月中旬,兵力已增至30000余人。14日和16日,印军在第四军军长考尔和第四师师长帕塔尼亚的指挥下,再次全线向我边防部队发动进攻。

我边防部队以东段的西山口作为主要反击方向,采取以一部兵力钳制正面之敌,集中主力向两侧及敌后实施迂回包围的战法,歼灭了侵入西山口地区的印军大部。接着继续向南反击,先后收复了德让宗、打陇宗、邦迪拉及其南面的鹰窠山等几个山口,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东段其他地区和西段地区,我边防部队也分别向当面的入侵印军发动反击,收复了梅楚卡、塔克辛、瓦弄等地,全部拔除了中国境内的印军侵略据点,粉碎了印军的再次进犯。

在打退入侵印军后,我国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这再次显示了我国愿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我边防部队遵照政府声明,于11月22日零时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开始全线后撤,从1959年11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向中国一侧撤退20公里。

停战后,我国政府命令我边防部队将在自卫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其他军用物资交还印度,尔后又分批释放了包括印军第七旅旅长达维尔准将在内的3000多名全部被俘人员。

在交还缴获物资前，周总理还特别指示，要把缴获的武器、车辆等擦洗干净，通知印军来领回。这种把缴获物资全部无条件交还敌方并为其擦洗干净的做法，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不曾有过。无怪乎国际人士和舆论界对此交口赞誉，认为这是中国继停火、后撤之后，向印度表明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的又一体现。

那么，印军派人来领取时，让他们打着什么旗帜呢？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的指示出人意料，他说：让印军“打着绿旗”前来领回。

打绿旗，这是一个奇特的意见，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因为，按照国际惯例，败方应该打出白旗；但是打白旗意味着投降，而我军进行自卫反击战的目的是把入侵印军赶出去，进而促使印方坐到谈判桌上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并不是要印军向我们投降，所以不宜让印军打着白旗来领取。当然，也不能让印军打着它的军旗前来。而打绿旗意味着和平，因此要印军打绿旗前来领取，一方面表明我国的和平诚意，希望中印两国的关系能够回到和平共处状态，两国间能够重建和平睦邻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军不把印军当作败方，给对方以一个台阶下，以便有利于解决争端，并为以后中印两国重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有利条件。由此可见，“打绿旗”这个主意看似简单，实际上在当时当地的特定环境和特定条件下，其中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既富有哲理，又体现了周总理善于将外交和军事艺术紧密结合、灵活运用的智慧和才能。

种豆捕鱼打黄羊

我作为副外长,除分管地区业务司外,还分工领导总务司。总务司负责全部的后勤供应,对外交业务起着保障作用,工作很重要,但也很繁杂。

当时,我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严重失误,使生产力受到破坏,生产下降,物资匮乏,导致全国经济陷入困境。当然,一些地方连年发生自然灾害,也加重了经济困难的程度。而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的正确意见的批判,使得经济领域中“左”的错误进一步滋长,从而使经济困难变成了一场持久的经济危机,以致社会上普遍发生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自然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有许多人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而浮肿、生病。

为了保障全部工作人员的健康,以便不影响外交业务,我找总务司司长、副司长等商议,能不能开辟一些食品来源。

有的同志连连摇头说:“困难啊!现在粮食、油、糖、肉、蛋等都凭票供应,不凭票的蔬菜市场上也很稀少,到哪里去搞到食物呢?”

我说:“多想些办法,能否到外地去采购,或者组织一些人自己动手搞生产,就像当年我们在延安搞大生产运动……”

听我这么一说,有的同志就提出,别的单位都自办农场,还有的到东北和内蒙古去打黄羊,我们可否也这样

做。

我说：“好啊，等我向部党委请示一下，如果同意，我们就搞。”

在外交部党委同意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和总务司的几位领导同志一起拟订了一个具体方案，设想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生产和增加食品供应：一是组织一个垦荒队，到北大荒去开垦荒地种黄豆；二是组织一个捕鱼队，到渤海之滨去捕鱼，或建鱼池养鱼；三是组织一个打猎队，到大兴安岭地区去打黄羊。

在将这个方案付诸实施时，总务司的同志向我提出了几个要求：种黄豆要有土地和豆种，打黄羊要有枪支弹药和汽车，捕鱼或养鱼要有鱼池和资金，最后还得有火车车皮把收获的农副产品运回北京，而这些总务司都无法办到，希望部领导加以解决。

我将上述情况报告外交部党委后，部党委授权我解决这些问题。我就去找当时担任有关部门领导的老战友，请他们大力协助。

首先，我找了王震同志。他在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那时我任三八五旅副旅长，由于两个旅的任务都是保卫陕甘宁边区，我们常有机会在一起开会，彼此很熟。建国后有一次我回国述职，和他在北京相遇。我问他：“王胡子，你怎么不在新疆，到北京来了？”他答道：“我调到农垦部了！”我笑着说：“那很好嘛，以后我如有事找农垦部，请你要多帮忙。”他摇摇头说：“你们搞外交的怎么会来找我们这个专门同土坷垃打交道的农垦部呢？”

除了荒地外,我们什么也没有,能帮你什么忙?倒是以后我们要向国外购买农业机械什么的,请你老兄多帮忙呐!”我也摇了摇头:“这个归外贸部管,你应该去找叶季壮同志。”当时我们是随便说说,想不到现在真的要找农垦部了。我对王震同志说:“我们想参加你的农垦队伍,希望能拨给我们一些地,还要借些黄豆作种子。”

王震同志听了我提出的要求后,立即答道:“上次你托我的事,没有给你办成;这次一定要帮你解决。”

他所说“上次你托我的事”,指的是这么回事:我在长征前和长征中积累的一批日记、照片等资料,在延安时由陆定一同志(当时他负责帮助美国记者斯诺收集写书的材料)转借给斯诺,斯诺离开延安时没有还给我。建国后我见到斯诺时便问及这些资料现在何处。他说,那年他离开延安,由丁玲陪同去西安,在路上已把这些资料交给丁玲了。我一听资料有了着落,心中大喜,就去找丁玲,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听说丁玲已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于是,我托王震去问丁玲。可是,由于当时丁玲的处境,她表示不知道这些资料的下落。所以王震提起此事,还因“没有给你办成”而感到遗憾。

我说:“上次的事,虽没办成,但你已经尽了力。这次又要给你增添麻烦……”

他打断我的话,笑着说:“看你说的,这谈不上什么麻烦,为了保证外交工作的开展,这点忙应该帮;再说,你们外交部派人到北大荒开荒种地,也是对我们农垦部的帮助啊!我看这样吧,请你们以外交部的名义给我部发个公

函,我在上面批一下就可以了。”

就这样,他批准拨给我们400亩地,还借给我们25吨黄豆。我们将一部分黄豆作为种子,一部分运回北京磨豆浆,放在食堂供应,使全部工作人员每天早晨都可以喝到热气腾腾的豆浆。接着,我们组织了几十个人开赴北大荒去垦种,当然少不得向当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借用些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农具。经过艰苦劳动,同志们洒下的汗水,变成了丰硕成果。获得丰收后,我们马上还清了所借的25吨黄豆。

与此同时,我又给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李聚奎同志打电话、发公函,请他帮助提供打黄羊所需的装备。

李聚奎同志和我在红三军九师时就一起战斗过,我很熟悉他那豪爽、直率的性格。此刻他听了我的要求后,毫不犹豫地说:“你们要什么,我们尽量提供。”

那时候社会上尚无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国家也没有颁布保护黄羊等野生动物的法律法令,李聚奎同志一听我说为了保障外交部工作人员的健康而要去打黄羊,便欣然支持。他和王震同志一样,并不是仅仅出于对我这个老战友个人的支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支援我国的外交事业。

打黄羊,首先要有枪支。那么要什么枪呢?我考虑,如用步枪,只能单发射击,遇到成群的黄羊,打中一只,其余的都跑了,因此便说:“除了步枪外,最好再能借几挺轻机枪。”

“还要什么?”

“还借几辆吉普车。”

我考虑到冬天在野外打猎，需要保暖，所以补充说：“还借些皮衣皮帽和大头鞋……”

“行！”李聚奎同志爽快地答允，他告诉我：吉普车和皮衣鞋帽等可由总后拨给，至于枪支，最好通过总参谋部向沈阳军区要。

于是，我又分别给罗瑞卿总长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同志打电话及写信。经罗总长同意后，陈锡联同志不仅命军区后勤部拨给我们几挺机枪、一些步枪和子弹，还给了几个探照灯准备安装在吉普车上。这是因为军区的同志对于打黄羊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在夜间打黄羊时，只要打开探照灯，黄羊就会睁圆两个眼睛，傻乎乎地盯着探照灯看，不跑也不动，直到被击中。

有了车辆、装备和枪械弹药，我便叫总务司组织打黄羊的队伍。不久，由总务司副司长陈仰山同志带领一支十多人的队伍，开赴东北和内蒙古交界处，打猎三个月，共猎获数千只黄羊。

陈仰山他们用汽车把猎获物陆续拉到沈阳。但是，这么多黄羊怎么运回北京呢？总务司又来找我想办法。我给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同志挂了电话，要了两节车皮，把几千只黄羊全部运到北京。

总务司到内蒙古去请了一些会做皮衣的师傅到北京来，将黄羊皮做成皮夹克，给年老体弱的工作人员每人发一件。给每位病号的家里送半只黄羊，其余的黄羊肉，一部分分给工作人员，大部分放在部内食堂改善集体伙食。

第三件事是捕鱼。说是捕鱼，其实是“抽”鱼。当时某部在天津附近有几个大盐场下马停办。我们得知后，决定将这些已经报废的盐田变成鱼池。经外交部党委同意，筹措了一笔钱将盐田要过来，加以修建。然后组织了一批人来到这渤海之滨，用管口似圆桌那么粗的抽水机，将海水抽到盐田里。有趣的是，正在海岸边觅食的鱼群也连同海水一起被抽了上来，其中有不少二尺来长的大鱼。我们买了网和防水靴，到这些由盐田变成的大鱼池里拉网打鱼。一网可拉数千斤，甚至万把斤。我们把鱼运回北京，将一部分鱼卖给商业部门供应市场，其余的鱼就放在食堂供应全部工作人员。

以上三件事，本是在部党委领导下为群众谋福利，是在国家经济困难的特殊情况下为全部工作人员的健康而做的保障工作，而且借豆还豆，借钱还钱，生产自救，自力更生，在具体做法上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在“文革”中，造反派竟以此为口实对我进行批斗，而且将此事上纲上线，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第五章

再度出使邻国

“又要你去当大使了！”

1963年夏的一天早晨，周总理叫秘书给我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我驱车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见总理正在一面批阅文件，一面等着我。他看见我走进来，马上放下手中的文件，招呼我坐下，然后亲切地问道：

“耿飏同志，你回部工作有几年了？”

我扳着手指计算：从1960年初回外交部任副外长，至今已三年半，便答道：“三年多了。”

总理点点头：“喔，还不满四年。可是，现在又要你去当大使了！”接着，他告诉我：为了加强我国和缅甸的友好关系，支持缅甸国内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即缅甸政府和缅甸共产党之间的和谈）以及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毛主席

指示派一名副外长去接任驻缅大使。

“你可能会想，在这么多副外长中，为什么要派你去呢？”周总理解释说，“除了因为你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政治上要强，最好懂军事’这个条件外，还因为你熟悉缅甸的情况……”

总理说我熟悉缅甸的情况，这是由于我在几位副外长中分工主管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业务，特别是我曾参加中缅边界条约和友好条约的签订工作，还曾经办过一些中缅合作的事情，如两国合作剿除边境地区土匪的协议，就是我按照周总理和陈外长的指示，与缅方协商确定的。

那时，国民党残余部队李弥匪帮在滇缅边境一带走私黄金鸦片，骚扰居民，为非作歹。缅甸政府要求我国协助剿灭这股顽匪。经过协商，两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合作剿匪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我国边防部队对靠近边境线的土匪实施进剿，俘获了数千匪徒，还收缴了大量黄金、鸦片及武器。按照周总理指示，我们将俘获的人和物全都交给缅方处理。

在交往中，我和缅甸领导人及外交部官员渐渐熟识。尤其是在1961年初随周总理访缅时，结识了不少缅方官员。

1960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缅甸的吴努总理和奈温总参谋长来华访问。作为回访，并应邀参加缅甸独立13周年庆祝活动，1961年初周总理和陈毅、罗瑞卿两位副总理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缅甸。在这个大代表

团中,包含有政府、军事、文化艺术、经贸和云南省等十来个小组代表团,共有 400 多人。其中,有一个由我们外交部组织的边界代表团,由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兼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姚仲明同志任团长,该代表团的任务是在仰光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并继续与缅方商讨在边界条约实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在文化艺术代表团中,有一个由青少年歌舞演员组成的东方歌舞班(东方歌舞团的前身),到仰光后他们表演了 14 国舞蹈,在观众(包括各国驻缅使节和缅甸文艺界人士)中引起轰动,也得到了新闻界和评论界的广泛赞扬。整个大代表团的工作,由国务院办公厅和外交部组织协调,我除了参加内部协调工作外,还负责与缅方联系。

周总理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云南省代表团除外)于 1960 年 12 月 31 日乘专机离京到达昆明,同云南省代表团会合。我们在昆明欢度元旦。1961 年 1 月 2 日,代表团离开昆明前往仰光。在昆明机场候机室中,陈毅同志兴致勃勃地赋诗一首:

元旦游湖惊浩淼,扁舟千仞望龙门。
青青麦秀遍原野,锦绣河山画不能。
红旗队队走不停,二日机场送远行。
中缅友谊添新页,祥云朵朵护机群。

代表团到达仰光后,受到了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当晚,吴努总理设盛大国宴欢迎中国客人。由于吴努是虔诚

的佛教徒,所以宴会为全素筵席。宴会上宾主相互频频祝酒,欢声笑语中洋溢着深厚浓郁的“胞波”情谊。席间周总理乘兴朗诵了陈毅同志于1957年底所作题为《赠缅甸友人》的诗篇:“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彼此是胞波,语言多同汇,团结而互助,和平力量伟。……”这些充满友谊的美好诗句,配以中国艺术家的轻歌曼舞,把欢乐友好的气氛推向高潮。

第二天开始,周总理、陈毅、罗瑞卿副总理等与吴努总理及缅方其他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还参加了各项庆祝缅甸独立日的活动。接着,在吴努总理亲自陪同下,周总理一行访问了缅甸著名的佛塔圣地曼德勒。从曼德勒回到仰光后,周总理参加了《中缅经济技术协定》签订仪式,然后便向主人告别,先行离缅回国。陈毅和罗瑞卿两位副总理则在奈温将军陪同下,继续到毛淡棉、山道威等地参观访问。

对于上述1961年初的访缅之行,周总理记忆犹新。因此,现在他对我说:“那次访问缅甸,外交部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也因此而交了许多缅甸朋友。这对你去当大使后开展工作是很有利的。不过,这次阵前换帅,你的担子不轻呀!”

我从总理语重心长的嘱咐中感受到了这副担子的份量,便请他对驻缅使馆的工作方针作指示。

周总理指出:要继续贯彻我国的睦邻政策,积极支持缅甸的和平中立政策和缅中友好政策,支持其国内和解与和平建设,但不干涉其内政,要努力增进和缅甸领导人

的联系,加强中缅两国的经贸合作及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他还强调:要保持和加强同国内的联系,坚持请示汇报制度,特别是使馆的一切对外事务都要向外交部汇报。这里,周总理特别强调“一切对外事务都要向外交部汇报”,这是有所指的。因为,驻外使馆的对外事务涉及面很广,有些事情是国内其他部门交办的。有的使馆把属于其他部门交办的对外事务的办理情况,只向有关部门汇报,而没有同时报外交部。这样,就使外交部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使馆的工作情况。有时候,毛主席要了解某些对外事务的进展情况,询问周总理和陈毅外长,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使馆没有将此事向外交部汇报。

周总理进一步告诉我:毛主席之所以指示要派副外长去接任驻缅大使,和上述这种情况有关。“因此,今后你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在我临行前,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外长也分别对我作了指示。他们的指示,其总的精神是一致的,都要我致力于加强中缅两国的合作和友谊。但他们谈话的内容各有侧重点。

毛主席的谈话侧重于要我注意把国家之间、政府之间的关系,同党的关系区别开。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因此,谈到对外关系,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国家关系来看,我们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尤其是邻国,应该和平相处,应该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这是我国的外交方针,是

确定不移的。另一方面,从党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同情和支持别国的共产党,否则,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了。当然,我们支持别国的共产党,并不是要去代替他们搞革命。搞革命,那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我们决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所以,一定要把国家的关系和党的关系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说得更清楚些,那就是:既不能因为要搞好国家关系,就不许我们支持别国的共产党;也不能因为要支持别国的共产党,就去干涉人家的内政。“对于这个问题,你在工作中要注意,必要时也可以向所在国的领导人讲清楚。”此外,毛主席还对在某些问题上应该坚持的几项原则作了指示。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十分明确,也十分重要。我到缅甸后,根据这些指示的精神,在一次和奈温主席的谈话中向他作了解释。

少奇同志的谈话侧重于要我对缅甸政府和缅甸共产党之间的和平谈判起促进作用,并要我加强同缅甸政府领导人的联系。他还将一封致奈温主席的亲笔签名信交给我带去。由于以前奈温几次访华,都受到刘少奇主席的接见,1963年刘主席访缅时,也受到了奈温主席的热情接待,他们之间因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现在我赴任时除了携带正式国书外,少奇同志特地写了一封个人信函,要我面交奈温。信中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邀请奈温夫妇在方便时再次访华;二是介绍我的经历,特别指出我过去是一名革命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指挥过许多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外交,请奈

温主席对我的工作给以大力协助。

陈毅同志主要是就外交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对我作了指示,并重申了周总理的嘱咐,要我赴任后加强使馆同国内各部门特别是同外交部的联系。

于是,我带着领袖们的指示和嘱咐,肩负着国家和人民的重托,迎着从印度洋吹来的暖风,来到了介乎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风光明媚的国际名城——仰光。

“我们都是将军出身”

我向奈温主席递交国书后,又向他面交了刘少奇主席的信。奈温主席对我说:刘主席信中提到的两点,一定会做到。他还表示,他自己也是一名军人,军人之间容易沟通,以后我如有事,可以随时找他。

记得我任驻瑞典和巴基斯坦大使时,都因为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而受到重视,现在在缅甸,我的这个军队经历再次对外交起了有益的作用。果然,以后我和奈温主席会面、交谈的机会,比其他国家的大使要多些。

在一次谈话中,奈温谈到了缅甸共产党的问题,我便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向他说明了我国对此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有着同样共产主义理想的缅甸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抱着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但是,这并不会妨碍中缅友谊的发展,也不会妨碍我们两国政府间的合作。

奈温说:“那么,能否请你对德钦巴登顶(缅共主席)施加影响,使缅共接受政府方面提出的和解条件?”

我答道：“我可以请他到使馆来交谈，以促进你们的和平谈判，因为我国政府希望贵国能够早日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团结起来进行和平建设。至于你们如何谈判以及谈判的内容和条件等等，这些都是你们双方之间的事，我们不便干预。我们也不能要求缅共按照我们的意见来进行谈判，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总之，我们支持你们进行和谈以求实现国内和解，但是我们不能干涉贵国的内政，也不能干预缅共的内部事务。”

奈温一面听，一面点头，表示理解中国的立场，并感谢中国政府对缅甸国内和谈的支持。

在和奈温谈话中，我还对上次中缅军队联合进剿李弥匪帮时我国边防部队提前行动之事作了解释。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

有一次，根据缅方提供的关于匪情的情报，中缅双方前线部队的指挥员共同拟定了一个联合进剿李弥匪帮的作战计划。但是，在预定实施作战计划的前一天，我国边防部队获悉匪情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来，李弥匪帮从缅方发出的明码电报中了解到中缅军队联合进剿的部署和步骤，便加紧采取对付措施。我边防部队指挥部见敌情发生变化，就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出击。因为，如不提前行动，等敌人做好准备后再行进击，不仅将失掉战机，使原定歼敌目标难于实现，而且有可能导致我们自己遭受损失。由于当时缺乏通讯联络设施，无法将此突然情况通知缅军，所以我军只好单独提前出击。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俘获了

大批土匪，缴获了大量鸦片、黄金和武器，后来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将俘获的人和物全部交给缅甸政府。

现在，在听了我的上述说明后，奈温主席诚恳地对我说：“我们都是将军出身，都曾指挥军队作战；因此对我来说，很容易理解你刚才所作的解释。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战机稍纵即逝，如果丧失了战机，不但歼灭不了敌人，而且有吃败仗的危险。所以，在当时敌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贵国军队提前行动是对的。这不仅不能怪你们，而且应该赞扬。对于贵军的英勇善战，我深感钦佩。同时，我十分感谢中国政府在合作剿匪中对我们的帮助。”

这样，通过交谈，沟通了彼此的情况和想法，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友谊。可见，作为驻外大使，如能经常和驻在国的领导人交谈，对外交工作的开展显然很有裨益。

中缅友谊的发展也体现在两国的经贸合作中。我国和缅甸的贸易额并不大，但随着两国间友好合作的发展，双方进出口物资的数量、品种和金额不断增加。在这方面，一些旅缅的华侨商人也起了积极作用。此外，中缅边境地区的民间贸易也逐渐开展起来。

中缅经济合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我国援助缅甸建设工厂。我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有多种形式，如援助物资、赠款贷款、援建交通和文体设施等，其中对受援国经济帮助最大的项目之一便是援建工厂。因为，帮助他们建设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工厂，可以使他们通过振兴民族工业来有效地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水平。当时，我们驻缅使馆内有个经援处，专门

负责援助缅甸建设工厂事宜。经过经援处的同志与国内及缅方反复联系、协商,我国援外部门与缅方订立了若干援建协定,先后在仰光和其他地方帮助缅方建设了一批工厂。

在我抵缅就任大使时,有几个工厂已经建好。其中有个纺织厂,具有相当的规模和生产能力。奈温主席对这个纺织厂很重视。当该厂经过一段时间试生产后,中方将其移交给缅方。移交时,奈温希望中方的厂长和技术人员留下,继续协助缅方进行企业管理,并给予技术指导。于是我们的厂长和部分技术人员、熟练工人继续在该厂干了两年,使生产走上了轨道,然后回国。可是,过了一年,奈温主席对我说:由于厂方管理和经营不善,导致生产下降,亏损严重。他要求我们再次派遣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来该厂工作,而且希望这些人员不再回中国,就在缅甸安家落户。

我答道:关于中方人员来缅甸安家落户之事,关系重大,牵涉面广,我这个大使可作不了主。但是,我可以请国内派专家来帮助你们进行调查研究,找出企业生产下降及出现亏损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协助你们提高生产水平。

后来,我们使馆经援处的同志和国内派来的专家一起,经过一番调研,查明了这个纺织厂产量下降、亏损增加的原因,然后和缅方人员一道制订了改善经营管理、改进生产技术的具体措施。同时,还组织专家们开设学习班,帮助缅方培养管理人才和技术人员。

在我离任回国前,奈温主席高兴地告诉我:这个纺织厂的生产已经走上正轨,产品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而且已经变亏为盈。

文化和体育交流也对中缅友谊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我们请国内有关部门及对外文委组织了一些文艺团体(如东方歌舞团和云南省的民族歌舞团等)到缅甸演出,同时向缅甸的文艺界学习。也邀请缅甸的文艺团体到我国演出。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在互相学习中提高了双方的艺术水平。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学到了不少缅甸的民间舞蹈。

我们也经常组织一些体育团体到缅甸来进行友谊比赛。有一次,我国的一个足球队来缅比赛。首场球赛在仰光举行,吸引了众多球迷,许多华侨华裔也踊跃看球,他们还热情地组成啦啦队为中国队助战。但是,比赛结果是中国队输了。散场后,有几位华侨立即赶到使馆来提意见,有的说:按照双方球队的实力来看,中国队要高于缅甸队,但却输了,这是中国队有意输球……

我说,胜负乃兵家常事,球赛也是如此。水平高的球队不见得每场都赢。中国队的运动员由于旅途劳顿,水土不服,首场失利,也是情理中事。

一位老华侨轻声告诉我,有些侨胞同缅甸朋友打了赌,如果中国队胜则侨胞赢钱,如果缅甸队胜,则缅甸朋友赢钱。现在中国队打败了,这些侨胞不但输了钱,而且脸上无光,所以心中都有怨气。

我便劝他们说：“中国队输了，连累你们打赌也输了，很遗憾。但是，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来看。有失必有得。我国的球队来缅比赛、交流，主要是为了增进中缅友谊。和友谊相比，胜负是第二位的。这次虽然首场失利，输了球，但赢得了友谊。同样，你们虽然打赌输了，但也赢得了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问道：“我们赢得了什么？”

我反问：“你们在异国安家立业，最希望的是什么？”

他们异口同声地答道：“那当然是中缅两国长期友好……”

我笑着说：“是啊！中缅友好，是你们的最大利益所在。和这个相比，打赌的输赢算得了什么！只有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长期友好，你们才能在这里安家立业。你们中间有许多是经商的，只有在友好的环境中，才能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赚得更多的钱。我们必须事事都把中缅友谊放在首位。同时，大家还要时时遵守缅甸的法律，和缅甸人民融洽相处。”

他们听后，不住地点头，脸上的怨气顿时消失。那位老华侨握着我的手感动地说：“耿大使这番话，使老朽茅塞顿开！今后，我们应该处处把中缅友谊放在第一位！”

海滩上的宏论

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友好往来，是两国间友谊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明显标志。奈温以前曾以缅甸政府总理和缅军总参谋长的身份访华，后来又以主席兼总理的身份

多次来我国访问。我国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也曾多次访缅。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连续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十个非洲国家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等三个亚洲国家。在访非期间还临时应邀访问了欧洲的阿尔巴尼亚。

周总理等到缅甸访问时,正值2月中旬,这时在缅甸正是春光明媚的季节。奈温主席事先和我商量,鉴于周总理连续访问非欧各国,十分劳累,来缅后准备让他放松一下,所以拟请中国代表团抵达仰光的次日,就到额不里海滩去休养,同时把会谈等活动也放在额不里海滩举行。

我表示:客随主便,听从主人安排。

额不里位于缅甸西部,濒临孟加拉湾,景色秀美,空气清新,是个游览和休养的好地方。奈温告诉我,1963年春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时,曾来这里休养。他兴奋地回忆说:“那次陈毅元帅还和我一起在沙滩上踢球呐!刘主席在旁当啦啦队,为我们鼓劲。陈毅元帅在沙滩上来回奔跑,他的球场英姿使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下海游泳了吗?”我问。

“没有。”奈温答道,“为了外国贵宾的安全,我们通常不安排他们在额不里海滩游泳,因为那里有鲨鱼,还有章鱼。”

“那好,这次也不安排周恩来总理他们下海……”这

样,我和奈温主席把周总理访缅的活动日程最后敲定。

1964年2月14日中午,中国代表团飞抵仰光。当日下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专程前往昂山将军墓地,向这位缅甸民族英雄敬献花圈。晚上,在缅甸国宾馆参加奈温主席为欢迎中国代表团而举行的招待会。

第二天,在奈温主席亲自陪同下,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全体成员来到额不里这个休养圣地。那沙质细洁的海滩、椰子树下富有南国情调的躺椅、温煦的阳光和凉爽的海风,使人有一种赏心悦目和回归自然的感觉。

晚上,奈温夫妇举行别有情趣的海滨露天宴会。挂在树上的一个个灯笼,给晚宴增添了欢乐祥和的气氛。主客双方频频为中缅两国的友好合作日益发展而干杯。

16日,奈温主席和周总理举行会谈。双方除了就中缅两国的双边合作问题进行磋商外,还就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周总理还就此次非洲十国之行的情况和感想,向奈温作了介绍。

他说:“通过这次十国之行,我们看到了非洲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好形势,非洲人民迫切要求建设自己的国家。”他指出,非洲人民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增强自卫能力等方面的呼声很高,在这些方面他们把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国家作为榜样。

周总理回忆了1954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后说:记得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非洲国家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等几个国

家,但是这个会议在整个非洲有着很深的影响。在非洲人民中普遍存在着亚非国家友好合作进行建设并为反对殖民主义而团结战斗的愿望。

谈到殖民主义对非洲人民的压迫和掠夺,周总理深有感触地说:“在非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受所谓西方文明压迫和剥削了四五个世纪的非洲人民受到的苦难更多更深。”他举在加纳见到的建筑在海滩上的古城堡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这样的城堡是殖民主义者从15世纪开始修建的,其用途是作为掠夺、贩卖黑奴的滩头阵地。随着贩卖黑奴行为越来越猖獗,这种城堡也越来越多。从北非的摩洛哥,沿着西海岸直到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每百十公里就有一个城堡。当黑人不愿意被贩卖而反抗时,这些城堡又成为殖民者进行镇压的基地。

周总理引用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的统计,以胜于雄辩的数字指出:从15世纪到19世纪初,由于殖民者贩卖黑人,非洲损失了1亿左右人口。西方殖民者为什么要掠夺这么多的劳动力呢?因为居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反抗殖民者,殖民者就将他们消灭殆尽,剩下一点跑到山上去了。西方资本主义不仅压迫、剥削本国人民,而且基本上消灭了美洲土人,奴役了非洲人,剥削了亚洲人。陈毅副总理为此做了一首词,其中有一句就是“两洲血”,两洲指的是非洲和美洲。

对于周总理提到的陈毅副总理的词,当时我不知道是哪一首,何时所作,后来问了代表团的其他同志,才知道在这次访问加纳时,陈老总有感于殖民主义的残暴以

及当前非洲人民解放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填词一首，题为《满江红·黄金海岸》：

尽是黄金，这海岸，摩天壁立。任掠夺，大洋风雨，神号鬼泣。贩卖黑奴过一亿，又教对岸红人绝。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

说宽恕，谁同意？论报应，亦不必。最无情只是斗争逻辑。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涤瑕荡垢土重光，全无敌。

这首词上阕中的“又教对岸红人绝”，其中“对岸”指的是大西洋彼岸的美洲，“红人”指的是美洲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因其皮肤棕红，故称。上阕末句“两洲血”即周总理所引之句。

周总理在分析了非洲独立运动的情况后强调：“总之，要根据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首先是争取本国民族独立。第二，争取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他还向奈温主席介绍说：“非洲有两类国家，一类已经取得独立，一类尚未取得独立。在非洲有 59 个国家和地区，已独立的有 34 个，未独立的有 25 个。……已独立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即单是政治独立是不够的，还要求得经济独立。”“只要非洲开发起来，农业发展起来，就能自给自足，从而打下可靠的国民经济基础，再逐步发展工业。未来的非洲一定是一个繁荣富强的非洲。”

周总理进一步指出，现在非洲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是如何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经过长期努力来彻底消灭已经深入到非洲社会各个方面的殖民主义统治势力。而要把非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贯彻到底,还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建立民族自卫武装;第二是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民族的国家机器;第三是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

周总理的这番宏论,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声讨殖民主义的檄文,也是一个支持非洲国家独立和革命的宣言。他那大气磅礴的气概、正义凛然的言辞以及实事求是的分析,博得了听者的高度赞赏。奈温主席表示赞同周总理的意见。两位领导人在交谈中一致认为亚非国家应该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精神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反帝反殖、支持民族独立、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合作而努力奋斗。

18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离开缅甸,前往巴基斯坦访问。

两年后,刘少奇主席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对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少奇同志第二次访问缅甸,而陈毅同志算起来应是第十次访缅了。

刘主席和奈温主席在会谈和交谈中都对中缅两国间友好合作的进展感到满意,同时他们也谈到了缅甸国内和解的问题。刘主席重申了我国支持缅甸政府与缅共的和平谈判,希望他们的和谈取得成功。

少奇同志在同我谈话时,指示要加强中缅之间的经贸合作。他强调指出,经贸合作和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大使馆应该十分重视并努力促进这方面的工作。

他的这个指示,使我回忆起了以前的一件事:在我任副外长时,有一次,刘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我和章文晋司长陪见。会见结束送走客人后,少奇同志要我和章文晋同志随他到中南海家中谈话。他说:国内各项工作的好坏,特别是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与邻国的关系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外交部的工作要与国内各部门的工作互相配合。请外交部党委研究应该怎样配合。我回部后,立即向外交部党委传达了少奇同志的这个指示。

由此可见,少奇同志一向重视外交工作与经济工作之间的关系。

我根据以往中央领导同志出访时必到使馆讲话的惯例,恳请少奇同志到大使馆向全体同志作报告。不料,他表示不作报告,也不去使馆。当我再三要求时,他就说:“那你请陈毅同志去讲吧!”

陈毅同志答允去使馆讲话,并对我说:“不要再去打扰少奇同志了,你要理解他的心情,体谅他的难处。”

于是,我不再坚持原来的要求。但是,对于陈外长的话,当时我觉得很费解,心想:国家主席到使馆作报告会有什么“难处”呢?

后来,在“文革”中我回忆起此事时才恍然大悟:看来,当时中央领导人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已经产生了分歧。

数天后,刘主席访缅圆满结束,乘专机离开仰光回到昆明。第二天便接到中央办公厅急电通知,要他和陈毅同

志立即到杭州去参加中央会议。他们匆匆飞抵上海，再乘专车到达桃红柳绿的西子湖畔。但是，他们和参加会议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无心欣赏这人间天堂六桥烟柳的如画景色，因为此刻主持中央会议的毛主席正在严厉批判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

一场震撼神州的政治大风暴已经开始！一场影响十亿人民、延续十年之久的政治悲剧已经拉开了序幕！

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也把我从驻缅使馆吹回北京，卷入了挨斗受批的旋涡！

第六章

新中国外交正确辉煌

挺直脊梁办外交

新中国的外交,和解放前历届旧中国政府的外交相比,有着根本的不同。

对于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的外交,周总理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确实,从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在帝国主义炮舰外交的淫威下,订立了多少向列强割地赔款的卖国条约,干了多少将国家主权双手拱让外国的无耻勾当!所以,旧中国的外交是丧权辱国的外交、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的奴才外交、跪在

外国主子面前直不起腰来的屈膝外交。在这种外交中缺乏作为一个国家最可贵的东西——独立自主。

与此相反，新中国的外交一开始就高举起独立自主的鲜明大旗。

早在1949年6月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同志即已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独立，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周恩来同志在建国前后也曾多次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在外交方面“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独立自主，这是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而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这是在外国人面前挺起了脊梁的中华民族的神圣权利。

为了坚持外交上的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夕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

什么叫“另起炉灶”？用周总理的话来说，这“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里所说的“新的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所宣告的，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毛

主席还说：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

对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一条，周总理曾用下面这些话来深刻阐明其内容和含义：“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根据上述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的第三天，即1949年10月3日，我国首先和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苏联建交，接着又相继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等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则要经过谈判以后，再决定是否与之建交。如果它们接受我国政府提出的建交原则和条件，即（一）和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二）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三）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四）同

意将外交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就可以和它们建交。反之,则暂缓建交。

从1950年春起的一年多时间内,我国通过谈判,又先后和印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缅甸、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有些西方国家,虽然口头上同意上述建交原则,但在具体行动上却违背了这些原则,仍同蒋介石集团保持所谓外交关系,或支持国民党集团非法占据联合国内的中国席位,因此,我国暂不与之建交。直到后来,当这些国家和国民党集团断绝官方关系,并真正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后,我国才同它们陆续建立外交关系。

这样,我国通过“另起炉灶”等方针原则,切断了旧中国那种半殖民地性质的对外关系,建立了一种崭新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当然,独立自主不仅体现在建交原则上,还体现在一系列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之中。例如,独立自主的外交和维护国家主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记得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同我谈话中,经常提到:作为一名驻外大使,必须时时处处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而我国建国以来的整个外交,也完全体现了这一点。

50年代初期,美国在出兵侵略朝鲜、轰炸扫射鸭绿江沿岸地区、威胁我国安全的同时,还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对此,我国政府在实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在外交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我国的领土、主权完整。我国除了派代表到联合国去揭露美

国的侵略行径外,还多次发表严正声明,谴责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强烈要求美军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周总理在1950年6月28日发表的声明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侵台行径“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声明斩钉截铁地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决心:“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在一次亚洲八国代表团团长为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而举行的会议上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数月后,中美两国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会谈持续多年,谈判地点先是在日内瓦,后改在华沙,其谈判内容中就包括美国侵台问题。

1960年8月,周总理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提到中美大使级谈判。他指出:“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具体问题。原则协议应当包括两点:第一,中美之间的一切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应当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第二,美国必须同意将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我国领导人在同外国领导人谈话时,也常常谈及台湾问题,有时还请他们向美国政府转达我国政府的意见。1965年4月,周总理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

总统约翰逊转告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句话,其中第一句就是关于美国侵台的问题:“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没有派兵去夏威夷,是美国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省。尽管这样,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且已经先后在日内瓦和華沙同美国就这个绝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谈了十多年。”

周总理还经常向国际新闻界人士表明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有一次,他在同美国《纽约时报》、《每日新闻》和《华尔街日报》等新闻机构负责人谈话时郑重宣告:“我们要求美国政府不要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尊重美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也希望它尊重我们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不会干涉美国内政。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中美关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关系就可以建立了。”

由于我国政府在美国侵台问题上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长期地开展外交工作,终于使得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了它的武装力量。

在争取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上,也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仍被国民党集团非法窃据。为此,周总理曾致电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及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要求把国民党的“代表团”从联大和联合国各机构驱

逐出去,由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团出席第四届联大。但是,由于美国的无理阻挠,我国这个合理合法的愿望未能实现。新中国竟被继续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达 20 年之久。

为了维护我国的主权,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国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和广泛的外交努力。1953 年,我奉周总理之命与新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谈了此事。以后,我国政府又和其他几位联合国秘书长就此事进行过交涉。周总理、陈毅外长和我国的外交官们还向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和外交官就此事广泛交谈,向他们介绍、说明有关情况,从而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在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下,我国终于冲破了美国的阻挠,于 70 年代初恢复了在联大、安理会及联合国各个机构中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

在同前苏联的外交关系中,也体现了我国独立自主和维护主权的外交原则。例如:抗日战争末期,苏联出兵我国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同意苏军留驻大连地区,并使用和管理旅顺口军港,还同意将中长铁路(全称为中国长春铁路,由原来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合并而成)交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经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经过与苏联政府谈判,在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或稍后,又与苏方签订了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这些协定,我国收回了中长铁路的全部经营管理权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收回了旅顺口军港的使用管理权,苏军也

从旅顺、大连地区陆续撤走。

到 50 年代末,中苏间的关系出现裂痕。这不仅表现在中苏两党对国际共运观点的分歧以及两国政府对国际问题的分歧方面,而且也表现为两国在外交关系中、包括有关中国主权问题上的矛盾。1958 年 7 月下旬,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奉其国内之命谒见毛主席,转达了苏联领导人的意见:希望在中国沿海地区设立一个苏联海军的潜艇基地,建立一个可以同苏联舰队通讯的长波电台,并由中苏海军共建一个联合舰队。接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来北京,当面向毛主席提出了上述要求。很明显,这样的要求有损于中国的主权。在新中国的土地上,绝不能建立外国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在我国的领海内,绝不容许外国的军舰随意行驶,更不能由任何外国在“联合舰队”的名义下来指挥和控制中国的海军。因此,毛主席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虽然因此导致了苏方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并加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从而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但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我们宁愿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由此可见,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是挺直脊梁、扬眉吐气的新中国外交的特点之一,也是它与旧中国历届政府的丧权辱国外交之间的根本不同之处。

坚持和平外交

争取和平,保卫和平,这是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之一。

建国之初,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就郑重宣告:“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1950年,周总理在一次谈到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原则确定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要保障本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当然要反抗外来的侵略;同样,要争取和保卫国际和平(包括世界和平与地区和平),也必须反对侵略战争。因为,在世界上还存在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情况下,和平不能依靠乞求取得,而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争取和平、保卫和平的目的。

建国初期,我国曾有一亿数千万人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发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和全世界人民一

起表达了中国人民争取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愿望；同时，这亿万人的签名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

但是，当美国军队的坦克碾压着我国近邻朝鲜的农田之时，当美国侵朝战争的烽火燃烧到我国边境之际，仅仅通过和平签名显然并不能制止侵略战火。因此，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向美国发出了严正警告：“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与此同时，他也发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呼吁：“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这对于东方的和平是有利的”，“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可是，美国对这些警告和呼吁竟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美军不但越过了“三八线”，而且肆无忌惮地将战火烧到鸭绿江畔，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及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出由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抗击美国侵略军。经过三年浴血奋战，中朝人民不仅把侵略者赶回“三八线”以南，而且迫使美国不得不接受停战，并与中国、朝鲜和其他有关国家一起举行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和外交谈判。

1954年在日内瓦举行了关于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

的国际会议。在会上,周总理、陈毅外长及我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对美国代表破坏朝鲜停战协议、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周总理严正指出:“朝鲜停战了,举世为之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但是我必须指出……他们正在企图利用每一种可能来破坏朝鲜的停战协定。同时,朝鲜虽然停战了,但是停战的状态究竟还不是巩固的和平。我们应该努力使朝鲜的停战状态转入和平状态。因此,当我们对和平统一朝鲜问题一时尚不能取得协议的时候,我们就有义务采取措施来巩固朝鲜的和平,以便为和平统一朝鲜创造条件。”

由于中国、朝鲜和其他国家的努力,终于挫败了美国对朝鲜的入侵,扑灭了东北亚地区的侵略战火,从而有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这五项原则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

在新中国诞生前后,毛主席就曾多次提出,我国和外国的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并结合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问题和新中国三年来的外交经验,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归纳为五点。1953年底,他对来北京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数月后,当中印两国经过谈判达成《关于中国

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上述五项原则被写进了这个协定的序言中。

1954年5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所作关于印支问题的发言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容许歧视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国家避免新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空前灾难而获得和平和安全。”这样，就把这些原则的应用领域从两国间的关系扩展到整个亚洲国家间的关系。

同年6月，周总理相继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的会谈中，总理们都同意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包括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准则，并将其作为正式倡议写入《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于是，中国与印度、缅甸便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毛主席不仅肯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加以推广。他在同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提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他还对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说：“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

在1955年4月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中，周

总理在发言时多次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处境大致相同的亚非国家首先应该友好合作，实现和平共处”，“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为了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亚非各国应该首先根据共同的利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印度、缅甸和中国曾经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本着这些原则，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两国侨民国籍问题的初步谈判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中国愿以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作为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并愿促进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同样需要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中国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以后，就同印度和缅甸的总理共同提出并承认五项原则，彼此受此约束。……从此，赞成五项原则的国家就一天天多起来。在座的许多代表的国家都表示了同意。尼赫鲁总理曾对我说，英国的艾登首相也表示同意五项原则，这使我很高兴。如果艾登首相愿意同中国总理发表关于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我将首先签名，支持五项原则并保证执行。”

周总理还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

题为《和平宣言》的议案。该议案的七点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此外在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

各国代表在上述《和平宣言》的基础上经过讨论，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中提出了包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在内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国家以此作为建立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准则，许多国际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或写进了这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

我国政府更是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开展外交活动，建立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例如，我国和许多邻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签订了边界条约。1957年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国政府在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又如，我国和一些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订立了友好条约，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国际贸易、开展经济合作

等。

当然,对我国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和邻国以及亚非国家的关系中,而且也适用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关于这一点,1954年8月毛主席在同英国工党访华团谈话时,就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朝等能共处吗?我认为,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合作也可以”,“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1956年10月,周总理在与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会谈时,也曾阐述:“我们认为,只有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才能得到发展”,“我们……主张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制度,那就是各国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用武力。我们在国际上主张和平友好的政策,各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者以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来相互约束。这就是一种国际保证,使得国家不分大小都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发展而不附带任何条件。我们要把殖民主义只为自己发展而把别人搞穷的原则埋葬掉。这种政策是不排斥任何国家的,包括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内,大家平等相处”,“各国以五项原则或十项原则为基础,互相保证长期和平共处,用条约形式把这种保证固定下来。”

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我国政府也坚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沟通和处理与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的关系。

日内瓦会议后,我国政府曾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政府表示: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中美两国间的争端和其他国际争端。周总理还在国际会议上公开申明了上述愿望:“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是不愿意同美国作战的,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如果大家愿意推动中美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那就会大大有利于和缓远东的紧张局势,大大有利于推迟和阻止世界大战。”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同英国首相艾登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后来,英国的反对党工党在英国外交部的支持下又派出以艾德礼(工党领袖、英国前首相)为首的代表团来华访问。对于当时英国在推进中英关系方面所采取的主动态度,我国政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此事时曾说:“我们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将首先从英国开始。这说明,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迫使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说些和平共处之类的话。这是人民的要求,美国统治集团也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1963年,周总理在同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交谈时说:“任何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只要彼此没有互相侵犯的意图,并且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因为我们有共同性,我们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我们都赞成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

1954年,周总理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

术文化访华团谈话时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我想,我们和日本也同样可以根据这五项原则来彼此承担义务。”以后,他在同许多日本各界访华代表团交谈时,都提到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友谊。特别是多次提出中日两国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关系,恢复邦交,签订和平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用法律来保证两国关系。”还应该“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

这样,由于我们坚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就使我国的和平外交取得了更大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与支援各国民族独立不相悖;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与反对殖民主义也并不相悖。相反,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再指出:我们一方面要高举和平的旗帜,争取和保卫世界持久和平;同时也要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数十年来我国的外交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实行国际经济合作,是新中国对外交往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毛主席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历来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也就是说,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不仅不能拒绝外援,而且要尽可能地与别国进行经济合作。

同时,他也经常指示我们,要尽力支援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建设民族经济而奋斗的国家。关于发展国际贸易的问题,他在建国前夕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上就已明确宣告:“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到,我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了发展我国的经济;二是为了加强同各国的友好关系;三是为了援助别的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地区的国家,发展它们的经济。此外,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也有利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

周总理在建国初期与日本外宾谈话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这就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让我们自己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市场扩大了,就更需要同外界互通有无,开展贸易,贸易额也就会增加起来。只要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购买力大了,他们就不能只在国内解决问题,这就需要输入,也需要向国外输出。……和平共处,就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存共荣’。”

他在1952年举行的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总结了六条我国的外交方针,其中第五条就是“互通有无”。对这一条他作了如下说明:“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美帝国主义对我国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我国同苏联

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我们想扭转国民党时期的入超,变为出超,这是好的,但我们当前的目标是进出口平衡。现在我们入口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出口的东西如鸡蛋、猪肉,是人家所需要的,这种互通有无是互利的。”

为了开展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我国在设立政府机构时就在政务院下面设立了外贸部和对外经济联络部门(开始是总局,后来升级为部)。在一些有对外贸易业务的省市,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特别是在广州,每年定期举办广交会,吸引了许多外国和港澳地区的客商来我国进行贸易。在外交部门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驻外使馆中设立经贸处或商务处,有商务参赞等人员专门从事对外经贸事务。对驻外大使来说,开展对外经贸业务是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

我国政府主张,在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中,应该实行平等互利的原则。对此,周总理在不同的场合曾多次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我们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不能要求特权和条件。中国保证在同到会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互相来往和进行和平合作与经济、文化交流时,不要求特权和特殊条件,而是平等对待。”“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包括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等,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来进行。……今后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应该真正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

基础上,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在中、印(度)、缅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也包含平等互利的原则。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等条件,在建国初期我国主要是同苏联及朝鲜、蒙古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例如,1950年毛主席和周总理访苏时,在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订立了中苏贸易协定、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及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其后,我国又和波兰、捷克、朝鲜、民主德国、匈牙利等国订立了关于贸易的合同和协定。

我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当时的贸易,大都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而且以现在的眼光来衡量,那时候的贸易额是很低的。尽管如此,这些贸易和经济合作,对我国恢复和发展经济还是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努力开展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周总理于1954年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六亿人口的市场很大,同中国发展贸易很有前途,西方国家都懂得这一点。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

在我担任驻瑞典、芬兰、丹麦等国大使(或公使)时,周总理曾多次指示我,要利用瑞典、芬兰等中立国家的地位,在北欧创造开展国际贸易的条件,来打破美国对我国的禁运。因为,当时英、法等国尚未与我国建交,所以我国和这些西方大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便受到了限制;而这几个北欧国家和我国建交较早,对我国友好,同时它们的经

济也比较发达,因此和它们进行贸易有着很有利的条件。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便在瑞典、芬兰、丹麦三国寻找贸易的契机。一方面我们和这些国家的政府经贸部门进行联系,同时也和三国的以及别的欧洲国家到北欧来做生意的企业界和商界人士进行接触。50年代初期,在丹麦和芬兰都举行过国际经贸会议,经过我们驻丹、驻芬使馆积极联系,我国外贸部门派了代表团与会,不仅与有关国家签订了贸易协议,而且参加了国际经济组织,从而为我国开辟了一条通向欧洲的贸易渠道。与此同时,我国驻瑞士等国的使馆也为开拓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

到50年代中期,我在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时,又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努力打开巴基斯坦这个“西门”,使其在进一步拓宽我国与欧洲交往(包括经贸往来)的通道中发挥作用。

在与欧洲国家开展贸易的同时,我国也与东面的日本建立和发展经贸关系。

关于中日之间的贸易,有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50及60年代,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开始时两国的经贸交往,通过人民团体之间签订协议来实现。例如,50年代中期就签订过渔业、贸易及科技交流等协议。但是后来由于日本岸信介政府不承认、不保证两国民间协议的实施,并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因此中日贸易来往停止了两年多。当岸信介下台后,我国政府为了恢复中日贸易,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这就是:一、政府协定;

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按照贸易三原则，一切协定（包括贸易、渔业、邮政、航运等协定）今后必须由中日两国政府来缔结，才能得到保证。当暂时还不能缔结政府协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签订民间合同的方式来进行贸易。对于日本的有特殊困难的中小企业，我方可以给予个别照顾，根据需要可以增加贸易数量。这贸易三原则实行后，中日间的贸易又开展起来。到1962年11月，由我国的廖承志同志（当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和日本的高崎达之助先生（日本自由民主党成员、众议院议员、曾任日本内阁国务大臣兼经济审议厅长官、通商产业大臣、日中综合贸易联合协议会会长等职）签订了《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备忘录贸易的议定书》，该议定书写明了关于今后五年内中日双方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出口的主要商品、交易合同的签订、各项交易的结算、商品检验和仲裁等各项问题所达成的协议。接着，双方分别成立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崎事务所来负责处理中日备忘录贸易事宜。在1964年高崎达之助去世后，由日本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先生和松村谦三先生继续负责中日备忘录贸易。于是，中日两国的贸易及经济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至于美国，尽管由于该国政府敌视新中国，因而当时中美之间不能实行经济合作，但我国政府还是希望同美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贸往来。1957年周总理在同来华访问的美国青年代表团谈话时表示：“如果中美两国友好起来，毫无疑问，对两国经济的发展都会有好处。

不言而喻,中国是在建设当中,诸位已经看到一些,将来还能看到一些。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当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这对我们中美两国,也不例外。当然,这种友好来往,经济来往,也是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其基础更为深厚,其内容更为广泛。正如周总理于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所作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中所说的:“我们愿意按照万隆会议的决议,尽可能地加强同亚非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平等互利的合作,以促进彼此的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随着我们各自的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的合作规模将会日益扩大。目前,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正在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这表示了我们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真诚愿望。”

国际援助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一部分,因此当然也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我国政府认为:一切援助都是相互支持的,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国家对受援国的“恩赐”,更不能在援助时附带各种条件包括政治条件。国际援助应该完全符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对别国进行控制、掠夺、干涉甚至颠覆。

1964年初周总理访问加纳时,在答记者问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稍后,这八项原

则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马里共和国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中。这八项原则是：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我国所有的援外部门和单位，在进行援外工作时，都

严格遵守上述八项原则。我在巴基斯坦和缅甸当大使时，也遵循这几项原则处理对驻在国的援助事宜。我们的这些原则和做法，得到了受援国的高度赞扬。例如，巴基斯坦的几位总统、总理和缅甸的奈温主席都曾亲自对我说：“中国的援助是真诚无私的。”“中国对援建项目严格按照规定执行，不仅质量好，而且负责帮助我们培训工程技术人员，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十分有益。”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外交一贯坚持下列原则：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支持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对别国进行威胁、控制和颠覆，反对在外国驻军及建立军事基地，反对建立敌对性的国际军事集团，提倡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反对对别国进行剥削和掠夺。在我国的台湾问题上，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反对外国势力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等等。

为了更有效地实现这些原则，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再教导我们，要把坚定的原则性和具体执行中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周总理说：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灵活，以求达到成功”。

在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就是身体力行者，是实行的典范。

在中美关系中，对于美国侵略朝鲜、侵占我国台湾、

干涉别国内政、对别国进行军事威胁和武装入侵、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建立军事集团、破坏国际和平等政策和行为,我国政府一贯坚持原则立场予以坚决反对。与此同时,毛主席、周总理在策略上则采取灵活态度,争取和美国沟通,以便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当美国入侵朝鲜后,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警告美国“我们不能坐视不顾”;另一方面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和印度政府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我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国侵占台湾,另一方面周总理在国际会议上及其他场合,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解决和缓远东及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还通过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向美国政府传话,希望中美两国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表示“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我在北欧时,也曾奉周总理之命,向瑞典、丹麦和芬兰三国领导人表达过中国政府愿同美国政府谈判的想法,请他们向美方转达。后来,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我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同志参加了历时数年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周总理还通过与来华访问的美国青年代表团、新闻界人士等交谈,阐明了我国外交上的原则立场,并表明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嗣后又开展“乒乓外交”,以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特别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多次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谈话,请他向美国政府转达我国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意见。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

灵活的策略和措施,才使中美关系逐渐解冻,后来经过尼克松访华及中美建交,终于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周总理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常常借助策略的灵活性来使我国的原则立场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例如,在万隆会议上,当有些国家的代表对新中国抱有疑虑和误解时,周总理立即灵活地在补充发言中提出了“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虽然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会议将共同的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他强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的主张为大多数代表所赞成和接受,从而为会议达成团结反殖的协议奠定了基础。

出席万隆会议的各国代表都赞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但是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有的代表则不同意“五项”这个数目。对此,周总理又按照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精神,提出了处理办法。他说:“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

“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我们应该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来谋求和平合作。”他诚恳地提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一致赞同，这样，会议最后通过了包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本内容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也称和平相处十项原则。

在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问题上，也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建交原则，除了“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外，还有一个问题，即对方必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必须和窃据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只有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我国才可与之建交。但是，作为西方大国的英国，当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和做法。它一方面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愿意断绝与蒋介石集团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却支持国民党集团非法占据联合国内的中国席位，实际上配合美国制造“两个中国”，而且仍然与台湾互派领事，同时英国政府的代表还在英国议会中散布“台湾地位未定”的论调，配合了国际反华势力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叫嚣。根据以上情况，我国政府对于和英国建交的问题采取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做法：建立代办级的关系。所谓代办级的关系，就是

中英两国互派代办驻在对方首都。由于代办不是全权大使或全权公使,在处理两国间的某些事情时不太方便,因此这只是一种半外交关系。从1954年中英建立代办级关系以后的十多年中,一方面我们同国际上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反华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断地做英方的工作,终于促使英国政府改变了它对联合国内中国席位的态度,并明确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从而使中英间的代办级半外交关系,得以在1972年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与英国不同,法国直到60年代初期还保持着与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外交关系。理所当然,中法不仅不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也不能建立代办级的半外交关系。但是,法国是个西方大国,中法两国之间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而且,在戴高乐总统领导下的法国,不愿受超级大国的控制,对国际问题有其独立的见解,对许多问题的观点和我国政府的看法比较接近,因此中法之间还是要交往。为此,我国政府对中法关系采取了灵活的办法。1955年周总理在同法国议员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对于中法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如果法国政府、法国议会有困难,现在可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然后水到渠成,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割断关系。中国方面是可以等待的。”八年之后,即1963年,周总理又对受戴高乐派遣访华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说:“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

的、民间的都可以。”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和做法，所以在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以前，两国间通过民间往来、议会交往及互相建立贸易机构等方法，保持着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上的联系。

日本的情况比法国更为复杂。由于战后的日本处于美国军事占领之下，在国际政治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再加上有几届日本内阁首相如吉田茂、岸信介等，采取了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因此中日之间长达20年没有建交。对此，我国政府也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办法来处理。

一方面，周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关于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第二，日本政府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日本政府不要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各种民间团体、政党或政治家个人之间的交往来沟通中日两国间的非官方或半官方关系。1956年周总理在同日本国营铁道工会等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谈到友好合作，不能不考虑到目前我们两国的外交关系尚未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需要两国政府的努力，但也需要两国人民的推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随时都伸出友谊之手，随时都愿意和日本政府商谈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问题。日本人民也具有同样的愿望，诸位便代表着日本人民的愿望，我们很感谢诸位的努力。……在我们两国政府能够进行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很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

善的。”“我们两国人民团体彼此达成了许多协议，并且由两国人民团体来执行。”当时，中日两国人民团体之间签订的协议范围很广，涉及工会、议会、渔业、侨民、青年、文化、科学、贸易、经济等方面，其中有些实际上已超出了民间外交的范围，具有半官方性质。1957年，周总理在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时指出：“贵党主张只有一个中国，要同中国缔结和约，恢复邦交，这是完全正确的，和中国人民的主张是一致的。我相信，贵党的主张是一定会实现的。”“贵党主张采取独立外交政策，这不但合乎日本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合乎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实现这个目标是需要时间和采取一定步骤的。一方面应该摆脱美国的干涉；另一方面，要恢复中日邦交，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我们互相配合，不仅可以打破两国的隔阂，也可以促进世界人民的了解。总有一天，日本外交的独立性会更加加强，水到渠成，日本撤消对台湾的承认，中日会恢复邦交。”

邀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人士访华，使中日关系由民间外交向半官方外交又跨出了一大步。1959年9月，日本前自民党总裁、前内阁首相石桥湛山率团访华，同周总理签署了会谈公报。1963年10月，石桥湛山以自民党资深议员和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的身份再次访华，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在和这位积极主张恢复

日中邦交的日本政治家谈话时指出：由日本“前任首相来访问中国，发表声明，承认新中国”，这是推进中日邦交的一种方式。他说：“前任首相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是前属社会民主党、现属社会党的片山哲先生。其次就是阁下两次访问中国。阁下不仅是前首相，而且是执政党的议员，代表着自由民主党的一个方面，只承认新中国而不承认台湾，为恢复中日关系、推进两国邦交的正常化而努力。这是间接的方式，也是积累、渐进的方式。”“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要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的，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是只要我们推进，采取积累方式，就可以解决。”此外，松村谦三（日本自民党顾问、国会议员）等自民党人士来华访问和处理中日间经贸事宜，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也起着推动作用。

正是由于我国政府采取了上述措施，促进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才导致了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并先于美国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个方面外，我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战略、确定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以及与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等方面，也体现了“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思想和做法。

“文革”开始后，林彪、陈伯达、康生及“四人帮”一伙，对建国17年来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全盘抹杀，对全国各个部门的工作一概否定，将新中国的各项政策、法律、法令全都污蔑为“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并不例外，也遭到他们肆意攻击。

他们恶毒地污蔑我国政府及各外事部门 17 年来执行了一条“三降一灭”外交路线。所谓“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反动派、投降修正主义，扑灭世界革命”，这本是康生对前中联部长王稼祥关于外交工作的建议所作的攻击之辞，在“文革”中竟被他们扩展到了整个外交工作和所有外事部门。然而，林彪、“四人帮”的恶毒污蔑，丝毫无损于新中国外交正确辉煌这个铁的事实。

第七章

风雨十年忆“文革”

挨批斗琐记

“文革”初期，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兴风作浪，猖狂一时。继上海夺权之后，造反派在全国夺权。外交大权虽然仍掌握在中央手中，但是外交部的政工部门已被砸烂，部内许多单位已被造反派把持，实际上是处于半夺权的状态。

1967年初，各驻外使领馆人员都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驻缅甸使馆人员分批回国。我因使馆内有许多事务要处理，所以留在后面走。但是造反派指定大使夫人必须先走。于是，赵兰香便先行回国。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原因，直到我自己回国后才知道，原来造反派指定赵兰香先回国，是为了要她背靠背地揭发我

的“问题”。

当我离开仰光回到北京时，只有造反派在机场等我。赵兰香和子女们都没有来接我。以前，我和赵兰香每次从国外回到北京，孩子们总要到机场来接，这次破例不来，使我感受到了“文革”的紧张气氛。再看看造反派那铁青的脸色，我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莫非他们不让我回家？果然，造反派命司机将车开到外交部。我问道：“可否把行李先送回家？”造反派严厉地回答：“不行！”

在外交部的一个房间里，几个造反派逼着我“交代”。我提出，应该先向部领导汇报驻缅使馆的工作情况。他们不仅对我的正当要求嗤之以鼻，而且蛮横地说：“什么向部领导汇报！你还想搞反动路线那一套！告诉你，现在是在搞文化大革命，你必须接受革命造反组织的审查……”

“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另一个造反派喊起口号来。

“你必须老实交代在驻缅使馆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哦，是罪行，所犯的罪行！”

“还要交代你在任副部长时如何执行‘三降一灭’资产阶级外交路线……”

当时由于我刚刚回国，还没有领教过造反派的厉害，更不知道造反派后面有中央文革在撑腰，所以一听他们这些蛮不讲理的话，不禁怒火中烧，就反驳他们：“大使回国述职，向部领导汇报工作，这是合情合理、合乎规章制度和外事纪律的做法，怎么叫‘反动路线’呢？我在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但是绝对没有什么‘罪行’！我在外交

工作中执行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是无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没有执行过什么‘三降一灭’的资产阶级路线!所以,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那你揭发别人也可以。”他们中的一个“启发”我。

我茫然地问:“揭发谁?”

“揭发部领导呀!比如有的部领导访问缅甸时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我明白他指的是陈毅外长,便直截了当地说:“陈部长访缅时说的什么,做的什么,你们不是也都知道吗?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你们自己揭发好了,何必来问我。我没有发现陈部长的言行有什么问题。”

他们见我顶得梆梆的,就威胁说:“你要是不交代,不揭发,那你今天就别想回家……”

“怎么?”我还是顶,“你们要拘捕我!我犯了什么法?再说,你们有什么资格拘捕我?”

这样硬顶硬抗了几个小时,造反派见天色已晚,自己大概也想回家了,便收篷转舵。他们说:“你今天不交代,以后还是要交代,躲不了!现在先让你回家,以后随传随到!”

我回到家中,见赵兰香正愁容满面地在等待。听了我才经历的一幕,她告诉我,她回国后已不止一次受到造反派的审问,要她揭发我的“问题”。

从此,我们便开始了被审查、被批斗的苦难历程。大会斗,中会批,小会逼供,成了家常便饭。

每逢部内造反派联合部外红卫兵批斗部领导时,我

们这些大使总免不了要站在旁边陪斗。低头弯腰当然是份内之事，所可自我安慰的是，我还没有被在脖子上挂上一块写有“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其实大会陪斗还是比较轻松的，只要低头站着，不必开口说话。而中会挨批就比较难受，既要恭恭敬敬地聆听造反派的“批判”，又要老老实实地做“检讨”。“耿飏必须老实交代，低头认罪”的嘶哑口号声，像一记记闷棍打在我脑袋上。最令人厌恶的则是小会逼供。几个造反派围着我，无休无止地勒令我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别人的问题。所谓别人的问题，这“别人”主要是指部领导乃至中央领导同志。造反派用多种多样的手法和方法来引导或逼迫我把矛头指向“别人”。他们或是“循循善诱”，或是厉声讹诈，或是旁敲侧击，或是指名道姓，或是拐弯抹角。他们所说的问题，大都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混淆是非、无限上纲……

造反派逼供也有分工，有的是管“历史问题”的，有的是管外交业务方面的，有的是管行政事务方面的。他们分成几组，对我进行轮番“轰炸”。

有一次，造反派逼我交代和刘少奇的“黑关系”。我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我出任驻外大使是由国家主席任命的，所以我们之间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而不是“黑关系”。

“你老实交代，刘少奇访问缅甸时同你说了些什么‘黑话’！”造反派紧追不舍地逼问。

我答道：“刘主席访缅是正式的国事访问，他的讲话

都是在外交场合讲的，新闻报道中都登载过。我作为大使，陪同他进行外交活动，聆听了他的这些公开讲话，除此而外，他并没有对我作过私人谈话，更没有说过什么‘黑话’。”

有个造反派冷笑了一下，追问：“刘少奇到使馆时和你谈过什么？”

“他根本没有到使馆来。”我说，“关于这一点，你们中间有些同志也知道。”

“那么，代表团里谁到使馆来了？”造反派明知故问。

“陈毅同志到使馆来……”

我还没有说完，造反派急不可待地抢着问：“陈毅对你讲了些什么？快交代！”“快交代陈毅说的‘黑话’！”

看着他们那种好像找到了一个金矿急欲开采的样子，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这次审问我的真正目标就在这里。因为，对他们来说，刘少奇毕竟已是“死老虎”，而陈毅却是“活老虎”。他们对我和其他大使进行批斗逼供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要揪出陈毅外长，进而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及其执行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并篡夺外交大权。可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在我这里，他们永远找不到为达到其目标所需要的任何材料。

于是，我不慌不忙地回答：“陈外长到使馆来对全体工作人员作了报告，主要是讲如何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我听不出其中有什么‘黑话’。至于对我本人，陈外长只是询问了使馆情况，并没有讲其他的话。”

“那么，”造反派步步紧逼，“1964年陈毅访问缅甸

时,说了哪些‘黑话’? 干了哪些坏事?”

显然,他们所指的是1964年春陈外长陪同周总理访缅之事。我坦然答道:“那次访缅,主要是周总理和缅方会谈。周总理的发言已在报刊上登载,如果你们要了解内容,我可以……”

当时,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虽然企图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但是慑于周总理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以及全国人民对总理的敬爱和拥戴,他们还不敢公开收集总理的“材料”;况且周总理在会谈中的发言,已公开发表,其中没有什么“油水”可捞,所以造反派对此并不感兴趣。因此,他们便打断我的话,严厉地说:“这个以后再说,现在你先讲陈毅的……”

相持了几个小时后,他们觉得从我身上实在捞不到什么,就警告我:“你这么顽固,对你自己没有好处。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下次还是要交代你和陈毅的关系!要揭发陈毅的问题!”

后来几次,造反派变换了手法,不再局限于追问陈毅访问缅甸之事,而是扩大到其他外交活动。他们特别逼我交代陪同陈外长出访时的情况。

“你当副外长时不是和陈毅访问过阿富汗和印尼吗?你不仅要交代自己在出访中的问题,还要揭发陈毅在出访中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严重错误,嗯,严重罪行!”造反派声色俱厉地指着我的鼻子说。

“据我回忆,”我严肃地回答,“陈毅同志在出访阿富汗和印尼时的言行,没有什么‘严重错误’,更谈不上‘罪

行’，也没有推行‘三降一灭’路线。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批准的出访方针办的。”

“中央批准！”造反派中的一个忽然从椅子上蹦起来，“中央是谁批的？是刘少奇吗？”

“是毛主席、周总理批的……”

“你胡说！”造反派发怒了，但怒色掩饰不了他的失望。

“这有案可查嘛！”我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可堵住他们的嘴了。

可是，造反派当然不会就此偃旗息鼓。他们见在外交业务方面攻不下我这个保陈毅的“顽固堡垒”，便改从行政事务方面进攻。

“耿飏，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当副部长时在行政工作方面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造反派对我展开了新一轮攻势。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我委实摸不着头脑，想了想便说：“我在负责领导部内行政工作方面，难免有错误，但绝对没有像你所说的什么‘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没有？还要狡赖！”造反派眼睛瞪得老圆，“你派人到东北去打黄羊，用黄羊肉来腐蚀群众，大搞物质刺激，对抗政治挂帅，这不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

我明白，他们所指的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事。当时由于食物缺乏，外交部干部职工中因营养不良而发生浮

肿乃至生病的很多,已经影响到外交工作的开展。为了大家的健康,我根据部党委的指示,组织了一些同志到东北去打猎,将猎获的黄羊运回北京,分给全体干部职工,以改善生活。可是,造反派颠倒黑白,把这样一件关心群众的好事,说成是“腐蚀群众”,还无限上纲,给我扣上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我就理直气壮地反驳:

“在当时食品供应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组织打黄羊是为了帮助国家克服经济困难,保证我部广大干部群众的健康,使大家能够坚持工作,这怎么谈得上‘物质刺激’呢?而且,关心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群众观点是毛主席提倡的四个基本观点之一,这本身就是马列主义的政治观点,怎么能把它说成是‘对抗政治挂帅’和‘搞修正主义’呢!而你们把按照毛主席提倡的群众观点办事,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造反派被驳问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又转换话题:“你们部领导分到的黄羊肉,肯定比群众分到的要多,你先交代:你自己多吃多占了多少斤黄羊肉!”

我一听,罪名已从“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下降到“多吃多占”,下降的幅度如此之大,不禁令我哑然失笑。于是,便微笑着答道:“领导和群众一视同仁,每人一份。当然,家不在北京的同志,他的一份就放到食堂。至于我自己嘛,连一斤也没有要,因为我家全都不爱吃羊肉,更别说黄羊肉了!”

造反派这回从我身上又没有捞到什么。但是,他们整

我的“材料”却层出不穷。过了几天，他们又向我提出了新问题，要我交代：

“耿飏，你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往人民解放军里钻？快交代！”

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定了定神答道：“我本来就是从解放军调到外交部来的，毛主席还说过，我们第一批大使都可保留军籍，怎么能说‘削尖脑袋往人民解放军里钻’呢？再说我从没有提出要求调回部队中去，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造反派冷笑一声：“你没有提出过，那么叶剑英怎么会向外交部提出要调你到军队呢？肯定是你自己去要求的！”

“什么？叶帅向外交部提出要调我？”我更茫然了，“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不知道！你休想蒙混过关，还是老实交代吧！”造反派抓住这根稻草不放。

我确实不知道此事，因此也无法“交代”。造反派就叫我去写书面交代。

为了弄清这件事的真相，我特地向老同志们打听，几经查询，才得知此事原委。原来，“文革”前有一次中央开会，会中叶剑英同志写了个字条递给参加会议的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同志。字条上写道：军委考虑将耿飏调任国防部副部长，请炳南同志征询外交部党委的意见。后来，外交部党委没有同意，此事就作罢。由于那时我正在缅甸任大使，陈毅同志访缅时也没有提起此事，因此我对这件

事一无所知。想不到现在却被造反派用来做打击我的炮弹。

造反派还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多次叫我交代历史上的“问题”。我说：“我的历史一清二楚，早年在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当童工，参加过罢工斗争，入了团；后来当游击队长，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参加红军，以后一直没有离开过部队，直到1950年调到外交部。”

“你在红军时被俘过几次？”造反派问。

我答道：“我在战斗中曾多次受伤，但从来没有被俘过。”

“你有没有离开过部队？”造反派又问。

我回答得很干脆：“没有。”

造反派问这两个问题，目的在于：如果我被俘过，就可戴上“叛徒”的帽子；如果我私自离开过部队，就可加上“逃兵”的罪名。现在见这两个问题上捞不到什么，又转向水口山。

“你在湖南水口山时，有严重问题，必须老实交代！”

面对他们的讹诈，我愤然答道：“我在水口山时还是个童工，有什么‘严重问题’？我和其他童工一起参加罢工斗争，这难道是‘严重问题’吗？”

造反派见我口气强硬，无言以对，就派人到水口山去“调查”我的“历史问题”。不知他们在“调查”时向水口山工人们说了些什么，结果引起了工人們的忧虑——担心我在北京遭受政治迫害。因此，矿上派出了四名工人代表，到北京来找我。当他们看见我没有被抓起来，才放下

心来。他们提出要留下来保护我。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劝他们回去搞生产。我说:“有毛主席、周总理在,造反派奈何不了我。”

每次挨批斗或审问后,我的心情总是格外沉重。这不仅是由于自己受了冤屈,更是因为想到了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以及极“左”思潮的泛滥,正使我们的党和国家陷进一个不测的深渊。因此,回到家中,不免长吁短叹。这时,赵兰香就来劝慰我。其实,她的心情也并不轻松,因为每次批斗大使,大使夫人都要站在旁边陪斗。所以,我也反过来安慰她。我们相濡以沫,互相鼓励,共同度过了“文革”中这段乌云翻滚的艰难岁月。

在互相安慰、鼓励时,我们不免回忆起在革命年代共同战斗和工作,以及建国后同赴国外任职的种种情景。

抗战初期,我率领八路军三八五旅驻守甘肃庆阳。当时,赵兰香正在庆阳县革命政府领导的县立女子小学当教员,同时还参加抗日宣传工作。革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由相识而相爱。结婚后她一方面要操持家务,一方面仍然积极参加革命工作。

1944年春,组织上派她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那时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由于处在战争环境,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所以当时物资缺乏,生活十分艰苦。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整个边区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我和赵兰香也积极投入这个“大生产运动”。我们俩在中央党校宿舍门前开垦了一块菜地,利用休息时间和节假日浇水施肥,种出的白菜每棵有20多

斤,收获后交给食堂。我们互教互学,一道纺棉花、织袜子。她纺得比我快,一个星期天就能纺四两多线。我们还常常互相商讨,共同克服学习中和生活中的困难。

后来,她回到庆阳,在西华池镇做医务工作和宣传工作,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前夕,她把孩子们留在庆阳父母家中,自己和几位同志一道从延安向晋察冀解放区进发。那时我正在晋察冀军区任副参谋长。她们是骑马来晋察冀的,沿途要经过敌人占领区。由于日寇盘查得紧,所以她们晚上行军,白天住在老乡家里。当晚上通过日寇封锁线时,常常得到当地老乡、民兵和游击队的帮助。在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地区,她们也小心翼翼,不敢大意,到处都依靠秘密交通员的护送。

克服了千难万险,她们终于平安抵达晋察冀。这时我正准备赴前线组织指挥打击日伪军、收复张家口的战役。赵兰香马不停蹄随军向张家口进发。不久,张家口被我军收复,晋察冀军区机关迁到张家口,她被分配在军区联络处工作。从此,她再也没有和我分离。解放战争中,她先后在军区直属队和十九兵团直属单位,随部队转战华北和西北各个战场,从事后方工作。

建国后,她随我一起调到外交部,先后在我国驻瑞典、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大使馆任职,并作为大使夫人参加了许多外事活动。在驻瑞典使馆时,她为了外交活动的需要,积极学习英文。我们在休息时间内,常常互相纠正英语发音,互教互学。

总之，我们在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中共同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我们又互相扶携着行走在“文革”的暴风雨中。

“策划人就是我！”

造反派在政治上压服不了我，就在生活上整我。在这方面，有两件事比较突出：

一件是不让我治病。由于长期受折磨，我的身体状况日益衰弱，终于病倒。经医生诊断为患急性肝炎和肺结核，必须立刻住院治疗。但是，造反派不顾事实，硬说我是为了逃避审查而假装生病，是对抗“文化大革命”。我拿出医院的证明给他们看。他们仍旧不准我去住院，还派人去医院调查，企图收集我“弄虚作假”的证据，以便“罪上加罪”。但是，广大革命群众（包括有些虽然迫于形势而身不由己地参加了造反组织，但思想上和极“左”派存在距离的同志）看不惯造反派这种做法，纷纷向周总理反映此事。总理得知后便批示外交部，必须立即让耿飏到301医院住院治疗。造反派无奈，只得勉强放我。但是我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尚未痊愈，就又被迫回来，继续接受批斗审查。

另一件事是将我连家带口扫地出门。“文革”前我家住在东交民巷的外交部宿舍。我和姬鹏飞、曾涌泉、罗贵波四个副部级干部住在一个院内。“文革”初期，造反派就在住房问题上整我们，给我们戴上了“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接着，他们又进一步勒令我们限期搬家。我

被指定搬到黄镇同志的家中。造反派命黄镇一家挤住楼下,将楼上给我住。当时我家连老带小共有八九口人,显然住不下。黄镇同志家中人口也不少,住得也很挤。没有办法,我就叫已成家的孩子搬出去,让他们自己去想法借房住。又把小女儿送到山东济南,委托我的老战友、当时的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给她找了个工作——在一家工厂当钳工。这样经过疏散人口,才算解决了居住问题。

造反派在住房问题上整我们,他们为这样的“杰作”而自鸣得意;可是对我们来说,却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因为,在“文革”中造反派可以部内部外到处串联,而我们这些挨整的对象却要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相互之间连话也不准说一句,如被发现相互交谈,轻则被戴上“搞黑串联”的帽子,重则给加上“阴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所以,住在东交民巷时,我和姬、曾、罗等几位老战友,见面时只能彼此点头示意,不能交谈。而搬到黄镇家中后,我们楼上楼下,近在咫尺,而且造反派也无法入室监视,这样就给我们创造了畅谈的条件。

我和黄镇同志在交谈中都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不满和忧虑,特别对“王八七讲话”及其在外交部内外造成的恶劣影响表示忧愤。那个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是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于1967年8月7日对外交部造反派头头的一次讲话。在这个讲话中,王力一方面声嘶力竭地攻击外交部领导执行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污蔑外交部是“卖国部”,叫嚣要打倒陈毅;另一方面竭力煽动

造反派进一步夺取外交大权。他别有用心地说：“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个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在这段话里，王力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因为，周总理曾再三强调：外交大权属于中央，造反派、红卫兵不能夺取外交权。周总理还指出：造反派、红卫兵要打倒陈毅，这个方向、路线不对。现在，王力所说“你这个外交就这么难？”“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其中的“你”和“有人”，显然指的是周总理。也就是说，王力是在煽动造反派、红卫兵反对总理。

王力还煽动说：“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指老、中、青三结合）？”“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有人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

“王八七讲话”这棵大毒草毒汁四溅，使得本来就弥漫着极“左”思潮毒雾的外交部更加毒气熏天。造反派连

连组织批斗陈毅的批判会。在批斗会会场上，造反派公然违反周总理指示，挂出了“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有一次，外交部造反派的头头率领一伙人冲击人民大会堂，企图抓揪陈毅，周总理好言劝阻，他们就是不听，总理又着急又生气，便厉声对造反派头头说：“你们要揪斗陈毅，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在批斗陈毅的同时，造反派遵照江青一伙的指点，又是查封外交部党委，又是封闭部领导办公室，又是夺取外交业务监督权，忙得不亦乐乎。那几个造反派头头，有的自任代理“外交部长”，有的任“副部长”，大权在握，好不威风！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几天之内，有数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署名签发的电报，发往世界各国的我国驻外机构。这些自命为外交部新领导的造反派头头，公然和周总理的指示唱反调，在电报中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要我各驻外机构贯彻执行。

接着，外交部造反派伙同其他外事部门的造反派及一部分首都高校的红卫兵，在为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的反华言行而举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竟制造了一起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十分重视。后来，毛主席在提到这些事件时曾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

在反革命手里。”他还指出,那些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人是极“左”派,也就是那些夺取一个半月外交大权的反革命。周总理后来对外宾谈到:“运动发展到(1967年)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一个是要冲缅甸驻华使馆,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两件事都有坏人,他们想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

毛主席和周总理以这些事件为契机,果断地将煽动者王力和造反派头头中的主要肇事者进行隔离审查,并将被夺的外交大权重新收回中央掌握。但是,在江青一伙人的煽动、纵容、支持下,极“左”思潮继续泛滥。我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受到造反派的干扰和抵制;“打倒陈毅”的口号并未销声匿迹;更令人气愤的是社会上还不断出现“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口号……所以,我和黄镇同志在谈到这些时,仍然忧心忡忡。

有一次,我对黄镇说:“我们是不是写份大字报,对外交部的这些问题和那个‘王八七讲话’,表明我们的看法?”

他欣然同意:“好啊,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起草后,给其他大使们传阅,赞成的可以签名。听说有些司局长也准备写大字报,我们可否和他们合写?”

我考虑了一下说：“还是分开写比较好，我们先写先贴，他们再写再贴，先后呼应配合，显得更有声势。也免得造反派说是我们指使司局长干的。”

“好！”他点点头，“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起草吧！”

“你是秀才，你执笔。”我提议。

他说：“你是老参谋长，足智多谋，点子多，咱们还是一起写吧！”

于是，我们两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写起来。写好后，在大使们中间传阅，同意的签名。传阅过程中，仲曦东等同志又作了修改、补充。最后，当这份大字报贴出时，上面签名的共有 26 人，按签名顺序为：耿飏、黄镇、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赵行志、杨琪良、章文晋、张世杰、何英、姚念、柴泽民、熊向晖、韩克华、岳欣、俞沛文、陈志方、周秋野、杨守正、陈坦、陈叔亮、朱其文、姚仲明、王雨田、张海峰。

后来，有许多大使表示，他们当时没有见到大字报底稿，不然也会同意签名。

大字报的主要观点是：反对“打倒陈毅”，反对把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污蔑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把我国 17 年来成就辉煌的外交工作说成漆黑一团，谴责在外交部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指出“王八七”的阴魂未散，还在干扰着外交工作，特别严辞指出：现在有一股反中央、反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一再侵袭我部；“而王力‘八·七’讲话这株大毒草出笼以后，我部竟发生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大量核心机密失窃，对革命群众和

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使我部运动和外交工作一度脱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给七亿中国人民丢了脸。”

当然,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份大字报,在词语上也有缺点。例如,对于当时赞成“打倒陈毅”的几位部领导同志和大使同志,我们的用词比较激烈、尖锐。但是,撇开这点来看,大字报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无疑是正确的。

这份大字报贴出后,得到了外交部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不久,91位司局级干部也联名贴出一份大字报,和我们的万字报相呼应。这样,声势和影响更大了,一股正气冲破极“左”思潮的浓雾,在外交部内迅速升起。

造反派一看情势不妙,急忙将此事上告中央文革。这时,那个自封为“文革”旗手的江青,正在为失去了她的三个得力打手“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悲伤,并为外交部夺权失败而懊恼;但是,她不甘心就此罢手,还在处心积虑地企图重整旗鼓,重新在外交部制造事端,以便直接插手外交领域。现在,她得到外交部造反派的报告后,心想机会来了,要抓住这件事好好做文章。她和狗头军师们经过一番密商,终于想出了一个毒招——把外交部出现的大好形势污蔑为“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

所谓“二月逆流”,这本身也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对几位老师 and 老同志的污蔑。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师和李先念、李富春、谭震

林等老同志在怀仁堂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争辩起来。这些老革命家痛斥林彪、江青一伙在“文革”中施展阴谋诡计，陷害革命干部，打击革命群众，散布极“左”思想，煽动造反派胡作非为……江青等人恼羞成怒，便派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主席告老师和老同志们的状。他们歪曲事实，制造谎言，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致使毛主席误听谗言，错怪了这些对党忠贞不二的老革命家。林彪、江青一伙借机给这些老革命家扣上了“二月逆流”的帽子。

现在，江青一伙人又把本身就是污蔑之辞的所谓“二月逆流”，和我们的大字报联系在一起，实在可笑！不过，反过来一想，他们这样联系，也有他们的道理。因为，凭着江青一伙人的反革命嗅觉，倒也确实发现了我们的大字报和这些老师、老同志们的发言之间，有个共同点：都坚决反对极“左”思潮，反对他们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他们便指使外交部造反派加紧批斗我们。

一时间，我和黄镇成了造反派批斗的主要对象。在大会批斗我们时，造反派摇晃着拳头恶狠狠地叫嚷“打倒耿、黄反党集团”、“打倒耿、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耿黄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这真是混淆黑白，倒打一耙！明明我们是在保卫党，保卫革命，却被他们加上了“反党”、“反革命”的头衔，而大使们一起写大字报则变成了“反党集团”，我和黄镇起草大字报竟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头！尤为可笑可气的是，他们还给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大使们也加上了各种头衔而进行批斗，如在我和黄镇之后

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四位大使，就被扣上了“耿黄集团”中的“四大金刚”这个不伦不类的头衔。

在小会围攻我们时，造反派又使出了他们逼供的拿手好戏。他们追问黄镇：“你们这张保陈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谁是幕后策划者？”

黄镇同志坚定地回答：“就是我和老耿两个人一起商量着写的，其他的大使们同意者签名，没有什么幕后策划者！”

造反派在黄镇面前碰了个硬钉子后，又转而逼问我：“幕后策划人是谁？你老实交代！”

我心里很清楚，他们的目标是周总理。因为，在贴出大字报之前，周总理曾和陈毅同志一道接见我们这些大使。现在我见造反派别有用心地如此逼问，暗自思忖：待我来给你们碰个软中带硬的钉子。于是，我扫了他们一眼，缓缓答道：

“策划人倒是有，但是不在幕后。”

“在哪里？是谁？”造反派面露喜色，大概他们以为这下可捞到重要材料，可以向中央文革邀功了。

我用手指了指自己，不慌不忙地说：“策划人就是我！”

造反派气得暴跳如雷，又叫喊起“耿飏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来。接着，便加强了对我的“专政”——除了七批八斗，勒令写检查、交代材料外，还加强了体力劳动的强度。

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

1968年下半年,在毛主席亲自过问和周总理再三督促下,我和黄镇同志得以从“牛棚”解放出来。据有的同志告诉我,毛主席在得知我们因写大字报而被打成“耿黄反党集团”后表示: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有错,而且反得对,反得好。什么“反党集团”,又是什么“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简直是乱扣帽子。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在加紧筹办。有一天,我忽然得到通知,作为外交部的党员代表去参加九大。当时我大感意外,后来才得知此事还有个反复的过程。原来,外交部的广大党员鉴于我以往及在“文革”中的表现,认为我忠于党的事业,坚持党的路线政策,因此推选我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但是,造反派秉承江青一伙人的意志,企图将我的名字从代表名单中划掉。党员们得知后纷纷向周总理反映此事。这时,负责筹办九大的周总理,不仅根据外交部广大党员的意見,将我列入九大代表名单,而且经请示毛主席后,将我和黄镇同志都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接着,我们这两个被江青一伙人定为“耿黄反党集团”的头头,均在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样一来,江青一伙人及造反派的阴谋诡计便被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巨掌粉碎了。

5月6日晚上,也就是九大闭幕后的第12天,周总理专门找我谈话。他说:“中央决定派你出任驻阿尔巴尼

亚大使,过几天还要派黄镇去法国复任大使。派中央委员去任大使,表明我国对发展中阿、中法关系的重视。”

接着,总理指示我:“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很好,阿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希望你尽快赴任,最好在10日就去。”

我请总理对驻阿尔巴尼亚使馆的工作方针作指示。他说:“中央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是:加强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加强中阿两国的团结合作,对整个外交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

我懂得周总理上述指示的涵义。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阿尔巴尼亚一直支持我国。毛主席称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因此,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有益于反帝、反修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斗争。

我遵照总理的指示,立即回部做赴任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准备行装。但因来不及办理签证手续和购买机票而推迟了行期,于5月16日抵达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政务参赞林中同志等和我同机抵阿。阿副外长马利列到机场迎接。在我当副外长期间,马利列曾任阿驻华大使。1968年冬,我和他还曾同去重庆处理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事件,所以彼此熟识。马利列对我当然非常热情。加之我是中共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阿方对此很敏感,认为这表明我国对阿的重视,因此对我破格接待。

我抵阿的第二天上午,阿方就安排我拜会议会主席列希,并呈递国书;下午,拜会阿总理谢胡。22日,阿外长

纳赛陪同我专程去发罗拉,会见正在海滨休养的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短短几天中,霍查和阿其他领导人巴卢库、凯莱齐、纳赛等都先后设宴款待我。他们讲话的调子甚高,对我国一片赞扬。我遵照中央方针,积极开展友好工作,推动两国团结合作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渐渐地,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是,后来我进一步察觉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我们中央的观点之间,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致,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分歧。例如,他们不赞成我国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和美国接触、谈判。当然,这种分歧当时尚未表面化;但在若干年后,当我国政府对中美苏关系进行战略策略调整时,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阿间的这些分歧便日益明显,从而导致两国关系的疏远与倒退。

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

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

援阿的化肥厂,年产 20 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 400 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先念同志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几乎谈了六个小时,所谈内容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有自己的“鞍钢”,还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还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先念同志当即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我通过对阿某些地区的实地调查了解到:阿在经济建设方面,贪大求全,战线拉得太长,非生产项目搞得太多。1969年,阿非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就占国家总投资的 24%,因而造成劳动力严重缺乏。根据阿方自己的计算,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仅按 1968 年 11 月 20 日中阿签订的协定,我国援阿新项目的建筑和投产就需要增加 4.6 万名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约等于阿当时产业工人的 38.3%。阿还存在一种不适当地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阿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

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所以我当时就感到这种倾向很值得注意。

由于阿方领导人存在上述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他们向我国提出了不少极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倒过来赚我们的钱。记得有一次阿副总理查尔查尼向我提出,要我们帮助更换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我国援建的,本应使用我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要我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我们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我们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我当即拒绝了他的这个不合理要求。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

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因此我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是又存在顾虑。因为，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其后果难以预料。万一给江青一伙人和造反派扣上几顶“反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帽子，岂不要重进“牛棚”。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终于驱使我撇开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提起笔来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提出，我国对阿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因此，我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

乔冠华看信后，对我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我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我的信转报中央。后来我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他对我说：“耿飏，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周总理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起我写信的事。他告

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说:“耿飏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也许正是由于毛主席说了这句话,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这件事整我。

当我任驻阿大使一年多时,由于一次意外事故,使我不得不提前离阿回国。这个意外事故发生使馆大扫除的时候,当时我正搭着椅子爬到高处擦窗子。过去在战争中我身上曾多次负伤,包括严重的腿伤,时常隐隐作痛,妨碍着在高空活动;加之年纪大了,腿脚更不灵活,因此擦窗时一不留神从高处摔了下来。我躺在地上觉得左腿一阵剧痛,想翻身站起,却怎么也站不起来。办公室内没有别人,我只得忍着疼痛爬到桌子旁打电话。经过医生检查,发现左腿骨已断裂。鉴于驻在国的医疗条件较差,外交部命我回国治疗。我回到上海住院医治。医生在我腿内打上不锈钢钉,接好了断骨。回到北京后,我本来还想回阿尔巴尼亚去。但是,周总理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任命我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一职由政务参赞林中同志接任。于是,我便提前结束了驻阿大使的任期。

调任中联部长

1971年1月初,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中南海西花厅),告诉我中央已决定任命我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并和我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谈毕,总理看了看表说:“三年来我从未与人谈过这么长的时间。”我笑着说:“我感到很荣幸。但是,耽误了您这么多的宝贵时

间,又感到不安。”总理幽默地说:“你竟把外交辞令用到我这里来了!”在谈话中,他首先讲述了中央作出这个任命的经过:

还在九大以前,主管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就向周总理提出,希望从外交部已“解放”的副外长级干部中,遴选一位到中联部任部长,最好是中央委员,并和外国共产党有过交往。九大刚闭幕,康生又找周总理说:“看了外交部干部名单,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只有耿飏,因此希望任命他为中联部长。”周总理答道:“毛主席已决定派耿飏到阿尔巴尼亚去任大使,中联部长另找别人吧!”现在,事隔一年半有余,中联部长仍然空缺。正好我回到北京,周总理便报请毛主席同意,决定任命我为中联部长。

接着,周总理谈了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共运现状以及我们与苏共的关系问题,并介绍了中联部的有关情况。

我向总理请示:到中联部后应该怎样开展工作。总理在重申了中央关于外事工作的方针和原则后,又对中联部的工作方针作了指示。然后他叮嘱我:今后关于中联部的具体工作,可以多向康生请示。

听了总理的这个嘱咐,我心中有些踌躇,故而默然无语。因为我知道康生和江青等人关系密切,他作为中央文革顾问,伙同江青等搞了许多阴谋诡计,整了不少老同志;即使如我和黄镇等同志被加上“二月逆流新反扑”的罪名这件事,免不了也有康生的份;而且,把我国外交路线污蔑为“三降一灭”,正是康生首先提出的。

周总理用他那善于洞察对方内心世界的、炯炯有神

的目光注视着我。显然，他从我的神情中已经看出了我的疑虑，便对我解释：“在中央常委中，由康生分工领导中联部。毛主席要康生管中联部，是有原因的。因为，康生曾和王明一起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回到延安后，他向毛主席揭发了王明的问题，特别是王明所写的《使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那篇文章，毛主席原来并未看过，听了康生说该文观点极‘左’，才拿来阅读，果然发现不少问题。因此，毛主席很信任康生。‘文革’前，中央指定刘少奇负责国际共运问题并指导中联部的工作，由康生协助；现在则由康生负责。毛主席虽然也要我负主要责任，但是由于我工作太多，忙不过来，实际上都由康生来管。所以，你遇事当然要向他请示。此其一。

“其二，你在和康生接触中，也可以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和他们（指江青一伙人）逐渐疏远起来。同时，还可通过康生来防止他们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关于后一点，周总理和我谈过不止一次。后来，当林彪自我爆炸后，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一手遮天，更加猖獗，而康生因在家养病而遭到冷落，此时，周总理曾再次嘱咐我多与康生接触，争取使他不再与江青等人沆瀣一气，至少也要与他们半脱钩。

听了周总理这番指示，我便遵照行事。到中联部的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康生的秘书李鑫，询问康生何时能接见我。康生说，明天上午来。次日上午，我和申健等同志一起去见康生。

一见康生，我便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说：“虽然周总理代表中央当面任命我为中联部长，但是，中联部的群众并不知道；因此希望中央能发一个书面任命，以便向群众公布。不然，我去上任，群众会感到莫名其妙。”康生点头说：“你这个意见对！过几天请纪登奎同志到中联部去，在群众大会上传达调令。”当时中央组织部也归康生领导，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协助他管组织工作，而中组部长早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倒，现由军代表郭玉峰代行部长职务，如派郭玉峰去中联部宣布中央对我的任命显然不太合适，所以康生决定由纪登奎去宣布。

接着，康生谈了中联部成立的经过。他说，中联部的成立，与一份文件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问：“这份文件现在中央吗？”

他答道：“不，就在我家中的保险柜里。”于是，他就叫曹轶欧取来了这份文件，一面念，一面讲解。

我边听边想：这么重要的文件（是原件孤本，并未印发），为什么不由中央档案部门或有关部门保管而存放在康生家中呢？正是这个想法，促使我回部后对中联部的文件分发、保管工作和保密制度进行了检查和改进。

康生还联系这份文件，讲了刘少奇同志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一文的发表经过。他说，“这篇文章是应斯大林的要求写的。当时斯大林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袖亲自署名发表阐述类似内容的文章。我们的文章写好后，毛主席不肯签名，经中央研究，由刘少奇签名发表。”

我是个直脾气，有话憋不住，听他这么说，便问道：

“既然这篇文章是我党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写的，刘少奇只是签了个名，那为什么现在把它作为刘少奇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证’呢？”

康生不提防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愣了片刻，一时答不上来；过了一会，他缓过神来，才答非所问地说：“这个……刘少奇的问题主要不是这个，”紧接着他赶快把话题又转到中联部，“你对中联部的工作有什么问题？”

“有！”我说，“当务之急是个干部问题。我刚到中联部就发现，全部各个部门和单位，都有许多工作没有人去做，特别是调研和资料工作长期陷于停顿，甚至连接待外宾也缺乏人手。偌大一个部，包括各个业务组（当时各业务局都叫大组）、行政部门和接待部门在内，一共才一百来号人，这样怎么开展工作呢？来个代表团，光翻译就要好几名，可是现在大部分翻译都在五七干校！”

康生点点头：“这是个问题。当时中央各个部门的干部都到五七干校，所以我召集中联部、中组部、中央党校、工青妇等团体的干部开了个动员大会，要求大家到五七干校去。现在看起来，像中联部这样的外事部门，下放1000多人是多了些。这样吧，你可以按照工作需要，调一些人回来。不过，只能陆续调回。是不是先调些外语干部和接待干部……”

“调研干部也很需要。”我补充。

康生说：“那么，搞调研的也可以适当调一些回来。这件事就这样吧，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还有一个也是干部问题——是领导干部的问

题。中联部现在不仅没有副部长，连副秘书长中也只有申健同志一个人在工作。原来的秘书长张香山同志和副秘书长唐明照同志，至今仍在受审查、靠边站。他们究竟有什么问题？能不能把他们解放出来，参加部领导班子？”

康生想了想，不紧不慢地答道：“主要是有的群众组织对他们两人的意见比较大。尤其是张香山，人家说他写过反对毛主席的文章，嗯，不过我看问题也不太严重。我现在身体不好，没有精力管这些事，这个事情就请你去解决吧！”

我回部后，首先开会布置从五七干校调回干部的工作。我在会上说：“把大多数干部下放，使各项工作陷于停顿，伤了中联部的元气。”有的造反派竟抓住我这句话大做文章，指责我“反对康老”，因为下放干部是康生的命令。后来，我把此事告诉康生。康生说：“当时下放干部是大势所趋，是必要的；现在由于工作需要调干部回来，也是必要的。”他就用这样模棱两可的话，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了。

接着，我找军代表和对张香山、唐明照有意见的群众组织负责人谈话，询问张、唐的问题。一了解，原来都是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至于所谓张香山“反对毛主席”的那篇文章，是他以前所写，内容主要是反对个人崇拜，其中的论点并没有超出中共八大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更没有提到毛主席，所以，说他“反对毛主席”，显然是无限上纲、罗织罪名。于是，我说服了军代表和这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解放了张、唐两人，并让他们立即参加领导工作。后

来,唐明照被调到国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张香山则和申健一同提为副部长。再加上从别的单位调来我部任副部长的冯铨同志,中联部的领导班子初步得到了充实。

但是,有些造反派对我解放张香山之事有意见,在后来“批林批孔”时指责我,说我“包庇”张香山,还说我对两个群众组织一碗水没有端平,偏向了支持张香山的那个群众组织。其实,我刚来中联部,对两派谁也不认识,谈不上偏向哪一派;我只是希望和促进两派联合,共同搞好工作。至于解放张香山同志,我是为了落实干部政策,也为了加强部领导班子,根本扯不上“包庇”。当然,现在我在这里回忆此事,并不是要对那些指责我的同志表示不满。我认为,当时参加群众组织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其中有些同志受到极“左”思潮的毒害,因而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认识了这个问题,改了就好。所以,如今我们回忆往事,决非为了责备他们,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免今后重蹈覆辙。

后来,李先念副总理对我说:“中央各部门有一批老同志相继得到解放。‘文革’前的外办和对外文委现已撤消,有些老干部如李一氓、张致祥等同志,原拟安排到外交部,姬鹏飞已同意,但造反派不答允,因此想改为安排到中联部,行不行?”

我说:“行! 非常欢迎。”

先念同志高兴地说:“耿飚你倒很爽快,但是你们那里的造反派会不会反对?”

我答道:“中联部正需要领导干部,这些老干部有丰

富的外事工作经验,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您把这笔财富给我们,我当然答允得很爽快。至于造反派嘛,我不被他们所控制。”

这样,李一氓和张致祥两位老同志便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同时,我们还解放和提拔了一批局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又从局级干部中选拔了区棠亮、吴学谦、乔石三位同志任副部长,进一步加强了部领导班子,并使部领导年轻化。干部问题解决了,各项工作便得以正常运转。

由于康生患病,经常卧床或在家休养,所以他常常叫曹轶欧代他听取一些部门关于运动和工作的汇报。我觉得这种做法不符合组织原则,因此,每逢我去汇报时,只与曹轶欧谈些无关紧要的事,凡是重要的事,一定要面告康生。有时康生实在不能谈话,我便直接向周总理请示。这样一来,我便得罪了曹轶欧。

还有几件事也使我得罪了她。

我在了解中联部上报文件的报送范围时发现:在报送名单中有两位中央委员与中联部的工作无关,其中就有曹轶欧。我认为应把这两位同志从报送名单中勾掉。有的同志提醒我:她们是中央委员,又是中央首长的夫人。我说:中央委员有很多,为什么单单给她们发文件呢?至于中央首长的夫人,如果她本人的职务与文件内容无关,光凭夫人的头衔,并不需要阅读这些文件。曹轶欧如果以康生办公室主任或秘书的身份,可以阅读,但她应该阅读报送给康生的文件,为什么还要给她另发一份呢?于是,

我提笔勾掉了她们的名字。不料这样一来竟引起了曹轶欧的不快,她责问中联部为何不给她发文件。为此我专门去找康生,向他讲明为何不给曹轶欧发文件的原因。康生听后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但他口头上还是说:“我已经有了,就不必再给她发了。她要看就看我的那份吧!”我还向周总理汇报此事,总理很赞成,对我说:“你这样做,既坚持原则,又符合保密规定,做得对!”

曹轶欧曾几次托人找我,企图推荐一个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头头到中联部来任副部长。我想:此人在中央党校呼风唤雨,把好端端的一个党校闹得天翻地覆,如果来任副部长,中联部岂不要遭殃;再说,他是曹轶欧的亲信,她把他安插到中联部来,其用意昭然若揭。因此,我一次次地拒绝了她的要求。

虽然得罪了曹轶欧,但她也奈何我不得。因为,她若要整我,必须通过康生,但是此时的康生已和“四人帮”产生了矛盾,加上重病缠身,所以无力顾及此事。相反,康生在我谈话中,曾多次提到他和张春桥的纠葛。有一次,他忿忿地说:“张春桥的野心很大,当了常委还不满足,还想往上爬。那个党章(指十大通过的党章)主要是我负责搞的,最后阶段我因有病才叫他接着搞,可是他在讲话中只字不提我,给人的印象是他负责搞的,真是‘贪天之功’,岂有此理!”显然,康、张之间的矛盾属于争权夺利的性质,但这些矛盾确实也增加了限制“四人帮”插手中联部的阻力。

70年代初期,我国的外交有了新的开拓,取得了新

的进展。自从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以后,我国在国际战略上和外交上就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之下。到60年代后期,在苏美争霸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同时,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也变为主要来自北面。毛主席和周总理审时度势,根据这种国际新形势,决定采取新的外交举措,以改变我国两面受敌的情况,进而创造出一个外交新局面。

1969年夏,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师研究国际形势,提出战略建议。这四位老师自从被林彪、江青一伙人强加以“二月逆流”的莫须有罪名以来,长期挨整,不是作检讨、受批判,就是下放“蹲点”,还被赶出北京、流放外地。但他们虽然身处逆境,仍然时刻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现在接到这个任务后,他们便成立了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由陈毅同志主持,每个星期在中南海紫光阁开一次座谈会,讨论世界局势的发展,研究苏美力量的消长及其关系的变化。经过多次认真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他们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这篇具有深远战略眼光的研究报告,还就苏军入侵我国珍宝岛事件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这篇具有独到见解和精辟论点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老师们提出了有关我国国防建设和外交政策的意见,特别是提出了缓和中美关系、建立外交新格局的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与毛主席、周总理的看法高度一致,从而对中央确定新的国际战略和打开外交新局面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会见美国记者兼作家斯诺时提出:我们欢迎美国人到中国来访问,“左、中、右都让来。”这实际上是向美国发出了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

1971年3月,经过毛主席批准,我国派出了国家乒乓球队赴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比赛结束后,我国邀请了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尼日利亚等国的乒乓球代表团来华访问。周总理分别接见了各国的乒乓球代表团。在4月14日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及美国记者时,周总理对客人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罗德里克先生,你打开门了。”

约翰·罗德里克当时是美联社驻东京记者,他立即答道:“谢谢你,总理先生。我首先感谢你邀请美国记者访华。美国记者访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中断,终于实现了。同时我赞成你刚才的说法,我们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如果我们两国间有更好的谅解,这新的一页将更加美好。”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说:“我们也希望中国朋友能到美国去访问。”

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杰克·霍华德提出:“我希望中国

乒乓球队能够在最近的将来访问美国,以便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报答你们的好客精神并在美国进行友谊比赛。”

周总理笑着说:“你的希望是好的。这个问题要决定于你们的团长。他是有权威的,所以还是保留给团长回答。”接着他询问斯廷霍文是否同意霍华德的意见。

斯廷霍文答道:“同意。”

不久,在美国乒协的努力下和美国对华友好人士的帮助下,我国乒乓球代表团也破天荒地实现了对美国的访问,并受到美国政府领导人的接见。这样,中美两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互访,不仅打开了两国人民往来的大门,而且也在两国上层人士中起着沟通的作用。这就是后来被国际新闻界誉为“乒乓外交”的由来。

1971年7月,在巴基斯坦政界和外交界人士的联系和帮助下,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他的助手洛德(后任美国驻华大使)、霍尔德里奇等人,在我国外交部章文晋司长和王海容副司长的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专机秘密来我国访问。周总理亲自到基辛格下榻处与他会见,这标志着中美政府高级人士直接交往的开始。

后来,基辛格在其所写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绘和周总理的这次会见:“7月9日下午4时,周恩来来到(宾馆),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微笑着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到脑后的第一步。”

在这段回忆中,基辛格之所以强调同周恩来的握手,

有其历史原因。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以反共反华闻名于世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下令禁止美国代表团成员同中国代表进行会外接触,尤其不许和中国代表握手。数日后,杜勒斯回国。代替杜勒斯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副国务卿史密斯,对新中国的态度不像他的上司那么傲慢僵硬,但是他不敢突破杜勒斯的禁令。有一次会议休息时,史密斯站在休息厅的咖啡柜台前,左手夹着雪茄,忽然看见周恩来正向自己走来,急忙用空着的右手端起一杯咖啡,这样两手都拿着东西,就可避免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见此情形,丝毫不动声色,一面从容自然地把伸出了一半的手缩了回来,一面微笑着同史密斯打招呼,充分显示出位大国总理和杰出外交家的度量与气魄。相比之下,杜勒斯的目光短浅和心胸狭窄,通过这个禁令而暴露无遗。

杜勒斯这个“不准握手”的禁令,不仅成为外交丑闻而貽笑天下,而且作为美国反华政策的象征,竟使中美两国间的正常交往中断了20年。所以,现在基辛格之重视和周恩来握手,不仅可以借此把早已成为国际笑柄的杜勒斯禁令丢进历史的垃圾桶,而且正如他所说,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出了第一步。

从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过程中,我再次体会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在50年代中期要我努力打开巴基斯坦这个“西门”的指示,确实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美国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所跨出的第一步,是即将到来的第二步的前奏。这第二步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

华。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来到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事与中方商量,进行具体安排。就在这时,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将国民党集团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决议。接着,我国派出由乔冠华副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出席了第26届联大。从此,结束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被长期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荒唐历史,使得联合国的工作和中国外交一道展开了新的篇章。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基辛格和国务卿罗杰斯的陪同下来华访问。也许同样是由于杜勒斯禁令的前车之鉴,尼克松也很重视和中国领导人的握手问题。当他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后,他吩咐所有随行人员都留在飞机上,以便让他自己先下飞机舷梯和前来欢迎的中国领导人握手。这样,就可使电视镜头中不出现其他美国领导人,以免分散电视观众的注意力,而突出他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

后来,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此事时写道:“我走完梯级(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时决心伸出我的手,向他(周恩来)走去。当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时,向他伸出了宽大有力的手。他们的握手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并为数年后中美建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尼克松访华及中美关系的改善,促进了其他国家对华关系的发展。1972年9月,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率团访华,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热情接见。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经过多次会谈,就中日建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此后,和我国建交的国家日益增多,其中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邻国先后于1974年、1975年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显示我国一贯坚持的睦邻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果。

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中美关系缓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我国建交,这些重大事件,使我国的外交出现了新格局,开创了新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联部的工作应该怎样开展呢?——我久久思考这个问题。

中联部是中共中央的对外联络部门。以前,它的联络对象是苏共、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自从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及国际反修运动开展以来,我党和各国老党即原有的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与少数几个国家的党仍保持交往外,由于许多老党追随苏共攻击我党,因此我们基本上停止了同它们的交往。于是,中联部的联络对象随之改变,从老党转向新党(即在国际反修运动中新建立的各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可是,新党数量不多,有的新党群众基础比较薄弱,影响较小。我在部领导会议上曾多次提到这

个问题,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曾就此问题贴我的大字报,指责我“贬低”和“污蔑”马列党。其实,我说的完全是实话。与此同时,我反复思考着:怎样才能拓宽中联部对外联络工作的路子?

我想:是否可以同各国的社会党、社民党进行交往呢?是否可以同第三世界国家中主张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政党甚至执政党建立关系呢?

对于后者,当我在任驻缅甸大使时,就已有过这样的想法。中缅两国的国家关系很好,政府间的合作较为密切,领导人也频繁互访,但是我们党和缅甸执政党社会主义纲领党之间却没有交往。当时奈温将军既是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后改为国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统),又是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所以我想,如果中缅两个执政党之间也建立了关系,就可以和政府间的交往相一致,这样就可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我带着这个问题专门去向周总理请示。总理仔细听了我的陈述后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如与一些友好国家的执政党来往,就可以同政府间的交往一致起来。至于社会党,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和我党的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彼此交往和交流。不过在目前情况下,这些事还不能一下子铺开,可以先找少数国家的社会党和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接触……”

我明白周总理所说的“在目前情况下……”,是指“文革”中极“左”思潮严重,必然对此事形成阻力,所以不宜与外国社会党等普遍联系。遵照总理的指示,后来我们邀

请了少数国家的社会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来华访问。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中联部才将这项工作逐渐开展起来。

周总理还说：“我另外有个想法。我考虑把一些进行民间外交的部门如对外友协、外交学会等，以及群众团体的外事部门，都归中联部领导。这样，中联部管党的外事和民间外交，外交部管政府外交。不过，这要请示毛主席后才能最后决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周总理的这个打算未能完全实行。

得罪“四人帮”

虽然江青一伙难于直接插手中联部，但是他们还是想方设法要把其惯于攫取权力的黑手伸向这个重要的外事部门。于是，我和他们便产生了矛盾，我也因此得罪了他们。

我到中联部后得罪江青的第一件事与她摄影有关。大家知道江青喜欢摄影，也爱出风头。尽管她的摄影艺术并不高明，但凭着其特殊身份，她的摄影作品却经常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在林彪自我爆炸前夕，她以“李进”这个笔名在《人民画报》上发表了一张照片——林彪装模作样地在读毛主席著作。由于当时林彪的野心已经暴露，毛主席正在考虑妥善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因此江青在此时发表吹捧林彪的作品，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得寸进尺，竟企图在《人民画报》上开辟一个专栏，专门发表她的作品。她命

人把这个想法通知外文局,因为该局所属外文出版社是《人民画报》中、外文版的编辑出版单位。

当时外文局归中联部领导,中联部副部长冯铨同志兼任外文局局长。故而外文局将此事上报中联部。

我接到外文局的报告后,心中思忖:《人民画报》是党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而且译成多种外文向各国发行,对外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江青滥用其手中权力,竟要每期《人民画报》都留出一页,供她发表摄影作品(大都是习作),这并非单纯是为了满足其发表欲,更重要的是她想利用这个权威画刊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因此,我们决不能答允她的无理要求,决不能让党的宣传阵地变成她个人的“园地”,更不能变成她宣传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

江青得知外文局已将此事上报中联部,便派一位摄影记者来找我,希望我能同意她的要求。我对这位记者说:“这个要求,我很难同意。要《人民画报》专门留出一页给她发表作品,不就成了她个人的园地吗?这种做法,以前从未有过,我们也决不能开这个先例。”记者说:“她是特殊情况……”我答道:“虽然她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那也不能搞特殊。我们还是按照原则办事。”

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又命人给中联部送来几本书。我问工作人员:“是些什么书?其中有没有毛主席的著作?”他们说:“没有毛主席著作,都是江青自己的小册子和‘梁效’的评论集等。”我说:“那就不去管它,放在那里就行了!”

有的同志提醒我,对江青赠书要不要表个态?要不要组织群众学习书中的文章?我说:“不必表态,也不用道谢。至于学习,我们现在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这些书谁愿意读谁就可以拿去。”

隔了几天,我主持全部群众大会,宣读中央文件。忽然台下有人递上来一个折叠成方块的纸条,我打开一看,见其内容是指责我对江青赠书没有表示感谢,是对她不尊重,要求以中联部名义给江青写感谢信。我知道这是造反派所写,由于其内容和正在宣读的中央文件没有关系,所以先不答复。等宣读完中央文件后,我才对这张纸条表态。我说:“刚才有人递条子,指责我对江青赠书没有表示感谢。但向中联部送书的人多得很,哪能在大会上对每个人都表示感谢!”

后来,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我、姬鹏飞和黄镇(也可能是方毅,记不清了)三人奉命参加。散会后,江青硬是要我们三人留下来谈话。她对我们说:“以前我和你们联系不多,今后希望你们经常到我那里走动走动,经常通通气。”“我这里有許多关于路线斗争的材料和书籍,可以给你们送去;你们那里有关运动(指“文革”)和业务(指外事工作)的材料,也希望经常送给我……”

我们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大家心里都明白:江青企图通过拉拢我们来达到她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的——插手并控制中央的外交、外事部门。

此后,我们三人谁也没有到江青那里去。我每次到钓鱼台去开会或汇报工作,都要经过她住的那幢楼,但我一

次也没有进去。同时，中联部既没有向她报送有关运动和业务的材料，也没有向她索要关于路线斗争的资料。

除了以上几件事得罪江青外，在外事活动中我也常常得罪“四人帮”。当时中联部组织的外事活动，包括接待外宾和组团出访，常有“四人帮”参加。他们以中央领导人自居，对我指手划脚、找茬挑刺，这且不说；在同外宾谈话时，他们往往置正当的议题于不顾，而是竭力宣扬极“左”思潮和“文革”中的错误做法那一套。对此，我当然要提出意见，于是便和他们发生了矛盾。

最令我不能容忍的是，“四人帮”借参加外事活动之机来抬高自己，排斥别人，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例如：有一次，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我国，由中联部负责接待，外交部协助。由于周总理病重住院，因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副主席与外宾会谈并陪同赴外地访问。但是，王洪文硬是挤进来参加活动。在赴外地之前，我和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同志（当时她代表外交部协助中联部接待越南代表团）一道去向周总理请示。总理指示：在外地活动中要突出邓小平同志。总理预见到“四人帮”会利用赴外地的机会来排斥邓小平，故而有此指示。果然不出总理所料，在赴上海前夕，王洪文叫秘书通知中联部，提出要准备两架专机，由他自己陪同黎笋乘第一架专机先走，邓小平则乘第二架后面赶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王洪文的用心：使得在上海机场的欢迎场面中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从而突出王洪文自己，并贬低邓小平。我想，一定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行事，决不能让

王洪文的阴谋得逞。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王海容,和她就此事交换意见;我们一致决定,拒绝王洪文的无理要求。

第二天,当专机抵达上海机场时,我料定王洪文早已布置其党羽在迎宾活动中搞名堂,所以事先吩咐随行的中联部工作人员做好准备。果然,在机场的迎宾活动和后来的参观活动中,上海市革委会的那帮人使用各种手段企图排斥邓小平,突出王洪文。这时,中联部的翻译和工作人员尽量把邓小平同志和主要外宾拉在一起,不让王洪文插在他们中间,从而挫败了他的阴谋。王洪文见自己的企图落空,竟迁怒于我,一见到我便怒目而视。

“四人帮”在出访活动中也常有违反外事纪律和外交礼仪之事,对此我免不了要劝告他们几句,从而招致他们的不快。有一次,姚文元在访问阿尔巴尼亚时,竟闹出一个大笑话。那次访阿代表团,姚文元为团长,吴桂贤为副团长,我是团员。姚文元在访问中的洋相很多,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一次晚宴后,他乘车先回住处。吴桂贤从宴会厅出来,到存衣处取大衣,可是保管人员怎么也找不着她的大衣。阿方接待人员、保卫人员连同我驻阿使馆人员一起找寻,还是没有找到。阿方人员连连表示歉意,吴桂贤只得怏怏而回。第二天,代表团外出参观时,吴桂贤突然发现姚文元身上的大衣正是自己丢失的那件,不由得叫出声来。原来,昨晚宴会后,姚文元错穿了吴桂贤的大衣,因而闹出了外交活动中的大笑话。后来开会时,我指出要注意礼仪,别出洋相,实际上是批评姚文元。

得罪“四人帮”必然会招致他们的怀恨和报复。在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江青和参加者一一握手，但她来到我面前时，一抬头见是我，却瞪了我一眼，不和我握手，扭头就走。对此，我并不在乎。这时，在我旁边的李先念同志问我：“耿飏，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江青不和你握手，是什么原因？”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把江青要求在《人民画报》上开辟个人专栏以及她向中联部赠书后我没有致谢等事说了一遍。先念同志点点头，提醒我说：“哦，你的胆子确实不小。不过，对这个人（指江青）你还是要当心呐！”

有一次，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批邓”，没有通知我参加。我听说别的部长参加了，但既然不通知我，我正好乐得不去参加。不料，过了几天张春桥见到我，先是阴阳怪气地问我：“那天为什么不参加会议啊？”接着又恶声恶气地责问：“你对批邓究竟抱什么态度？”我也没有好气，就反问他：“你们不通知我，我能去参加吗？”张春桥见我竟敢反唇相讥，便用镜片后那双白多于黑的三角眼狠狠地瞪了我一下，那阴森的眼神中大有“你等着瞧！”的味道。

1974年1月24日，农历正月初二，“四人帮”在京召开军队系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第二天，他们又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一个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个“1·25大会”的召开，事先并未经过中央讨论，也未把开会的意图告知周总理，却在开会前临时通知总理参加，并要他主持大会。这不仅是对周

总理搞突然袭击,而且其中还包含着“四人帮”的险恶用心。原来,“四人帮”召开这次大会,是以“批林批孔”之名,行攻击老干部之实,其矛头最终指向周总理;因此,他们要总理主持大会,是想借总理之手来攻击总理所保护的老干部,并反对总理自己。此其险恶用心之一。要是这次大会出了纰漏,遭到毛主席批评,则他们可以把责任推到大会主持人周总理身上。此其险恶用心之二。由此可以看出“四人帮”的心肠是何其毒也。

在这个大会上,“四人帮”及其爪牙迟群等人通过发言或插话来影射攻击周总理,还点了叶帅、郭老和廖承志等一大批老干部的名。江青坐在主席台前排中间,频频插话,颐指气使,俨然是大会的实际操纵者。

会议中间,有人递了个条子给坐在主席台上的江青。她看后将条子转递给周总理。总理看后就说:中联部的×××同志要求发言,可以上台来讲。不料,此人一上台就点了我的名,说什么中联部的“批林批孔”搞得冷冷清清,指责我对群众运动有抵触情绪,进行消极抵制。江青一听,正中下怀,便也声色俱厉地对我指责起来。

“1·25大会”后,中联部的造反派贴出大量大字报对我进行“批判”、“声讨”和“揭发”,在北京街头和外地也出现了“打倒耿飏”的大标语。

过了一天,我到周总理的办公室,气愤地说:“现在不但‘批林批孔’,还提出‘批周公’、‘批宰相’、‘批现代大儒’,矛头所向不是很清楚吗?中联部不是没有‘批林批孔’,而是没有按照他们要求的那一套来批。再加上他们

对我有意见，所以就来攻击我……”

周总理问：“他们对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从外交部 26 个大使的大字报起，他们就对我恨之入骨，这个您是知道的。我到中联部后，又在很多问题上得罪了他们，如……”我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和我的矛盾叙述了一遍。接着，我向总理请示：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没法工作，可不可以辞职不干？”

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过了一会，他又用和缓的语气鼓励我：“我送你三句话：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

一年多后，病中的周总理在医院会见外宾，我和纪登奎、张香山等同志陪见。会见外宾后，我送周总理回到病房，纪登奎同志也跟了进来。总理招呼我们坐下，然后对我重提旧事：“那次‘1·25 大会’是我主持的，会上有人发言攻击你，真对不起你，我本来可以不让他发言……”

我说：“总理，这件事和您无关，是他们早就安排好的。不过，这样一来，对我倒有些好处。”

“啊，还有好处？”周总理似乎觉得意外，问道，“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答道：“中联部的客人来了，往往由他们会见，我陪见，别人从电视上报纸上见到我老是和他们在一起会见外宾，以为我和他们是一伙的。现在好了，‘1·25 大会’帮我和他们划清了界线。过去，有些老战友对我有误解，不理睬我；在那次大会后明白了真相，反而同我更亲近了。”

周总理听了我的解释，乐得哈哈大笑，并说，这倒是“坏事变成了好事”。我和纪登奎同志被他的笑声所感染，也跟着笑起来。

在病房外的护士们听得总理的笑声，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进房询问。她们说：“总理很久没有这样开心了！”

心碑永存

在周总理病重住院期间，“四人帮”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攻击和迫害。几位老同志和老师到医院探望周总理，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江青一伙派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到长沙去向毛主席告状，诬陷周总理与老同志搞“秘密串联”。毛主席看穿了“四人帮”的阴谋，严厉斥责了他们。

1976年1月8日，一代伟人周恩来与世长辞。

周总理逝世后，广大人民群众悲痛万分，纷纷自发举行各种悼念活动。但是“四人帮”却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清明时节，天安门广场上汇集了人民群众为悼念周总理而自发送来的成千上万的花圈，还有许多讽刺“四人帮”的诗歌，如“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这里“江桥摇”句中的“江”指江青，“桥”指张春桥，“摇”是“姚”的谐音，指姚文元。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对祸国殃民、迫害总理的“四人帮”，实在痛恨到了极点。

气急败坏的“四人帮”又使出其造谣诬陷的手段，向毛主席谎报军情，污蔑广大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是什么“邓小平为后台”的、“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并进行疯狂镇压，从而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

接着，“四人帮”布置追查天安门悼念活动的参加者。中联部也接到了追查的命令。由于我部群众曾做了一个大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最高处，当电视台播放群众送花圈的场面时，落款“中联部革命群众”的这个大花圈十分引人注目；因此，中央有关部门特别指出要中联部追查此事，并要登记有哪些人曾去天安门广场，有谁传抄了诗歌。当时我想，群众悼念总理没有什么错，中联部不能追查。于是，我吩咐政工部门不要登记，也不要追查送花圈之事。我告诉有关同志：“凡是群众手头有传抄来的天安门广场的诗文，可以自行处理，自行销毁”，意思是不必上缴，当然也就不必登记。他们把我的话传达给全体工作人员，一下子把许多提心吊胆的同志“解放”了。

但是，我自己的心情却很沉重。因为，天安门事件后，北京大街上出现了由一些中央部门的部领导带头的游行，庆祝镇压群众的“胜利”。我们中联部的领导没有参加、也没有组织这种游行。加之上面经常来催问登记、追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就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不仅如此，我的心情沉重还由于：深感到“四人帮”的猖狂，忧虑着党和国家的前途。

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虽然遭到了镇压，但是“四人帮”永远摧残不了、消灭不了人们对总理的尊敬、

爱戴和思念。周恩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外交家，这位人民的好总理，虽然身后没有墓碑，没留骨灰，但是，他的英名及其光辉业绩永远镌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在我的心中也永远竖立着一块高大的周总理纪念碑。

我早在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就经常聆听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到达陕北后，面聆他教诲的机会更多。最使我难忘的是1944年秋周副主席（当时恩来同志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交给我一个任务——把一个美军观察组从延安护送到晋察冀。他向我详细交代这个观察组的背景，并解释说：“本来，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一架飞机，但是涞源（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驻地）那边的机场不保险，所以改为骑马。这些美国人对我们还了解，你要团结他们，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

周副主席还谆谆嘱咐我：这是盟军的观察组，是国际友人，因此，一路上要以礼相待；但是另一方面，这次是千里行军，又要通过敌占区，必然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所以应该使他们遵守行军纪律，才能便于指挥，共同克服困难，顺利到达目的地。同时，美军观察组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看一看正在前方抗战的八路军究竟有多大力量，是怎样坚持敌后战斗并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二是利用这个机会搞些情报。因此，在行军路上以及到了晋察冀后，你们一方面要向他们介绍我方军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内外有别，保守机密。

周副主席的这番嘱咐,不仅指导我成功地完成了这次护送任务,而且也使我第一次受到了如何做好外事工作的实际教育。

1946年我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北平军调部同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团打交道时,也多次聆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新中国建立后,我调到外交战线,从此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20多年。其间,总理对我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而他在开创和发展我国外交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更使我万分敬佩和仰慕。

外交部建部初期人很少,而且大都是从军队和地方上调来的,不懂得外交怎么搞法,工作是在总理亲自领导下,从无到有,一步步开展起来的。周总理从建部起就兼任外长,一直兼到1958年。陈毅同志任外长后,上面也还是总理管。从方针政策,到干部培养,从设立机构,到建立制度,及至礼宾、调研等工作,他都抓得很具体。是我们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建国后,我们在外交上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开始,同我国建交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几个邻国和少数西北欧国家。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就发生了朝鲜战争,然后是志愿军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家和人民承受着沉重的负担。当时,国民党集团还窃据着中国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的席位。美国对我国采取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的卑劣手段,这也影响了一大片国家对我们的态度。但

是,新中国经过不懈的努力,冲破了封锁,顶住了美国的压力,同周围邻国建立了睦邻关系,同亚洲、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声音传世界,朋友遍天下,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我们在外交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在制定、实行和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面是有伟大建树的。巴基斯坦的一家报纸曾经说:“不可能把中国革命以来的对外政策同周恩来的名字分开,两者是同义词。”这个评价一点也不过分。周总理参与了我国所有重大的外交决策,而且是这些决策的最胜任的执行者;他善于把毛主席一些原则性的思想变为完整的易于理解和遵循的方针政策;他善于吸取别国的经验,将其运用于中国的实践;他很注重调查研究,勇于探索,在求实、严肃的基础上提出和发展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理论和原则。

在1952年举行的第一次使节会议上,周总理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他强调我国“坚持和平的对外政策”,“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他高度概括了建国初期“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的六条外交方针,提出了分清敌我友、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派)、利用矛盾以及针锋相对、弯弓不发、见机而作、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一整套外交战略和策略。在那次会议上,周总理还明确提出了我国外交工作的七点

指导思想：“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这些外交方针、战略、策略和指导思想的提出，为我国外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5年，周总理在同出席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谈话时强调，“今天我们要高举和平、民族独立、爱国主义、民主自由和宗教自由五面旗帜”来推进世界和平运动。“争取持久和平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这对于我们祖国的建设，对于各国人民的进步和繁荣，都是有利的。我们要在和平竞赛中前进，当然也要防止另一方面放松警惕的偏向。”

1956年，周总理在国务院一次常务会议上谈到外援问题时说，我们要争取外援，但要去掉依赖思想，我们主要是自力更生，但不放弃争取外援。

1963年4月，在同埃及部长执委会主席萨布里交谈时，周总理列述了中国人办外事的四点哲学思想：（一）要等待，不要将意见强加于人；（二）决不开第一枪；（三）来而不往，非礼也；（四）退避三舍。他指出：“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同年10月，他在同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谈话时阐述了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关系问题，

他说：“……我们（指中法两国）有共同性，我们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我们都赞成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世界事务，因为这样不能维护世界和平，反而会增加战争危险。只有世界所有国家取得平等地位，大家都有权过问世界事务，才能真正达成协议，才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

周总理的这些论述和观点，都体现了我国外交的基本思想和政策，不仅在当时是我们开展外交工作的依据，而且现在仍在指导我们的工作，今后还将继续引导我们在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周总理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也是他把毛泽东思想化为具体外交政策的一个生动范例。我们当年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了同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后来遵循五项原则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关系正常化，今天还是靠它来进一步发展同其他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被公认为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反映在许多国际文件中。这五项原则以及周总理经常强调并实行的“求同存异”方针，对于各国之间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以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有着促进作用和十分深远的影响。

周总理在推行睦邻政策方面立下了丰功伟绩。安定四邻是我们建国后的一个紧迫任务。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同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上历史上

的一些遗留问题,又有数目可观的侨民,因此,有些邻国对我国存有疑惧,这并不奇怪。那时候,印度是个很有影响的国家。周总理于50年代前期访问印度,接着访问缅甸,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印、缅建立了友好关系。在印尼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周总理夜以继日、广泛深入地做工作。他高瞻远瞩、通情达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以真诚和微笑赢得了与会各国领导人的信任,消除了他们的疑虑,为我们同亚非国家特别是同邻国的关系打开了局面。后来,他又多次率团访问我国的周边国家,并邀请邻国的领导人来华访问,通过领导人互访和交往,建立了和这些国家的睦邻关系。他还领导和指示外交部、对外经贸部及其他有关部门,与邻国订立友好条约、经贸和文化等交流合作协定,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和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50年代后期我担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时,巴基斯坦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与印度不和。当时,总理曾找我商量如何做巴基斯坦的工作。他不因为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不因为巴基斯坦是两个反共反华国际组织的成员而排斥它;相反,他亲自多次同巴方领导人会见,体谅巴的处境,实事求是,推心置腹,坦诚相待。由于周总理的耐心工作,我国在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也得到很快发展。迄今,巴领导人几度更易,中巴两国始终保持着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的友好关系。

同邻国友谊的发展,使我们有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周

边环境,便于我们国内的建设,也扩大了国际影响,树立了我国的和平形象,同时也为亚洲与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

周总理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新独立国家维护民族独立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他会见过亚非拉地区许多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和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著名人士,热情地支持他们,和他们一起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不辞辛劳,不顾个人安危,长途跋涉,多次出访。不论国家大小,他一视同仁,平等相待,政治上予以支持,经济上尽力援助。这样,不仅促进了民族独立运动和国际和平事业的发展,也大大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使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了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

周总理在处理对外事务时非常善于抓住时机,当客观条件具备时能当机立断,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1953年春,瑞典副外长哈马舍尔德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当时我在瑞典任大使。周总理得知哈马舍尔德当选后,立即发了一份很长的电报,指示我去找他详谈,争取他就任后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努力。数月后,周总理又指示我去拜访丹麦外交大臣汉斯·汉森(当时我兼任我国驻丹麦公使),请他向美国方面转达:中国政府愿意举行国际会议,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同时,周总理还通过其他途径向西方国家表达了上述意愿。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促成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召开。

其后不久,周总理又指示我去拜访瑞典和丹麦的政府领导人,请他们转告美方:中国政府愿意和美国政府进行谈判,讨论台湾问题及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并改善中美关系。后来,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表声明,重申了这个意见,从而为中美两国的大使级会谈创造了条件。

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持续进行了十多年,到60年代中期,由于两国关系紧张而中断。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出现松动现象。有一次,美国驻波兰大使在一个招待会上碰到我们的翻译,拉住他,表示愿同我使馆代办会晤。电报发回来,总理看到后,立刻拿去报告毛主席,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着敲门砖了。”主席同意。于是,总理马上抓紧办理。头天晚上接到电报,第二天一早就复电。这件事总理看准时机,处理得非常果断、迅速。反应之快出乎美国政府预料,从而使中断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恢复,也为后来基辛格、尼克松访华铺平了道路。

周总理曾经指示我们,外交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联合,是友谊;另一方面是斗争。外交斗争不能乱斗,而要有理、有利、有节。在这方面,他自己就是模范实行者。例如:在日内瓦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在其发言中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进行无理指责,却根本不提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针对杜勒斯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周总理在首次发言中说:“我们是到这里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不要摆出一副指责别人的架势。”“你究竟准备怎么解决,把你的方案拿出来嘛!”这几句铿锵

有力的话,把杜勒斯的挑衅坚决顶了回去;但并不在其态度问题上多费唇舌,而是要他拿出解决朝、越问题的方案。接着,在以后的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了中国代表团关于解决印支问题和朝鲜问题的方案。

在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方主张将已经取得一致的意见写下来,达成一个协议。但是,美国代表团操纵一些国家的代表横生枝节,企图使谈判达不成协议。他们的论点是:“在每一项已经取得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原则下面,还有很多的分歧之点,如果关于这些分歧之点不同时加以解决,肯定这些原则又有什么用处呢?”对此,周总理反驳说:“其实,正是为了更好地进一步解决这些分歧,才有必要将已经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只有根本反对达成任何协议的人和他的附和者才会反对这种程序。”他还指出:“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阻挠政策是本会议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接着,他向会议提出一项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周总理的发言和建议是如此合情合理,因而使得一些原来追随美国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会议主席、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立即宣布:“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将宣布他的建议成为会议双方的一致意见。”艾登还被周总理的外交才能和非凡风度所倾倒,在会后向记者们表示了对他的钦佩之情:“周

“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你们早晚都会清楚，他是个不平凡的人。”

总理对于外交上的大事抓得很紧，亲自抓，一竿子抓到底。可以说，我们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从大政方针到具体问题，无不倾注着总理的心血。其实，何止外交，国内的政治、经济、文教等大事，他都尽心尽力、呕心沥血地抓。我们建国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外交也好，内政也好，哪一项能和总理分得开？如果拿各个朝代的宰相来比较，历史上有哪一个贤相比得上周总理！？

同时，周总理个人的品质、作风、才能、学识，也令我十分钦佩。我在他领导下工作，经常受到他的亲切指导和关怀。驻外使节回国，他总要接见、谈话，还亲自带我们去见毛主席。我在国内工作时，他常常召集我们了解情况，研究对策。他学识渊博，才智过人，讲起话来很深刻，很生动，办起事来井井有条。他作风正派，不搞阴谋诡计，不拉帮结派，见到他什么话都可以说，放心地说，说错了也不会挨整。有时我们做错了事，他批评起来很严厉，但只要承认错误，找出原因，改了就好，从不整人。他不喜欢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也没有人去拍他的马屁，因为拍的结果不外是碰壁和遭到严辞训斥。他对干部既严格又爱护，对群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很关心。他深入群众，爱护和重视群众，尊重群众的劳动。到国外访问时，常常关心宾馆的服务人员、厨师、司机等的情况，离别时都要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致谢。在国内的外事活动后，对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也是如此。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好

多东西是他的思想,他的创造,但他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相反,如果出了问题,他总是承担责任。他的这些品德,言传身教,对当时外交部干部的素质是有很好的影响的。

周恩来,这个响亮的名字,和他那光辉的形象、深邃的思想、伟大的业绩一道,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第八章

春风又绿中华

接过华国锋手令之后

1976年,我国接连损失了三位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领袖。继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元帅逝世之后,9月9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毛主席逝世后,人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临终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在瞻仰遗容、守灵和参加悼念活动中,都没有听说有什么遗言,只听说,从9月初起,毛主席经常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即使想留下什么话,恐怕也力不从心了。如果要有有什么遗言的话,在毛主席去世后,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及华国锋同志所致悼词中一定会提及的,可是在这些文件中只字未提这件事。

令人纳闷的是,从9月下半月开始,报纸、电台、电视台突然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来了。报纸上用黑体铅字印出,做成通栏大标题;有的还把“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作为毛主席语录登在报头上。这个遗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讲的,不得而知。有的报纸还怕老百姓不明白“按既定方针办”是什么意思,故而解释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就是“要坚持学习,深入批邓”,就是“要按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这种宣传的背景和用意当时我还不完全清楚,但从字里行间多少闻出点味道来了,说穿了,就是要按“四人帮”那一伙人过去乱党、乱军、乱政、篡党夺权的“总纲领”办。

我在和肖劲光、王震等同志交谈中,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感到气愤,对于江青等人的野心感到担心。我们希望叶帅等老同志能出来解决“四人帮”问题,挫败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但是,又觉得此事关系重大,必须由当时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出面,才是名正言顺。那时我并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正在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

叶帅是我党、我军的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同志,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自林彪自我爆炸后,毛主席命叶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是“四人帮”千方百计地整他,处心积虑地要夺他的权。当周总理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即1976年2月2日,“四人帮”用中央名义发了个1号文件,向全党全军通告:叶剑英“生病”期间,不再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

工作。其实,此时叶帅根本没有生病,“四人帮”是以此为借口来夺他的权。可是,“四人帮”能夺他的权,却无法动摇他在全军指战员中的威望。所以,现在当此危急存亡之际,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同志纷纷来和叶帅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帅自己也常用他那深沉睿智的目光凝视苍穹,他正在思考一举歼灭“四人帮”的时机和方法。

这时,身在中南海的华国锋,正遭受着“四人帮”的折磨。自从周总理去世、邓小平再度被打倒、叶剑英靠边休息后,“四人帮”志得意满,以为党、政、军大权一定会落到他们手中。不料事与愿违,毛主席早已洞悉了江青一伙人的野心,所以确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抑制了“四人帮”的夺权图谋。对此,“四人帮”怀恨在心,他们不甘失败,伺机卷土重来。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屡屡发难,企图实现其夺权旧梦。江青一会儿提出要讨论中央领导的安排问题,一会儿要求把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和毛远新保管清理,还经常在深夜打电话给华国锋无理取闹,实际上是逼他交权。王洪文更是嚣张,他命秘书们在中南海紫光阁设置了十几部红机子,擅用中央办公厅名义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联系,要各地党委向他们请示报告,俨然以党中央自居。

面对“四人帮”的干扰与进逼,华国锋同志忧心忡忡。他感到“四人帮”搞政变已迫在眉睫。于是,他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商量,决定同叶帅联系。

关于华国锋与叶帅联系之事，现在流传着种种说法，有些说法与事实有出入。据后来华国锋同志告诉我，他请李先念同志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叶帅当时并未深谈。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首先解释了未与李先念深谈的原因，然后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以及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

与此同时，“四人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准备工作。他们通过掌握的新闻单位和“梁效”等写作组，大肆进行舆论准备；“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向民兵组织增发武器；窃据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通过其爪牙背着李德生司令员私自调动部队；“四人帮”控制的一些中央部门的领导人也蠢蠢欲动，积极配合；对于不受他们控制的中央部门（包括党中央直属机构和国务院各部委），则已经拟好了新的领导人名单，准备夺权；他们还在内部放出空气，说在10月7、8、9日将有特大好消息。当然，其中很多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室商量事情。我到他那里时，外交部的韩念龙、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已经先到了。华国锋让我们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

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9月30日已去联合国,10月4日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他发言稿上‘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及?”

我说:“因为时差的关系,纽约比北京晚12小时,所以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

研究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就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我听了这番解释,明白了“四人帮”搞这种变戏法的

险恶用心：是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毛主席对他们有“临终嘱咐”，这样，他们既可以捞到政治资本，又可以把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当成尚方宝剑，今后他们不论搞什么阴谋诡计，都可说成是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如果有谁反对他们胡作非为，阻挠他们实施阴谋，他们还可用这把“尚方宝剑”来打击之，反诬别人反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这样，就给他们篡党夺权开了方便之门。同时，我对“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这一段时间内为什么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背景和用意，就更加清楚了。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等着。”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4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中写道：“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伪造的“尚方宝剑”，他们要砍人了。我意识到，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因为这篇反革命宣言书式的文章，明明是他們要动手篡位夺权的一颗信号弹。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起来。

我谈了对《光明日报》文章的看法。我说：“人家在下战表了！”

华国锋同志点了点头，呷了口茶，不慌不忙地拿出几个纸条来，并说：“那天和你谈起毛主席写的字条，因不在手头，所以没有给你看，现在我拿来了，就是这几张……”接着他递过来两张说：“今年4月30日晚，毛主席会见外宾后，我向他汇报了全国形势，并对某些省的情况表示担忧，主席当即用铅笔写了这两张条子：一张写的是‘国内问题要注意’，一张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等我看过这两张字条后，华国锋同志继续说：“我还同主席谈到中央的情况，我说，他们（指“四人帮”）许多事都不听我的，很难办。主席又写了这张条子：‘你办事，我放心’。最后我谈到各省的干部和人事安排问题，并请主席作指示，他又写了这张条子：‘照过去方针办’。”

在解释了这些字条的来由后，华国锋同志接着说：“我也感觉到了，他们几个在跟中央、跟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作对。随便抓件事就大吵大闹，胡搅蛮缠。主席去世后，政治局晚上开会，一吵就是大半夜。每个晚上，江青都要打电话给我，乱叫乱嚷，吵得我无法睡觉。她晚上吵闹白天睡大觉，可是我白天还要工作……你认为他们还会有什么动作？”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你有什么根据？”华国锋问道。

我答道：“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在北京，我数了数，大概有十来个部门，甚至不止这个数目，要跟他们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带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问：“你们中联部怎么样？”

我说：“中联部不沾边。部内有人想整我，但大多数干部群众和我是一致的。当然，少数人也可能会跟着他们跑。”

华国锋欣慰地笑了，接着他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华国锋拉我坐下，然后说：“具体任务到时会向你交代。你在家里等我的电话，要我亲自打的电话才算数。”

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感到有

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在今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要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飏、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我接得手令之后问邱巍高:“广播事业局是哪个警备师守卫的?”

他答道:“是警备一师。”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这个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究竟怎样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指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暂不对外公布此事），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们领受完任务后，立即驱车去中央广播事业局。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这是误传。当时广播事业局虽然和其他新闻单位一样被“四人帮”所控制，但是广大干部群众是听从党的领导的，而且守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警备部队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因此，根本不需要我带领部队去进行军事占领，也不必用别的部队去替换原来的部队。守卫电台、电视台的还是原来那班人员。虽然在我去之前，警备一师已增派了一些战士去电台，但这是他们为加强警卫力量而作的内部兵力调配，与“带领军队去占领电台”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我只是同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他还没有下班，但像是准备睡一会的样子，因为他来开门时衣服扣子没有扣好。他大概是因为这么晚了，忽然来了这些不速之客，显得有些紧张。为了说明来意，我把华国锋的手令拿给他看。他看完手令，好久

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要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邓岗打电话召集人的同时,我请邱巍高和王甫带着另外10名战士去掌握电台的播音室。他们立即在直播室和机房门前加强了岗哨。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事业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我考虑,光靠我和邱巍高、王甫三个人,工作难于运转,因此对邱巍高说:“应该再调一些人来。”他同意我的意见,并说:“要找人,我们那里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中联部找人吧!”我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铨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我对邓岗说:“我们得住在这里,你也不要回家了。”于是,就在邓岗的办公室内架了几只行军床。头三天我们

睡觉不脱衣、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没有那么多床,我和邱巍高轮流睡一张床,我睡一会儿,再换他睡一会儿。所谓“睡”,不过是躺一躺,放松一下筋骨,眼睛却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突然发生的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四人帮”虽然被抓起来了,但还要防止他们的余党、死党狗急跳墙。新闻舆论阵地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之徒来?我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种影响比我当年指挥的任何一个战役的影响都要大……越想越感到责任重大,越想越难于入睡,索性起来继续伏案工作。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在党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这个重要宣

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北京市广大市民和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的广大干部群众,都自发走上街头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胜利。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也纷纷举行游行和其他庆祝活动。我和邱巍高等同志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就离开了广播事业局。我对邓岗说,你也可以回家了。中联部的冯铨等同志也离开广播大楼回部,只留下张香山同志暂时负责广播事业局的工作。后来,张香山同志被调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

政务军务忙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扫除了笼罩在共和国上空的阴霾,使阳光照融着被十年“文革”所冰冻的大地,像春风又吹绿了因十年动乱而枯萎的中华大地。我们的党和国家开始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重铸辉煌的明天。

在我离开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第二天,我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央宣传部未恢复前,先成立临时的中央宣传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会议还决定由我负总责,宣传口办事机构的编制由我确定,人员由我挑选。我说,人不要多,机构要精干,但要有几个懂行的来参加领导工作。不久,就调来了朱穆之、

华楠、王殊等同志，他们还兼着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领导职务。上面指定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也兼任宣传口领导职务，但他不在宣传口办公，只是负责传达汪东兴同志的指示，因汪东兴代表中央领导宣传口，并主管全党、全国的宣传工作。

中央宣传口的领导班子确定后，又从中央各部门调了20来个干部来做具体工作。我们开始时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大约一个多月后搬到钓鱼台。

宣传口成立后，就把长期独霸剧坛和影坛的“样板戏”暂时停演停映，开放了“文革”以来被禁止放映的《东方红》、《洪湖赤卫队》、《海霞》、《甲午风云》等一批优秀影片，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原来电影发行公司有巨额亏损，这几部片子一放，收入迅速增加，不但还清了欠债，还有不少盈余，为筹拍新片准备了资金。同时，经中央宣传口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游击队歌》、《救亡进行曲》、《延安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社员都是向阳花》、《绣金匾》等一批被“四人帮”禁锢不让播放的优秀歌曲。春风重新吹绿了我国的文艺园地！

在报刊和广播宣传方面，我们致力于扫除“四人帮”的影响及一些明显的极“左”思想。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认识上的局限，当时对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例如，对“两个凡是”的问题，就是如此。

1976年10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在谈到报刊上开展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提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

与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凡是毛主席所说的话、所作的指示,都不要批判。后来,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叫人把华国锋的上述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中,命宣传口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还要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样,该观点便离开了批判“四人帮”的特定环境而变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观点。

我接到这篇社论稿后,便和宣传口的领导成员一起进行讨论。大家认为,如果按照这“两个凡是”的提法,首先就会影响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的问题。但是,听了李鑫同志传达汪东兴同志的指示后,觉得还是应该按照组织原则,遵照中央的决定,把社论稿送到两报一刊编辑部去发表。至于组织宣传“两个凡是”的工作,我们只是向各新闻单位的领导同志转达了汪东兴的指示,并未对此作出具体的要求和部署,以后也未进行检查。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对“两个凡是”观点的认识还很肤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此的认识才逐渐深刻起来,明白了“两个凡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

宣传口存在了整整一年。1977年10月中央宣传部恢复,中央调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任中宣部部长。于是,中央宣传口的工作便全部交给了中宣部,宣传口完成了历史任务而宣告解散。

在1977年8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我相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次年3月,我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协助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处理外交事务,领导和协调各对外部门的工作。同时,我还分工领导国家民航总局和国家旅游局。

1979年1月,我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改任国防部长。

无论是在国务院的工作中,还是在军委的工作中,我努力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了促进我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讨论了把民航和空军分开的问题。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对此事作了批示:处理此事,不要损害某一方面。我在讨论时说,把民航和空军分开,这样既有利于空军建设,又有利于发展民航及旅游事业,对于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都有积极作用。但是,分开之后,军民之间仍应合作,特别是空军方面应更多地协助民航;在分开的初期,民航总局还来不及大量修建机场,因此,在没有民用机场的地方,民航班机仍可借用军用机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常委的李先念同志赞同我的意见。在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终于决定将民航和空军分开。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民航和空军比翼双飞,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充分证明当年国

务院和军委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鉴于军委的工作涉及很多方面,因此我请示军委主席、副主席后,建立了军委秘书长办公会议的制度。由我和几位副秘书长定期开会,一起办公。当时的三总部主要领导同志韦国清、杨勇、杨得志、王平等都是副秘书长。有时讨论的问题涉及各军兵种或各部委,就请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这个制度有利于发挥集体的智慧,有利于交流情况和经验,作出决定后也有利于执行及检查。

我们在邓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师的领导下,抓了军队的精简工作。抓这项工作,一是出于军队建设本身的需要,因为,“文革”给部队建设造成了许多麻烦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机构臃肿,各级领导中一名正职往往要配好几名、甚至十几名副职,机关干部也人浮于事,还有非战斗部队占了很大的军队编制和军事预算。因此精简消肿,不但不会削弱、反而可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而且节省下来的军费还可用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二是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据此作出的战略决策,我们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必须利用这个和平环境,集中力量(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来搞好我国的经济建设。军队精简后,可以减少军费在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精简下来的人员和非战斗部队可以参加地方的生产建设工作,有些军事工业可以转为民用工业,这些都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此外,从国际关系方面来看,我国大规模地裁减军队,也能促进国际裁军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所以,

我们十分重视此事,抓紧完成了这个任务。光是把基建工程兵和铁道兵等部队成建制地划归国务院和地方有关部门,就使军队减少了几十万人。这是“文革”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大消肿。以后到80年代中期军队又裁减100万人。这两次精简对我军建设和国际裁军工作作出了贡献。

在军队建设中,除了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外,还恢复了“文革”时遭到批判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技能教育。恢复及增设了军队院校,加强了军事科研,并考虑恢复军衔制的问题。这些措施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还建立了干部交流制度,包括军区之间的交流,领导机关和部队基层之间的交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委曾下令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在军区间进行互调,要求接到调令后数日内离任,并立即到新的岗位报到就任。命令发出后,所有的军区首长均如期就任新职,没有一人拖延。这种以身作则、服从组织调动的态度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充分体现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本色。

在此期间,我还率团出访了许多国家。

1980年6月,我应美国政府邀请,率领我国军事代表团访美。代表团成员中有刘华清副总长等我军的高级将领。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副总理率领的访美军事代表团。访美期间,我们受到了卡特总统的接见,并和美国国防部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官员举行了会谈、会晤。美方还特地为我们举行了海军演习。在会谈中,讨论了中美之

间的军事交流和合作问题。这次访问,不仅增进了中美两军之间的了解和交往,而且也有利于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在华盛顿时,居住美国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蔡文治伉俪盛情邀请我和赵兰香到他们家中作客。蔡文治先生和我是老相识。1946年初,我作为北平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副参谋长,曾参加三方(我方、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参谋长会议,当时蔡文治以国民党代表团参谋长的身份参加。在会议上,我和蔡文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以后,我们又多次打交道,每次都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现在,蔡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不胜感慨地说:“过去我站在国民党方面,与贵党贵军为敌,回想起来,深感内疚!”我说:“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了!爱国不分先后,希望蔡先生今后能为海峡两岸的交往起促进作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回国后,我向叶剑英同志转达了蔡文治先生的问候,并建议叶帅邀请蔡先生来华访问。后来,蔡文治夫妇几次回国访问或开会(黄埔同学会),也来我家作客。

出访传友谊

“文革”期间,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掌舵和领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克服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和极“左”思潮的干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对外交往方面也出现了一个矛盾,就是外国领导人来华访问的多,而我国领导人很少出访。外国的外交界、舆论界对此

颇有微词。有的国外报刊评论文章甚至把这种情况与古代外国使者朝拜中央王国相提并论,显然这是一种误解。不过,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是欠了外国的“债”。因此,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政府就着手处理“还债”之事。外交部拟出了需要“还债”的国家名单。我一看名单,见要访问的国家很多,便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这么多“债”不能一下子还完,应该分批分期,每年出访其中一部分国家;第二,可以多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率团出访,有的领导同志年高体衰,乘飞机长途旅行有困难,可出访大国、邻国和较近的国家,我的身体还能作长途飞行,可到较远的国家。中央讨论后,基本上同意了我的意见。后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同志分别访问了美国、日本和几个邻国。

1978年,我和陈慕华副总理、黄华外长等陪同华国锋同志访问了朝鲜。其后两年中,我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欧洲的20多个国家。

在访问巴基斯坦时,正值中巴国际公路建成通车。哈克将军(当时任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政府首脑)盛情邀请我到中巴边境的喀喇昆仑山口参加这条国际公路的通车仪式。他对我说:“这条公路的建成,和你这位前任大使当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因此,你应该参加剪彩。”

我说:“这条建立在世界屋脊上的康庄大道,象征着中巴两国间的友谊合作,有着广阔远大的前途。”

他同意我的看法,并说:“和中国友好是巴基斯坦外

交的柱石。无论我国的政府如何改变，巴中友好的政策决不会变。”

我答道：“是啊，贵国历届政府都为发展中巴友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谈到这里，我乘机向哈克提出了布托的问题。

巴基斯坦前总统和前总理布托，在任期间坚持巴中友好政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7年7月，当时任巴陆军参谋长的哈克宣布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并拘留布托。次年3月，拉合尔高等法院以阴谋暗杀政敌罪判处布托死刑。我国政府闻讯后，立即电令驻巴大使陆维钊向哈克提出，希望给布托以宽大处理。哈克表示：拉合尔高等法院的判决已上报巴最高法院，将由最高法院作出最后决定。现在，我再次向哈克转达了我国政府领导人的口信，希望对布托减刑。我诚恳地指出：“中国政府决不干涉巴基斯坦的内政。布托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阁下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因此，我们是以好朋友的身份提出这个愿望。我们认为，如能对布托宽大处理，将有利于贵国的团结和稳定。”

半年后，李先念副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时，也向哈克提出，请给布托以宽大处理。其后，当巴最高法院决定维持原判后，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又先后以不同方式向巴方表达了上述愿望。当布托被处以绞刑后，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曾公开对此表示遗憾，但是中巴两国之间的友谊并未受到影响。

访问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两个南亚国家后不久，我

又率团访问了拉丁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圭亚那三国。自70年代初我国和上述三国建交后,三国领导人曾多次访华,这次是我国政府代表团首次访问三国。代表团受到了三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我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克拉克总统、威廉斯总理,牙买加的格拉斯波尔总督、曼利总理,圭亚那的阿瑟·钟总统、伯纳姆总理,分别进行了会见和会谈。

在会谈和交谈中,我和上述三国领导人讨论了许多双边的和国际的问题,特别是讨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和三国的友好合作问题。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是加勒比海中的岛国,圭亚那是濒临加勒比海的南美国家,因此,我们也谈到了中国和南美及加勒比国家建立友谊的问题。在我这次访问后的几年中,南美和加勒比地区有许多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访问拉美国家快要结束时,我们收到了国内来电,要代表团增访南欧的马耳他。于是,我们就飞越大西洋,来到这个位于地中海的国家。马耳他总理明托夫是马中友好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他自1971年6月就任马耳他总理后,一直致力于和我国建立友好关系。在两国政府共同努力下,1972年1月31日中马建交。在我这次访马之前,他曾三次率领马耳他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后来又曾于1982年、1984年两次率团访华。)他主张建立不受西方大国控制的自主经济,在外交上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我们在会谈中讨论了国际形势和进一步发展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特别是就如何增进两国经贸合作

问题交换了意见。

为了配合我国发展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在率团出访时很注意与被访问国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问题。例如:1979年,我率团访问瑞典、挪威、芬兰和冰岛四个北欧国家时,代表团成员中有冶金专家、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徐驰同志和外贸、电力等方面的领导、干部和专家。由于瑞典的冶金工业和汽车工业,挪威的冶金、造船和航运业比较发达,冰岛的地热资源得到有效开发而被誉为“无烟工业”,芬兰的人工造林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和各国有关部门讨论了建立经济合作的问题,还研究了开展双边和国际贸易的问题。这些研讨为以后我国和北欧国家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创造了条件。

除了率领政府代表团出访外,我还应法国社会党邀请,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法国。代表团成员中有中联部长朱良等同志。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的对外关系也摆脱了“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干扰而迈开了新的步伐。我们开始和各国社会党、社民党、民族主义政党和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建立联系,进行交往。当时法国是社会党政府执政,所以我们这次访法,也是中法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一次重要交往。访问期间,我们同法国社会党总书记若斯潘(后来任法国总理)及该党其他领导人进行会谈和交谈,就发展两党关系及广泛的国际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在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上,我均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我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我国人大第一次设立外事委员会。于是,我开始致力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外事工作。

在外事委员会中,聚集着人大常委中的外交英才,如副主任委员宦乡、符浩、王国权、曾涛,委员楚图南、王炳南、郝德青、梅益、吴茂荪、丁光训、宋一平、张致祥、区棠亮、谢怀德等。后来我又向人大常委会和代表大会提议,补选楚图南同志为外委会副主任委员,并调程思远同志来外委会任副主任委员。我还把一些并非人大代表的老外交家如黄镇、张香山、宋之光、郑为之以及国际法专家邵天任、著名翻译家李越然等,聘为外委会顾问,从而使外交人才济济一堂。

外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外事立法,审议国务院各部门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涉外法案。同时,外委会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与各国议会开展外交往来的建议,外委会本身也同各国议会的外委会建立联系,进行交往。

鉴于欧美等国的许多议员和经济、企业界有着广泛联系,所以我们很重视通过议会外交来促进中外经贸的交流和合作。外委会在接待法国议会外委会访华团及其他外国议员访华团时,结合客人的要求,尽量安排他们参观我国的工厂企业,并和我国经济界人士会面交谈。在接待德国联邦议院外委会代表团时,还特地安排客人同我国外贸部领导同志进行会谈。我们外委会代表团出访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时,也要求对方安排参观工厂企业,并和

经济界人士交谈。通过这些措施,为中外经贸合作起了搭桥和促进作用。

参加各国议会联盟(以下简称“议联”),是全国人大开展议会外交中的一件大事。

“议联”是世界各国议会之间、议员之间进行联系和合作的一个全球性国际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每年召开两次大会,在日内瓦或各国的城市轮流举行。会议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问题,如和平与发展、裁军、人口、环境、种族歧视、非殖民化、国际债务、国际难民、男女平等、青年等问题。也讨论一些特殊的、局部的问题,如非洲饥荒、局部战争、地区性国际纠纷等。虽然大会决议对各国没有约束力,但其议题往往和联合国讨论的议题相呼应,因而对联合国会议的决议和国际舆论有着一定的影响。同时,对各国议会讨论有关问题自然也有相当的影响。“议联”还单独或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共同组织召开一些专门会议。

早在1955年7月,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曾组成由彭真副委员长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人大代表团,申请参加“议联”,并准备出席这年召开的“议联”第44届大会。但是,这时的美国一方面阻挠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方面又阻挠我国人大代表团参加“议联”。同时,它还怂恿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立法院”向“议联”提交了要求参加的申请。由于美国的阻挠,当时的“议联”执行委员会于8月份决定拖延讨论我国参加的问题。11月,执行委员会重新通过决议,认为

中国代表团符合“议联”章程的要求,并否决了台湾当局“立法院”的申请。1956年4月,由于美国再次阻挠,“议联”理事会不顾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作出了待联合国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后再研究中国加入“议联”的决定。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后,1973年9月,“议联”秘书长约见我国驻日内瓦代表处临时代表,希望我国参加该组织;还致函朱德委员长,介绍该组织情况。但是,当时我国正处于“文革”动乱中,全国人大无法讨论此事。1978年4月,“议联”秘书长又致函叶剑英委员长,希望我国参加“议联”。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促进全国人大和各国议会间的交往与合作,全国人大外委会成立后,便把加入“议联”作为重要任务来抓。我们命外委会办公室组织其下属的业务处收集整理关于“议联”的资料,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委员长会议提出报告。

彭真委员长召开委员长会议扩大会,请外委会几位副主任委员和办公室负责人列席会议,专题讨论外委会的报告。经过反复讨论后,会议同意将此报告提交常委会讨论。

1983年12月8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我国人大代表参加“议联”的决定。按照“议联”章程,各国议员应以个人身份组成议员团参加“议联”,因此,我国也应由全国人大代表组成代表团参加。次年3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国议

会联盟代表团章程》。“章程”规定，所有的全国人大代表都是该代表团成员。每年再从该代表团中遴选部分成员组成出席“议联”大会的代表团。常委会还决定由我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4月上旬在日内瓦举行的“议联”第71届大会。

我们于3月底抵达日内瓦。4月2日，先于大会举行的“议联”理事会通过决议，接纳我国人大代表团为“议联”成员。接着，大会热烈欢迎来自中国的人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议联”会议。当我和曾涛、吴茂荪等分别在大会上发言后，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欧洲国家和美国等国的议员们，纷纷过来和我们握手，向我们祝贺。在会外，我们还同各国的议员们举行会晤，交了不少朋友。这些新朋友对我们说：“你们全国人大代表着十亿多中国人民。以前你们没有参加‘议联’，这个组织因而长期缺乏普遍的代表性；现在好了，你们的参加弥补了这个缺陷。”“以后我们议员要和你们人大代表多往来，多交流……”这次大会以后，我们外委会和全国人大办公厅与“议联”的执行机构秘书处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就有关工作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同时，也促进了全国人大和各国议会的往来。

现在，我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我仍时刻关心着我国的建设事业，也关注着我国的外交工作。我看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各项工作、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两个文明建设、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成就卓著，外交工作和其他外事工作

也取得了新的成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开创的新中国外交事业后继有人，心中感到无比欣慰。这里，我借用陈毅同志的诗句来表达交织着的欣喜和崇敬心情，并作为本书的结尾：

天安门上望，城下人如海。举头红五星，共庆山河改。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后 记

本书记录了我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经历和见闻，它与我以前所写的一本回忆录——《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出版）是姊妹篇。以前的那本《耿飚回忆录》写的是我在建国前的经历，因此这两本书在时间上既有区别，又有连续相承的关系。

从内容上看，以前那本回忆录主要记载着我参加革命斗争、特别是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而本书记述的则是我在外交战线上的工作历程，也包括在“文革”中、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时的经历和见闻。

本书的内容，由我口述，请蔡华同同志记录整理。整理成书后，书稿的每一章节都经我审核修改。如果书中对某些事件的忆述有误，或某些提法有不妥之处，均由我本人负责。

耿 飚 1997年四月廿一日

附录

耿飚的戎马生涯

· 蔡华同 ·

湖南省醴陵县北乡一带，山清水秀，景色迷人。尤其远近驰名的是那绵亘数十里的龙形山，好似一条昂首盘旋的绿色巨龙，蜿蜒起伏在湘东大地上。按照民间传说，在这样“风水好”的龙形胜地，必定会出贵人；但是千百年来此地非但未出贵人，倒是常常兵连祸结，灾荒频仍，致使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只是到了本世纪初叶，这里才诞生了一位大人物，但他并非龙形山的风水所赐，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使他成为一位人民军队的将军，后来又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家和政府领导人。他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耿飚。

1909年8月26日子夜，耿飚出生在北乡严家冲的

一户贫苦人家。他的父亲耿楚南早年浪迹天涯，学得一身好武艺，却因报国无门而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泥瓦匠，靠辛勤劳动勉强养家糊口。耿飏7岁时，父亲因生活艰难而不得不带领全家背井离乡，到衡阳地区的常宁县水口山矿谋生。13岁那年，耿飏为了分担父母的生活重负，也到矿上当了一名敲砂童工。

水口山是我国的重要铅锌矿产地，也是湖南军阀的重要财源。反动当局对水口山矿工的压榨异常残酷、沉重。因此，那里的矿工早在1917年就进行过反压迫、反剥削的自发斗争。1922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蒋先云、谢怀德、毛泽覃等，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名义，到水口山来传授安源煤矿工人运动的经验，组织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人运动。耿飏的舅舅宋乔生也在水口山当矿工，被选为工人俱乐部和工人纠察队的领导人。耿飏在他们的教育和引导下，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不仅为地下党组织站岗放哨、传递消息，还积极参加罢工、示威等工人斗争。1925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他一方面在工人夜校学文化，一方面在父亲教授下学武术，既习文又习武，为以后更好地进行革命斗争准备了条件。

第一次和枪杆子打交道

耿飏第一次和枪杆子打交道，并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一次特殊的革命活动中。

1926年冬，耿飏接受了水口山党组织指派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党员黄佐等到东阳渡镇上去秘密接运一批

枪械,以便建立水口山工人武装。

东阳渡位于衡阳南面的湘江之滨,离水口山有三四十公里水路。当时的湖南军阀政府在那里建了一个兵工厂,专门制造枪炮弹药,当地老百姓管它叫枪炮局,有一个营的“粮子”(老百姓称反动政府的士兵为粮子)把守。

水口山党组织事先已和兵工厂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商定了一个秘密运枪计划。但是不知何故走漏了消息,反动当局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正准备按照计划中规定的时间、地点,派军警特务暗中埋伏,企图将水口山取枪人员连同兵工厂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在取枪人员临行前,水口山党组织从秘密渠道获悉了反动当局的这个阴谋,而此时兵工厂地下党组织还不知道这个新情况。因此,必须尽快先派人去和兵工厂党组织重新联系,改变接运枪械的时间、地点和联络暗号。

党组织负责人宋乔生和黄佐商量后,决定派耿飏先去兵工厂联系。因为他勇敢、机警,行动敏捷,而且年纪小,到了东阳渡后不大会引人注目。

耿飏回家告诉父亲,自己即日要到外地去办一件事。父亲耿楚南作为一个积极参加罢工的老工人,很关心和支持矿上的革命斗争,就问:“什么事这么着急?”耿飏虽然信任父亲,但也不能向他谈论党的秘密,所以并没有详告一切,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这件事是舅舅交办的,重要得很。”他父亲听说是宋乔生交办的,知道是组织秘密,便不再打听,只是问道:“那你怎么走法?”

耿飏知道父亲早年在外面闯世界时不但学过武术,

而且也学过用兵布阵之法，很有计谋，本来就想请他协助，现在见他问起，正好提出要求：“我年纪虽然小，但是工头们都知道舅舅是工会负责人，一定会注意我的行动，所以想请您替我想想办法。”

“这个……”父亲沉思半晌，突然一拍脑门，吐出了三句干净利落的话：“兵不厌诈”，“金蝉脱壳”，“马上搬家”。

他们立刻收拾行装，并向邻居和工友们告别说：矿上发的矿票一文不值，在这里实在无法生活，不如回醴陵老家种田去。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全家离开矿山，到附近的松柏镇码头上租借了一条篷船，扯起篷沿湘江向北驶去。

耿飏的母亲并不知道此行的真正原因，她在船舱中一面忙着准备早饭，一面埋怨走得太急，这也没带上，那也没弄好。可是耿飏根本没有心思理会母亲的埋怨，因为他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江面上的动静。

船行不久，忽然从大渔湾码头驶出来一只挂篷的渔船，不即不离地跟在他们的篷船后面。那只渔船的船头上架着一副渔网，但网是干的，上面没有一滴水珠。两个流里流气的“渔夫”，一个坐在船头油腔滑调地哼着色情小曲，一个蹲在船尾唱着板眼不准的《四郎探母》，两双贼不溜秋的眼睛，始终盯着前面的篷船。

“那两个人不像是打鱼的。”耿飏轻声对父亲说。

“我早就看出来啦！渔船哪有扯起满篷的？”父亲手里不慌不忙地把着舵，嘴里却风趣地说，“看来他们的网不是为了网江里的鱼，而是要网你这样的‘鱼’！”

“那怎么甩掉他们呢？”耿飏忙问。

父亲没有答话,只是不动声色地继续把着舵。驶了约摸六七十里,已到东阳渡镇,但他并未靠岸,而是一个劲地向北行驶。经过衡阳、衡山、石湾、昭陵,一直驶到湘江和淥水交汇处的淥口附近,后面的“渔船”才停止跟踪,掉头返航。

耿飏松了口气。胸有成竹的父亲一边在暮色中靠岸,一边笑着对儿子说:“看来他们相信我们确实是要从淥水回到醴陵,所以不再盯梢。这就是兵书上所说的‘金蝉脱壳’之计。现在你就从这里上岸走回东阳渡去吧!”

耿飏换上一套乡村少年的衣服,告别父母弟妹,离船上岸,借着星光向南返行,日夜兼程赶了一二百里路,终于抵达东阳渡镇。

他虽然知道兵工厂接头人的姓名和联络暗号,但并不认识此人。怎么联系呢?他装作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少年,蹲在枪炮局大门口一个旅店的墙根下,仔细观察兵工厂内的动静和进出的人们。经过一天观察,他发现,在大门内的门房对面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许多人名,其中就有那个接头人。当下班时,工人们从车间出来,在这块黑板前排队,由几个士兵进行检查,看看有没有夹带枪支零件或子弹。检查完了,每个工人便在黑板上自己的名字下划一道线,每划五下便成一个“正”字,以此记录上班的次数。

耿飏在中午和下午下班时反复观察了两次,就认准了那位接头人。傍晚,接头人从工人宿舍出来,和几个工人一起到一家小饭店吃饭。耿飏装作去要点吃的,溜过去

和他接头。

接头人其实是以吃饭为掩护，正与几个工会负责人在开秘密会议。当和耿飏对上暗号后，他们便重新约定了接枪的时间、暗号和交接地点。

黄佐等也来到了东阳渡。他们听取耿飏汇报后，立即研究行动计划。黄佐决定，由耿飏在接枪时设法引开敌人，其余的人负责接枪。

兵工厂位于湘江边，东面有一条沿江大堤，南、西、北三面都筑有高高的围墙。一条运送枪炮用的铁路支线从西南角上延伸进厂里。南墙内是一个试枪场，新造的或修好的枪支都要在这里试射。主建筑枪炮车间位于厂区中间。北面有几排工人宿舍。东北角的高地上有个土地庙，哨兵站在庙顶上，向西可以监视工人宿舍北面的围墙，向南可以俯视沿江大堤。还有几个游动哨不断地在厂区内巡查。耿飏的任务是把土地庙顶上的哨兵和厂内的游动哨吸引到南面来，以便兵工厂的同志们把预先存放在工人宿舍内的枪支弹药从北面的围墙上递出来，交给等在墙外的黄佐他们。

任务是艰巨而危险的，但是耿飏爽快地接受了这个重要的任务。下午，他背了一个破竹篓，从西南角的铁路道岔溜进厂内，在试枪场边的隐蔽处潜伏下来。等试枪的人试完枪走后，他就爬过去，扒开沙土拣子弹头。

等到天黑，他看见厂外对面山包上闪亮了三下，知道是黄佐划了三根火柴发出的行动信号。于是，他把拣到的子弹头和弹壳装进竹篓，在上面盖了些树枝乱草，然后拿

着竹篓沿着大堤向北隐蔽前进。他利用大堤上的许多茶籽树作掩护,接近了土地庙。这时,他故意弄出些响声来吸引哨兵。

赤着双脚站在庙顶上的哨兵,正在悠然自得地抽烟。听见响声,他立即扔掉烟头,端起步枪大声喝问:“哪个?”

耿飏伏在树丛里屏息不动。等哨兵收起枪时,他猛地跃出树丛,向江边飞快地跑去。

“站住!”哨兵看见一个黑影在飞奔,就一边喊着,一边跳下土地庙追上来,还“砰”地开了一枪。那些游动哨听见枪声,也纷纷向江边跑来,喊叫声、哨子声、脚步声搅乱了平静的夜空。

耿飏见目的已经达到,就将竹篓迅速扔掉,自己又折回树丛,向南到达围墙,纵身翻到墙外,一口气跑到白天租好的旅店。

哨兵们发现了竹篓,一看里面尽是子弹头和弹壳,以为是穷孩子拣破烂卖钱的,就没有再追。

就这样,16支锃亮的“老套筒”(即当时流行的“汉阳造”步枪),连同一担子弹,被递出北墙,到了黄佐手中。这些枪支成为水口山工人赤卫队的首批武器。后来,这些武器连同水口山工人赤卫队一起,在宋乔生的带领下上了井冈山。1928年11月,宋乔生与毛泽东、朱德、谭震林、毛科文五人组成湘赣边前委,成为当时边界党的负责人之一。而耿飏却从完成接枪任务后离开了自己的这位革命带路人,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宋乔生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同志们安全撤退中弹牺牲。

从农军战士到游击队长

东阳渡接枪任务刚完成，组织上又派黄佐带领一个小组到醴陵去开展农民运动。这个小组共有八个人，除耿飏是共青团员外，其余都是中共党员。为了避免引起军警的注意，他们决定分散走，到醴陵南乡的泗汾集合。

耿飏一到醴陵，就去石门口看望父母。父亲知道他这次回来，必定又有新的任务，但也不便详细询问，只是讲了两点意见：第一，行动要小心谨慎，注意安全；第二，要找个工作。耿飏懂得父亲的意思：找一个工作，不仅可以挣些钱，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而且可以用公开职业作掩护，以免引起特务、密探的注意。同时他自己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当了工人，可以在工友中广交朋友，开展工人运动，把工运和农运结合起来。主意已定，他便想法找工作，恰好从一份广告上看到，修筑醴(陵)茶(陵)公路的工地上正在招收工人，就去报名当了修路工人。接着，他前往泗汾去找黄佐他们。

自从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攻占醴陵县城后，全县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县农会、总工会、女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和商会等群众团体相继挂牌成立。县城周围各乡的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陆续成立了农会。黄佐等一到泗汾，就全身心投入了农会工作。当耿飏找到他们时，他们正在和一些农会会员开会。

黄佐得知耿飏当了修路工人，高兴地说：“好啊，以后你一面做工，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一面利用工余时间参加

农会工作。这样,就可把工运农运结合起来,来个工农大联合!”正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两个想到了一起。

根据上级的指示,他们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还组织了农民赤卫队。农民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梭镖,也有大刀、棍棒和少量土枪。武器虽然原始、简陋,但武装起来的赤卫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而平时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官僚、不法地主、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此刻都收敛凶焰,威风扫地。耿飏也领到了一支梭镖,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手持可以杀敌的武器。1927年夏,他正是高擎着这支闪闪发亮的梭镖,参加了十万农军扑长沙的战斗。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长沙的反动军阀许克祥于5月21日发动了马日事变,学着蒋介石的样子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挥起了血淋淋的屠刀。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决定,调集省城附近各县的农军围攻长沙。中共醴陵县委组织了两万农军参加这次扑城行动。黄佐、耿飏等八人和南乡各村的农民赤卫队也拿起各式各样的武器加入了向长沙进军的行列。

凶顽狡猾的许克祥在长沙南面的易家湾集结重兵,阻击农军。当农军主力从株洲向北挺进时,许克祥下令从火车上用机枪向农军扫射。农军虽然人数众多,作战勇敢,不断向前冲锋,但是原始武器终究敌不过机枪,加以农军缺乏作战经验,不懂得隐蔽,直着身子向敌阵硬冲,很多人被机枪扫倒。于是,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军,就

被敌人打散了。

扑省城失败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镇压。由于这次扑城的农军总指挥潘疆爪曾任醴陵代理县长，因此敌人对醴陵革命群众的镇压更加残酷。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工人纠察队员、农会会员、农民赤卫队员以及所有参加农军扑城行动和支持革命的人，都是“铲共清乡委员会”的镇压对象。醴陵县城成了一个大刑场，被杀害的烈士有3000多人。

当时，县城四周有很多乡镇和村庄仍由革命力量所控制。为了打击敌人，醴陵县委决定集中各乡革命力量攻打县城。1927年7月，各乡汇集农军上万人，围攻醴陵县城。耿飏扛着梭镖，作为农军的一名战士，和手持土枪、马刀、竹矛的农友们一起向县城进军。但是，这次扑城又因敌人防守严密而归于失败。

扑县城失败后，敌人加紧镇压，把泗汾等小镇也占领了。县委决定，各乡的革命力量分别进攻各镇的敌军。于是，耿飏又参加了攻打泗汾的农军行列。

泗汾的敌军只有一个排的“挨户团”，战斗力较差。当农军挥舞着马刀、梭镖发起冲锋时，这些“挨户团”吓得屁滚尿流，没有怎么交手，就投降的投降，逃散的逃散。农军顺利地占领了泗汾。

县城里的敌人闻讯，立即派了两个连来。于是泗汾又被敌人夺回。等敌军撤回县城时，农军再次攻占泗汾。这样，泗汾数次易手，最终仍被敌人夺了回去。

经过几次扑城失利，醴陵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

坏。从水口山来的八个人,有的在扑城中牺牲,有的在冲散后失去联系,最后只剩下黄佐和耿飏两人。他们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和另外几个党团员重新组织了一个小组,辗转在南乡的一些村庄中坚持斗争。后来由于敌人的追捕,他们决定暂时隐蔽到醴陵县城南面约 30 里的深山中去。

有一次,黄佐召开支部会,耿飏和另一名共青团员列席。黄佐要大家提出建议,在当前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斗争。大家纷纷提出了不少建议。耿飏说:“我们可以下山去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敌人罪行,宣传党的主张,让农民知道党还在坚持斗争。”大家都认为这个建议好,并进一步提出要把标语贴到县城里去。会上,耿飏和其他几位同志都争着要把到县城去贴标语的任务交给自己。最后,组织决定派耿飏去。黄佐说:“耿飏在东阳渡接枪中表现得很出色,胆大心细,要得!”

当天晚上,他们写了几十份传单、标语,并给反动官僚和土豪劣绅写了警告信。次日凌晨,耿飏化装成一个到城里收账的少年,把标语、传单卷成一卷,伪装成账簿藏在身上,还带了一瓶刨花水当糨糊,向县城走去。

他混进城后不久,敌人就开始宵禁。保安团的巡逻队在街上肆意逞凶,老百姓谁也不敢出门,整个县城就像一座阴森可怖的大监狱。

耿飏避开巡逻的团丁,三转两转,转到了县城东北角的城隍庙里。他想在这里等到下半夜,让团丁们“回窝”休息后再去张贴。当他一进庙门,看见有一群乞丐横七竖八

地躺在没有神像的神座上时，一个念头在他头脑中产生：何不让他们给我当个“同盟军”呢！

主意打定，他就走过去问那些乞丐，有谁认得字？当得知他们中间除了一个瞎眼的外，谁也不识字时，耿飚就从怀里掏出标语、传单说道：“明天我们‘茂源’米号开张，掌柜的请大家赏光，前去讨喜。今天夜里，请各位帮帮忙，把这些开市大吉的告示贴出去。谁愿意去贴，我这里有赏钱。”他一面说着，一面把下山前同志们凑给自己吃饭用的几个铜板捏在手里，摇晃了几下。

“我去，我去！”乞丐听得明天可以讨喜，现在又有赏钱，纷纷来抢标语、传单。

耿飚把标语、传单分给他们，还在他们讨饭的破碗里倒了些刨花水，嘱咐说：“把这些‘告示’，贴到各个十字街口。”他又拿出几封警告信，说道：“这些是‘请帖’，从那些大户人家的门缝里塞进去就行了。不过不许偷懒，我要检查的，如果贴得不认真，明天讨喜莫怪敝店不肯打发！”

“一定认真贴！”“谁不仗义，让他出门撞上保安团，进门碰上‘挨户团’！”乞丐们赌咒发誓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下半夜，等乞丐们走了后，耿飚把剩下的一部分标语，自己贴到县公署周围，连县保安司令家的山墙上也贴了一张。这时天渐渐亮了，他到城外一个馄饨摊上坐下来观察动静。隔了一会，只见从城里出来的人，三三两两都在交谈：

“共产党大队人马昨天夜里进城了！”

“满城都是共产党的标语！”

耿飏满意地笑了。这时，他觉得肚子“咕咕”地在闹“革命”，便伸手到衣兜里想掏出铜板来买碗馄饨吃；可是兜里空空如也，这才想起铜板都给乞丐们了。“饿肚子也值得！”他一面想着，一面快步向山里奔去。

当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大家都很振奋。耿飏想起几年前毛委员派遣蒋先云等来到水口山时的情景，胸中热血沸腾，便向黄佐建议，去参加毛委员的队伍。黄佐和其他同志都赞成这个意见。他们从过路的商人那里得知，毛泽东正在江西的铜鼓、修水一带，便各自收拾好仅有的几件替换衣服，连夜向布满茫茫大山的东北方向进发。

他们到达文家市附近的一个村庄后，听说文家市、铜鼓都已被敌人占领，毛委员已去浏阳。他们立即改变行程，向浏阳赶去。刚赶到浏阳，又得知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去了。

正当他们因没有见到毛委员而感到十分遗憾时，县委领导同志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留在浏阳工作。黄佐和另外几位同志都领受了县委分配的工作，和耿飏握手告别。

轮到分配耿飏工作时，县委一位管作战的委员对他说：“听黄佐同志说你参加过扑城的战斗，打仗很勇敢，因此任命你为游击队长。你的任务是打击县城附近的反动武装，和其他几支游击队一起，保卫县委和县、乡革命政权……”他把一支老掉了牙的驳壳枪和一根竹筷交给耿

飏,抱歉地说:“这支枪不太好使,也没有退壳钩,得用这根筷子退壳。子弹只有三发,要节省着打。”

这支游击队开始时只有七个队员,两支上了年纪的“老套筒”和10发子弹。耿飏带着这支由文盲农民组成的游击队,数次进攻地主武装和“挨户团”,缴获了几十支长短枪,队员也逐渐扩大到30多人,分为3个班,战斗力迅速增强。耿飏自己也在斗争中提高了组织和指挥能力,并从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参加红军 保卫苏区

1930年9月,红军两战长沙后向江西方向转移,红一军团占领了萍乡、攸县、醴陵等地。红军每到一地,除了打击敌人外,还做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并进行筹粮和扩军。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猛烈扩大红军一百万”。各级地方党组织广泛动员青壮年参军。耿飏心中重新燃起了参加红军的热烈愿望。恰好浏阳县委也已作出决定:命耿飏带领这支游击队全体参加红军。

耿飏拿着组织介绍信,带着30余名游击队员,从文家市出发,昼夜兼程追赶红军,在崎岖的山路上赶了两天,终于在醴陵西北的板杉铺附近赶上了红军队伍。

30余名游击队员被一一分编到红三军下面的部队中去。耿飏分配到红九师师部当参谋。

他参加红军后接受的第一次战斗洗礼是攻打江西吉安。

吉安,这座位于赣江西岸的名城,是敌人坚固设防的

重要据点。守敌邓英部共有三个团,再加上保安队、“挨户团”等,兵力不弱。在此之前,红军已八次攻打吉安未克。1930年10月上旬,红军第九次围攻吉安。耿飏随同红九师从安福出发,迅速赶到吉安;那时,红五军已与守敌交战,红九师立即投入战斗。红军的武器不如敌人,当时每个师只有一门迫击炮,几发炮弹。但是战士们打起仗来十分勇敢,和士气低落的敌军形成鲜明对比。战斗中,耿飏两次冒着弹雨到前沿阵地传达师部的命令,保证了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经过一番激战,红军终于击溃敌军,占领了吉安。

这时,北方的蒋、冯、阎军阀大战暂告结束,蒋介石乘机调集军队“围剿”红军。因此,红三军奉命从吉安回师赣南、闽西,保卫中央苏区。耿飏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兴国县的小固、黄岗地区休整练兵,准备反“围剿”作战。

1930年12月,蒋介石以所谓“十万甲冑”,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红军总前委制订了歼灭来犯之敌的反“围剿”作战计划。在反“围剿”军民誓师大会上,毛泽东总政委作了鼓舞民心、激励士气的动员讲话,提出了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战斗开始前,朱德总司令来到红三军驻地,在全军指战员大会上作了战斗动员,下达作战任务。他在讲话中指出:“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时机已经到来。”并宣布:“总前委决定,你们红三军担任正面攻击。希望同志们努力打!要初战必胜。……有没有信心?”

“有!”耿飏和其他指战员一道响亮地回答。

“坚决打垮敌人!”“活捉张辉瓒!”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怒吼。张辉瓒是敌前线总指挥,所以这些口号表明了红军的必胜信心。

战斗打响后,红九师师长徐彦刚见担任正面进攻的第二十六团迟迟不能推进,便命耿飏前去查询、督促。耿飏来到前沿阵地,发现王团长提着一把马刀,站在前出位置上,一个劲地命令战士向前冲,战士们更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而是直着身子从敌人火力封锁下往前硬冲,所以伤亡很大,进攻受阻。耿飏向王团长建议:首先组织火力压住敌人的火力,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让战士们利用池塘旁边的土坎作掩护,弯腰伏地冲过封锁地段,沿小路绕到敌人侧面攻击。王团长依计而行,二十六团迅速突破敌人防线,二十七团尾随他们进入战斗。这时,红三军的第七师、第八师,红四军、红十二军以及红三军团也相继进攻得手,从而对敌军形成了毛泽东设计的“五瓣莲花抄尾阵”的合围态势。

经过历时五天的激烈战斗,红军共消灭敌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包括敌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在内的9000余人被歼。同时重创了敌谭道源部。接着,红军乘胜追击,又歼灭了敌第五十师的1000多人。于是,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便被苏区军民所粉碎。

战斗结束后,耿飏被任命为红九师作战科科长。接着,徐彦刚师长在总结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时提出,鉴于许多指战员不懂得战术技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因此要成立一个教导队,培训连、排级干部。耿飏被任命

为第一期教导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还当军事教员和政治教员。于是，他和60多名连、排级干部一起度过了紧张而又充实的四个月教导队生活。

1931年5月，蒋介石又出动2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这时已经升任红九师参谋长的耿飏，和徐彦刚师长、刘英政委一道率领全师指战员，英勇地投入了第二次反“围剿”战役。

5月16日拂晓，红九师正沿着东固通往中洞的大路强行军，忽然听见右翼有枪声，徐师长立即下令跑步前进。这时，总部的一个通信员迎面跑来，通知说：“叫你们几位师领导火速到前面去。”徐彦刚、刘英和耿飏三人策马飞奔，拐过一个山嘴，看见毛总政委一手拿着指北针，一手指着一条延伸到白云山云层里的小路，正在和一位当地的老向导交谈。在他身旁，黄公略军长正蹲在路边，把那条小路标在地图上。毛泽东见他们来了，立即下令：“朱总司令和总部特务连已经在前头打响了，你们改走这条小路，直插中洞，聚歼敌人！”黄公略抬起头来补充说：“我们的打击目标是公秉藩师……现在你们火速从这条小路插过去，一鼓作气歼灭该师！”

耿飏前几天派人调查地形时，曾经侦察到这条山间小路。据当地老乡说，这是一条荆棘丛生、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只有猎人、采药者和贩私盐的才走这条路。可是这条在所有地图上都没有的秘密险路，却是通往中洞的捷径，因此耿飏就把它注记在自己的军用地图上。现在，他拿出地图和黄军长核对，发现毛总政委所说的正是这

条小路。这时，毛泽东走近耿飏，用赞许的目光看着他说道：“对！打仗就是要事先进行侦察、调查。”毛泽东的这句话以及他亲自进行调查时那种认真的神情，深深印入了耿飏的脑海，从而增强了他凡事要进行调研的信念，并影响着以后几十年的战斗和工作。所以，至今耿飏一提起毛泽东《渔家傲》中的名句“飞将军自重霄入”，就倍感亲切，因为他知道，这个“重霄”正是白云山云层里的那条小路。

经过半个月激战，红军五战五胜，歼敌三万，并将残存的敌军逐出苏区，从而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

一个多月后，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又调集 30 万人马，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司令，以陈诚、罗卓英、蒋鼎文、卫立煌等嫡系部队为骨干，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压过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决定先打敌人后路，并像牵牛一样调动敌人。

耿飏根据上级作战意图和徐师长的意见，拟定了师部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红九师的广大指战员和兄弟部队一起，一会儿进击敌军的后方联络线和补给基地，一会儿迅速撤退，引诱敌军跟在后面奔波。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找不到红军主力决战，却在炎炎烈日下像推磨似的围着苏区转了一圈，一路丢下伤兵、病号，没伤没病的也都累得筋疲力尽，士气不振。

7月31日,红一方面军进行全面反击。激战到9月中旬,共歼敌3万多,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发展了中央苏区。

第三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的第二天,敌人派飞机空袭苏区,红三军军长黄公略中弹壮烈牺牲。上级调徐彦刚任红三军军长,红九师师长一职暂缺,师部的军事指挥任务就由耿飏代理。同时,九师政委也由刘英换成了朱良才。

1932年4月,耿飏和朱良才率领红九师参加了中央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的战役。接着,又参加了水口之战和乐安、宜黄等战役。不久,上级调原二十七团团长李聚奎来任红九师师长。其后,耿飏又和李聚奎、朱良才一起率领全师指战员投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1933年1月,蒋介石再次组织兵力,以50万之众,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因受“左”倾路线排挤,已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的继承者周恩来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一起,仍然采用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大龙圩战斗中,耿飏正站在毛毛细雨中观察敌情,二十五团团团长突然奔过来说:“参谋长,快看!”耿飏透过雨幕,看见敌人指挥所前面的小桥上有个穿雨衣的胖子,正拿着望远镜四处张望。从他旁边的马匹、卫兵和提包拿图的军官来看,这胖子必是大官。二十五团团团长说:“不知是不是敌人的师长。”

耿飏说：“不管是师长还是旅长，一定抓活的。你先组织火力压住他，我带部队从后面包抄过去。”

经过一番激战，终于抓住了这个胖子，一审讯，原来此人就是敌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耿飏立即派侦察参谋彭明治把这个胖师长押送到后方。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听说抓到了敌人的师长，高兴地说：“好，好！这叫‘擒贼先擒王’呀！”

红一方面军连续奋战了将近两个月，屡战屡胜，特别是在黄陂、草台岗地区连打两个大胜仗，歼灭了敌军三个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计划，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其后，红军进行了改编，原来的师改编为团。耿飏先到红一师三团任参谋长，不久又调到红二师四团任团长，政委是杨成武。

1933年5月，蒋介石又着手筹划更大规模的“围剿”。他共调集了100万人马，其中50万兵力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9月下旬，敌人开始了第五次“围剿”。

当时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完全放弃了前四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战略，以及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等战术，而改用单纯防御的消极战法，提出了“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错误战术。这样，就使红军在战斗中陷于不利的态势。

在广昌保卫战中，正在阵地上指挥的耿飏忽然觉得右腿不听使唤，低头一看，只见裤管里、鞋子里全是血。开

始,他以为是哪位战友牺牲在身边了,便大声对警卫员喊道:“快来看看,这是谁的血,把我的裤腿都染红了!”警卫员杨力(全国解放以后曾任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过来一看,背起耿飏就跑。耿飏说:“放下,放下!搞什么鬼?”杨力边跑边说:“别动!你挂花了!”他背着耿飏翻过四座山头,一口气跑进了红军医院。

十多天后,伤口刚封口,耿飏就拄着拐杖,离开医院赶回部队。他一回到团部,便和杨成武一道率领红四团参加新的战斗。

红四团在温坊战斗中打垮了敌第八旅,俘敌 1600 多人,得到红二师师长陈光和红一军团领导的表扬。加上兄弟部队的战绩,红军在温坊之战中取得了歼敌 4000 多人、俘敌 2400 多人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并不能扭转“左”倾路线造成的不利处境。广大红军指战员虽然进行了一年又一个月的英勇奋战,仍然难于改变被动的局面,第五次反“围剿”终于遭到失败,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而进行战略大转移。

万水千山长征路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时,耿飏率领红四团担任前卫,一路上斩关夺隘,为大部队及中央纵队开路。在突破敌人设在江西信丰、湖南桂东至汝城、良田至宜章等地的三道封锁线后,红军来到临武境内。红四团驻扎在天堂圩。1934年11月17日,师部给耿飏发来电令,要他率领红四团火速奔袭道县,限在18日占领县城,并“拒止由零

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

耿飚和政委杨成武商量后，立刻拔寨起程，向西急行军100多里抵达潇水之滨。潇水，当地老百姓称之为潇水河，发源于湘桂边境的江永、江华地区，流到道县附近时河面已有400多米宽，成为敌人阻止红军西进的一道天然防线。

耿飚在行军途中已向当地老乡调查了解过道县的地形以及县城守敌的情况，此刻他站在河边观察对岸的道县县城，发现城墙上有人在行走，守敌已把用船只串连成的浮桥拉过河去，河面上并无其他船只，附近又无别的桥梁，所以急切间无法过河。怎么办呢？他当机立断，命令先头营一面隔河监视城上敌人，一面向上下游派出警戒；火力队做好夜间射击准备；担任爬城的突击部队准备云梯；一部分人员准备铺设浮桥的木板；其余部队抓紧时间休息。到了晚上，派三名战士在前面偷渡潇水，20多名紧跟其后游向对岸。当战士们到达对岸时，被敌人发觉，于是城上火光闪现，枪声一片。耿飚立即命令火力队隔河还击，压住敌人火力。泅渡上岸的战士们一部分去拉浮桥渡船，一部分隐蔽在城门口，守护渡口。等渡船一只连一只地撑回此岸后，耿飚指挥战士们火速铺上木板，加以固定，一座可以通过四路纵队的浮桥便架好了。担任突击的一个营立即冲过桥去，打进城内，守敌溃逃。红四团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潇水这道天然屏障，占领了道县县城。接着，耿飚又派出部队向北面的零陵方向警戒，以保证大部队和中央纵队从浮桥上安全渡过潇水。与

此同时,红六团也在上游地区架设浮桥,以便后续部队分路过河。

渡过潇水之后第七天,中央军委发出了强渡湘江的命令。在湘江之战中,红四团仍是前卫,奉命首先抢占左翼的界首地区,继而协助兄弟部队攻占右翼的全州,并担任阻击敌人的重任,以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耿飏带病指挥,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五天五夜的艰苦战斗,红军终于全部越过了湘江这条敌人苦心经营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由于坚持“左”倾路线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使得红军在这次战役中遭到巨大损失,由从中央苏区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为不足4万人。这种情况,促使全军指战员以及一部分中央领导人都在认真考虑:应该让毛泽东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来,指挥红军度过目前的危局。

不久,毛泽东在湖南通道会议上提出,红军应该转向西南地区,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他的这个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接着,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要到达遵义,必须越过天险乌江。因此,军委命令红一军团在江界和龙溪两处渡过乌江。

红四团受命从江界强渡乌江。耿飏率领全团来到乌江边,举目察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江中水流湍急,奔腾的江水撞在暗礁和岩石上,激起层层巨浪,还形成许多旋涡,再看对岸尽是悬崖峭壁,敌人只要用几挺机枪,就可封锁江面。别说现在江上杳无船只,即使有船也

很难通过急流旋涡而抵达对岸的险滩。

在向当地老乡调查请教,并和指战员们开了“诸葛亮会”以后,耿飏吸收大家的意见,制定了一个突破乌江天险的计划。他吩咐李英华参谋长布置一部分兵力在渡口处来回搬运渡河用的毛竹、木料,并呼叫呐喊,演出进行佯渡之“戏”,以吸引对岸敌人的注意力,同时组织人力到竹林中砍竹,准备架设竹桥的材料,自己则带领一个营到隐蔽处制扎竹筏,编结竹缆,以备渡江之用。接着,他亲自挑选了八名勇士组成尖兵队,把他们带到上游500米处下水泅渡,将一根缆绳拖过江去。

当勇士们拖着缆绳游过中流时,被对岸的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向江中射来。一发迫击炮弹把缆绳炸断,八名勇士失去了缆绳的依托,顿时被激流卷向下游。耿飏见状,立即派人到下游去把勇士们接回来。同时发出命令:“抬竹筏,我亲自上!”正好陈光师长走来视察,他不同意耿飏亲自强渡。他们两人商量决定:加强佯攻,以火力压制敌人;改泅渡为筏渡,由一个尖兵队增加为三个队,以提高成功系数;将白天强渡改为夜间偷渡,以减少伤亡。为了加强火力,耿飏向陈光师长和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提出要求炮兵支援。左权立即派炮兵营的赵章成连长带着三门迫击炮前来支援。

在夜幕的掩护下,三个竹筏载着三个尖兵队连撑带划地冲进了激流。结果,一个竹筏翻在江心,一个竹筏被冲向下游,只有三连连长毛振华率领的尖兵队筏渡成功,抵达对岸。

次日清晨,60个双层竹筏已经扎好,耿飚命令一个营乘上这些竹筏强渡。这时佯攻部队的火力组向对岸敌人加紧射击,隐蔽在崖下的毛振华尖兵队也向崖上的敌人猛烈开火,在他们的火力掩护下,这个营强渡成功,并迅速冲向山崖上的敌人。这时,松了一口气的耿飚便走向工兵阵地,和军委派来的工兵营营长王耀南一起研究尽快在乌江上架桥的方案。

红军攻占遵义后,耿飚和杨成武吩咐各营着手安排举行联欢会和会餐等活动。忽然,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来到四团团部,他们一进门就说:“不行不行,四团不能休息,有任务。”

耿飚与杨成武接受了先攻占娄山关、再占领桐梓城的任务后,立即率领红四团向娄山关进发。中途奉师部命令,全团在板桥镇休整一天。乘部队休息的时机,耿飚率领侦察分队前往娄山关实地侦察。

来到关前谷地,他和侦察员们抬头仰视,只见娄山关确是险峻异常。这个名闻遐迩的雄关,位于娄山最高处,两座高插云霄的山峰像一对刺向苍穹的利剑夹峙险关,形成了一条狭窄的隘路。从遵义北行的公路,正是沿着这条狭隘通道蜿蜒而上,经过关口通向桐梓。面对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耿飚思忖:要夺关必须循公路仰攻,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如果硬攻,部队肯定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必须采取正面进攻和侧翼抄袭相结合的战术,才能达到刘伯承总参谋长提出的“夺关快,伤亡少”的要求。但是,要侧翼包抄必须从两面的高山中找出一条小

路来,而眼前处处都是悬崖峭壁,到哪里去找小路呢?他正在发愁,恰好团部通信主任潘峰带来一位当地的老猎人。他指点着右面的群山说,那边有一条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可以绕到关后。耿飏一听,喜出望外,回到团部后,立即召集干部会议,确定了进攻方案。

翌日凌晨5时许,耿飏命李英华参谋长和潘峰率领一支突击队,带着竹竿、绳索、钩镰等登山和开路的工具,往右侧高山中去寻觅那条羊肠小道,向敌人侧后隐蔽行进。三个小时后,估计突击队已抵达娄山关侧后,耿飏便指挥主力部队抵近关前山脚下,十多把军号一齐吹起冲锋号,轻重机枪、步枪、驳壳枪同时发出怒吼,霎时间向娄山关喷出一条条火龙。

关上的守敌着了慌,躲在岩石后面和掩体里向山下胡乱射击。突然,在敌人的左翼响起了枪声,手榴弹接二连三地他们在他们中间爆炸。原来是李英华、潘峰带领突击队从敌人侧后杀将过来。耿飏见时机已到,立刻指挥部队向娄山关猛扑上去。

红四团攻占了川黔道上的这座雄关。这是红军长征中首次夺取敌人重兵把守的天险娄山关。一个多月后,当红军回师南下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指挥五个团由北向南再次攻占了娄山关。这是后话。

现在,耿飏登上娄山关,看见路旁矗立着一块石碑,上刻“娄山关”三字。他仰望蓝天,仿佛触手可及,俯视脚下,白云飘浮山腰,心胸顿时感到无比开阔,不禁想起了古人“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的诗句,便向身旁的参谋

要了笔墨，在石壁上写下了这两句古诗。

接着，耿飏率领红四团乘胜追击，当天就占领了桐梓城。在桐梓停留不到半天，红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又来传达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命令：红四团马上出发北进，占领川黔边境上的松坎，以警戒可能从重庆来的敌人。耿飏二话不说，接受了这个任务，但当时他并不知道，总部之所以这样部署，是为了保障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全进行。

遵义会议按照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的意见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愿望，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耿飏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欣慰，因为他知道，这将使红军得以转危为安，并为中国革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与此同时，耿飏奉命调到红一师任参谋长。

有一次，耿飏正在赤水河畔指挥部队过河，这时毛泽东通知红一师的几位领导同志到他那里去。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都去了，耿飏不在师部，故而未去。毛泽东特地写了一封短信，要黄甦带给耿飏。信中表扬了耿飏和红四团在抢渡潇水、乌江的战斗中以及几次架桥的任务完成得好，保障了大部队通过。

此后，耿飏和红一师的几位领导一起率部参加了四渡赤水、再克遵义、攻占曲靖、抢渡金沙江等战斗。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西南部的山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命耿飏率领红一团（团长为杨得志）为前卫团。耿飏受命后与杨得志率部迅速攻占了德昌，绕过西昌，进到泸沽。

这时，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一团加强工兵和通讯分队，组成北上先遣队。由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聂荣臻为政委。该先遣队的任务是为全军做战略侦察和开辟通路。耿飚便在先遣队中协助刘伯承、聂荣臻工作。

先遣队通过彝民区后，奉命抢占大渡河畔的安顺场，为大部队渡河开路。耿飚、杨得志和黎林（红一团政委）率领部队猛冲过去，消灭了守敌一个营，并夺得两条船。这两条船是对岸敌人派过来搬家的，其余船只早已被他们拉走了。耿飚和红一团的领导立即组织渡河，一方面向两位老船工讲解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主张，说明红军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队伍，请他们帮助将红军渡过河去；一方面从各营连中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在老船工的帮助下，在炮兵和掩护火力的支援下，17名勇士奋不顾身强渡过河，占领了滩头阵地。接着，在17名勇士的掩护下，老船工驾驶这两条船，在流速达每秒四米的急流中不停地来回穿梭，将红一团全体指战员和先遣队其他人员分批渡到河东。

正当红一师的二团和三团渡河时，毛泽东来到了安顺场渡口。他注视着在浪尖上颠簸的两只木船，对身旁的刘伯承、聂荣臻和林彪等说：其他几个军团即将来到渡口，仅靠两只木船渡河，势必旷日费时，不利于摆脱后面的追兵，因此必须迅速夺取北面的泸定桥。他随即下令：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先遣队及红一师沿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方向进发。西岸则由林彪指挥红二师向北急进。这样，红一军团的两个师沿大渡河两岸齐头并进，直奔泸定桥。

耿飏和红一团走在前面。他们边走边打，扫清了沿途敌人准备隔河射击西岸红军的火力点。为了及时赶到并夺取泸定桥，他们连夜行军。越往上游走，河面越窄。天亮时，耿飏发现了对岸行军队伍中的熟悉身影。原来，红二师以四团为前锋，他们与东岸的前锋红一团正走在同等位置。红四团的指战员们也发现了东岸的老团长耿飏，便纷纷喊话、打手势向他致意。两岸的勇士们互相鼓舞，遇到敌人时还互相以火力支援，共同歼敌。

经过两天急行军，两岸的红军几乎同时到达目的地。红四团组织了英雄突击队，以大无畏精神夺取了只剩下九根铁索的泸定桥。与此同时，耿飏和红一师的英雄们在滂沱大雨中击溃守敌，攻占了泸定城。于是，两岸夹击夺取泸定桥的计划得到胜利实现，从而保证了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安全渡过了长征路上又一天险大渡河。

接着，红一方面军越过雪山、草地，经过少数民族地区，跨过渭河，攻占通渭城，然后向六盘山进发。从通渭出发时，毛泽东、周恩来和耿飏在一起行军。行军中，耿飏等指挥部队打垮了敌人的一个骑兵团，毛泽东很高兴，对耿飏说：“你们总结一下打骑兵的经验。今后要注意这些‘六条腿’（指敌骑兵）了。听说西北有‘四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四人）哩！”

耿飏汇报说，在草地上我们也曾遇到过骑兵，和他们打过交道。乍一看，他们倏忽而来，倏忽而去，速度很快。但只要两三个人背靠背围成一圈，专门射击他们的坐骑，他们就难于施展其伎俩了。我们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

多半摔个半死。

毛泽东听得很有兴趣,手臂向前一挥,笑着说:“这个打法对头,这叫做‘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你们可以编一个打骑兵的歌子,让大家学。”他还指示,不能把这条“尾巴”(指尾随红军的敌骑兵)带进陕北根据地。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红军集中兵力,在杨城子以西地区把尾追的三个敌骑兵团彻底击溃,从而保证了红一方面军完成长征这个举世无双的壮举,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

保卫边区 抗击日寇

红军抵达陕北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中央军委部署了新的战斗任务——直罗镇战役。耿飏率部参加了这个被毛泽东称为中国革命立足西北的“奠基礼”的著名战役。

红一军团在直罗镇战役中消灭了敌一〇九师后,又冒雪奔袭太白镇,歼灭敌一〇六师一个团。接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下令继续进攻盘踞于甘泉的敌一一〇师。

甘泉之战中,耿飏负了重伤——守敌从城墙上扔下的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一块弹片在他耳根下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口子,顿时鲜血直流。耿飏掏出随身携带的止血白药,敷在伤口上,便继续指挥部队作战。陈赓、罗瑞卿、杨得志等闻讯赶来,劝他立即撤下去治疗,耿飏不同意。正在这时,彭德怀来到前线,一看耿飏的伤势不轻,马上

叫警卫参谋打电话给红十五军团的徐海东,要他让卫生部长“戴胡子”火速赶来。

戴部长骑着徐海东的骡子,星夜奔驰 200 多里赶到甘泉。他一见耿飏就大声责备:“耿飏你不要命了?伤成这样还骑马到处跑!”

耿飏和“戴胡子”是熟人,便笑着回答:“戴胡子你别大惊小怪。我的伤我自己清楚,不过削了块肉去,没伤着骨头。”

戴部长“哼”了一声说:“伤了骨头你早完了。你知道这是什么部位?这是危险三角区,紧挨着大动脉……你快住院吧!”于是,耿飏不情愿地住进了红军医院。彭德怀派自己的警卫员住到医院里来,和耿飏的警卫员一道看住耿飏,不让他离开医院到处乱跑。

为了巩固陕甘宁边区,并开辟通向华北的抗日路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渡黄河东征。耿飏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要求出院参加东征。戴部长起初强调伤口没有愈合,危险期未过,不同意他出院,但是禁不住耿飏再三要求,最后勉强答允,临别时还嘱咐:“保重啊,那地方可是危险三角区!”

改组后的红一师由陈赓任师长。陈赓的性格很开朗,说起话来十分幽默。他见耿飏的颈部缠着纱布,就诙谐地说:“看看!参谋长怎么把绑腿打在脖子上呀?”接着,他又关心地向耿飏介绍治伤的办法:“参谋长,我告诉你个秘方,陕北的土炕,烧得热乎乎的,舒筋活血,保你伤口愈合快。”

红军渡过黄河后,在东岸的三交镇发出了东进抗日通令。当时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自己不抗日,也不让红军东进抗日。他调集晋军前来堵截红军。红一师和兄弟部队奋起抗击,在关上村一战中消灭了阎锡山的王牌军独二旅。接着,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向同蒲路进击。红一师属右路军,他们在孝义县的兑九峪地区又歼敌两个团,然后越过汾河,攻占了介休县城。

面对红军的凌厉攻势,阎锡山惊恐万状,急忙发电向蒋介石求救。早就想染指山西的蒋介石,乘机将20万中央军派往山西。根据敌情的这个重大变化,毛泽东随机应变,决定将全部红军撤回河西。

红一师奉命殿后,保证全军安全过河。这时,敌二十五师孤军突出,紧跟在红一师后面。陈赓对耿飏说:“你带一个团把二十五师这个出头鸟给收拾了!”耿飏便率领一个加强团迎击敌人。他命两个营埋伏在正面及两侧,另外两个营绕到敌军后面兜屁股进攻。当敌军被突如其来的进攻搞得晕头转向,前后联络被切断时,预先埋伏的两个营奇兵突起,把敌人一个团一口吃掉。在战斗中,耿飏亲率战士与敌军拼刺刀,直杀得敌人呼爷叫娘,死的死,伤的伤,许多人被俘,残余者落荒而逃。红一师在掩护大部队安全渡过黄河后,自己也迅速回到河西。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党中央决定在瓦窑堡开办红军大学,以培养抗日干部。耿飏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红大”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该校第一期分为三个科,耿飏等师以上干部都是第一科学员。

当耿飏在“红大”即将毕业时，周恩来通知他，中央军委决定调他到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去任参谋长。毛泽东也与他谈话。耿飏问道：“请示主席，叫我去干什么？有什么任务？”毛泽东答道：“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耿飏有些不理解，便认真地说：“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毛泽东笑着说：“他们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耿飏从“红大”第一科政委罗荣桓手中接过了毕业证书后，立刻赶赴数百里外的盐池，到红四军军部报到。他在红四军中，与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等合作得很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发动，也宣告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四军编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该师师长为刘伯承，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教导团和各直属队。耿飏任三八五旅副旅长兼参谋长。

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下，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节节败退或不战而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东北和南方各地的抗日队伍却毅然走向抗日前线，活跃于敌后，担当起了抗击日寇的重任。

正当耿飏和战友们摩拳擦掌，准备奔赴抗日战场时，却传来了上级命令：三八五旅只有七六九团开赴前线，而旅部和七七〇团留在后方，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耿飏和王维舟旅长一道率领部队驻守在甘肃庆阳一带。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陇东事件。这两次事件,都是国民党顽固派指使其在陇东的驻军有计划、有预谋地挑起的。这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不仅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当地的爱国群众组织,封锁八路军的粮草供应,公开进行反共宣传,而且多次袭击驻守庆阳地区的八路军,拘捕和绑架八路军指战员及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并扬言要消灭陇东八路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耿飏亲率一部分兵力,将肇事的一名国民党官员和一名警官抓获,要他们改弦易辙,不再挑衅。但是,国民党甘肃省省长朱绍良不但不知悔改,反而于1939年4月上旬密令国民党军一六五师派兵攻打由八路军驻守的镇原县城。中共方面急电蒋介石和朱绍良,要求停止进攻,由双方派人商谈。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理睬中共的合理要求,先后两次冲进镇原城。驻守的八路军奋起反击,两次均将顽军击溃。这就是第一次陇东事件。

到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又挑起事端。他们派重兵突袭八路军驻守的宁县和镇原县城。当时这两城分别由七七〇团的二营和三营驻守,兵力较少,且并无防备,因此被迫从城中撤出。接着,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国民党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赵思忠(绰号赵老五)又率部侵入属于中共边区政府管辖的洪德区,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当地老百姓对赵老五恨之入骨,纷纷要求八路军惩罚这个惯匪。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边区,巩固抗日大本营,耿飏奉命指挥部队进剿,歼灭了这帮土匪,将其巢穴全部

摧毁，只有赵老五只身逃逸。

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边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三八五旅选择在庆阳东北的大山里开荒屯垦。耿飏率领部队进山垦种，利用大凤川、小凤川水源充足的有利条件，种出了陕甘宁边区稀有的稻米，除了满足本旅各部队的需要外，还上交中央或调拨给兄弟部队。

1941年，耿飏奉命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三年后毕业，调到晋察冀军区工作。当他向在延安的战友们一一告别，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交给他一个任务：顺便把一个美军观察组护送到晋察冀去。周恩来说：“本来，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一架飞机，但是涞源（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那边的机场不保险，所以改为骑马。这些美国人对我们还了解，你要团结他们，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他还谆谆嘱咐耿飏：这是盟军的观察组，是国际友人，因此，一路上要以礼相待；但是另一方面，这次是千里行军，又要通过敌占区，必然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所以应该使他们遵守行军纪律，才能便于指挥，共同克服困难，顺利到达目的地。周恩来的这番嘱咐，使耿飏第一次受到了如何做好外事工作的教育。

接着，周恩来亲自陪同耿飏到叶剑英（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外事组组长）那里去领人。这个美军观察组共有11人，在来延安之前，都曾在重庆等地“观察”过国民党军队。叶剑英告诉耿飏：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外事组特派韩叙（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我国驻美国大

使)、董越千(建国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我国驻瑞典大使)和马振武三人为翻译;同时,为了保证路途安全,总部决定派一个警卫排随行。

于是,耿飏告别中央首长,告别延安,带着这支中西合璧的队伍向华北进发。这是一次不平常的军事行动,也是一次马背上的外事活动。一路上,这些美军军官自由散漫,不遵守纪律,给行军增加了许多困难。但是耿飏不急不躁,遵照周恩来的嘱咐,对全体观察组成员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还组织战士们帮助这些美国人学习骑马,终于使他们逐渐适应了环境,遵守了纪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耿飏率领这支中西混合的队伍胜利抵达晋察冀军区机关驻地——河北阜平的城南庄及其附近村庄,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具有国际意义的特殊任务。

到晋察冀后,耿飏被任命为军区副参谋长。由于军区参谋长唐延杰调到冀东去任职,所以聂荣臻司令员指定由耿飏负责作战工作,另外几位副参谋长分别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

当时晋察冀的军事任务主要是进攻和消灭日伪军,扩大解放区。耿飏参加制定了军区的战略方案和战役计划。1945年初,晋察冀军区指挥各二级军区和军分区,发动了对日伪军的春季攻势,收复了数百个村镇,光复了任丘、河间、新镇、文安、饶阳、安平、武强、深泽、灵丘等县城,威逼北平,并重新掌握了紫荆关要点。从5月中旬起,又发起夏季攻势,向敌占区开展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约两个月的战斗,各区部队战绩辉煌,歼敌1万多人,收复

了上千个村镇,光复了献县、大城、霸县、涞源、怀安、崇礼等县城,大大扩大了解放区面积,并将日伪军压缩到铁路沿线地区及部分城镇。春夏两次攻势,使晋察冀战场的对敌斗争态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接着,中央军委命令晋察冀部队迅速占领张家口,打通去东北的通道。当时,聂荣臻和军区其他领导人都在延安开会,由军区副政委程子华和耿飏一起主持军区工作。他们接到军委命令和聂荣臻发来的“相机夺取张家口”的电报后,立即调集部队向张家口进军。

张家口这个塞上重镇,是察哈尔省的省会,日寇以此为中心,苦心经营了防御工事,屯积了大批粮食和军火。为了保守这些工事的秘密,日本兵杀害了数以万计的中国民工。

8月17日,程子华和耿飏电令冀察军区派部队包围并进攻张家口的日伪军。冀察军区即命第十二军分区(即平北军分区)派第四十团和第十四团向张家口急驰。他们在第十三军分区第二十团和察北骑兵支队的协同配合下,完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

耿飏奔赴前线,到各部队去看望指战员。在部队待机地域,他遇到了在中央苏区和长征时的警卫员杨力。这时的杨力,已担任了营长职务,正在枕戈待命,准备投入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呢。

8月20日拂晓,耿飏发出了总攻命令。各部队指战

员奋勇争先,浴血杀敌。经过一番激战,部队从东、南两面攻入城内,占领了日本领事馆,突破清水河铁桥防线。日伪军死伤被俘者甚众,残余的日军扔下妻子儿女,丢盔弃甲,狼狈逃窜。22日,张家口这座塞上名城回到了人民手中。这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寇反攻以来夺取的第一个省会城市。

驰骋在解放战争硝烟里

1946年初,耿飏奉命到古都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的工作。北平军调部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代表团组成。耿飏是中共代表团的副参谋长兼交通处长。

鉴于八路军并无军衔,为使中共代表团成员与对方谈判或打交道时方便起见,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特别任命了一批将校:叶剑英(团长)、罗瑞卿(参谋长)、李克农(秘书长)等为中将,耿飏、宋时轮、李聚奎、陈士榘、黄镇等为少将,韩念龙等为上校。于是,耿飏就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和美蒋代表在谈判桌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向解放区发动进攻。8月10日,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军事调处失败。这样,军调部就自然解体。耿飏于9月上旬离开北平,回到晋察冀军区。

那时,晋察冀军区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等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设在张家口。因此,这

个塞上重镇已成为晋察冀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也许正是这一点，蒋介石把张家口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军事目标，调集 30 多万兵力，从东、西两线对其组成包围态势，企图一口吃掉晋察冀主力。

聂荣臻召集军区高级指挥会议商量对策。耿飏在会议中提出：全军区野战部队加上地方部队，只有十来万人，不到敌军的三分之一。这种兵力对比敌众我寡的情况，再加上我们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整个军事态势不利于我军坚守张家口。因此，我们的作战原则应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拘泥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他的这个意见，符合当前的军事形势，也符合中央军委来电中“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指示精神，因而被会议所采纳。

会上决定组成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由肖克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耿飏任参谋长，直接到前线指挥作战。会议还决定：遵照毛主席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应把主力部队配置于东线，先集中打击和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对傅作义部队，则以少数兵力予以牵制和阻击。待沉重打击了蒋军，消耗其有生力量后，我军再撤离张家口。

根据上述决定，耿飏于会后立即带着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杨尚德等三人，驱车前往张家口东南面的怀来前线，设立野战军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勘察地形，并指挥部队落实各项作战准备工作。

9 月底，东线的国民党军队沿平绥路向怀来一线发

动进攻。经过十多天激战，晋察冀野战部队在地方部队的协助下，不仅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而且毙、伤、俘敌一万余人。蒋军有六个师遭到沉重打击，其中两个整团、一个整营和三个山炮连被全部歼灭。鉴于在这次战役中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完成了预定的作战任务，因此晋察冀军区领导决定主动撤离张家口。

耿飏在离开这座自己参加战斗，从日伪军占领下夺回来的塞上名城时，一步一回头，心中默念着：张家口，我们一定回来！你一定会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

离开张家口后，耿飏随着军区司令部转战平汉路。在保北（保定以北）战役中，耿飏按照聂荣臻司令员的决策，组织部队围攻龟缩在姚村的敌军。次日深夜，他获悉保定敌人已派出一个师和一个旅增援姚村，而且将于拂晓后派飞机来轰炸我军，便将这敌情向聂荣臻汇报，并找了肖克、罗瑞卿一起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恋战，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于是，聂荣臻果断地下令撤退。

耿飏向各个部队传达了拂晓前撤出战斗的命令，又去组织司令部机关准备转移。当这些工作办妥后，他回到聂荣臻的住处。这时，东方已出现鱼肚白，他便催促聂荣臻赶快离开。聂荣臻还不肯走，耿飏急了，一面动手收拾东西，一面说道：“敌人的飞机可能马上就来轰炸，您的住处目标太大，必须尽快离开。”在他再三催促下，聂荣臻才同意离开。他们来到村口上了马，走出不多远，就看见敌

机朝村庄飞来,接着投下几颗炸弹。在轰隆声中,聂荣臻回头向村里望了望,说道:“耿飏,你很机警,你看,敌机果真炸中了我们住的房子!”耿飏望着村里的滚滚烟尘,心中暗想:“好险哪!幸亏早走了一步。”

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迁到了冀中的安国。聂荣臻和耿飏等都住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有两三天,聂荣臻没有见到耿飏,也不见他到食堂吃饭,心中不免有些纳闷:耿飏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干什么?莫非是病了?

其实,耿飏这时正在从事一件重要的工作。三天前一个宁静的夜晚,耿飏睡在床上,想起不久前中央军委、毛主席发来电报,批评晋察冀军区在平汉路诸战役中一直打被动仗,没有打歼灭战,故而战绩不大,指出今后应该“完全主动作战”、“大踏步进退”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耿飏觉得中央的这个批评严肃而中肯,切中了前一阶段作战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分工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他深感自己没有做好工作,所以心潮起伏,转侧难眠。

他又想起,军区领导最近作出的要“打出去,争取主动”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接下来就要看我们参谋部门能不能把这种决策演化为具体的作战方案和战役计划。想到这里,他立刻披衣下床,点上蜡烛,摊开军用地图,伏案拟订起新的作战方案来。

他连续奋战了三日三夜,不但没有到食堂去用餐,有时连警卫员放到桌边的饭也忘了吃,终于拟订出三个攻打石家庄的作战方案。他自己对第二个方案最为满意,称

之为“掰蟹脚”方案。因为，他想起童年时在家乡的河滩上捉螃蟹，为了不被它钳住，不让它逃跑，曾把蟹的螯和脚全都掰掉。现在，他把石家庄的敌人比作螃蟹，觉得必须像掰蟹脚那样先扫清其外围，切断其外援，把它变成一座孤城，然后才能全力围攻它。因此，第二个方案规定：先歼灭石家庄周围各县及其西面正太铁路（从正定到太原）沿线的敌人，再进攻东面津浦路和北面保定的敌军，切断它和太原、北平、天津的联系，然后集中力量围攻这个华北重镇。

第三天，当耿飏正在对这几个方案作最后审核时，聂荣臻推门进来，他一见耿飏熬红的眼睛和桌上的方案后，便明白了一切。聂荣臻十分赞赏耿飏的设想，决定召开会议对这几个方案进行讨论。

1947年3月下旬，军区召开了各纵队旅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聂荣臻首先谈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晋察冀的情况，传达了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会议的主要精神，然后要大家讨论耿飏拟订的作战方案。讨论结果，大多数与会者赞成第二个方案，并对此作了补充。会后，军区将此方案上报中央军委，获得批准。

自4月上旬至7月上旬，晋察冀部队按照上述方案开展军事行动，先后进行了石家庄外围战、正太战役、青（青县）沧（沧县）战役和保北战役（包括进攻保定西面的满城、完县之敌的战斗），占领了数十个县城和军事要点，歼灭了大量敌人，并控制了正太路、石德路（石家庄至德州）及津浦路、平汉路的部分路段，从而为解放石家庄掰

去了“蟹脚”。

中央军委对上述方案的实施十分赞赏,当正太战役正在进行时,毛泽东就在给晋察冀军区的电报中说:“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在晋察冀视察的朱德总司令也指出:“你们的这些想法,合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从晋察冀来看,正太战役为尔后解放石家庄创造了条件;从全局来看,正太战役配合了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从东面打击了胡宗南。所以,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

保北战役后,晋察冀军区成立了新的野战军领导机构,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为第二政委,耿飏任参谋长。10月中旬,罗瑞卿赴阜平开会,杨、杨、耿三人率领部队在保定北面铁路两侧寻找战机。这时忽然传来消息:驻在石家庄的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领其军部和第七师另加一个团,已离巢北进,企图增援保定。

一听到这个消息,耿飏异常高兴,心想:“机会来了!罗历戎终于出动了!”本来,前面拟订的作战方案,其箭头最终指向石家庄;经过几次战役,虽然掰掉了蟹脚,但是由于石家庄驻有敌人重兵,因此完成作战方案最终目标的条件尚未成熟。现在,罗历戎离窝出洞,正是天赐良机。我们只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战机,将这股北犯之敌歼灭,就为解放石家庄创造了有利条件。

他把这个想法和杨得志、杨成武一说,二杨深表赞

同，于是，三人就在行军中作出决定：立即挥师南下，围歼罗历戎部。

耿飏命作战参谋余震拿出军用地图，铺在路旁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杨、杨、耿三人围在地图前，仔细地查看敌军行进的路线，准备找出一个合适的围歼地点。耿飏指着地图上望都以南约30里的清风店地区说：“我看在这里打比较理想。”二杨同意。于是，他们马上发布命令：除了第二纵队的一个旅和第三纵队的两个旅以及一个独立旅留在保北地区阻击北面的敌军外，其余各纵队、各旅均连夜急行军南下，赶到200里外的清风店地区设置伏击圈。

两天后，解放战争中负有盛名的清风店歼灭战，按照杨、杨、耿的意图和部署打响了。经过三昼夜激战，这支国民党精锐部队全部被歼，其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及第七师师长李用章均被俘获。

接着，耿飏又参加了由朱德、聂荣臻直接指挥的石家庄攻坚战。经过六昼夜浴血奋战，英勇的晋察冀军民解放了这个敌人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这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人民解放军攻占的第一个大城市，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说，这次战役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石家庄的解放，标志着耿飏在安国时拟订的作战方案已完全实现。这也表明：耿飏不仅是一名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勇将，也是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杰出的军事家。

不久，晋察冀野战军改编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后又

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原野战军下属的各个纵队都改为军，统归兵团管辖，这就是《毛泽东选集》中多次提到的“杨罗耿兵团”。耿飚任该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解放战争后期，这个威名远扬的杨罗耿兵团参加了平津、太原、兰州等战役。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耿飚又和杨得志一道率部参加解放宁夏的战役。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宁夏守敌不得不派出代表与解放军代表进行谈判。耿飚参加了谈判及《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签字仪式。宁夏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银川市各界人民举行向解放军献旗大会。当耿飚从宁夏省人民和平委员会的代表手中接过绣着“伐暴救民”四个大字的锦旗时，不禁感慨万千：20多年革命战争的烽火，终于烧毁了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殿堂，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新中国即将向全世界展现它那生机勃勃的英姿！

1950年初，耿飚奉调到外交部门工作。当他依依不舍地向战友、向军营告别时，心中默默地自语：“我，永远是人民的战士！”

将军打赌分胜负

赴京报到之前，耿飚向组织上告假，同夫人赵兰香带着孩子们一起回到阔别20年的醴陵去探望乡亲。

火车缓缓驶进醴陵的阳山石车站。耿飚刚下车，欢迎的人们纷纷拥上前来和他握手。其中一位英姿勃勃的解放军将领一面紧握耿飚的手，一面喊道：“欢迎，欢迎！我

的老乡！想不到我们竟在故乡相见！”耿飏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三年半前和自己在四平进行辩论和打赌的陈明仁。

三年半前，耿飏作为北平军调部派出的第二十八停战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从沈阳奔赴四平。因为当时蒋介石正调集军队，准备进攻驻守四平的东北民主联军。不料行到铁岭，就被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的部队软禁。当时耿飏带着电台和机要员，但是陈明仁吩咐其部属不让他使用这部电台和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联系。耿飏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停战小组中美国代表的电台向北平发报。他料到，陈明仁虽然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但还不敢阻止我们和美国人接触。于是，他叫机要员把要发出的电文译成密码，然后带着翻译到美国代表的驻地。美国代表听明来意后，开始时面露难色，但挡不住耿飏据理力争，为了维护其“中立”、“调解”的假面具，只得同意。这样，耿飏就绕过国民党的监视和限制，将被陈明仁软禁的情况和准备进攻四平的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及时报告了北平中共代表团。

过了两天，耿飏见自己住处门前的哨兵由一人增至两人，知道陈明仁还不想解除软禁，便向第二十八停战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刘建义提出抗议。不料，刘建义将两手一摊，耸了耸肩，摇头说道：“我也没有办法！在铁岭地区，陈军长是最高长官，而且他是中将，我是少将，论军衔我也得服从他的命令。”

“那我去找陈明仁！”耿飏气愤不已。

刘建义又摇了摇头：“陈军长正忙于指挥，恐怕不会见你。别着急，乘这几天清闲无事，咱们先来下两盘围棋。”

“不！”耿飏坚持己见，“我一定要见陈明仁！请你帮助引见。”

“好，看在我们是湖南老乡的份上，我帮你这个忙。不过，如果你说要去向他提抗议，那他肯定不会见你。这样吧，他和你都是醴陵人，就以醴陵同乡的名义要求见他。”

过了几天，陈明仁终于同意和耿飏相见。耿飏一见陈明仁，不等他畅叙同乡之谊，就毫不客气地责问：“为什么阻碍停战执行小组去四平进行军事调停，还软禁我们？……”

陈明仁辩解道：“这个，这个，嗯，这是因为前面在打仗，汽车过不去了，并非阻碍你们去四平，也没有软禁你们。”

“在我的住处门前派了两个哨兵看守，这还不是软禁？”耿飏理直气壮，毫不退让，“我还拍了照呢！”原来他为了留下遭到软禁的证据，在住处门前自摄了一张和两个国民党哨兵的合影。

在事实面前，陈明仁无法再作辩解。沉默了一会，他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唉，我也没有办法，这是‘高峰’的命令。”他所说的“高峰”，指的是蒋介石。后来，耿飏了解到，其他停战执行小组中的中共代表也都遭到相似的待遇，证明陈明仁所说不假，阻碍停战小组执行调处任务，确实是蒋介石的统一部署。

又过了几天，刘建义兴冲冲地告诉耿飏：“好了，现在可以去四平了。”原来，东北民主联军在给予进犯之敌有力打击后，主动撤出四平，向长春方向撤退。损失惨重的国民党军队以“胜利者”姿态进入四平。于是，陈明仁便以主人的身份在四平接待耿飏。

由于四平之战已经结束，所以第二十八停战执行小组也无军事调处任务可以“执行”。这时，陈明仁却对耿飏“热情”起来。他不但举行宴会欢迎第二十八停战执行小组，而且晚上还硬拉着耿飏和自己联床而睡，说是要通过聊天加强同乡情谊。

耿飏心想：一起睡就一起睡，聊天就聊天，看你究竟要谈些什么！

别看陈明仁是国民党军队中一员虎将，平时对部下惯于颐指气使、怒目厉声，可是此刻同客人交谈，颇懂得谈话艺术。你看他一开始就从“同乡情谊”谈起：

“据我所知，在你们共军将领中有两位是醴陵北乡人，一位是你老兄，一位是左权将军。听说杨得志将军也是醴陵人，但他不是北乡的。我的老家北乡洪源冲，和你家严家冲、左将军的老家东冲埔黄茅岭，相距仅咫尺之遥。我们不仅同省、同县，而且同一个乡，所以是真正的‘同乡’。可惜，左权将军已经去世，我们则同乡而不同道，如今竟闹得兵戎相见，实在太遗憾了！”

耿飏答道：“左权同志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他为保卫我们的国家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在我们两党、两军之间，虽然也经常发生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事件，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现在之所以兵戎相见,完全是由于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双方协议的缘故……”

接着,两人就近来国共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原因和责任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辩。忽然,陈明仁改用较为缓和的口吻说道:“好了,不谈这个,让我们换个话题。我说呀,你们的部队不仅装备差,而且生活也太苦了。你看我们的生活有多好,吃的是洋面,穿的是美国卡其。……”

耿飏反问:“你是不是觉得全用外国货光荣啊?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爱吹外国的?”

“你们的武器都是老掉了牙的。你看我们的武器装备,不但有卡宾枪,还有美国新式的飞机、坦克、大炮。”

听到这里,耿飏想起了被这些美式武器杀害的战友,不禁怒火中烧,忍不住提高嗓门责问:“你是不是认为用外国枪炮来屠杀中国同胞是英勇啊?”接着,他以自己曾做过工的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为例,指出帝国主义把从中国掠夺去的金属制造武器,再用这些飞机、坦克、枪炮、子弹来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

“不管怎么说,”陈明仁又转换话题,“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何以见得?”耿飏问道。

陈明仁总结了“国民党必胜”的几个原因:第一,领袖(指蒋介石)懂军事,上过日本军校;第二,武器装备精良;第三,兵力大大超过中共军队;第四,有美国援助。

“关于打仗,”耿飏侃侃而谈,“你们虽然背信弃义,向

我们进行突然袭击,但是到处碰得鼻青脸肿。就拿四平之战来说,我们在以寡敌众的情势下,给了你们以沉重的打击,然后主动撤离,这难道能说是你们打胜了吗?”他停顿了片刻,继续说道:“的确,我们的枪炮、兵力不如你们,也没有美援;但是,你读过《孙子兵法》,一定知道民心、士气对打仗的重要性,我们就是依靠民心、士气来打败你们。在这里,我可以送你两句话。”

“哪两句?”

“抗战时期,毛泽东主席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过一篇社论,标题是《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现在我改动几个字,赠送给你:请看今日之中国,必是人民之天下。”

耿飏的辩驳有条有理,言之有据,使陈明仁感到难于对答。他便赶紧收篷:“你们共产党就是擅长宣传,会讲大道理。好了,我不同你辩了!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两年以后,不到三年,我们一定消灭共产党。”

耿飏立即针锋相对:“至于说到内战的前途,我敢保证,不出三年,国民党一定失败。”

陈明仁问道:“你敢跟我打赌吗?”

“行!”耿飏回答得干脆。

于是,两个“同乡不同道”的将军,就这样在联床而卧的环境中,为中国的前途而打起了这个奇特的赌。

正因为有了这次打赌,所以三年半以后,当历史的车轮已经越过纷飞的战火,透过弥漫的硝烟,将其前进的辙印清晰地印在华夏大地之时,陈明仁还念念不忘偿还自

己输掉的“赌债”。

当然，此时的陈明仁已不再是当年以四平之役的“胜利者”自居的国民党将军，而是一位与耿飏一样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原来，国民党侵占四平以后，陈明仁被调回南京任总统府中将参军，1948年冬，被任命为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后兼第一兵团司令官，率部驻守湖南。1949年8月初，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面前，陈明仁跟随程潜毅然通电起义，为湖南的解放立了功。8月上旬，起义部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由陈明仁任司令员。后来，该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二十一兵团司令部本来设在浏阳，由于该兵团所属两个军均驻守醴陵以南地区，因此1950年初，即耿飏抵达醴陵的前几天，兵团司令部从浏阳南移至醴陵。此时，陈明仁从醴陵县长那里得知耿飏将到，便亲赴车站迎接。

耿飏在醴陵县政府的招待所刚刚住下，便转身到二十一兵团司令部去拜访陈明仁和兵团政委唐天际。双方寒暄几句后，陈明仁立刻把话题转到了那次打赌上。他直爽地对耿飏说：

“四平的打赌，你赢了，我输了！”

耿飏连连摇手：“你我之间无所谓输赢，应该说是蒋介石输了，人民赢了。况且你现在是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所以你还是赢家。”

“这是两回事！”陈明仁答道，“从四平打赌来看，还是我输了！”

“那么,从现在起打赌之事就算结束了。”耿飏笑着说。

“不,还没有结束!”陈明仁显得很认真,“这样吧,明天我在家设个便宴,一来为您接风,二来作为偿还这笔‘赌债’。请唐政委出席作陪。”

耿飏推辞不掉,只好答允。

谁知道,第二天耿飏来到陈明仁家里一看,不禁怔住了:哪是什么便宴!堂上摆开十来桌酒席,简直是个大型盛宴!

陈明仁见到耿飏的惊愕神情,急忙解释:“今天出席的都是我们兵团的团以上干部。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对四平打赌作个交代。”接着,他举起酒杯,向大家高声说:

“耿飏同志也是醴陵北乡人,所以是我的老乡。三年多前我们在四平相会,今天我在家乡欢迎他,这真是有缘。当年我在四平也曾宴请过他,不过,那次在座的大多是国民党军官,今天在座的都是解放军指挥员,这说明了历史的发展。记得我们在四平有过一场争论,他水平比我高,眼光敏锐,看得比我远,我说不过他,就和他打了个赌:我说两年内国民党一定胜利,他说不出三年国民党一定失败。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那次打赌,他赢了,我输了。现在,我敬耿飏同志一杯,作为向赢者致贺,我自己喝一杯作为罚酒,以此来了结我们当年的打赌。”

他刚说完,耿飏就站起来,也端起酒杯说道:“陈将军是有名的帅才。我能和他在四平相识,确实像他刚才所说的是有缘,今天又在故乡和他会面,更是高兴。我们打赌

的输赢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取得了胜利。而陈将军顺应历史的发展,毅然率部起义,为人民革命事业立了功。今天我们作为革命军人,作为同志在这里一道举杯,共庆人民革命的胜利,这就是四平打赌的圆满的结束。来,大家干杯!”

说完,他和陈明仁、唐天际相互碰杯,三人都仰脖一饮而尽。在座的几十位军、师、团级干部也都站起来干杯。

宴会后,陈明仁得知耿飏要去严家冲看望乡亲,便命后勤部门挑选几匹好马,供耿飏等代步。他还考虑到湘东解放不久,沿途恐有匪徒出没,所以特地派了一个班随行保护。

耿飏一面策马而行,一面回忆着自己和陈明仁的交往。他想:从铁岭被扣,到盛情宴请;从老乡情,到同志情;从争辩打赌,到举杯共庆人民革命的胜利——这正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封面
目录
正文